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42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四十二卷

---

## 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4 年 1 月至 1848 年 2 月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编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前所写的著作。第三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4 年 8 月在巴黎会见以后所写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至四卷的补充,对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本卷第一部分主要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文摘要》说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的重视。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后来称赞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在《资本论》中多次加以引用。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一书摘要》,是 1844 年马克思在巴黎研读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所作的大量笔记之一。马克思对该书的评注表明,尽管他当时的经济学观点还处在形成的最初阶段,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采取鲜明的批判立场。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采取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关系看成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在《摘要》中已经开始表述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比较系统地阐述的异化理论的个

别原理。他用异化这个范畴来考察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他指出：“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见本卷第 30 页）。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三个未完成的手稿组成，这些手稿反映了当时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对自己的新的哲学、经济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作综合的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形成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时，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把它们的发展看作现实经济关系演变的反映。他肯定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功绩，又批判了他们的形而上学方法，揭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立场。

马克思在《手稿》中详尽地论述了异化和异化劳动的问题。“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著作中曾广泛使用过。而马克思首先把异化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用异化来分析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统治下，“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见本卷第 91 页）。劳动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工人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工人同生产行为本身的关系上：“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

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见本卷第 93、94 页）。

马克思还指出：异化劳动既然夺去了人的生产的对象，也就夺去了人所固有的真正的人的生活；人同他的劳动产品、他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他人相对立。

马克思还分析了异化劳动的产生以及它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强调指出，要消灭异化劳动、结束人的相互异化，必须废除私有财产，“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见本卷第 140 页）。

马克思在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即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时，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见本卷第 120 页）他的这种看法是用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来表述的，但已包含了他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

在《手稿》的最后部分，马克思专门用一章来谈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问题。马克思利用了费尔巴哈的积极成果，站在彻底

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成分和保守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他着重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是理解黑格尔哲学奥秘的关键。马克思揭示了《现象学》的伟大成果就在于它在阐述异化的各种形式时提供了“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同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指出黑格尔讲的异化的不同形式,无非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

马克思还揭露了黑格尔的阶级局限性,指出黑格尔虽然站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见本卷第163页),因此,黑格尔不能运用他的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预见到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编入本卷第三部分的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他在1845年3月写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草稿。李斯特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当德国年轻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马克思在评论中揭露了李斯特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实质,指出这是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大谈国家利益来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李斯特的论点,而且还发挥了自己关于“劳动”、“工人”、“生产力”、“交换价值”等经济学范畴的观点。此外,马克思还表述了他后来在一些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中进一步发挥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见。

本卷第二部分是恩格斯1844年发表在宪章派刊物《北极星报》上的一组文章和简讯。当时,恩格斯在英国直接参加了英国工

人运动,出席宪章派组织的群众大会。1843年他同《北极星报》建立联系,并从1844年开始为该报撰稿。他在为该报写的文章、通讯中报道了国际上的某些事件,阐明了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状况。他在《报刊和德国暴君》、《德国消息》、《啤酒骚乱》、《普鲁士的牧师专制》等通讯中揭露了普鲁士的反动制度、官吏的横行霸道和僧侣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举行起义。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当时旅居英国的恩格斯的密切注意。他写了两篇通讯:《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和《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同年6月,法国里昂附近的里夫-德-纪埃发生矿工罢工,恩格斯也及时写出了《法国消息》一文报道这一事件。恩格斯从这些事件中看到,工厂制度、机器技术的进步等等带来的后果,在大陆上和在英国,对工人阶级说来都是一样的;工人进行斗争的形式,也有相同之处。他认为,各国工人的非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是促使他们进行斗争的常见的社会原因。

本卷第三部分收入了恩格斯在居留巴门期间(1844年9月至1845年4月)写的两篇文章:《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它们反映了恩格斯当时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情况。

恩格斯在《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利用关于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报道材料,驳斥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论断,指出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优越。但是,恩格斯不同意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可以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指出这种移民区只是证明在集体所有制的



基础上可以更合理地组织经济生活,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手段。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工人联合的重要性:“当工人彼此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并追求一个目的时,同富人相比,他们就无比强大。(见本卷第236页)。

第三部分还包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居留期间(马克思从1845年2月至1848年3月,恩格斯从1845年4月至1846年8月)写的一些著作。恩格斯以英国工人的一次罢工为内容写的《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描述了这次罢工的详情细节。他在文章中说明了自己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目的,称这本书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是恩格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论三种外在统一》一书的长篇摘要。恩格斯在发表这篇摘要时加了前言和结束语,这两部分曾单独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傅立叶的这一著作,认为它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生动、非常明智的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在从事金融贸易方面的贪婪、诡诈、伪善和卑鄙。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尖锐地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是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揉合在一起的大杂烩,是“劣等的德国理论”,这种观论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一无所知。

《珀歇论自杀》是马克思利用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珀歇的回忆录中有关自杀问题的材料写成的。马克思通过这些材料揭露了法国社会的道德、风尚的腐朽和堕落。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彻底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外,所有其他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写的纲领性文献《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它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形成过程的最初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曾数次提到的这一文献长期没有找到。1968年在德国汉堡发现了《信条草案》以及收入本卷附录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盟文献。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第三部分还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4—1847 年写的一些札记和手稿片断,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当时写作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如《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表明马克思本来打算写一本书论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又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卷手稿片断》以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的札记手稿,则是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作准备的。

\* \* \*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为依据。大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并参照俄译文翻译的。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

## 目 录<sup>\*</sup>

说明 ..... —

卡·马克思  
(1844年1月—8月)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文摘要 .....	3—4
*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	5—42
一 论生产 .....	5
二 论分配 .....	5
三 论交换.....	12
四 论消费.....	31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43—181
序言.....	45
[第一手稿].....	49
工资.....	49
资本的利润.....	62
一 资本.....	62
二 资本的利润.....	63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65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66

---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地租.....	75
[异化劳动].....	89
[第二手稿] .....	104
[私有财产的关系] .....	104
[第三手稿] .....	112
[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	112
[共产主义] .....	117
[需要、生产和分工].....	132
[货币] .....	150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	156
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 修辞练习的说明 .....	182—185

弗·恩格斯

(1844年1月—8月)

报刊和德国暴君 .....	189—190
* 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	193
* 普鲁士局势 .....	194—195
* 德国消息 .....	196—197
一个叛徒的命运 .....	198—199
啤酒骚乱 .....	200—201
* 普鲁士的牧师专制 .....	202
* 圣彼得堡新闻 .....	203
* 法国消息 .....	204—206
瓦勒内战 .....	207—208
* 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	209—210

## 目 录

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 ..... 211—21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44年9月—1848年2月)

弗·恩格斯。大陆社会主义 ..... 217—218

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  
移民区记述 ..... 221—236

卡·马克思。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 ..... 237

卡·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 ..... 238

卡·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 239—271

[I 李斯特的一般评述] ..... 239

[II 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 ..... 252

[III 第三章片断]。[论地租问题] ..... 263

IV 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 ..... 268

卡·马克思。\*《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计划 ..... 272

卡·马克思。\*笔记本中的札记 ..... 273

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英国的一次罢工 ..... 277—291

弗·恩格斯。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王室”  
之间的不和。——维克同德国资产阶级的争执。  
——对巴黎木工的判决 ..... 292—293

弗·恩格斯。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 ..... 294—297

弗·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 ..... 298—299

卡·马克思。珀歇论自杀 .....	300—317
弗·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	318—359
[前言].....	31
一 .....	321
二 关于流通的经济原则的虚伪性 .....	328
三 破产的等级 .....	332
四 破产者的上升翼 .....	336
五 中心。——宏伟的色调 .....	340
六 下降翼。——肮脏的色调 .....	349
七 结论 .....	354
[结束语] .....	355
弗·恩格斯。费尔巴哈 .....	360—36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 批评的回答 .....	364—36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一卷手稿片断 .....	368—372
第一章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 观点的对立》的片断 .....	368
第三章 《圣麦克斯》的片断 .....	370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	373—380
卡·马克思。保护关税派 .....	381
卡·马克思。需求 .....	382—383
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 .....	384
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 .....	385—386
弗·恩格斯。改革派的利尔宴会。——赖德 律-洛兰先生的演说 .....	387—390

## 目 录

弗·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 .....	391—396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民主派兄弟协会”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 .....	397—399
卡·马克思。法国的局势 .....	400
弗·恩格斯。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 尔。——基佐的外交政策 .....	401—405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支持全民请愿书群众 大会] .....	406—409

## 附 录

致《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 .....	413—417
要求卡·马克思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有关当前政治 问题的著作的保证 .....	418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	419—423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1847年6月 .....	424—437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致汉堡同盟支部 .....	438—440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7年9月 .....	441—457
《北极星报》关于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的报道 .....	458—466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 .....	467—470
1847年11月30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的演说记录 .....	471—473
1847年11月30日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的演说记录 .....	474—475
1847年12月7日弗·恩格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的演说记录 .....	476

---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 协会 1847 年 12 月 31 日举行新年晚会的报道 .....	477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 1848 年 1 月 9 日马克思 在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 .....	478—480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的报道 .....	481
注释 .....	485—534
人名索引 .....	535—552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	553—563
期刊索引 .....	564—567

---

## 插 图

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的信的片断 .....	191
载有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 区记述》一文的《1845 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的封面 .....	219
载有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一 文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封面 .....	275
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 回答》一文和卡·马克思的著作《珀歌论自杀的》《社会 明镜》杂志的封面 .....	301



卡·马克思

1844年1月—8月

卡·马克思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sup>1</sup>

私有制。它的最初的结果：商业和一切活动一样，是商人收入的直接泉源。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价值。抽象的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萨伊认为决定实际价值的是效用，李嘉图和穆勒则认为生产费用。在英国人那里，同生产费用相对，竞争表现效用，在萨伊那里，竞争则表现生产费用。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是否应该生产，即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sup>2</sup>。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差别就在于人们在买卖中给予的等价物不是等价物。价格——生产费用和竞争的关系。只有能够垄断的东西才有价格。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假定，需求一减少，马上就影响到地租，并且立刻就使相当数量的最劣等的耕地停止耕种。这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忽略了竞争，而斯密的定义不包括肥沃程度。地租是土地的肥力和竞争之间的关系。土地的价值应当依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来计算。

资本和劳动的分离。资本和利润的分离。利润分为利润本身

---

在恩格斯的文章中是：麦克库洛赫。——编者注

---

和利息……利润是资本用来衡量生产费用的砝码,是资本所固有的,而资本又还原为劳动。劳动和工资的分。工资的意义。劳动对确定生产费用的意义。土地和人的分裂。人的劳动分为劳动和资本。

卡·马克思写于 1844 年上半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3 卷

\* 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sup>3</sup>

## 一 论 生 产

[XVIII]“为了使劳动存在,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从事劳动的人所使用的其他一切物品。”(第 8 页)“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从事少数几项操作所练出来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第 11 页)

“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从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同上)

## 二 论 分 配

### (1) 关于土地租金或地租

“土地具有不同程度的肥力。有一种土地,可以看作是什么也不生产的土地。”(第 15 页)“在这种土地和最肥沃的土地之间有一些中等的、即中等肥力的土地。”(第 16 页)“最肥沃的土地也不会同样轻而易举地提供它所能生产的一切。例如,一块土地每年能提供 10 夸特或者比这还多两、三倍的谷物。但是,它提供第一个 10 夸特是由于投入了一定的劳动量,而提供第二个 10 夸特则由于投入了更大的劳动量,等等,而且生产每一个新的 10 夸特都要求比生产前一个 10 夸特付出更多的费用。”(第 16—17 页)“当还没有在全部较好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并对这种土地的耕作投入一定量的资本时,所有投入农

业的资本都会带来同等数量的产品。可是每当达到一定的阶段,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追加产品不相应地减少,就不会投入任何追加资本。因此,在任何国家,人们从土地上获得一定数量的谷物之后,只有相应地付出更大的费用才能获得更大数量的谷物。”(第 [17]—18 页)“当农业需要一部分只能带来较少产品的资本时,对这部分资本的使用可以有两种办法:把资本或者投入一块初次耕作的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或者投入一块具有一等肥力的土地——在这上面已经投入了全部资本,并且在这块土地上能够使用这笔资本而不减少产品。至于把资本投入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还是投入具有一等肥力的土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取决于这两类土地的性质和质量。同一资本,如果投入较好的土地只生产 8 夸特谷物,而投入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可生产 9 夸特谷物,那么人们就会把它投入后一种土地,反之亦然。”(第 18—19 页)

“当土地什么也不生产的时候,就不值得费力去占有它。当只需要把一部分较好的土地投入耕作的时候,所有未经耕作的土地就什么也不生产,也就是没有价值。因此,这后一部分土地就没有所有者,谁着手使它具有生产能力,谁就可以把它变为自己的财产。在这个时期内,土地不支付地租”,这就是说,不存在对土地的生产能力的支付,而只是付利息,即为开垦这块土地所投入的资本的利润。(第 19—20 页)“但是,必须耕种二等土地或者在一等土地上投入追加资本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投入二等土地的资本带来 8 夸特,而投入土地<sup>N<sup>o</sup>1</sup>的追加资本带来 10 夸特,那么投入这笔资本的人就可以为获准耕种土地<sup>N<sup>o</sup>1</sup>而付出 2 夸特:“这种支付就是地租,即土地租金。”(第 20—21 页)“因此,地租按连续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效力降低的比例而增加。”(第 21 页)“如果人口增长到这样的程度,即耕种了所有的二等土地,而且不得不耕种只能生产 6 夸特而不是 8 夸特的三等土地”(这种情况同在较好的土地上投入带来较少产品的追加资本一样),那么土地<sup>N<sup>o</sup>2</sup>就带来 2 夸特租金,而土地<sup>N<sup>o</sup>1</sup>就带来 4 夸特租金。(第 [21]—22 页)“因此,无论是把资本投入具有各种不同肥力的土地,还是分批地连续投入同一土地,以这样的方式投入的资本的某几个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提供较多的产品。提供产品最少的那些部分只提供为补偿和报酬资本家所必需的一切。资本家每次新投入的资本所得到的东西不会多于这种公平的报酬,因为其他资本占有者的竞争妨碍他得到更多的东西。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超过这种报酬的一切东西据为己

有。因此，地租是对土地投资效力最小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同所有其他投资效力较大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之间的差额。”（第 [22]—23 页）有这样的情况：甚至肥沃土地的土地租金即地租也根据投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资本的总产品减去这些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后的余额来计算。萨伊把这种情况同文明国家的每块土地都要缴纳地租这一实际矛盾（见萨伊等人的著作）作了对比。可是，除此之外，租地农场主正在使用并且能够使用这样一部分资本，它只给他带来通常的资本利润，而支付不出任何土地租金。（第 30—31 页）

## [XIX] (2) 关于工资

“生产是劳动的结果；可是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它要加工的原料以及帮助它加工原料的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第 32 页）在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第 32—33 页）。“人们发现，对工人说来，更加方便的是以预付的方式把工人的份额付给工人，而不是等到产品生产出来和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人们发现，适合于工人取得其份额的形式是工资。当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完全得到了产品中他应得的份额时，这些产品便完全归资本家所有了，因为资本家事实上已经购买了工人的份额，并以预付的方式把这个份额支付给工人了。”（第 [33]—34 页）

§ 1：“产品按什么比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或者，工资水平按什么比例调节？（第 34 页）“确定工人和资本家的份额，是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的对象，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切自由的商业交易都由竞争来调节，讨价还价的条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第 34—35 页）“假定有一定数目的资本家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假定他们分配产品的比例也通过某种方法确定了。”如果工人人数增长了而资本量没有增加，增加的那一部分工人“就会试图排挤原来在业的那一部分。他们只有按较低报酬提供自己的劳动，才能作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必然降低”（第 35—36 页）。“假定情况与此相反，工人人数保持不变而资本量增加了；资本家拥有用以雇用劳动的大量资金，拥有一笔他们想从中获得利润的剩余资本；因此资本家就需要增加工人。可是所有这些工人都被其他雇主雇用了，要把工人吸引到自己这里来，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供较高的工资。而其他雇主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并且为了留用这些工人,他们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这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必然结果是:提高工资水平。”(第 36 页)所以,人口增加而资本量不增加会引起工资下降,在相反的情况下,工资则会提高。“如果这两种量以不同的比例增加,那么结果就是这样:一种量不增加,而另一种量的增加额等于双方实际增长额之差。”例如,人口增加 $\frac{2}{8}$ ,资本量增加 $\frac{1}{8}$ ,那么结果就是这样:资本量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 $\frac{1}{8}$ 。(第 36—37 页)因此,“如果资本量同人口的比例不变,工资水平也就保持不变;资本量与人口相比增加了,工资水平就提高;人口与资本量相比增加了,工资水平就下降”(第 37—38 页)。“根据这个规律,就很容易发现那些决定每个国家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处境的条件。如果人民的处境安逸、舒适,那么只要促使资本象人口一样快地增长或者阻止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就足以保持这种状况。如果人民的处境恶劣,那就只有加速资本的增长或者减少人口,才能改善这种处境;这就是说,使民族就业资金同构成这一民族的单个人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增大。”(第 38 页)“如果资本增长的自然趋势比人口增长快,那就很容易保持人民的安乐处境。相反,如果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比资本量增长快,那就会有极大的困难;工资就不断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将使人民越来越贫困,使他们染上恶习,使他们死亡。不管人口按什么比例比资本更快地增长,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比例死亡,这样,资本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比例将保持不变,工资水平也就会停止下降。”几乎所有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都证明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是一个自然趋势。没有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贫困。“人类的普遍贫困是一个事实,它只能用下述两个前提之一来加以说明:或者是人口具有比资本增长得快的趋势,或者是人们以某些方式阻碍了资本具有的增长趋势。”(第 [38]—40 页)

§ 2. “可以从以下几点推论出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

第一,妇女的生理构造。妇女最低限度在二十岁到四十岁期间至少每两年能够生一个孩子。因此一个妇女的自然生育数是十。(第 [40、42]、43 页)我们把一切不幸事故、不生育等情况都考虑在内,假定一对富有的夫妇只能培育五个孩子。(第 44 页)即使根据这一假定也很清楚,“过不了几年人口将增长一倍”(第 44 页)。

第二,可以把官方的人口统计表、尤其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统计表与这个



结论相对照。(第 44 页)然而这些统计表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口的增长。即使这些统计表表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处于不兴旺状态,这也证明不了什么。部分地是贫穷使得大多数在贫苦环境中出生的人口过早死亡,部分地是理智阻止许多婚姻的缔结或者阻止婚后生育的子女超过一定的数目。(第 45—46 页)

§ 3. 资本的增长趋势较小,因为“资本的任何增长都来源于储蓄。任何资本都是”年产品的一部分。“要把这部分产品留下来作为资本使用,它的所有者就必须放弃自己对它的消费。”(第 46—47 页)

年产品必然按两种方式分配。“或者是把一切维持生活和供享受的必需品充分地供给广大人民群众,而把较小部分的年产品用来增加富人的收入;或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供给严格地限制在绝对必需品上,这样,当然就会形成一个收入可观的阶级。”(第 48 页)在后一种情况下,平民阶级“不可能进行储蓄”(第 [48]—49 页);同时“四周都是穷人的富人阶级是不喜欢节约的”;富人非常“渴望立即得到享受;他们何必为了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实用意义的积蓄而放弃眼前的享受呢?”(第 49 页)在前一种情况下,无论是穷人阶级还是富人阶级都“没有要节约的强烈动机”;穷人阶级中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动机,因为他们没有仔细考虑过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即使有例外,有仔细考虑的人,他们也没有这种动机,因为他们有顾虑,怕放弃了眼前的享受而将来得不到补偿。(第 50—51 页)

看一看以下各页继续唠叨的无聊话。

“人口增长的趋势不论是大还是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均匀的。只要是在同样良好的条件下,人口在某个时期不论以什么样的比例增长,在其他任何时期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长。相反,资本增长得越多,增长的困难就越大,直到最终不能增长为止。”(第 55— [56] 页)

[XX]因此,“无论人口增长得多么慢,由于资本增长得更慢,工资将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以致有一部分人口经常由于贫困而死亡”(第 56—57 页)。

§ 4. “惩罚和奖励是立法的权力借以改变人类活动进程的两种主要手段,然而用这两种手段来抑制人类繁衍和增长的趋势是不太适宜的。”(第 57— [58] 页)

“立法在不直接起作用的情况下,往往能通过间接的作用而获得很大的

效果。”如果立法促使人口增长,那么“如此有害的立法就需要修改”(第 58—59 页)。“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利用人民制裁的巨大影响也许有很大的好处,对那些由于自己的不慎行为和由于建立人口很多的家庭而陷于贫困和依赖地位的人不遗余力地给予公开谴责,而对那些由于明智的节制态度而保证自己免于贫困和堕落的人给予公开赞扬,这样做也许就够了。”(第 59 页)“通过教育人民、改进立法、破除迷信将解决这个难题。”(第 59 页)至于加速资本的增长,则立法拥有反奢侈浪费法这一手段,立法可以把节俭提上议事日程而认为浪费是可耻的。(第 60 页)立法可以直接起作用,把每年的纯产品的一定部分提出来,使它变成资本。可是怎么提取呢?——通过所得税。“对于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资本,立法可以采取两种使用办法:借给要使用资本的人,或者留下自己使用。”(第 61 页)“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借给能够保证偿还的资本家和工厂主。每年由这些债款获得的利息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在下一年当作资本使用。假定每年获得的份额以这样的方式构成复利,并且保持较合理的利息率,那么资本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增加一倍。如果发现工资下降,那就到了提高所得税的时候了。如果工资的提高超出了必须使工人的状况但求温饱的水平,那就可以降低所得税。”(第 61—62 页)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口迅速地增加;而把资本投入质量越来越低的新开发的土地或分批地连续投入产品一次比一次少的同一块土地的必要性,也同样快地增加”(第 62 页)。“如果资本带来的产品逐年减少,资本家得到的收入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减少。经过一定的时间,资本的收入减少到只有拥有大量资本的所有者才能从中取得生存资料;这就是”上述做法的“最后结果”(第 62—63 页)。“假定工资水平保持不变。所有不靠劳动生活的人都靠资本的收入或者地租生活。上面所假定的情况的趋势是使靠资本为生的人变穷”,使土地所有者通过不断提高地租而变富。“除了土地所有者以外,社会上所有其余的人,工人和资本家,几乎是同样的贫穷。每当有土地出售时,人们为了获得它,总要付出巨额资本;因此每个人只能购到数量很有限的土地。”(第 63 页)“在这种情况下,出售土地可能是经常的,也可能是不多见的。如果是经常的,那么土地就被分成很小的地块,为数量众多的居民所占,其中哪一部分人的状况都不比工人好多少。如果自然灾害使得一年或几年的产品大大低于正常年景,那么一场普遍的和无法补救的灾难就会蔓延起来,因为只有在大部分人的收入多于靠工资为生者的收入的国家,才能靠这

些富人建立巨大的储备来减轻亏空所造成的后果。”（第 [63] —64 页）“人类追求完善化的能力，或者说，不断地从科学和幸福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人所组成的阶级：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主人，也就是说，他们相当富有，根本不必为取得能过比较安乐的生活的资财而操心。科学的园地就是由这个阶级的人来培植和扩大的；他们传播知识；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准备担任最重要的和最美好的社会职务；他们成为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教师、各个领域的发明家、人类赖以扩大对自然力的控制的一切巨大和有益的工程的领导者。”（第 65 页）“最幸福的人是拥有中等财产的人。”他们不依赖于人，“他们必然享受全人类所应享受的种种乐趣”。因此，“这个阶级应当成为社会的尽可能大的组成部分。为此，决不容许人口由于加紧资本积累而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收入非常之少。资本的收入应当大到足够使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能够享受余暇所提供的好处”。如果人口超过了必要的数量，那么这种情形“就会减少社会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剩余产品储备，而不是增加年产品中减去必须用来补偿所消耗的资本和维持工人生活之后的剩余产品额”（第 67 页）。

### （3）关于资本的利润

“在研究所有用来调节工资和利润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地租除外。因为它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须进行分配的那些产品减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第 76 页）“如果某种东西在两个人中间分配，那么很明显，能调节一个人的份额的东西也能调节另一个人的份额，因为从一个人那里拿走的东西必定给另一个人。”（第 76 页）“可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份额之间的比例取决于人口数和资本量之间的比例，并且因为前者的增长趋势比后者快，所以，这种变化的能动的本原 [XXI] 是在人口方面，而且可以把人口数，也可以说是把工资，看作调节者。”（第 76—77 页）“因此，利润——资本家在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取决于工资”，并与工资成反比例。（第 77 页）“利润不仅取决于占有者所得到的分配物的份额，而且也取决于分配物的总价值。”（同上）“随着投入农业的资本的利润减少，投入工场工业和所有其他各种工业的资本的利润也会减少。”（第 81 页）“前一种减少是不可避

免的；可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资本的利润率决定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的资本的利润率，因为如果在其他方面投资能获得更大的利益，那就没有人愿意继续把他的资本投入农业。因此，所有的利润都必定降低到农业利润的水平。”（第 81— [82] 页）

“要经过哪些阶段才达到这个结果呢？当对于额外数量的谷物有了需求，而这个数量的谷物只有通过耕种低质量的土地或者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带来利润较少的几份新资本才能生产出来时，耕作者对于以生产成效比以前小的方法来使用自己的资本是否合适，自然是犹豫不决的。这样一来，对谷物的需求就在这种商品的生产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日益增长。其结果自然是谷物的交换价值提高，而且当它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耕作者生产的谷物比以前少，却能够从自己的资本中获得和其他的资本所有者同样多的利润。在此之后，不是他的利润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所有其他的利润降低到他的利润已经降到的水平上。由于谷物价值的增大，劳动价值也随之增大。工人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而不论它们的价钱高还是低。如果它们的价钱比以前高，工人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比以前高，虽然他们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其他物品的数量一点没有变。因此，可以认为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虽然他们的劳动的实际报酬并没有增加。这样，所有的资本家就被迫付出较多的工资，他们的利润也就减少了。由于同一原因，农场主的处境也是如此。因此，随着人口逐渐增多以及必须把资本投入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所有资本的利润也逐渐减少。”（第 82— [83、84] 页）

### 三 论 交 换

§ 1. 交换是以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剩余和对他人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为基础的。交换的代理人“是承运者和商人”（第 85 页）。

§ 2. “如果一种产品和另一种产品相交换的数量取决于供求关系”，那么要问，“这个关系取决于什么”（第 89 页）。这个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费用”（第 [91]—92 页）。这个生产费用就是劳动。“因此，劳动量决定产品互相交换的比例。”（第 99 页）

§ 3. 直接劳动；资本：积累劳动。（第 100 页）“关于这两种劳动应当指出：（1）它们并不是始终按照同样比率取得报酬的；（2）它们不是始终按照

同样比率参加所有商品的生产。”（第 100—101 页）

“劳动和资本参加生产的过程是不同的，用三种情况就足以说明。两种极端情况和一种中间情况：(1) 产品只由直接劳动生产，没有资本参加；(2) 产品一半由直接劳动生产，一半由资本生产；(3) 产品只由资本生产，没有直接劳动参加。”（第 102—103 页）

“如果在生产中两种劳动都使用，如果在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另一种劳动的价格下降，那么在第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大量使用这种劳动生产的商品，同少量使用这种劳动生产的商品相比，其交换价值就提高了。提高的比例每次都取决于两种情况：(1) 取决于一种劳动的价格在另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下降的比例；(2) 取决于生产上述第一种商品所使用的第一种劳动的量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使用的这种劳动的量之间的比例。”（第 [103]—104 页）

因此，首要的和唯一的问题是：“如果工资提高，利润以什么样的比率下降？生产各种商品时所使用的两种劳动的比率取决于每个特殊情况的条件。”（第 104 页）

“我们把上述三种情况用 №1、№2、№3 来表示。如果所有商品都是在 №1——只用劳动来生产，而资本仅仅用于支付工资——的情况下生产的，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丝毫不差地按工资提高的比率下降。”（第 104 页）“假定所使用的资本是 1 000 镑，利润是 10%。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价值等于 1 100 镑，因为这笔款项将补偿资本连同它的利润。这些产品可以看作是由 1 100 个相等的部分组成的，其中 1 000 属于工人，100 属于资本家。”如果工资提高 5%，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下降 5%，因为现在资本家必须付给工人 1 050 镑，而不是 1 000 镑，也就是说，留给资本家的只有 50 镑，而不是 100 镑。“他的产品的价值也不会为了补偿他的损失而提高，[XIX] 因为我们已假定所有商品是在同一种情况下生产的；这些产品的价值始终为 1 100 镑，其中留给资本家的只有 50 镑。

如果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处在 №2 的情况下，那么利润下降量只有工资提高量的一半。假定 1 000 镑资本用于支付工资，另外的 1 000 镑用作固定资本；假定利润象以前一样是支出总额的 10%；那么产品的价值是 1 200 镑，因为这笔款项将补偿所消耗的资本连同 10% 的利润。假定工资提高 5%，那么资本家就要付出 1 050 镑的工资，而不是 1 000 镑；留给他自己的利润是

150 镑”；因此他的每一百个单位资本的利润只减少 2.5%，即工资提高率 5%）的一半。“如果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那 1 000 镑资本以一定的比例作为流动资本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消耗掉并且以后得到补偿，那么情况也完全一样。例如，在把 1 000 镑用于支付工资的同时，可以把 500 镑作为固定资本用于供长期使用的机器，500 镑用于购买原料和作其他费用。根据这样的支出预算，产品的价值等于 1 700 镑，即应该补偿的资本总数连同其 10% 的利润。在产品的 1 700 个部分中有 1 000 是工人的份额；700 是资本家的份额，其中 200 代表利润。如果工资上涨 5%，那么在 1 700 个部分中有 1 050 是工人的份额，650 是资本家的份额，他在补偿了自己的 500 镑流动资本之后，只有 150 镑的利润。这就是说，他的利润减少了 2.5%，与以前一样。”（第 106—107 页）

“如果所有商品的生产处在<sup>Nº3</sup>的情况下，那么，因为在这里不支付工资，工资的提高就不可能改变利润的数量。显而易见，这些商品的生产越接近这种极端情况，利润量就越不会由于这种提高而发生变化。”（第 107 页）

“如果我们假定，实际上发生了同样多的从中间到一个极端的情况以及从中间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这是很可能的），那么，行将发生的互相补偿的结果自然就是：利润下降量恰好为工资上涨量的一半。”（第 [107]—108 页）

“如果随着工资上涨，所有的利润下降了，那么很清楚，使用比资本小的劳动份额生产的所有商品，同使用较大劳动份额生产的商品相比，其价值就下降了。例如，如果把<sup>Nº1</sup>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保持不变，而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下降。如果把<sup>Nº2</sup>这种中间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保持不变，而生产条件接近于第一种极端情况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提高；生产条件接近于后一种极端情况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下降。在<sup>Nº1</sup>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承担了 5% 的追加支出；可是他们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在其他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商品去交换在<sup>Nº2</sup>的情况下（这里资本家只承担 2.5% 的追加支出）生产的商品，那么他们就从这些商品中多得到 2.5%。这样，他们由于换得了在<sup>Nº2</sup>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就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而且工资提高的结果只使他们的利润减少 2.5%。在这种交换中，对于在<sup>Nº2</sup>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来说，结果就完全相反。他

他们在生产自己的商品时已经多支出了 2.5% 的费用,并且他们由于用自己的产品换取了在<sup>Nº1</sup>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他们的利润就减少了 2.5%。”(第 108—109 页)“因此,总的结果是:所有的生产者,不管他们是通过生产还是通过交换占有在<sup>Nº2</sup>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都得承担 2.5% 的损失;其中 [XXIII] 生产条件接近后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占有者,承担的损失较少;最后,如果第一种极端情况的数目和后一种极端情况的数目相等,那么所有的资本家总的说来都承担 2.5% 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可以预料到的、利润的减少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第 110 页)“根据这些原则,很容易估计工资的提高对于各种产品的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所有的产品通常都同货币或者贵金属相比较。如果假定,货币是在<sup>Nº2</sup>的情况下即使用等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生产的(这大概很接近于实际情况),那么在类似条件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会由于工资的提高而发生变化;生产条件接近于第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价格将提高;接近于后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价格将降低;最后,对商品总量起作用的是补偿:价格既不提高也不降低。”(第 110—111 页)

#### § 4. 互相交换产品对各国有利:

( ) 如果“被正确理解的分工”要求互相交换;( ) 如果由于某些地方有较便宜的生活资料、较多的燃料,或者有能推动机器的充足水源,商品“只能或者更便于在这些地方生产”(第 112—113 页);( ) “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相比,用等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两种商品中的一种商品量比另一种商品量大,那么进行交换对两国是有利的”(第 119 页)。

§ 5. “人们从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总是来源于所获得的、而不是所提供的商品。因此,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所获得的利益都来源于进口的商品;国家通过进口而不是通过其他办法获取利益。”(第 120 页)“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工业品或食品,那么他不可能由于简单地把自己的商品脱手而获利。他只有把自己的商品脱手,换得了另一种商品,才能从获得的商品中得利:要知道,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商品比他要换取的商品价值高,那他是会把自己的商品保留着的。宁要另一种商品而不要自己的商品这一事实,证明另一种商品在他看来具有更高的价值。”(第 121 页)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在于简单地把自己的产品脱手,而在于用它来获得的东西。”(第 121 页)

## 媒 介

§ 6：“交换的媒介是这样一种商品：为了实现其他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首先在同其中一种商品交换时获得它，随后在同另外一种商品交换时把它付出去。”（第 125 页）金、银、货币。

§ 7：“货币的价值等于货币同另外的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或者在同一一定量的其他东西交换时付出的货币量。”（第 128 页）

这个比例是由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总量确定的。（同上）“如果假定，一方面把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把所有的货币集中起来，那么很清楚，在双方进行交换时，货币的价值”，即与货币进行交换的商品量，“完全取决于货币本身的量”（第 128—129 页）。“实际上情况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总量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交换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往往是小量地，而且是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中进行的。同一块铸币，今天用作这种交换，明天可以用作另一种交换。一部分货币用于交换的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于交换的次数很少，第三部分被积蓄起来，不用于交换。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中，假定所有铸币都进行了次数相同的交换，那么就可以找到一个以每块铸币用于交换的次数为基础的平均数。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均数确定为任意数，例如<sup>10</sup>。如果国内现有的每块铸币都已用于十次购买，那么这就如同货币总量增到十倍而每块铸币只用于一次购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所有商品的价值等于所有货币价值的十倍，因为每块铸币的价值等于它能换取的商品量的价值，因为每块铸币在一年之内用于十次交换。”（第 129—130 页）

〔XIV〕“如果不是每块铸币在一年之内用于十次交换，而是货币总量增到十倍，并且每块铸币只用于一次交换，那么很清楚，货币总量的每次增加都会引起这些铸币中的每一个铸币的价值相应降低。因为我们假定，所有货币能换取的商品量保持不变，所以，货币总量的价值在其总量增加之后不会变得比以前大，如果我们假定货币量增加 $\frac{1}{10}$ ，那么它的每个部分（比如说 1 盎斯）的价值就得减少 $\frac{1}{10}$ 。如果货币总量为一百万盎斯并且增加 $\frac{1}{10}$ ，那么不管整体的价值怎样减少，这种减少必然相应地反映在整体的每个部分上；一百万的 $\frac{1}{10}$ 与一百万之比如同 1 盎斯的 $\frac{1}{10}$ 与 1 盎斯之比一样。”（第 130—131 页）“如果货币总量只有假定数的 $\frac{1}{10}$ ，而它的每个部分在一年之内用于十



次购买,那么这就同货币总量与商品总量的 $\frac{1}{10}$ 进行了十次交换一样。可是如果假定数的 $\frac{1}{10}$ ,即货币总量,以某种比例增加,那么这就同整体或者假定数以这个比例增加一样。因此,不管货币总量增加或者减少的程度如何,只要其余东西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这个总量的价值和总量的每个部分的价值就相应地减少或者增加。很清楚,这个原理是绝对真理。每当货币的价值提高或者下降,而货币所能换取的商品量以及流通速度保持不变,价值变化的原因就必定是货币量的相应增加或减少,决不能归于其他原因。如果商品量减少而货币总量保持不变,那么这就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类似的种种变化是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化的结果。流通速度可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购买次数。购买次数的任何增加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总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一样;购买次数的减少则起相反的作用。”(第 131—132 页)“如果年产品的一部分——例如,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或不同货币交换的部分——根本不用于交换,那么这部分产品就不能计算在内,因为不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对于货币来说就象根本不存在一样。”(第 132—133 页)

§ 8. 用什么来调节货币量呢?“制造货币可以在两种情况下进行。政府要么给予增加或减少货币的自由,要么自行调节货币量,随自己的意愿使之增加或减少。”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把它的造币厂向公众开放,并为所有要求把自己的金银条块变成货币的人铸造货币。拥有金银条块的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变成货币的金银条块比其原来的形式具有更高的价值时,才要求把金银条块变成货币。而这种情况只有当货币具有异常的价值时、只有当用同量的铸成货币的金属所换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比用同量的条块形式的金属所换得的更多时才能发生。因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量,所以货币少时价值就高”。于是就把金银条块变为货币;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增加又恢复了原先的比例。因此,如果货币超过了金银条块的价值,那么在事情自由进展的情况下,私人就直接干预,通过增加货币量使平衡恢复。(第 134—136 页)“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大,以致货币的价值低于金银条块的价值,那么就还用同一方式立即把铸币变为金银条块的办法恢复原先的比例。”(第 136 页)

[XXV]“因此,只要货币量可以自由地增加或者减少,这个量就由铸币金属的价值调节,因为,是增加货币量还是减少货币量对私人有利,这要看

铸币形式的货币价值是大于还是小于金银条块形式的货币价值。”（第 137 页）“可是，如果货币量由铸币金属的价值决定，那么什么东西来调节这个价值呢？金和银都是商品，是需要使用劳动和资本的产品；因此，金和银的价值，象所有其他产品的价值一样，由生产费用调节。”（同上）

在谈到货币和金属价值的这种平衡并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来描述时，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如果说，例如生产费用最终——或更准确些说，在需求和供给不是经常地即偶然地相适应的情况下——决定价格（价值），是个不变的规律，那么，需求和供给的不相适应，从而价值和生产费用没有必然的相互关系，也同样是个不变的规律。的确，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sup>4</sup> 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把国民经济学归结为一些严格而准确的公式的情况下，他们要抽象地表达上述运动，基本的公式就必定是：在国民经济中，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从这种偶然性的运动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规律的形式中。——

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既

然人使这种中介活动本身外化,他在这里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失去人性的人而活动;物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用物进行的活动变成某种在人之外的、在人之上的本质所进行的活动。由于这种异己的媒介——并非人本身是人的媒介,——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媒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媒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自我目的。同这个媒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最初关系的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这个媒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在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起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因此,凡是人的这种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可以转移给这个媒介。因此,这个媒介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媒介相脱离的人也就穷到什么程度。——

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

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为了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2)为了私有财产的社会;(3)为了社会的私有财产。

但是,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5 货币的情况也是一样。——

为什么私有财产必然发展到货币呢?这是因为人作为喜爱交往的存在物必然发展到交换 [XXV],因为交换——在存在着私有

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其实,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是价值。货币才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因为进行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来互相对待,所以物本身就失去人的、个人的财产的意义。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社会关系已经是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私有财产是自身异化了的。因此,这种关系的独立存在,即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 *système monétaire*<sup>6</sup>, 的对立之所以不能给前者——尽管它充满智慧——带来决定性胜利,是因为,如果说,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如果说,随后走来一个有见识的、老于世故的国民经济学家,向他们证明:货币是一种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而它的价值也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生产费用同需求(竞争)和供给的关系,取决于生产费用同其他商品的数量或竞争的关系,——那么,这个国民经济学家得到的公正反驳是: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后者归根到底存在于货币之中,而货币又存在于贵金属之中;可见,货币是物的真正的价值,所以货币是最希望获得的物。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学说甚至最终也归结为这种明智的道理,所不同的只是他具有一种抽象能力,使他能在所有的商品形式中看到货币的这种存在,从而不相信货币的官方的金属存在的专有价值。——货币的金属存在仅仅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货币灵魂的官方的、可感知的表现。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贵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

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越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是天然生长的而是人制造的,用国民经济学的话来表达就是,它的作为货币的价值越是同交换价值或者同它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的货币价值成反比例,那么,货币作为货币——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或交换过程中内在的、自在的、潜在的相互关系——的自身存在就越适合于货币的本质。因此,纸币和许多纸的货币代表(象汇票、支票、借据等等)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较为完善的存在,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

在信用业——它的完善的表现是银行业——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假象所迷惑的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 [XXVI] 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

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

信贷的本质是什么构成的?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谈信贷的内容——这个内容仍然是货币。就是说,我们不说这种由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所表示的信任的内容: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把某种价值贷给他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要求为信贷支付利息,就是说他不是高利贷者——相信这另一个人不是骗子,而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里,表示信任的人,象夏洛克一样,认为“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

信贷在两种关系和两种不同情况下是可以想象的。这两种关系是:一个富人贷款给一个他认为是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这种类型的信贷属于国民经济学的浪漫的、温情的部分,属于它的迷误、过分行为、例外,而不属于常规。即使假定有这种例外,有这种浪漫的可能性,对富人来说,穷人的生命本身、他的才能和他的努力也都是归还债款的保证;也就是说,穷人的全部社会美德,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他的存在本身,在富人看来也都是偿还他的资本连同普通利息的保证。因此,债权人把穷人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情,因为这是他的资本连同利息的死亡。请想一想,在信贷关系中用货币来估价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不言而喻,债权人除了有道德上的保证以外,还有法律强制的保证以及他的债务人方面的或多或少的实际保证。如果债务人自己是富裕的,那么,信贷就直接成为便于交换的媒介,即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

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 and 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 and 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 and 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 and 始终一贯的卑鄙。

在信用业的范围内，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学对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双重的证实：(1)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因为信贷只提供给已经富裕的人，并且使富人有进行积累的新机会。至于穷人，他认为富人对他的随意判决就是对他的整个存在予以肯定或否定，因为他的整个存在完全取决于这种偶然性。(2)尔虞我诈 and 假仁假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对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不仅简单地判决他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承认，因而是社会的贱民，坏人。穷人除了自己的穷困还遭受这样的屈辱：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富人请求贷款。[XXVII](3)由于货币的这种纯观念的存在，人伪造货币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只用他自己的人格就行了：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货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这种信贷关系——不论对表示信任的人来说，还是对需要这种信任的人来说——成了买卖的对象，成了相互欺骗 and 相互滥用的对象。同时这里还十分清楚地暴露出，这种国民

经济学上的信任的基础是不信任：疑惑不定地考虑应该还是不应该提供借贷；探察信贷寻求者的私生活的秘密等等；透露这个人的——一时困境，使他的信用突然动摇，以便把对方整垮，等等。破产、虚假企业等等的整个体系……在国家信贷中，国家地位同上面说到的单个的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等等。

(4)信用业最终在银行业中完成。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在国民经济的阿雷奥帕格——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

因为在信用业中，对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承认，象对国家等的信任一样，采取了信贷的形式，所以隐藏在道德上的承认这种虚情假意之中的秘密，这种道德的不道德的卑鄙行为，以及对国家的信任中所包含的假仁假义和利己主义也就暴露了出来，并且显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性质。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



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因此,以下论点是相同的: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它恰好也是这个相互结合的运动。”亚当·斯密说:“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sup>7</sup>

我们看到,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XXVIII]国民经济学——同现实的运动一样——以作为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的人同人的关系为出发点。如果假定一个人是私有者,也就是说假定一个人是特殊的占有者,他通过这种特殊的占有证实自己的人格,并使自己同他人既相区分又相联系,——私有财产是他个人的、有其特点的、从而也是他的本质的存

在,——那么,私有财产的丧失或放弃,就是人和私有财产本身的外化。我们在这里只谈后一个定义。如果我把我的私有财产出让给另一个人,那它就不再是我的了;它成为一种与我无关的、在我的范围之外的物,一种对我来说是外在的物。这就是说,我使我的私有财产外化了。因此,对于我来说,我把它看作是外化的私有财产。但是,如果只对于我来说,我使它外化了,那么,我也不过把它看作是外化的物,我扬弃的只是我同它的个人的关系,我使它返回到自发的自然力的支配之下。私有财产只有当它不再是我的了,而且并不因此而不是一般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同在我之外的另一个人发生了它以前同我所处的那种关系的时候,换句话说,当它成为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才成为外化的私有财产。如果把强制的情况除外——我怎么会非把我的私有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不可呢?国民经济学回答得很正确:由于贫困,由于需要。另一个人也是私有者,然而另一种物的私有者,这种物是我需要的,我没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愿意没有它,在我看来,它是补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

使两个私有者发生相互关系的那种联系是物的特殊的性质,而这个物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物质。对这两种物的渴望,即对它们的需要,向每一个私有者指明并使他意识到,他同物除了有私有关系以外,还有另一种本质的关系,即他并不是他自认为的那种单独的存在物,而是总体的存在物,他的需要也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有内在的所有权关系,因为对某种物的需要最明显、最无可争辩地证明:这种物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这样,两个所有者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过,是在确认私有权的同时放弃的,或者是在私有权

关系的范围内放弃的。因此,每一个人转让给别人的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因此,两个私有者的社会的联系或社会的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表现为双方外化的关系或作为这两个私有者的关系的外化,而在简单的私有财产中,外化还仅仅是就自身而言、是单方面发生的。

因此,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财产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的对立。

私有财产本身由于它的相互外化或异化而获得外化的私有财产这个定义。首先,因为它不再是这种财产占有者的劳动产品,不再是占有者的个性的特殊表现,因为占有者使它外化了,它脱离了曾是它的生产者的占有者,并且对于不是它的生产者来说获得了私人的意义。私有财产对占有者来说失去了私人的意义。其次,它同另一种私有财产发生关系,并被认为同这种私有财产是相等的。它的地位被另一种私有财产所代替,如同它本身代替了另一种私有财产一样。因而,私有财产从双方来看都表现为另一种私有财产的代表,表现为同另一种自然产物相等的东西,并且双方是这样相互发生关系的:每一方都代表另一方的存在,双方都作为它的自身和它的异在的代替物相互发生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本身的存在就成了它作为代替物,作为等价物的存在。现在,它不表现为同自身的直接统一,只表现为同某个他物的关系。它的作为等价物的存在不再是具有它的特点的那种存在了。因此,它成了价值并且直接成了交换价值。它的作为价值的存在是它自身的一种不同于它的直

接存在的、外在于它的特殊本质的、外化的规定 [XXIX] ;只不过是某种相对的存在。

如何更详细地规定这个价值以及这个价值如何成为价格,应当在其他地方加以探讨。

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异化的劳动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达到自己的顶点,是由于(1)一方面,谋生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会组合;(2)购买产品的人自己不生产,只是换取别人生产的东西。在上面说到的那种外化的私有财产的粗糙形式中,在物物交换中,两个私有者中任何一人生产的东西都是他的需要、他的才能和手头有的自然材料直接促使他去生产的。因此,其中任何一人只是用自己的产品余额去交换另一人的产品余额。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通过交换,他的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这种劳动的目的和它的存在已经不同了。产品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它同生产者直接的个人关系而生产的。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

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

联系；(2) 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 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 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

因此，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

同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表现为做买卖 [Schacher]<sup>8</sup> 一样，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

现在正是人的劳动的统一只被看作分离，因为社会的本质只在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中、在异化的形式中获得存在。分工随着文明一同发展。

在分工的前提下，产品、私有财产的材料对单个人来说越来越获得等价物的意义；而且既然人交换的已不再是他的余额，而是他所生产的、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所以他也不再以他的产品直接换取他需要的物了。等价物在货币中获得自己作为等价物的存在，而货币现在是谋生的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交换的媒介（见上文）。

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

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如果说,在等价物中,在价值中已经包含着私有财产的外化这一规定,那么,这种外化在货币中就获得感性的,甚至是物质的存在。

[XXX]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能够把这整个发展只作为某种事实,作为偶然需要的产物来把握。

劳动同它自身的分离等于工人同资本家的分离,等于劳动同资本——它的最初形式分为地产和动产——的分离……私有财产的最初定义是垄断;因此,一旦私有财产获得政治结构,这就是垄断的结构。完成了的垄断是竞争。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和精神在不同的人之间和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分离,是劳动同它的对象以及同它那作为精神的自身的分离。分配是私有财产的积极实现自身的力量。——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假定有这样一个情况:政府想把货币的增加量或减少量固定下来。“如果它力求把货币量保持在能保证物的自由流通的限度内,那么,它就提高已铸成货币的金的价值,因此,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金块变成铸币。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私造货币的事,于是,政府不得不用惩罚的方法加以制止。如果政府要把货币量保持在必需的水平之上,那么,它就压低货币的价值,这样,每一个人都竭力把货币铸成金块,对此政府只好又采用惩罚的办法。但是,利欲胜过对惩罚的恐惧。”(第 137—138 页)

§ 9:“如果两个人各欠对方 100 镑,他们就不必相互支付这笔款项,而只

要相互交换他们的债券就行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就有了汇票,这在实行不文明的政策的时期尤为必要,因为这种政策禁止并严惩贵金属出口。”(第 142、[143—144]页)

§ 10 通过纸币来节省非生产性消费。(第 146 页及以下各页)

§ 11 “使用纸币的弊端表现在:(1)发行纸币的人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2)伪造。(3)外汇行市,行市变化。”(第 149 页)

§ 12 贵金属是商品。“人们只出口那些输出国比输入国价廉的商品,而只进口那些输入国比输出国价贵的商品。”这样,“贵金属应该进口还是出口,取决于该国贵金属的价值”(第 175 页及以下各页)。

§ 13 “贵金属的价值相当于用来同贵金属相交换的其他物品的数量。”(第 177 页)这个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是不同的。“‘生活费用不高’的意思是:在某个地方能用较少的货币买到生活资料。”(第 177 页)

§ 14 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商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总是尽量设法贱买贵卖”(第 215 页)。

## 四 论 消 费

“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的、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第 237 页)

§ 1 消费分为:(1)生产性消费。它包括为了生产物品所花费的一切,也包括工人的生活资料;其次是生产操作所需的机器、工具、厂房、牲畜;最后是原料——“或者是直接用以制成产品的东西,或者是可以从中提取产品的东西”(第 238—239 页)。“只有第二类物品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不完全消费掉。”(第 239 页)

(2)非生产性消费

“仆役的工资,凡不是为了产品、不是为了借助一物品而生产另一等价物的消费,都是非生产性消费。”(第 240 页)“生产性消费本身是一种手段,即生产手段;非生产性消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通过消费得到的享受,是消费前的一切活动的动机。”(第 241 页)经过前一种消费一无所失,而经过后一种消费则失去一切。(同上)“生产地消费的东西总是资本。这就是生产性消费的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地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第 [241]—242 页)。“一国的生产力在一年中所创造的全部东西构成年总产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资本。总产品中补偿资本以后剩余的部分构成纯产品;它只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地租进行分配。”(第 [242]—243 页)“它是一种基金,国民资本的一切追加部分通常都来源于这种基金。”(第 243 页)与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相应的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第 244 页)

§ 2:“在一年内生产的一切,在下一年就消费掉”——生产地消费掉或非生产地消费掉。(第 246 页)

§ 3 “消费随着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一个人进行生产只是由于他需要占有。如果所生产的物品就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在他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数量后,他就停止劳动。”如果他生产出多余的物品,那么这是因为他想在交换中用这种“多余的物品”去换取任何其他物品。他生产这种东西,是因为他渴望占有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生产对他来说是获得另一种东西的唯一手段,而他获得这另一种东西要比他被迫自己去生产时便宜。在分工的情况下,他只限于生产某一种东西或这种东西的一部分;他自己只使用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则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所有其他商品;如果一个人只限于生产某种单一的东西,并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发现,他从他所渴求的各种东西中得到的要比他自己 [XXXI] 生产这些东西时得到的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生产,那就不会有交换。这种人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也不提供什么东西去出售。他占有一种物品,他生产了这种物品,但不打算把它们脱手。如果在这种场合拿‘供给和需求’这一用语来作比喻,那么供给和需求在这里是完全符合的。至于可卖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我们完全可以把年产品中每个生产者消费掉的部分——不管是他生产的或是购买到的——撇开不谈。”(第 [249—250], 251 页)

“我们在这里谈论供给和需求,也只是就总的情况来说的。如果我们谈到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供给等于它的需求,那么我们谈的并不是一种或两种商品,而是想说,该国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整个说来等于该国能够提供交换的所有商品。尽管总的说供给和需求相等,但是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某种或几种单个商品的生产多于或少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 251—252 页)“构成需求必须有两个条件:要有得到某种商品的愿望和拥有可以提供交换



的等价物品。‘需求’这一用语意味着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如果缺少其中之一，购买就不能实现。拥有等价物品是任何一种需求的必要基础。一个人想占有某些物品，但是又不提供什么东西来换取这些物品，那种希望是徒劳的。一个人所提供的等价物品就是需求的工具。他的需求量就是用这个等价物品的价值来衡量的。需求和等价物品是两个可以相互代替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每个从事生产的人都力图占有不同于他所生产的物品的另一些物品，而这种意图即这种愿望的大小是以他不想留下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来衡量的。同样明显的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生产的而又不想自己消费的物品拿出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可见，他的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是相等的，或者说，他的需求，正好等于他不想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第 252—253 页）

穆勒在这里以其惯于嘲讽的尖锐性和明确性分析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交换。

人——这就是私有制的基本前提——进行生产只是为了占有。生产的目的就是占有。生产不仅有这样一种功利的目的，而且有一种自私自利的目的；人进行生产只是为了自己占有，他生产的物品是他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的物化。因此，人本身——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下——以他自己直接需要的量为他生产的尺度，这种需要的内容直接是他所生产的物品本身。

因此，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的東西不多于他直接的需要。他需要的界限也就是他生产的界限。因此需求和供给就正好相抵。他的生产是以他的需要来衡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交换，或者说，交换归结为他的劳动同他劳动的产品相交换，这种交换是真正的交换的潜在形式（萌芽）。

一旦有了交换，就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但是这种剩余产品并没有超出自私自利的需要。相反，它只是用以满足这样的需要的中介手段，这种需要不是直接物化在本人的产品中，

而是物化在另一个人的产品中。生产成为收入的来源,成为谋生的劳动。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需要是生产的尺度,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产品的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产品的占有,是衡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需要得到满足的尺度。

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象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象你的生产的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也就是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同另一个人的产品有消费关系。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因此,我们的交换也就不可能是那种证明我的产品 [XXIX] 是为你而生产的产品的中介运动,因为我的产品是你自己的本质即你的需要的物化。问题在于,不是人的本质构成我们彼此为对方进行生产的纽带。交换只能导致运动,只能证明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产品从而对另一个人的产品的关系的性质。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看作是另一个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物化的私利。

当然,你作为人同我的产品有一种人的关系;你需要我的产品;因此,我的产品对你来说是作为你的愿望和你的意志的对象而存在的。但是,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对我的产品来说却是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和意志。换句话说,你的人的本质,因而也就是同我的人的产品必然有内在联系的本质,并不是你支配这种产品的权力,并不是你对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因为我的产品所承认的不是人的本质的特性,也不是人的本质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

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

如果我生产的物品超过了我自己能够直接消费的,那么,我的剩余产品是精确地估计到你的需求的。我只是在表面上多生产了这种物品。实际上我生产了另一种物品,即我想以自己的剩余产品来换取的、你所生产的物品,这种交换在我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因此,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在这里,掠夺和欺骗的企图必然是秘而不宣的,因为我们的交换无论从那方面或从我这方面来说都是自私自利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私利都力图超过另一个人的私利,所以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设法互相欺骗。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力。但是,我们互相承认对方对自己的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如果身强力壮,我就直接掠夺你。如果用不上体力了,我们就互相讹诈,比较狡猾的人就欺骗不太狡猾的人。就整个关系来说,谁欺骗谁,这是偶然的事情。双方都进行观念上和思想上的欺骗,也就是说,每一方都已在自己的判断中欺骗了对方。

总之,双方的交换必然是以每一方生产的和占有的物品为中介的。当然,我们彼此同对方产品的观念上的关系是我们彼此的需要。但是,现实的、实际的、真正的、在事实上实现的关系,只是彼此排斥对方对自己产品的占有。在我心目中,唯一能向你对我的物品的需要提供价值、身价、实效的,是你的物品,即我的物品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彼此的产品是满足我们彼此需要的手段、媒介、工

具、公认的权力。因此,你的需求和你所占有的等价物,对我来说是具有同等意义的、相同的术语。你的需求只有在对我具有意义和效用时,才具有效用,从而具有意义;如果单纯把你看作一个没有这种交换工具的人,那么,你的需求从你这方面来说是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而在我看来则是实现不了的幻想。可见,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毫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有人的关系。但是,手段是支配物品的真正的权力。因此,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产品顽强地不服从我们自己,它似乎是我们的财产,但事实上它是它的财产。我们自己被排斥于真正的财产之外,因为我们的财产排斥他人。

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XXXIII]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

当然,在你心目中,你的产品是占有我的产品从而满足你的需要的工具、手段。但是,在我心目中,它是我们交换的目的。相反,对我来说,你是生产那在我看来是目的的目的物品的手段和工具,而你对我的物品也具有同样的关系。但是,(1)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你为了占有我的物品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你的物品的生产者。(2)你自己的物品对你

来说仅仅是我的物品的感性的外壳,潜在的形式,因为你的生产意味着并表明想谋取我的物品的意图。这样,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你象奴隶一样从事劳动,目的是为了你所愿望的对象永远不再给你恩赐。如果我们被物品弄得互相奴役的状况在发展的初期实际上就表现为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那么这仅仅是我们的本质关系的粗糙的和直率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我们彼此的价值就是我们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因此,在我们看来,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某种没有价值的东西。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

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我们的假定中出现的不同因素。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

第二: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

我的劳动是什么,它在我的物品中就只能表现为什么。它不能表现为它本来不是的那种东西。因此,它只是我的自我损失和我的无权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

(3)“显然,每个人加在产品总供给量上的,是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消费的一切东西的总量。无论年产品的一部分以什么形式落到这个人的手里,只要他决定自己一点也不消费,他就希望把这一部分产品完全脱手;因此,这一部分产品就全部用于增加供给。如果他自己消费这个产品量的一部分,他就希望把余额全部脱手,这一余额就全部加在供给上。”(第 253 页)“可见,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年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财富,并且因为每个人的供给也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必然是相等的。供给和需求处于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之中。每一种被供给的、被运往市场的、被出卖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需求的对象,而成为需求对象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产品总供给量的一部分。每一个商品都始终同时是需求的对象和供给的对象。当两个人进行交换时,其中一个人不是为了仅仅创造供给而来,另一个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创造需求而

来,他的供给对象、供给品,必定给他带来他需求的对象,因此,他的需求和他的供给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始终相等,那么,一个国家的全体人员的供给和需求,总起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无论年产品总额如何巨大,它永远不会超过年需求总额。有多少人分配年产品,年产品总量就分成多少部分。需求的总量,等于所有这些部分产品中所有者不想留下供自己消费的东西的总额。但是,所有这些部分的总量,恰恰等于全部年产品。”(第 253—255 页)

人们对此提出异议:“同需求相比,生活资料 and 商品经常大大过剩。我们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然而它也否认不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第 255 页)。

“虽然每一个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的人的需求等于他的供给,但是仍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他在这里碰不到他想找的那一类买者;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要他想用来交换的那种物品。尽管如此,严格地说,需求还是等于供给,因为他想用他提供的物品去换取某种物品;因为货币本身是一种商品,除了把它用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消费,谁也不想把它用于其他目的。”(第 256 页)“既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等,那么当市场上有一种商品或生活资料超过需求时,就会有另一种商品或生活资料低于需求。”(同上)如果个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那么总的供给和需求就始终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年产品怎样多,也不会有任何商品过剩。现在假定,需求和供给的完全一致被部分地破坏了,例如,对谷物的需求不变,而呢绒的供给却显著增加。这时,呢绒就过剩了,因为对呢绒的需求并没有增加,但是必然会发生另一些商品的相应短缺,因为所生产的呢绒的追加量只能靠一种方法获得,即从其他一些商品的生产中抽出一笔资本,因此这些商品的产量减少了。但是,如果某一商品的数量减少了,而需求的量仍然较大,那么这种商品就会短缺。因此,在同一个国家中,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量,在另外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量不低于其需求量的情况下,是决不可能相应地超过其需求量的。”(第 256、257—258 页)

“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供给过剩的商品跌价,而短缺的商品则涨价。前一种商品跌价,很快会由于利润减少而把一部分资本从这类商品的生产中抽出来。短缺商品涨价,就会把一部分资本吸收到这个生产部门。这种运动一直要进行到利润平均化为止,就是说,一直要进行到需求和供给一致为止。”(第 258 页)“可以用来证明年产品能够

比消费增加得更快这一论断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只消费最必需的物品,因而年产品的全部剩余就会节约下来。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人类天性的原则是不相容、不符合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研究它的结果,以便证实产品和对产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第 258—259 页)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获得的部分年产品——除去他消费的最必需的物品——就用于生产。整个国民的资本用于生产原料和小量的日用品,因为这就是唯一需求的商品。既然每个人在年产品中所占的份额,除去他所消费的,都用于生产,这一部分年产品就花费在供原料生产和某些日用品生产所需的物品上。但是这些物品本身恰恰就是原料和日用品,因此不仅每个人的需求完全包括在这些物品之中,而且全部供给也包括在这些物品之中。已经证明: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为年产品中超过消费部分的余额成了需求的对象,而这全部余额又成了供给的对象。可见,同需求相比,生产决不会提高太快。生产是需求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生产只有在创造需求时才创造供给,是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并且使二者相等。”(第 259—260 页)

(4)“所有的消费都是由个人或政府进行的。政府消费的东西,没有作为资本被消费掉,没有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它仅仅被消费掉,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是,这种消费是保护任何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因。不过,如果其他东西不是以不同于政府消费的方式来消费,那就根本没有产品了。”

(因此,穆勒可以进一步说,那时也就根本没有政府了。)(第 261—262 页)

“国家收入是从土地租金或地租,从资本的利润或从工资中抽取的。”(第 262 页)“国家收入按什么比例并以何种方式从这三种来源 在斯卡尔培克看来,利息有:(1)货币利息,(2)地租,(3)作为地租特殊形式的租金。之一中抽取呢?这就是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第 262 页)抽取国家收入的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我们先考察第一种。(第 262—263 页)



(5) 如果国家的支出从地租中支付,那就不“影响国家的工业。土地的耕种取决于资本家,他投身于这一事业是因为它会给他的资本带来通常的利润。对于资本家来说,把剩余的产品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还是以赋税的形式支付给政府税吏,这是无所谓的”(第 264 页)。以前,君主靠归属于他的地产(领地)支付他的绝大部分日常费用,而军费则靠他的贵族支付,也只有在这个明确的条件下才把地产分封给贵族。“可见,在那时,政府的全部支出,少数除外,都是从地租中支付的。”(第 [264]—265 页)因此,国家的支出从地租中支付,有很大的好处。“资本占有者可以从这里获取利润,工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工资而没有任何扣除,每个人可以用最有利的使用方法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不会由于捐税的有害影响,被迫把自己的资本从国内生产效率较高的领域转到另一个生产效率较低的领域。”(第 266 页)

显然,穆勒象李嘉图一样,反对向任何政府提出关于把地租作为税收的唯一来源的想法,因为这对一个特殊的单个人阶级来说是偏颇不公的负担。但是——这是一个重要而又狡诈的“但是”——地租税从国民经济的观点来看是唯一无害的,因而从国民经济的观点来看也是唯一公正的税收。国民经济学提出的与其说是吓人的不如说是诱人的唯一顾虑是:“即使在一个具有一般的人口密度和面积的国家里,地租水平也会超过政府的需求。”——

“人们买和卖现存的地租,做买卖的人是把希望寄托在地租上的。因此,它应当不计入任何特别税之内”,或者至少应当给它以可望有所提高的前景。人们做买卖的念头是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现在我们假定,在立法机关的支配下,借助于它制定的法令,并在一切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纯产品的数量增加一倍。在这种场合,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去阻碍立法机关行使权力,而是有许许多多理由让它来行使权力”,以便“从这种新的来源中支付国家的支出,免除公民们对支付这些支出的任何负担。这样的措施不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不公正。他所得到的地租额,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由于农业上的某种改良可望得到的地租额,仍然会保持不变,而社会的其他成员得到

的好处却很大”（第 268—269 页）。

“立法机关实际上具有我们所设想的权力。它采取一切措施增加人口，从而增加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样，它就迅速地增加了农业的纯产品，就象出了奇迹一样。如果立法机关实际上有步骤地去做它想象中会通过某种直接的行动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也不会使现状有什么改变。”（第 269—270 页）“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在土地上或多或少更有效地使用资本，在一国农业的纯产品中就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进入地租，而资本的利润则相应地减少。由社会而不是由土地所有者的私人行动所创造的条件使地租不断增多，看来，这会形成一种基金，这种基金对于满足全国需要来说，其适应程度不小于从未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的土地收入。”保持原有收入的土地所有者，收租人，“没有权利对并没花费他什么东西的新收入来源成为供国家之用的基金这一点发怨言”（第 270—271 页）。

（6）“资本利润的直接税，只由资本家负担，不能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此外，“一切物品的价值都会保持不变”（第 272—273 页）。

卡·马克思写于 1844 年上半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3 卷

##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sup>9</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44 年 4—8 月

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  
第 3 卷

原文是德文

## 序 言

[XXXIX]<sup>10</sup>

## 序 言

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sup>11</sup>。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因此，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sup>12</sup>。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 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 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

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sup>13</sup>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sup>14</sup>但是德国人在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以外,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sup>15</sup>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sup>16</sup>;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sup>17</sup>。

//除了这些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但是,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忌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实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sup>18</sup>——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

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sup>19</sup>。费尔巴哈越不喧嚷,他的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同当代批判的神学家相反,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 L ]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不彻底性是必然的,因为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

---

双斜线// //中的话在手稿中已经划掉。——编者注

前提出发,或者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发生怀疑,于是就怯懦地、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而且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现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

//他是这样消极而无意识地表现的:一方面,他不断反复保证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和他自己不去注意批判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之间必要的辩论,不去注意现代批判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性,他反而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批判只同它之外某种狭隘的批判形式(比如说,十八世纪的批判形式)以及同群众的局限性有关。最后,当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本质的发现——如费尔巴哈的发现——被作出时,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制造一种似乎这些发现正是他自己作出的假象,而且他是这样来制造这种假象的:他由于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就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还处于哲学束缚下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深信他的水平甚至超过这些发现,就以一种诡秘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弄黑格尔辩证法诸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这些要素是他在这种批判中还没有发现的,而且还没有以经过批判改造的形式提供给他使用。他自己既不打算也无力使这些要素同批判正确地联系起来,他只是神秘地以黑格尔辩证法所固有的形式搬弄这些要素。例如,他提出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反对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作出一切来使他能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他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缺少时,他就自诩为真正克服哲学的人,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尽管如此沉湎于对“自我

意识”和“精神”的唯灵论的偶像崇拜,却终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意识。//

仔细考察起来,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步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sup>20</sup>。

//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 [XL]

---

涅墨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译者注



## [第一手稿]<sup>21</sup>

### 工 资

[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很通常而卓有成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工人说来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工人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

因而,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说来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sup>22</sup>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而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如果供给的量超

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会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会脱离这种应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向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靠近。但是,第一,在分工大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靠近时,工人无条件地要遭到最大的损失。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 ]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比对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小;而对利润的影响又比对工资的影响小。一般情况是,在某个地方工资提高时,另外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再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二者互相抵销。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二者互相抵销。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

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时,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实际的个人活动如何。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在苦恼时,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我们且举社会可能所处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一下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象所有者阶级所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sup>23</sup>。

[ ](2)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

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呢?那就是在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

( )大量劳动积累起来,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剥夺了,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

( )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 and 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运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 ]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 )在福利增长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资本的积聚就会增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就沦为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由于这样增加,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陷于行乞或饿死的境地,正象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 and 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

作为某种有危险的东西而与他相对立),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V]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引起资本家般的发财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因而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象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工人的数量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更大量的产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长、增进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这种正在增长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3)“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所以这个人数不能再增加了。”<sup>24</sup>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VI]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

是不幸福的,既然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而国民经济学(一般是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又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在于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说来,可以由劳动时间总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资本利息的提高会象单利和复利<sup>25</sup>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同时他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

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挣得的部分,只有这么多:如果他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

[V II]<sup>26</sup>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大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有特权的和闲散的神仙——处处对工人占上风,并对他发号施

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具有偶然性、更受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并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疯狂竞赛中去;而跟着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猛烈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而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1)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他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

按照理论,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的扣除。但是在现实中,工资却是土地和资本让给工人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给工人、劳动所打的回扣。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特别沉重的压迫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压迫则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

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作为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说来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象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

[VIII]“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期预备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很快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但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最为普遍。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五十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五十年前一样,那么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



的只有一千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一百万人,那么就有 999 000 人并不比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肤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二十五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 [X] 而增加到每日十二至十六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的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地方。”(舒耳茨《生产运动》<sup>27</sup>第 65 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一种收入同另一种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为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与世隔绝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人口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 65—66 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国民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完善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 100 甚至 250—350 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用来加入 [X] 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必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福利的情

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倍。但是,在我们甚至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仍然取决于象掷骰子那样的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

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对多数居民说来却有增无已。”(同上,第 67—68 页)

“从复杂的手工劳动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可以说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工作同较大量人手间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表现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弊病……[XI]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 69 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里,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 74 页)

“在英国的纺纱厂中就业的只有 158818 个男工和 196818 个女工。朗卡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 100 个男工就有 103 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 209 个。在英国里子的麻纺厂中每 100 个男工就有 147 个女工;在丹第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 280 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体力的毛纺织厂中主要是男工。1833 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 18593 个男工以外,至少有 38927 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妇女就业的范围已经扩大…… 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 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 71—72 页)

“1835 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的有 8—12 岁的儿童 20558 人,12—13 岁的儿童 35867 人,13—18 岁的儿童 108208 人…… 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使人日益摆脱单调劳动操作,促使这种弊病逐渐 [IX] 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最容易最便宜地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劳动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劳动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耳茨《生产运动》第 70—71 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做资本家吧!’…… 不幸的是,千百万

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同上,第60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有产者效劳,也就是说,要受他们的摆布。”(贝魁尔《社会经济的新理论》<sup>28</sup>第409页)

“佣人——月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409—410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替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XIII]“这种经济结构注定人们去干如此低贱的职业,遭受如此凄惨冷落之苦,以致野蛮状态与之相比似乎也是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421—[422]页)拣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办法》<sup>29</sup>(1842年巴黎版)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6—7万人。“品德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第228页)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6—7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6—7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有8—9千名妇女为这个淫秽的职业献身,也就是说,每天大约要有24名新的牺牲者,或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新的牺牲者;如果这个比例适用于整个地球,那么这种不幸者的人数势必经常有150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贫困的增长而增长;大量的人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挣扎,彼此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 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801827人。1831年增加到7764010人,也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反而增加21%(《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统计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毕莱《论贫困》<sup>30</sup>第1卷第[36]—37页)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抽象地看作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就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3页)“为什么人们把劳动只看成交换价值呢?(同上,第44页)“大企业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一瞬间都在出卖,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XIV]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50页)现存的经济制度

“既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完成8400万手工劳动者的工作。”(同上,第193页,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象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它的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毕莱,同上,第20页)“这种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他仲裁者,战争的判决就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

学在对抗力量的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 :按照科学的意见 ,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 ;这种战争就叫作竞争。”(同上 ,第 23 页)

“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工业战争 ,需要有人数众多的军队 ,这种军队能调集到一个地点 ,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这种军队的士兵所以能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 ,既不是出于忠诚 ,也不是由于义务 ;只不过为了逃避那必不可免的饥饿威胁。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 ,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 ,这些部下不是人 ,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群众甚至没有信心会有人经常雇用他们 ;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的时候才让他们活下去 ;而一旦能够撇开他们 ,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 ;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 ,时间越长 ,越令人痛苦和厌恶 ,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 ;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 ,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 ,第 [68]—69 页)

[XV]“我们确信——那些调查手工织布工的状况的委员会委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 ,那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 ,第 362 页)

## 资本的利润

### 一 资 本

□](1)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如果资本本身并非来源于盗窃和诈骗,那么,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1卷第136页,注)<sup>31</sup>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成文法。(萨伊,第2卷第4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定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财富直接提供给他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拥有的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权力。”(斯密,第1卷第61页)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2卷第312页)

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

(2)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斯密,第2卷第191页)<sup>32</sup>

## 二 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之下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劳动完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工]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1卷第97—99页)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1卷第96—97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

那么,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么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资本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变动,甚至是时刻变动。(斯密,第1卷第179—180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利润的数额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略知道这个数额。如果使用货币可以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

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么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1卷第181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相当双倍利息的利润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就是指通常的普通的利润。”（斯密，第1卷第198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1卷第196页）

[III]“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它吞没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只够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价格。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1卷第[197]—198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外，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在市场上销售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可以使其他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密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同样的价格甚至比竞争者低的价格供应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致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人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120—124页）

可能提高资本利润的另一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减少市场的商品供应，从



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的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1卷第190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得越大。随着商品加工的进展，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了，而且每个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V]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和利润，而且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的。”（第1卷第102—103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大，另一方面使每个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后面再讲。

资本家得到双重的好处：第一，从分工；第二，从一般加在自然产品上的人的劳动的增长。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更接近于同一水平。”（第1卷第228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不同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同上，[第226—227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

### 三 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部门的唯一动机。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V]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

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2卷第400—401页）

“对资本家说来，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萨伊，第2卷第130—131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是利润。然而，利润率不象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地，利润率很自然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象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一般利益联系在一起……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

#### 四 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斯密，第1卷第179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食品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营时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 [VI] 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2卷第372—373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利益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象复利<sup>25</sup>一样影响商品的价格（斯密，第1卷第199—201页），——所以，竞争是对抗资本家的唯

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sup>33</sup>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许多资本，因为资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能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面的积累。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个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到，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 [VI]

[VII] 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遭殃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的增长和大量资本的存在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进为前提。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很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斯密，第1卷第 [196]—197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遍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遍懒惰。”（斯密，第

2卷第325页)

在竞争扩大的条件下，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所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他资本所占领的行业。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交易条件放宽一些，那么他就多半不能指望把其他资本排挤掉。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工人容易找到工作，[X]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雇用的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2卷第358—359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1)他由于已经不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2)亲自经营实业，比更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市场价格由于假定的激烈竞争而已经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陷于破产。相反，如果大资本家想挤掉小资本家，那么，与小资本家相比，他拥有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具有的对工人的一切优越条件。对他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从容地容忍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数量大，所以，他贱卖也不会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么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2卷第359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利润高的小资本一般也增长得更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1卷第189页）

如果象在假定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所发生的那样，利润低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么大资本会把它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

[X] 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就是用于生产食物，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留在所有者手中或者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依靠这种流通，即依靠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就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业工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2卷第197—198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斯密，第2卷第226页）

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银行家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点，因为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办公的费用。大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按照他的土地面积而相应地增多。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

是对于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相当大的节约。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大农业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家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集中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 [XI] 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就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了生产的共同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过剩部分就会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在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负债的小所有者的数目就会增加起来，这些小所有者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重新吞掉小地产，正象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相当大的地产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贫穷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耳茨《生产运动》第 [58]—59 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价值 3 先令 8 便士的一磅棉花，纺出 350 束总长 167 英里（即 36 德里），价值为 25 基尼的纱。”（同上，第 62 页）

“四十五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  $\frac{11}{12}$ ，并且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 1814 年需要付 16 先令，而现在只值 1 先令 10 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 4 万增加到 150 万。[IX] 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么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商品量相比必然减少了。在 1820—1833 年这一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 4 先令  $1\frac{1}{3}$  便士减少到 1 先令 9 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了。结果，在某些

工业部门有时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频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波动不定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投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常常不得不突然实行停工或缩减生产，而雇佣劳动者阶级总是深受其害。”（同上，第 63 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 劳动是人，相反地，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28 第 411—412 页）

“材料要素如没有劳动要素就根本不能创造财富；在材料所有者看来，材料所以具有创造财富的魔力，仿佛是他们用自身的活动给材料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 400 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么，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 2 000 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 5 个人为他劳动；10 万法郎的收入表示 250 人的劳动，而 100 万法郎则表示 2 500 人的劳动，”（同上，第 412—413 页）从而，3 亿法郎（路易·菲利浦）表示 75 万工人的劳动。

“人们制定的法律赋予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利…… 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并且始终付给他们足够的工资，等等。”（同上，第 413 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时性的确定是完全自由的；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心所欲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 413 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利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质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因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東西；他可以生产得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XIII] 生产者既不知道需要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卖的人。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切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偶，是强者、宽裕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

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则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供给不知道需求，而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的爱好和时兴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头已经过去而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范围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 414—416 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 2 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利润 2000 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 100 个工人还是雇 1 000 个工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 1 000 万还是有 1 200 万，都是无关紧要的。”德·西斯蒙第先生说（第 2 卷第 331 页）：“真的，就只能盼望国王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把手，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sup>34</sup>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 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毕莱]，同上，第 82 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乏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坏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乏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到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上去。这儿的商人 [XIV] 只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大富商的代理人。”（斯密，第 2 卷第 382 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两种办法：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两种情



况都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 2 卷第 338 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前提，所以只有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这时每个工人的任务越来越简单，所以减轻和加速这些任务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从前不大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工具和器具。在任何生产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有可能实现这种细密的分工。”（斯密，第 2 卷第 193—194 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间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XV] 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 194—195 页）

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企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为了购买其他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那里一个工厂主有时拥有 10 000—12 000 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主管人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属领，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制铁的全部生产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所有者手里的。见 1838 年《德意志季刊》第 3 期《伯明翰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众多的大股份公司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和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

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就更是多方面的了,[XVI]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对立也缓和下来并趋于消灭。然而,正是这种增大的按不同方式使用资本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耳茨,同上,第40—41页)

房东从穷人身上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从沦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也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结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sup>35</sup>

萨伊的纯收入和总收入。[XVI]

## 地 租

[1] 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第 1 卷第 136 页,注) 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斯密,第 1 卷第 99 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润…… 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 但是,(1) 土地所有者甚至对未经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可以看作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租的追加额(附加费);(2) 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资本,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仿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出资本进行的;(3) 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 1 卷第 300—301 页)

为说明后一种情况,斯密举叉明草(海藻 Seekrapp, Salicorne) 为例,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可成为制造玻璃、肥皂等等所用的碱性盐。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各地,但是只生长在涨潮能达到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段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象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德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的大部分居民 [1] 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水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所住。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東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東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 1 卷第 301—302 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

物。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斯密，第2卷第377—378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是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是同土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2页）

“在这三大阶级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花劳力也不用劳心，而是所谓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进行任何谋算和计划。”（斯密，第2卷第161页）

我们已经听到，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的肥力。

决定地租数量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1卷第306页）

“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自然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量就取决于用来耕作或开发的资本数额以及 [III] 使用这种资本的本领的大小。如果资本数额和使用资本的本领都相等，它们的产量就同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成比例。”（[斯密]，第2卷第210页）

斯密的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生产费用和资本额相等的条件下把地租归结为土地肥力的大小。这清楚地证明了国民经济学把土地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的这种概念的颠倒。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租，看它在现实的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我们就来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

怎样的。

“当决定租约条件时,土地所有者设法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数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工资,购买、维持耕畜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资本,并使他取得当地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个数额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情况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数额,而土地所有者决不会多留给他。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作为地租攫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IV]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作自然地租,即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而然地应该得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299—300页)

萨伊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除了天然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独享他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或道路的修建,当地人口和福利的增长,都会提高地租……诚然,租地农场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好处;租期一满,全部利益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然没有预付分文,却取得利息,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萨伊,第2卷第[142]—143页)

“因此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299页)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占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并且这个数额大都是固定的,[V]不受收成的意外变动的影响。”(斯密,第1卷第351页)“低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的地租是很少的。”(同上,第2卷第378页)

并非从一切商品上都能取得地租。例如,在许多地区,对石头就不支付地租。

“通常只有这样一部分土地产品才能送往市场出卖,即这种产品的普通价格足够补偿把它们运往市场所需的资本,并能提供这笔资本的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足够价格,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恰好

是这个足够价格,商品虽然能够完全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个足够价格,这取决于需求。”(斯密,第1卷第302—303页)

“地租是以与工资、资本利润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03—[304]页)

食物是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之一。

“因为象其他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资料相适应,所以对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多或少的 [VI] 劳动量,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诚然,由于有时要支付高工资,食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相等。但是,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按照当地普通生活标准所能维持的那个数量的劳动。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产出较大量的食物,也就是说,除了维持使食物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劳动外还有剩余。这个余额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所以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斯密,第1卷第305—306页)“不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如果后来其他任何土地产品也提供地租,那么它的价值中的这个剩余部分,也是土地的耕种和改良使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45页)“人的食物看来是始终提供地租的。”(第1卷第337页)“一国有多少人口,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的衣服和住宅,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的食物。”(斯密,第1卷第342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些东西大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同上,第1卷第[337]—338页) [VI]

[VIII]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所有者如何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

(1) 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sup>36</sup>。(斯密,第1卷第335页)

(2) 我们已经从萨伊那里听到,地租如何随着铁路等等的修

建，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增多和日益安全而增加。

(3)“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即扩大土地所有者购买他人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权力的趋势……在土壤改良和耕作上的进步可以直接造成这种结果。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得到的那个份额，必然随着这个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这种原产品实际价格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也可以直接地并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随着产品的实际价值的增长，不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额的实际价值，从而他支配他人劳动的实际权力增长了，而且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额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增长了。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多。这样，产品中一个比过去小的份额，就足够补偿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因此，现在留归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分产品同总产品比较起来，将比过去大得多。”（斯密，第2卷第157—159页）

[X] 对原料的需求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料价值的提高，可能部分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长的结果。但是，每一项新的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随着铁路、轮船等等的出现，煤矿的地租大大增长了。

除了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各种发现和劳动取得的这种利益以外，我们现在再看一看另一种利益。

(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过他个人消费的这部分原料或这部分原料的价格来交换工业品。凡是降低工业品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农产品的实际价格。这时，同量原料将相当于较多的工业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较多的享乐品、装饰品和奢侈品。”（斯密，第2卷第159页）

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 [X] 结论说（第2卷第161页），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利益一致，这就荒谬了。根据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占统治的条件

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成反比，正象高利贷者靠浪费者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浪费者的利益相一致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顺便提一下土地所有者针对外国地产的垄断欲；例如，谷物法就来源于这种垄断欲。同样，我们在这里不谈中世纪的农奴制、殖民地的奴隶制、英国农民、短工的贫困。让我们遵循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原理吧。

(1)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原理，土地所有者从社会的繁荣得到利益；他从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从社会需要的增长，一句话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得到利益，正如我们上面所考察的，这种增长与贫困和奴役的增长是一致的。房租上涨和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是土地所有者从社会得到利益的一个例子，因为随着房租的上涨，地租，即房基地的租金也增长。

(2) 根据国民经济学家们本身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农场主即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sup>37</sup>

[XI] (3) 因为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越少，土地所有者能够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就越高，又因为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越高，租地农场主就把工资压得越低，所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雇农的利益是敌对的，正如工厂主的利益同他的工人的利益是敌对的一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

(4) 因为工业品价格的实际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以，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工人工资的降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生产过剩以及工业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灾难直接得到利益。

(5) 由此看来，如果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完全



不一致，并且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争的缘故，也决不会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竞争。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是与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必然引起大地产的积累和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吞并。

[IX ](1)工人和劳动工具的相对数量，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地产中那样随着基金的增大而减少得那么多。同样，全面利用的可能性，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巧妙的分工，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地产中那样随着基金的增大而提高得那么多。不管地块多么小，耕种这块土地所必要的劳动工具如犁、锯等等的数量到一定限度便不能再减，而地产的面积则可以大大缩小，不受此限。

(2)大地产把租地农场主用于改良土地的那笔资本的利息供自己积累。小地产则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方面。因而，对它来说，这全部利润便化为乌有。

(3)每一项社会改良都对大地产有利而对小地产有害，因为这种改良总是要求小地产付出越来越多的现款。

(4)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规律：

( ) 生产人们食物的耕地的地租，决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31页)

归根结底只有大地产才能生产家畜之类的食物。因此，大地产决定其他土地的地租，并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正象拥有自己的工具的手工业者和工厂主的关系一样。小地产简

直成了劳动工具。[XVI]对小土地所有者说来,地租完全消失了,留给他的至多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和他的工资;因为通过竞争,地租可能降低到刚好相当于并非土地所有者本人所投入的那笔资本的利息。

( )此外,我们已经听说,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和经营水平相等,那么产品就同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因而,大土地所有者总是取得胜利。同样,如果资本相等,那么产品就同土地的肥力成比例。因而,在资本相等的条件下,胜利属于较肥沃土地的所有者。

( )“一般说来,一个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要看用一定量的劳动从这个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用同量劳动从其他大部分同类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斯密,第1卷第345—346页)“最富饶的煤矿的产品价格也调节邻近其他一切矿井的煤的价格。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都会发现,如果他们的产品的卖价比邻矿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邻矿也不得不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虽然他们不大有能力这样做,虽然这种价格会越来越降低,有时还会使他们完全失去地租和利润。结果,一些矿井完全被放弃,另外一些矿井提供不了地租,而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开采。”(斯密,第1卷第350页)“秘鲁银矿发现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都废弃……在波托西银矿发现以后,古巴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矿,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第1卷第353页)

斯密在这里关于矿山所讲的这些话,或多或少也适用于一般的地产。

( )“应该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如果地租大大低于货币利息,那么,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会很快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补货币利息而绰绰有余,那么,所有的人都愿争购土地,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同样会很快回升。”( [斯密],第2

卷第 [367] — 368 页)

从地租和货币利息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说，地租必然越来越降低，以致最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土地不出租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XVII] 其次，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就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较小的土地所有者现在一般仅仅作为资本家存在一样。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

(1) 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sup>38</sup>是我们所不取的。他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sup>39</sup>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范围内必然的和所期望的后果混为一谈。首先，封建地产按其本质说来已是买卖了的土地，已是同人相异化并因而以少数大领主的形态与人相对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属于土地。土地继承了他。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领地的君主。同时，在封建领地上，领主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物质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假象。地块随它的主人一起个性化，有它的爵位，即男爵或伯

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土地仿佛是它的主人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俗语说：“没有无主的土地。”这句话表明领主的权势是同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无宁说就象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最狭隘的民族性。

[XVIII] 正象一个王国给它的国王以称号一样，封建地产也给它的领主以称号。他的家族史，他的家世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变成他的家世，使地产人格化。同样，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象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是直接政治的，同时又有某种感情的一面。风尚、性格等等依地块而各不相同；它们仿佛同地块连结在一起，但是后来把人和地块连结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最后，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地产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地，他消费那里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去操心新财源的开辟。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态度，它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

这种假象必将消失，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来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基于利害关系的

联姻代替，而土地也象人一样必然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即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悠闲享受必然变成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最后，在这种竞争的过程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随着资本运动的规律而升降浮沉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IX] (2) 关于地产的分割或不分割的争论，应该指出下面一点：

地产的分割是对地产大垄断的否定；但是分割只有使垄断普遍化才消灭垄断。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它只触及垄断的存在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竞争运动的。除了工具分散和劳动相互分离（应当同分工区别开来：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许多人来分担，而是大家各自从事同样的劳动，这就是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利之外，这种分割也和上述的竞争一样，必然重新转化为积累和积聚。

因此，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更加丑恶的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地产分割本身。但是这并非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对垄断的最初扬弃总是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

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平等。同样，联合也就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借助于农奴制度、老爷权势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地产分割的巨大好处是，一大批不再甘心忍受农奴制奴役的人，将以不同于工业的方式，由于财产而灭亡。

至于说到大地产，它的维护者总是用诡辩的方式把大农业在经济上的好处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仿佛这种好处不是恰恰通过[这种]财产的废除，[XX]才能一方面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利益。同样，这些维护者还攻击小地产的商贩心理，仿佛大地产甚至在它的封建形式下也不是潜在地包藏着商贩行为，更不用说现代英国的地产形式了，在那里，土地所有者的封建主义是同租地农场主的牟利和勤勉结合在一起的。

大地产可以把地产分割对垄断的责难回敬给地产分割，因为地产分割也是以私有财产的垄断为基础的，同样，地产分割可以把对分割的责难回敬给大地产，因为那里也是分割占统治地位，只不过采取不动的、冻结的形式罢了。总之，私有财产是以分割为基础的。此外，正如地产分割要重新导致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地产一样，封建的地产，不管它怎样设法挣脱，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者至少要落到资本家手中。

这是因为大地产，象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进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因此大地产把国内的贫民和全部活动都推到敌对方面，从而促使自己的敌人即资本、工业的势力的产生和壮大。大地产把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变成工业人口，从而使他们成为大地产的敌人。如果工业实力达到高

度发展，象现在英国那样，那么工业就会逐步地迫使大地产把它的垄断针对外国，迫使它同外国的地产进行竞争。因为，在工业的统治下，地产只有通过针对外国的垄断才能确保自己的封建权威，从而不受与它的封建本质矛盾的一般商业规律支配。而地产一旦卷入竞争，它就要象其他任何受竞争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争的规律。它同样会动荡不定，时而缩减，时而增加，从一个人手中转入另一个人手中，任何法令都无法使它再保持在少数特定的人手中。[XXI]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所有者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

最后，那种靠强力维持下来并在自己旁边产生了可怕的工业的大地产，要比地产分割更快地导致危机，因为在地产分割条件下工业的权力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正如在英国那样，大地产就它力求搞到尽可能多的货币而言，已经失去自己的封建性质，而具有工业的性质。它给所有者带来尽可能多的地租，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尽可能多的资本利润。结果，农业工人的工资就被降到最低限度，而租地农场主阶级就在地产范围内代表着工业和资本的权力。由于同外国竞争，地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形成一种独立的收入了。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取代租地农场主的地位，而租地农场主则有一部分沦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有许多租地农场主也占有地产；这是因为有优裕收入的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沉湎于挥霍，并且一般都没有能力领导大规模的农业；他们往往既无资本又无能力来开发土地。因此，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破产。最后，为了经得起新的竞争，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

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相信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些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 [XXI]



## [异化劳动]

[XXII]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同样，竞争无孔不入，人们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

程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所以才会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分割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象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让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的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

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sup>40</sup>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sup>41</sup>。

劳动的实现竟如此表现为失去现实性，以致工人从现实中被排除，直至饿死。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靠最紧张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sup>42</sup>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个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

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

[XXIII] 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产，以及对象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而，他首先作为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

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

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

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sup>43</sup> 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同感性的外部世界、同自然对象这个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同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

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XXIV]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sup>44</sup>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sup>45</sup>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在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已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



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而，人具有的关于他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说来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的结果：

(3)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

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身的关系的東西，也都适用于人同他人、同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

[XXV] 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考察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在现实中必须怎样表达和表现。

如果说劳动产品对我说来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同我相对立，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主人。而且，下面这种情况会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

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同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人。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僧侣或者俗人同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正

象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使自己失去现实性,使自己受惩罚一样,正象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象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他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上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

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的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本身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不过再作出 [XXVI] 几点结论。

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作为一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分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sup>46</sup>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 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 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 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当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1)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同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同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同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同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同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说来,占有就表现为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对

劳动和工人是异己的人同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XXVII] 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作。

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XXVII]

## [第 二 手 稿]

### [私有财产的关系]

[.....][XL]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sup>47</sup>。因此,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象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作为工人、作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作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正象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漠



不关心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界限。因此,英国工厂主在1834年实行新济贫法<sup>48</sup>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  
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  
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  
这种生产的产品是自我意识的和自我活动的商品……商品人……  
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  
人生产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  
至是有害的。照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  
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  
[XLI]英国国民经济学<sup>4</sup>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  
高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工资和资本  
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

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彼此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类活动的生产,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说来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论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类活动的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甚至连表面上的人的关系也没有了),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幻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所谓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sup>37</sup>继重农学派之后主张过的;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无宁说,只用货币语言来讲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

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在工业等等中,同不动的地产对立,表现出的只是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同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包括全部生活的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差别而存在:工业(城市生活)同地产(封建的贵族生活)对立而形成,并且本身通过垄断、行会、同业公会和社团等形式还带有自己对立物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实际的共同体的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以及完全单独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

[X LII]但是,获得行动自由的和本身有单独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真正工业活动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经济上的存在,才作为私有者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或者相反。租地农场主的工业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业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他们回想起对方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土地所有

者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骄傲起来的、获得行动自由的、发了财的、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和自私自利的、昨天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相互揭了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和相反的攻击,就对双方的卑鄙性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封建的往昔、怀旧、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幻想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钻营的、拉人下水的骗子,利欲熏心的出卖灵魂的人;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牵线人、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精;冷酷无情地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见其中的重农学派贝尔加斯的著作,对他,卡米尔·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严厉批评过;并见冯·芬克、兰齐措勒、哈勒、利奥、科瑟加顿以及西斯蒙第的著作)。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嫡子;它可怜自己的对

---

见爱好夸张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的著作,他眼含热泪,引用利奥先生的话说,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不肯不再充当贵族的财产。并见尤斯图斯·默泽尔的《爱国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超出循规蹈矩的庸人的那种小市民的、“家传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然不失为纯粹的幻想。这个矛盾也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

手是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是完全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它把他描绘成用正直、诚实、为公共利益服务、坚贞不渝这些假面具来掩盖其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厌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它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用揭底和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温床的下流、残忍、挥霍、淫佚、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怀旧、他的诗意、他的幻想浇冷水。

[X LIII]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这个游手好闲的、只会捣蛋的粮食奸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后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象高利贷一样贪婪地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它作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让土地所有者看一看自己的租地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说来,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了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他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伪善的、幻想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早已在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替自己辩护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真的,而土地所有者不如说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

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据说,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据说,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尔·路易·古利耶、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社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著作。)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多少觉察到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粹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的,企图阻止地产变成资本,但是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回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各个成分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把资本家看作自

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 积累劳动= 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完全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工人阶级,正象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 [X LIII]

## [第三手稿]

### [国民经济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

补入第 XXXVI 页<sup>49</sup>。——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因而,十分明显,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在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在这种揭示了——在私有制范围内——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sup>50</sup>,是一些拜物教徒、天主教徒。所以,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sup>51</sup>是对的。正象路德承认宗教、信仰为外部世界的本质并以此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象他把宗教观念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观念一样,正象他把教士移到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俗人之外的教士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为人本身,而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在人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财富,也就是只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保持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



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就象在路德那里被当成了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以前是人之外的存在、人的实际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因此,如果说上述国民经济学是在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的假象下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转为人自身的本质而能够不再束缚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方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而代之,——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使自己的犬儒主义充分表现出来。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它不顾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的矛盾,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是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指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无宁说是敌视人的;最后,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财富泉源的最后一个个别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的存在形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成了完全经济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法反抗的封建所有制的表现。(李嘉图学派。)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的犬儒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他们总是积极地和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把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变为主体,就

是说,既把人变为本质,同时也把作为某种非存在物 [Unwesen] 的人变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工业 [II] 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地,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的过渡。重农学派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但正因为如此,它同样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恢复,不过它的语言这时不再是封建的,而是经济学的了。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才具有意义。但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的要素,而重商主义只承认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因此,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农业同时被宣布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来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所以,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象劳动产品还被看作一种特定的——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一样。在这里,土地还被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作资本,也就是说,还没有被看作劳动本身的要素。相反地,劳动却表现为土地的要素。但是,因为这里把过去的仅仅作为对象存在的外部财富的拜物教归结为一种极其简

单的自然要素,而且已经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的存在,所以,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而,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重农学派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部的、纯对象性的财富。但是,在重农学派看来,劳动首先只是地产的主体本质(重农学派是以那种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并得到公认的财产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的人。他们既然把生产(农业)说成是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他们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

十分明显,那种与地产相对立的、即作为工业而确立下来的工业的主体本质一旦被理解,那么,这种本质就同时也包含着的那个对立面。因为正象工业包含着已被扬弃了的地产一样,工业的主体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被释放了的奴隶,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即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

[III]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象工厂制度是工业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

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

我们看到 ,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 ,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

## [共产主义]

[I]补入第 XXXIX 页。——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sup>52</sup>。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进一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

补入同一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不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sup>53</sup>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和改善工人状况。<sup>54</sup>最后,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开始时它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sup>55</sup>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

(1)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sup>56</sup>这样的共产主义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首先,物质的财产对

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暴露了这个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秘密。正象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即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关系转向它同整个社会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 [V] 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sup>57</sup>

---

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而已,因为这种卖淫是一种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的关系,并且后者的下流无耻远为严重,所以,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到卖淫这一范畴中。

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的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了。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直接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而，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2)共产主义( )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 )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

(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sup>58</sup>

[V]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而上述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从个别的同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从现存的事物中寻找证明,同时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尔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但是它这样做恰好说明: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如果说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

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



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这一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在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神论(欧文)<sup>59</sup>,而无神论最初还远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无宁说还是一个抽象。所以,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但是,同样,无论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

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 ,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 ,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 ,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VI]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 ,虽然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享受 ,即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的那种活动和享受 ,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或这种享受的内容本身为根据并且符合其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 ,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時候 ,我也是社会的 ,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 ,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 ,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 ,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因此 ,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 ,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 ,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

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 ,而在今天 ,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 ,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 ,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 ,他的生命表现 ,即使不采取共同的、

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

(4)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

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VII]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关于拥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sup>60</sup>)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象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

---

因此,正象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

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中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

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同样,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同别人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不言而喻,人的眼睛和原始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和原始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说来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不同于耳朵的对象。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VIII]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

感 ;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 ,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不是对象 ,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 ,也就是说 ,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 ,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 ,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 ,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 ,总之 ,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 ,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 ,才一部分发展起来 ,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 ,不仅五官感觉 ,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 ,一句话 ,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 ,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 ,由于人化的自然界 ,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 ,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 ;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 ,而且不能说 ,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 ,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 ;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 ,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 ,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 ,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 ,正在产生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 ;同样 ,已经产生的社会 ,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 ,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

久的现实。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sup>61</sup>;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IX]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X]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



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 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种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的活动的激情。//

(5)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所以,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

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sup>62</sup>(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sup>63</sup>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对个别人说说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生出来的,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个人的性结合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因而,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所以,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但是你会回答说:我承认这个循环运动,那么你也要承认那个无限的过程,这过程驱使我不断追问,直到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一问题。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假定它们是不存在的,然而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要坚持自己的抽象,那么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XI]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

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许你是一个假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

你可能反驳我说:我并不想假定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我是问你自然界是如何产生的,正象我问解剖学家骨骼如何形成等等一样。

但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象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XI]

## [需要、生产和分工]

[XIV](7)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何等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敌对的本质越来越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他的贫穷随着货币的权力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数量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象货币把任何本质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身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数量的本质。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甚至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奇想、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

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乐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下贱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的按基督教教义说来应该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苍蝇诱向粘竿的弱点;对社会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剥削,正象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的心的途径;每一个急难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来接近自己的邻人并且向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而必不可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的服务付报酬。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无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脚踏实地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XV]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

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人即儿童变成工人,正象工人变成无人照管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较弱的人变成机器。

// 关于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这一问题,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当我们谈到作为资本家的科学自白和科学存在的国民经济学家时,我们一般总是指经验的生意人)是这样论证的:(1)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可怜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再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都宣布为人的生活 and 人的存在;(2)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作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象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

——无论是消极的享受或积极的活动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把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都节省下来。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主义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但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理想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舞台。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XVI]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场,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力,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尽管货币是这一切,它除了自身以外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 I 占有了主人,我就占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了。因此,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工人只能拥有他想要生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么一点]他才有权要活下去。//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争论。一方(罗德戴尔、马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方(萨伊、李嘉图等)则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前者承认,它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即绝对的节约;而后者承认,它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侈。前者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幻想,认为不应仅仅由发财欲决定富者的消费,并且当它把挥霍直接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时,它是跟它自己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通过挥霍我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我的财产。后者假意不承认,正是一时的兴致和念头决定生产;它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忘记了只有通过竞争,生产才必然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兴决定使用;它希望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它忘记了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等同的。

同时,如果你希望按照经济学办事,并且不愿毁于幻想,那么你不仅应当在你的直接的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节省,而且应当在热心公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省。

// 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也就是说,变成有用的。如果我问国民经济学家:当我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满足别人的淫欲来换取金钱时,我是不是遵从经济规律(法国工厂工人把自己妻女的卖淫称为额外的劳动时间,这完全是对的),而当我把自己的朋友出卖给摩洛哥人时,我是不是在按国民经济学行事呢(而通过买卖新兵等形式直接贩卖人口的现象,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有)?于是国民经济学家回答我:你的行动并不违反我的规律;但请你看看道德太太和宗教太太说些什么,我的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和



宗教丝毫不反对你的行动方式,但是.....——但是我该更相信谁呢——国民经济学还是道德。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谋生、劳动和节约、节制,但是国民经济学答应满足我的需要。——道德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富有道德心、德行等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德行的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富有道德心呢?——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 [XV II].....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但是,李嘉图使国民经济学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么这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歇尔·舍伐利埃讲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又必然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国民经济学同道德的关系不是任意的、偶然的因而无根据的和科学的,如果它不是装装样子的,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么这种关系就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这难道是李嘉图的过错吗?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不过是一种假象,它既是对立,同时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

// 节制需要,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责难那些违背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难道这不

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sup>94</sup>) ,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 //

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 ,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 ;这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精致、隐秘、含糊 ,是假象 ;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露骨、坦率 ,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需要与富人的考究的需要相比是一个大得多的收入来源。伦敦的地下室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 ,也就是说 ,地下室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 ,因而 ,用国民经济的语言来说 ,是更大的社会财富。

正象工业利用考究的需要进行投机一样 ,工业也利用粗陋的需要 ,而且是人为地造成的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因此 ,对于这种粗陋的需要来说 ,自我麻醉 ,这种表面的对需要的满足 ,这种在需要的粗陋野蛮性中的文明 ,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 ,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明显的象征。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财富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 ,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受到英国警察从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 [XVII]

[XVIII]我们已经看到 ,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 : (1)资本是积累劳动 ; (2)资本在生产中的使命——部分地是连同利润的资本再生产 ,部分地作为原料 (劳动材料)的资本 ,部分地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 (机器——直接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 ; (3)工人是资本 ; (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 ; (5)对工人来说 ,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 ; (6)对资本家来说 ,劳动是他的资本的能动的要素。

最后 , (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 ;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要素

[IX] 如何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见穆勒)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例如,在拜物教上就可看出,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性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性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的公式“自我=自我”译成法国语言即政治语言罢了。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以此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由于政治的原因是平等,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应该从这一点出发来加以批判和承认。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  
.....] 人的生

---

手稿这一页的左下角破损,因而这里最后六行的原文残缺不全,无法恢复全部内容。——编者注

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它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际实现才能完成。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个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觉悟这一点,看作是现实的进步。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学说、宣传等等。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或联络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说来已经足够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XX]//当国民经济学断言需求和供给始终相符的时候,它当即忘记了,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人的供给(人口论)始终超过对人的需求;因而,供求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整个生产的本质结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显著的表现。

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目的,那使我成为本质并使我占有别人的对象性本质的手段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地产(在土地是生活的泉源的地方)以及马和剑(在它们是真正的生存手段的地

方)也都被承认为真正的政治的生命力。在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它能佩剑,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马就使人成为自由的人,使人有可能参加共同体生活。

我们在上面说过,人回到穴居生活,然而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回到那里去的。野人在自己的洞穴——这个自由地给他们提供享受和庇护的自然要素——中并不感到更陌生,反而感到如鱼得水般的自在。但是,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他不能把这个住所看成自己的故居——在这里他最后会说:我在这里,就是自己家里——相反地,他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住在一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即将他抛向街头的陌生人的家里。他同样知道,就质量来说,他的住所跟彼岸的在财富天国中的人的住所是完全相反的。

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仅仅供享乐的、不活动的和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而且,对人的蔑视,部分地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恣意挥霍,部分地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

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作手段,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的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的、乖戾的、傲慢的、好幻想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和机智的。他还没有体验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作自身的力量,而且[在他看来]最后的、终极的目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享受,[.....]。.....]。

在这种..... [XXI]为感性外表所眩惑的关于财富本质的美妙幻想对面出现的是实干的、清醒的、平凡的、节俭的、看清财富本质的工业家;如果说他为挥霍者的贪得无厌的享受开辟越来越大的范围,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献媚——他的一切产品都是对挥霍者的欲望的曲意奉承,——那么,他同时也懂得以唯一有利的方式把挥霍者的正在消失的力量据为己有。因此,如果说工业财富起初表现为挥霍的、幻想的财富的结果,那么后来工业财富也以能动的方式通过它本身的运动排除了挥霍的幻想的财富。货币利息的降低是工业运动的必然后果和结果。因此,挥霍的食利者的资金日益减少,同享受的手段和诱惑的增加恰成反比。所以,他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工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地租固然由于工业发展进程而直接不断地提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总有一天地产也必然和其他一切财产一样,落入那再生产着自身和利润的资本的范畴,而这也就是同一个工业发展的结果。因而,挥霍的地主也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

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自己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即经营农业的企业家。

因此,货币利息降低,——蒲鲁东把这看成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社会化的倾向,——不如说直接地就是劳动的资本对挥霍的财富的彻底胜利的象征,也就是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转化。这是私有财产对它的一切表面上还是人的特性的彻底胜利和私有者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劳动——的完全屈服。当然,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简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它本身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花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连同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所以,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而以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利息的降低只有当它是资本正在完成的统治的象征,也就是正在完成的、因而正趋于扬弃的异化的象征的时候,才是资本扬弃的象征。一般说来,这就是现存的东西确证自己的对立面的唯一方式。//

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XXI]

[XXXIV]其次,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国民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相反,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倒是唯一的完全不生产的食利者。农业是资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能够从农业上有希望得到通常的利润,他

就会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个用途。因此,重农学派所谓土地所有者作为唯一生产的所有者应当单独支付国税,从而也只有他们才有权表决国税并参予国事这样的论点就变为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收入征收的单一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单一税。显然,这样理解,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就再也不可能从他们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得出来了。

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的的东西,都不过是具有资本形式即工业资本形式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路即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前进。——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性质。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XXXV]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为他而存在。正象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不过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就是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



家们是讲得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的。

亚当·斯密：

“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这种倾向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为一切人所共有，而在其他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动物一旦成长，就完全独立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他单单指望别人发善心给以帮助，那是徒劳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并使他们相信，他希望他们为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这样就可靠得多了。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们决不说我们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这样一来，因为我们相互需要的服务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最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这种交换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又迅速、又精巧。他往往用自己制造的这些产品去同自己部落的人交换家畜和野味。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得到更多东西。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造弓等等当作自己的主要业务。个人天赋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人如果没有交换和交易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会不得不亲自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方便品。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那么，唯一能够造成才能上的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正象这种交换倾向造成人们才能上的差别一样，这同一个倾向也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许多同类但不同品种的动物，它们在天生资质上的差别比人类在没有受过教育以前天生资质上的差别要显著得多。就天赋的才能和智慧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猎犬和鹑猎犬之间、鹑猎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可是这些不同品种的动物，尽管是同类，彼此却几乎无法利用。家犬虽然力大，[XXXVI]却不能辅以猎犬的敏捷，等等。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向，这些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程度的智力活动不能汇集在一起，因而丝毫不能增进同类的幸福和便利。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自然给予动物各种各样的能力，动物却不能由此得到丝毫好处。相反，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交相为用，因为依靠交换和交易这种普遍倾向，他们的不同才能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好象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

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因为交换这种倾向产生了分工,所以这种分工的发展程度总是受交换能力,换句话说,受市场的大小限制。如果市场非常狭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7……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是亚当·斯密说的。<sup>65</sup>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它所需的全部消费品,那么社会在不实行任何交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了。——虽然交换不是社会的基础,但在我们的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不能没有它。——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增进社会威力和社会的享受,但是它限制个人的能力并使之退化。——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这是让·巴·萨伊说的。<sup>66</sup>

“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就是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就是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就是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构成生活资料的各种产品的能力。促使一个人给别人服务的动机是利己心,因为他要求得到为别人服务的报酬。——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

这是斯卡尔贝克说的。<sup>67</sup>

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生产出运动;他能移动物品,[XXV II]使它们相互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互相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从事少数几项操作所练出来的速

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从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有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大制造业,往往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所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

这是穆勒说的。<sup>68</sup>

但是,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都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

亚当·斯密的论述可以归纳如下:

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它起源于人所特有的交换和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大概不是偶然的,而是运用理性和语言的结果。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只有交换才使这种差别成为有益的。同类而不同品种的动物的特性的天生差别比人的秉赋和活动的差别显著得多。但是因为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类而不同品种的动物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不能给任何动物个体带来任何好处。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生活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市场的规模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文明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商人,而社会则是商业社会。

萨伊把交换看成偶然的、非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

存在。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交换才成为必要的。但是,没有交换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创造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使每一单个人的能力退化。最后这个意见是萨伊的进步。

斯卡尔贝克把个人的、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即智力和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同来源于社会的力量,即相互制约的交换和分工区别开来。但是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斯卡尔贝克用客观的形式表述了斯密、萨伊、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东西,因为斯密等人指出利己主义、私人利益是交换的基础,并把买卖称为交换的本质的和适合的形式。

穆勒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人的活动可归结为机械的运动。分工和采用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委托给每个人的操作范围应尽可能小。分工和采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量生产即生产的集中。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XXXVII]考察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

说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等于说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我们应当考察下述各个要素：

第一，交换的倾向——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利己主义是它的基础——被看作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萨伊认为交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用分工和交换来说明财富、生产。分工使个人活动贫乏和退化。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别的原因，而这种差别又由于交换而成为有益的。斯卡尔贝克把人的生产的本质力量或者说生产性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分：(1)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而不是来源于现实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其次：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去完成。——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操作应当尽可能少。——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

## [货 币]

[XLI] 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 [狭隘] 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通过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感性地存在这一事实而真正肯定自己，那么，不言而喻的是：（1）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生命特殊性；对象以怎样的方式对它们存在，这就是它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态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如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也就是对象的肯定；（3）只要人是人的，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人的，那么对象为他人所肯定，这同样是他自己的享受；（4）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5）如果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那么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

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媒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他人对我的存在之间充当媒介。对我说来他人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御看它们真是威武堂堂，  
 真好象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歌德《浮士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

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癩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那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

---

歌德《浮士德》第四场(《书斋》)。——编者注

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并且下面又说: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XLI]为了不同的目的,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你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

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为了理解他,我们首先从解释歌德那几行诗句开始。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

---

玛尔斯是古代罗马人的战神。——译者注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编者注



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加上他可以给自己买到很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他们的人,不是比他们更有头脑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是能够解开和系紧任何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

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

(1)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

(2)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

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依靠货币都能做到。因而货币把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变成它本来所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

当我想要食物或者因我身体不佳,不能步行,想坐邮车的时候,货币就使我获得食物和邮车,这就是说,它把我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

当然,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求只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它对我、对第三者、对另一个人 [XLIII] 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不存在的,因而对于我依然是非现实的,无对象的。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的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的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没有供旅行用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也就是说,没有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旅行的需要。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本领。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现实的、人的和自然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想;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想,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仅仅按照

这个规定,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面,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

其次,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

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

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性质,不是特定的事物或特定的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X LIII]

##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XI](6)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有关叙述,以及最后对最近的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作一些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致象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前者是完完全全地,后者在自己的《复类福音作者》<sup>69</sup>中(与施特劳斯相反,他在这里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甚至在《基督教真相》<sup>70</sup>中,至少有可能完全地——仍然拘泥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例如,《基督教真相》一书中说:

“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既然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既然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等等。或者说:“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

这些说法连语言上都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且无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

[IX]鲍威尔在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sup>71</sup>一书中对格鲁培先

生提出的“那么逻辑学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唐突的问题避而不答，却让他去问未来的批判家。<sup>72</sup>这表明，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鲍威尔《复类福音作者》）时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还缺乏这种认识。

但是即使现在，在费尔巴哈既在收入《轶文集》的《纲要》中，也更详细地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之后；在不能完成这一事业的上述批判反而认为这一事业已经完成，并且自封为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之后；在批判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其余的世界（它把这个世界与它自身对立起来而归入“群众”这一范畴）和它自身的关系，并且把一切独断的对立消融于它自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蠢之间、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之间的一个独断的对立中之后；在批判每日每时以群众的愚钝来证明它本身的超群出众之后；在批判最后宣告批判的末日审判，宣称这样一天——那时整个正在堕落的人类将集合在批判面前，由批判加以分类，而每一类人都将得到一份贫困证明书——即将来临之后；在批判于报刊上宣布它既对人的感觉又对它自己独标一格地君临其上的世界具有优越性，而且不时从它那讥讽的嘴唇发出奥林帕斯诸神的哄笑声之后，——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做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丝毫没有暗示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甚至也[丝毫]未能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这是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

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恰成惊人的对照。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

(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

(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

黑格尔从实体的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还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还

没有被承认的 [XIII] 肯定 ; 可见 , 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是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 。

但是 , 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 , 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 , 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 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 , 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

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 , 也要说明这一和现代的批判相反的运动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过程的同一过程的区别 ; 或者更正确些说 , 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现象学。

(A) 自我意识。

I 意识。( ) 感觉确定性 , 或“这一个”和意谓。( ) 知觉 , 或具有特性的事物和幻觉。( ) 力和悟性 , 现象和超感觉世界。

II 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a) 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 , 主人和奴隶。(b) 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 , 怀疑主义 , 苦恼的意识。

III 理性。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a) 观察的理性 ; 对自然界和

---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句话 : “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作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sup>73</sup>——编者注

自我意识的观察。(b)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道。(c)自在和自为地实在的个性。精神的动物界和欺骗,或事情本身。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的理性。

(B)精神。

I 真的精神 ;伦理。II 自我异化的精神 ,教养。III 确定自身的精神 ,道德。

(C)宗教。自然宗教 ,艺术宗教 ,启示宗教。

(D)绝对知识。

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象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而不是作为外化的、抽象的思维来理解。——最后,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这种思维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就是绝对知识因而就是绝对的即抽象的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



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就是抽象。

黑格尔有双重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的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且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XV II]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而,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也就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种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意义。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

[XV III]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占有;因此,在《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

已包含着那种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有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其次,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例如,有这样一种理解:感性意识不是抽象感性的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的现实,是客体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的现实;因而,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因此,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此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物,所以,在这个限度内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因此,《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但是,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象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的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象抽象的意识本身(对象就被看成这样的意识)仅仅是设定差别的自我意识的一个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

结果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绝对知识,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也就是说,其结果是纯思想的辩证法。 [XV III]

[XX III]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使自身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实际表现出来,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这又是只有通过人类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我们将以《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来详细说明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一章既概括地阐述了《现象学》的精神、它同思辨的辩证法的关系,也概括地阐述了黑格尔对这两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

---

在手稿中作者指出:下接第 XX II 页,但是手稿中没有这一页。——编者注  
在手稿中,作者在这里指明为第 XV III 页。——编者注

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总括起来,并且把自己的哲学说成就是这个哲学。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的以至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则认为是哲学本身所做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现在让我们转到我们的本题上来。

绝对知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

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因此,问题就在于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的、同人的本质(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下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这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这就是说,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黑格尔对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对象不仅表现为返回到自我(das Selbst)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对这一运动的片面的即只抓住了一个方面的理解)。把人和自我等同起来。而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是自我的(selbstisch)。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这种特性。但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无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界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界是 [XXIV] 自我意识的质。

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下文还要谈到这一点)。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地,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因此,对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之返回到自我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

意识的对象的克服可全面表述如下:

- (1)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来是正在消逝的东西;
- (2)自我意识的外化就是设定物性;
- (3)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
- (4)它不仅对我们或者对自身有意义,而且对意识本身也有意义;
- (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
- (6)另一方面,这里还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

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7)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就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

(8)意识必须既依据自己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考察对象。意识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本身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于意识说来,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对象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度。<sup>74</sup>

关于(1)。——所谓对象本身对意识说来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象之返回到自我。

关于(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等于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即对他说来是对象的那个东西,而只有对他说来是本质的对象并因而是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那个东西,才是他的真正的对象。既然被当作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界——因为人是人的自然界,——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的自我意识),等于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他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他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但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不从属于他的本质并且凌驾其上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XXVI]

---

马克思在手稿的页码中没有标出第XXV页。——编者注

同样很明显的是：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说来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设定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似乎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在一瞬间。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sup>75</sup>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sup>76</sup>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

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这是说,在这个东西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说来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温饱,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我的身体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象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

[XXVII]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

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着,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因而,对这第三者的对象说来,我是和它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因此,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



在物的对象,那么就要以不存在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为前提。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它的对象。但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这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sup>77</sup>。

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正象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正象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它作为产生活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来谈。)

第三,由于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动,所以这种设定必然重新被扬弃,而物性必然遭到否定。

关于第(3)、(4)、(5)、(6)。——(3)意识的这种异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4)它不仅对我们或者对自身有

意义,而且对它本身即对意识也有意义。(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意识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知道自己就是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知道对象就是它自身。(6)另一方面,这里还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我们已经看到,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占有,或在异化——它必然从漠不相关的异己性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这个规定下的对象性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说来成为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说来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 [XXVIII]抽象的自我确证。对于意识本身说来,对象的虚无性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是因为意识知道这种虚无性、这种对象性本质是它自己的自我外化,知道这种虚无性只是由于它的自我外化才存在……

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成为意识的对象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就是说知道对象同它没有区别,对象对它说来是非存在,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也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烟云,而就它的本质说来不过是知识本

身,这种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并因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己对立起来;或者说,知识知道,当它接触某个对象时,它只是在自己之外,使自己外化;它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也就是说,对它说来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

另一方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自我意识既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

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

第一,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因此自我意识,或者,——如果我们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用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从而可以说人的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这里首先包含着:意识,也就是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异于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费尔巴哈)。这里所以包含着这一方面,是因为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

第二,这里包含着: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又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硬说他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又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

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也就是在自己身边。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

因此,现在不用再谈关于黑格尔对宗教、国家等等的适应了,因为这种谎言是他的原则的谎言。

[XXIX]如果我知道宗教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也就知道,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不是我的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我知道我自身的、属于我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不是在宗教中,倒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自身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

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

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因此，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我的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的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因此，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就是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但是，如果只有宗教哲学等等对我说来才是真正的宗教存在，那么我就只有作为宗教哲学家才算是真正信教的，而这样一来我就否定了现实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的信教的人。但是同时我又确证了它们：一方面，是在我自己的存在的范围内或在我使之与它们相对立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的范围内，因为异己的存在仅仅是它们本身的哲学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它们自己的最初形式，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虚假的异在、譬喻，是隐蔽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即我的哲学的存在的形式。

同样地，扬弃了的质等于量，扬弃了的量等于度，扬弃了的度等于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等于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等于现实，扬弃了的现实等于概念，扬弃了的概念等于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等于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等于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等于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等于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了的伦理精神等于艺术，扬弃了的艺术等于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等于绝对知识。

一方面，这种扬弃是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也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观念中的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

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说来现在已成为一个思想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 被思维看作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

[XXX]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加以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因此,黑格尔是同它们的通用的概念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的最后的确证。

现在应该考察一下——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a)扬弃是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

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

这样,黑格尔由于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失去对象和失去现实性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本质的关系,把那作为异己存在物来表现自身的活动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

(b)但是,撇开上述颠倒的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些说,作为上述颠倒的结果,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行动,第一,仅仅具有形式的性质,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思维的本质,即自我意识;而

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

因此,这个运动在其抽象 [XXXI]形式上,作为辩证法,被看成真正人的生命;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异化,所以它被看成神灵的过程,而不是人的神灵的过程,——一个与人自身有区

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所经历的过程。

第三,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首先必须是一个结果;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sup>78</sup>

关于第一点:对人的自我产生的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和抽象的理解。

因为黑格尔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所以人的异化了的对象,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的现实性,不外就是异化的意识,就是异化的思想,是异化的抽象的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即否定。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所作的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也被抽象地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者干脆被想象为活动。因为这种所谓否定性无非就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掉了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正是对任何内容都通用的,脱离现实的精神和现实的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下文我们将阐明绝对



的否定性的逻辑内容。)

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把它们联贯起来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是绝对观念。然而，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如果绝对观念不愿意再去从头经历全部抽象活动并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或自我理解的抽象，那么，绝对观念也要再一次扬弃自身。但是，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即抽象，从而达到了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了自然界。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

#### [XXIX] 绝对观念、抽象观念，

“从它与自身统一这一方面来考察就是直观”(黑格尔《全书》第3版<sup>79</sup>第222页)，它“在自己的绝对真理中决心把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环节，或最初的规定和异在这一环节，即作为自己的反映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也就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同上)

举动如此奇妙而怪诞、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筋的整个观念，无非就是抽象，即抽象思维者，这种抽象由于经验而变得聪明起来，并且弄清了它的真相就决心在某些——虚假的甚至还是抽象的——条件下放弃自身，而用自己的异在，即特殊的、特定的东西，来代替自己的自在性、非存在，代替自己的普遍性和无规定性；——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也就是说，决心抛弃抽象而看一看摆脱掉它

的自然界。直接成为直观的抽象观念,无非就是那种放弃自身并且决心成为直观的抽象思维。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这整个过渡,无非就是对抽象思维者说来如此难以达到、因而由他作了如此牵强附会的描述的从抽象到直观的过渡。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进入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

(自身异化的人,也是同自己的本质即同自己的自然的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思维者。因此,他的思想是居于自然界和人之外的僵化的精灵。黑格尔把这一切僵化的精灵统统禁锢在他的逻辑学里,先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维的外化,然后又把它们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这种外化的扬弃,看成人的思维的现实的表现;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由于仍然被束缚在异化中,它一部分是使原来那些僵化的精灵在它们的异化中恢复,一部分是停留在最后的活动中,也就是在作为这些僵化的精灵的真实存在的外化中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一部分则由于这种抽象理解了自身并且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而要求放弃抽象的、只在思维中运动的思维,即无眼、无牙、无耳、无一切的思维,在黑格尔那里,便表现为决心承认自然界是本质并且埋头于直观。)

[XXXIII]但是,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进入直观的抽象

---

这就是说,黑格尔用那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行动来代替这些僵化的抽象;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贡献:他指明了原来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适当的概念的来源,把它们综合起来,并且把它们作为批判的对象创造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抽象来代替特定的抽象。(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离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

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正象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在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不过现在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个自然界是思想的异在,是现实的、可以被直观的、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或者,如果用人的语言来说,抽象思维者在他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他在神灵的辩证法中以为是从无、从纯抽象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本质——在自身中转动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向现实看一看的思维劳动的纯粹产物——无非就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因此,对他说来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而已。他重新分析自然界和这些抽象。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自然直观抽象化的确证活动,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例如,时间等于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否定性(前引书,第238页)。被扬弃了的运动即物质——在自然形式中——同被扬弃了的生成即定在相符合。光是反射于自身的自然形式。象月亮和彗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物的自然形式,按照《逻辑学》,这种对立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地球是作为对立物的否定统一等等的逻辑理由的自然形式。

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离开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同于这些抽象概念的自然界,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无的无。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

“有限的目的论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前提,即自然界本身并不包含

着绝对的目的。”(第 225 页)

自然界的目的在于对抽象的确证。

“结果自然界成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既然观念在这里表现为对自身的否定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么自然界并非只在相对的意义对这种观念说来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构成这样的规定,观念在其中表现为自然界。”(第 227 页)

在这里不应把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在这里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缺点、缺陷。因为真实的东西毕竟是观念。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的形式。而既然抽象的思维是本质,那么外在于它的东西,就其本质说来,不过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抽象思维者承认,感性、同在自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的本质。但同时他又把这种对立说成这样,即自然界的这种外在性,自然界同思维的对立,是自然的缺陷;就自然界不同于抽象而言,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XXXIV]不仅对我说来而且在我的眼里看来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即就其本身说来是有缺陷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有一种为它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它自身的另一种东西。因此,对抽象思维者说来,自然界必须扬弃自身,因为他已经把自然界设定为潜在地被扬弃的本质。

“对我们说来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精神是自然的真理,因而对自然界说来精神也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界消逝了,结果精神成为达到其自为的存在的观念,而概念则既是观念的客体,同时又是它的主体。这种同一性就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概念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完满的外在的客观性,但现在它的这种外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在这种外化中成了与自己同一的东西。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性。”(第 392 页)

---

“启示,作为抽象的观念,是向自然界的直接的过渡,是自然界的生成,而作为自由精神的启示,则是自由精神把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的世界,——这种设定,作为反思,同时又是把世界假定为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中的启示,是精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和真实性。”“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sup>79</sup> [XXXIV]

## 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sup>80</sup>

“我不能离开祖国的土地 ,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 ,而不公开表示深挚的感谢 ,以我和王后 的名义 ,它激动着我们的心。它产生于 7 月 26 日的行刺所引起的那种无数用口头和书面方式向我们作的爱的表示——也就是在犯罪的一刹那 ,当上帝的手从我胸前挡住致命的子弹并使它落到地上时向我们欢呼的那种爱。我仰望着神明的救世主 ,振作精神设法做我的日常工作 ,以完成已经开始了的、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怀着新的必胜的信念同邪恶作斗争 ,并对我的人民来说是我的崇高使命责成于我的人 ,并且是我的人民之爱所应该得到的。

(签名)弗里德里希-威廉

1844 年 8 月 5 日于埃尔德曼斯多夫”<sup>81</sup>

一时的激情是蹩脚的作家。爱者在十分冲动时写给被爱者的信不是范文 ,然而正是这种表达的含混不清 ,极其明白、极其显著、

---

伊丽莎白。——编者注

极其动人地表达出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就是被爱者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因此,热恋所造成的词不达意和语无伦次博得了被爱者的欢心,因为有反射作用的、一般的、从而不可靠的语言本性获得了直接个别的、感性上起强制作用的、从而绝对可靠的性质。而对爱者所表示的爱的真诚深信无疑,是被爱者莫大的自我享受,是她对自己的信任。

从上述这些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我们使人对国王致谢的内心真诚无可怀疑,我们就为普鲁士人民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如果我们证明感激之情的力量征服了王室作者,我们就会使这种真诚无可怀疑,而且我们展示感谢诏书的文风混乱来证明这种感激之情的力量征服了王室作者。因此,我们出自爱国热忱的分析将不致被误解。

“我不能离开祖国的土地,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而不公开表示深挚的感谢,以我和王后的名义,它激动着我们的心。”

按句子的结构,乍一看,可能以为是国王和王后自己的名义激动着他们的心。人们在対这种独特的激动感到惊异之余再一思索,就会发现,“它激动着我们的心”中的“它”不是指“名义”,而是指远在前面的“感谢”。“我们的心”用的是单数,却代表国王的心和王后的心,堪称富有诗意的大胆文笔,堪称知心的王室伉俪心意一致的知心表现。把“以我的名义和王后的名义”简化为“以我和王后的名义”,这很容易引起错误的解释。“我和王后的名义”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国王的名义,因为丈夫的名字就是丈夫的和妻子的名字。诚然,大人物或孩子们用他们的名字而不用“我”作主语是他们的特权。这样,凯撒可以不说:“我胜利了”,而说:“凯撒胜利了”。同样,孩子们不说:“我要去维也纳上学”,

而说：“弗里德里希、卡尔、威廉等等要去维也纳上学”。但是把某人所称的“我”当作主语，同时又保证这个“我”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讲话，这是一种危险的创新。这样一种保证看来是承认人们通常不按自己的本意讲话。“我不能离开祖国的土地，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是对于“我甚至不能短时间地离开祖国的土地而不……”这句话的改写，措词既不十分高明，也不十分好懂。困难是由于把三个思想捏合在一起造成的：（1）国王离开他的土地；（2）他只是短时间地离开；（3）他觉得需要感谢人民。在表达时过分压缩这三个思想，就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国王表示感谢，只是因为他要离开他的土地。但是，如果这种感谢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那就不可能联系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来表示感谢。满腹衷情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一吐为快。

“它感谢产生于7月26日的行刺所引起的那种无数用口头和书面方式向我们作的爱的表示——也就是在犯罪的一刹那，当上帝的手从我胸前挡住致命的子弹并使它落到地上时向我们欢呼的那种爱。”

不知道行刺引起的是爱呢还是爱的表示，尤其是那个第二格的“爱”在插入句之后又作为句子的起支配作用和被强调的成分出现，就更加如此了。在修辞上破格重复使用这个第二格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我们看看句子的内容，疑难就更多了。难道可以把用口头和书面表示的爱直接当作在街上喧哗的人吗？难道实际情况的来龙去脉可以不需要你先表述在事件发生时立刻表示的爱，然后再表述后来用书面和口头方式表示的爱吗？

难道不应该避一避嫌疑：国王想同时既讨好贵族又讨好人民？讨好贵族，是因为他们的书面和口头的爱的表示，虽然按时间来说比人民的爱的表示要晚一些，但是就其作用来说，在国王心里激起



的感谢却更早一些 ;讨好人民 ,是因为人民欢呼的爱被说成是和书面以及口头的爱本质上相同的东西 ,可见 ,对爱来说 ,世袭的贵族身分被取消了。最后 ,让上帝的手直接挡开“致命的子弹”也是很不适的 ,因为根据这一点而连贯前后稍微想一下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上帝既把罪犯的手引向国王 ,又把致命的子弹从国王身前挡开 ;因为怎么能够设想上帝有片面的行为呢 ?

“我仰望着神明的救世主 ,振作精神设法做我的日常工作 ,以完成已经开始了的、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怀着必胜的信念同邪恶作斗争 ,并对我的人民来说是我的崇高使命责成于我的人 ,并且是我的人民之爱所应该得到的。”

大概不可说,“我设法”“是什么样的人”。最多可以说设法“成为什么样的人”。虽然我们也不想把后一种说法当作正确的来推荐,但“成为”这个动作至少表现为“设法”这个动作的结果。陛下“仰望着上帝而设法”“完成已经开始了的,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看来这既不预示着顺利地完,也不预示着顺利地实施。要完成已经开始了的和实施已经准备就绪的,就必须把眼睛紧紧盯住已经开始了的和已经准备就绪的,而不能置这些于不顾,仰望着苍天。真正的“仰望着上帝而设法”的人“不是将在凝视上帝中消溶吗?他的一切尘世计划和设想不会消失吗?那句用逗号断开的孤零零的结束语“我的人民之爱所应该得到的”好象暗示着有这样一句没有说出来的隐藏着的副句:“应该得到尼古拉妹夫的鞭子和梅特涅老兄的政策所应得的”或者“应该得到本生骑士的可怜的宪法所应得的”<sup>82</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44 年 8 月 15 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4 年 8 月 17 日《前进报》第 66 号,  
未署名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1844年1月—8月

弗·恩格斯

## 报刊和德国暴君<sup>83</sup>

我们的读者意识到共和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理正在德国迅速传播开来,这种进展近来在戴王冠的强盗们以及他们的伟大联邦<sup>84</sup>的顾问们中间引起了少有的惊慌。因此,他们就采取进一步的镇压措施来制止这些“危险的学说”的发展,特别是制止它们在普鲁士的发展。看来,1834年曾经在维也纳举行过一次秘密的全权代表会议,当时通过了一个议定书,不过只在最近才予以公布;议定书对报刊实行极严格的限制,并强行宣称,君主们的“神权”凌驾于一切立法团体和任何其他民间团体之上。我们不妨援引第十八条来表明这个极其恶毒的议定书是实行“神圣同盟”原则的样板;条文写道:<sup>85</sup>

“君主们由于他们的等级议会违反 1832 年联邦议会法令的规定而受到威胁时,应解散这些议会,并从联邦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军事援助。”

为了证明报刊的正义性和自由在普鲁士是怎样被理解的,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科伦、闵斯德和其他天主教城市的检查官都接到严格的指令,不准转载任何有关目前正在爱尔兰进行的审判案<sup>86</sup>的材料。一家德国报纸打算派一名记者或通讯员前往都柏林,可是就连他的书信也别想获准发表。没有关系,尽管他们有

---

地牢和刺刀,自由还是会胜利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1 月底—  
2 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2 月 3 日《北极星报》  
第 325 号,未署名



1844年5月4日《北极星报》编辑部文章援引的  
弗·恩格斯给该报的信的片断



---

## \* 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sup>87</sup>

我想向您提供为《星报》撰写的有关在大陆上从事运动的党所取得的进展的报道、德国报纸的摘录以及我同巴黎和德国的消息灵通人士的通信的摘录。我高兴地看到，您的报纸登载的关于我愿使您在报道德国方面同样如此。德国的政治状况正日益变得重要起来。那里很快就要发生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结局只能是建立起一个联邦共和国<sup>88</sup>。同时，我将不仅限于德国，而且还将向您报道有关瑞士、奥地利、意大利、俄国等等国家的一切可能使您的读者感兴趣的情况。您完全可以按照您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来使用我所提供的材料。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4 月底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5 月 4 日《北极星报》

第 338 号，未署名

## \* 普鲁士局势<sup>89</sup>

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的时候,整个欧洲再没有一个更得人心的君主。而现在却再没有一个更不得人心的君主了。一个都没有,甚至连俄国的尼古拉也不是,因为他起码还受到他那些低贱的愚昧透顶的农奴的崇拜。这位普鲁士国王特意称自己是“基督教国王”并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了由一群唠唠叨叨的圣徒和佯装虔诚的朝臣组成的可笑无比的拼凑物,他用尽一切力量擦亮人民的眼睛,这并不是徒劳的。他开始时摆出一副开明的姿态,继而转向封建主义,最后建立起警察密探统治体制。苛刻的书报检查和法庭的起诉,把出版事业推到拿着国王的钱而又随时可以被国王免职的法官们面前,这些法官审理案件不用陪审团,而且禁止旁听。压制现象极为普遍。柏林大学的学生刚开始举行会议讨论政治问题就被警察制止,演说者遭到逮捕和起诉,其中有几个被学校开除。瑙威尔克博士是这所大学的讲师,他讲授现代政治,敢于说出自己的共和主义观点,他的讲课竟有大臣的密探来光顾,大约一个月以前,在大臣的非法干预下他的课终于被停止了。柏林大学对这种横加阻挠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学校有些人把这一抗议书发表了;由于这一弥天大罪,这些人现在正被起诉。在二月份举行的一些公开

的学生示威集会上,曾向因发表了一些讽刺诗而遭解职的霍夫曼教授欢呼致敬。其结果是又有六个学生被开除,并且因此而不能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开业行医。在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公众化装舞会由于一些政治影射的缘故而遭到警察的制止,可怜的杜塞尔多夫居民甚至到科伦去参加那里的节日游行都受到阻拦。

这还只是可以表明政府意图的压制措施中的几条措施而已,而它们对于公众舆论的发展却产生了奇效。它们把人民从政治上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使人民如此激愤,以致连这位“基督教国王”最老和最忠实的拥护者都开始为现行制度的稳固性担忧了。不满情绪到处都在增长,而且在莱茵省,在东普鲁士、波森、柏林和所有的大城市中,已经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人民决心首先要争得出版自由和宪法。但是,整个德国积累了那么多一触即发的问题,而且各种看法又是那样千差万别,所以无法预言这场运动一旦真搞起来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过,它必将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4 月底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5 月 4 日《北极星报》

第 338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 德 国 消 息<sup>90</sup>

在巴登大公国的众议院里,韦尔凯尔先生——一位自由派议员,也是这个国家的约翰·罗素勋爵——恳请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消除人民的不满情绪。

他说:“因为我在德国各地旅行很久,所以会见了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大批来访者。如果我不指出,在每一个地方,君主政治体制的原则在德意志民族各阶级的心目中正日益失去其基础,那我就是在欺骗人,就是没有履行我作为一个人民的代表的职责。因此我恳请各位大臣不要再反对公众舆论的潮流;因为如果不立即采取一些措施,如果听任我们祖国各邦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其后果如何,没有人会有丝毫怀疑。”

可以认为,韦尔凯尔先生关于共和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的证词是一切可能有的证词中最不容怀疑的证词,因为这一进步使他甚至比政府更感到害怕;其次还因为这一进步是与他自己的愿望完全相悖的。

由于出版了一本攻击奥地利政府的书而近来受到控告的弗里德里希·施泰因曼先生,已被判处要塞监禁八个月,尽管他住在普鲁士,而且他的书<sup>91</sup>是在那里发表的。他不是被奥地利政府而是被普鲁士政府控告,并且是在普鲁士法庭上。

《耶稣传》的作者施特劳斯博士正在撰写一部类似的著作:《使徒行传》。<sup>92</sup>他在这本书里当然还是会象他在前一部著作中那样对

待福音书。

俄国目前正非常积极地对德国各邦的宫廷展开外交活动,目的在于谋求实行一些措施来制止德国报刊那样猛烈地抨击沙皇的政策。眼下在德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反俄情绪,前些时候以来就在所有的报纸上和大量的小册子里发泄出来,因而使专制君主焦急不安。但幸运的是,他将无法制止它们的出版。

### 慕尼黑的严重骚乱

本月3日,慕尼黑由于啤酒价格上涨发生了骚乱。这次骚乱是严重的,而且要不是动用一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就平息不了。军队奉国王的明确命令,向手无寸铁的人们开枪射击,打死数人,打伤若干人。下述的进一步详情表明人民得胜了,国王屈服了;原因是这位王室杀人犯害怕他自己的工具即军队会转过来反对他!

慕尼黑,5月5日。

“本市已恢复平静,但是不可否认,王权在处理此事时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国王在表示自己坚决反对任何调解或妥协以后,在亲自命令军队向人民开枪——而且他亲自督阵——以后,结果却要求啤酒商顺从人民的要求。今天早上,所有街道的角落里都张贴了布告,宣称将不提高啤酒价格;人民看来是满意了,但是同时暗地里仍然对国王怀有仇恨,因为他下令向他们开枪,致使本市市民数人丧生。看来国王屈服的主要原因是军队表现得对他不太忠诚,他们看样子根本不愿意向人民开枪。”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5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44年5月18日《北极星报》

第340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 一个叛徒的命运<sup>93</sup>

积极参加过 1830 年革命<sup>94</sup> ,后来却背弃了自己的党的亚当·古罗夫斯基伯爵被允许回国了 ,又因为发表了几本书而弄得声名狼藉 ,臭不可闻。他在这些书中劝他的同胞把他们的独立被消灭看成是上帝的判决——而对于上帝的判决他们必须诚惶诚恐地服从——并到受上帝嘱托来掌握他们命运的伟大沙皇的宝座下寻求庇护。<sup>95</sup>他对他们说 :波兰被制服在俄国枷锁之下是波兰所遇到的再好没有的运气 ;他们的责任就是放弃一切独立的希望 ;最后一点就是 ,沙皇政府是地球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府。他当然指望得到尼古拉的奖赏 ,可是这位专制君主谨慎之至 ,对一个叛徒是不信任的。他利用了他 ,又抛弃了他 ;他给了他一个下级官职 ,古罗夫斯基眼见自己没有晋升的希望就辞去了这个职务。他甚至由于自己参加起义而丧失的一个国民的权利都得不到 ;最后 ,他决定再度离开波兰去普鲁士避难 ,到布勒斯劳 ,他已要求那里的当局把他当作一个军队逃兵来对待。古罗夫斯基由于自己的同胞鄙视他——他背弃了他们的事业—— ,欧洲一切党派嘲笑他 ,沙皇又抛弃了他 ,所以正打算到美国去 ,大概是希望他的名声不会随着他一道漂洋过海吧。

---

现在称作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俄国专制政府对波兰铁一般的统治,目前依然和过去一样残酷无情。它用一切办法使不幸的波兰人每走一步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奴隶。甚至路旁的路标都必须用俄文书写;不准用一个波兰字。所有的法庭都不使用波兰文。德国歌曲《北方的吉普赛少年》,内容丝毫没有影射俄国或波兰,仅仅表达了想返回故乡的强烈愿望,这首歌译成了波兰文,可是被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作为一首爱国的因而当然也是犯罪的歌曲扣压下来。难怪尼古拉想封住德国报刊的口,因为它是使全世界了解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唯一渠道。不过,决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在一个俄军的边屯团里,有六个波兰士兵逃跑,可是还没跑到普鲁士就被抓住了。每人被判笞刑一千五百皮鞭,惩罚执行了,他们的亲属也被迫参与执行,六个人中只有三个人没有被打死。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5 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5 月 18 日《北极星报》

第 340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啤酒骚乱<sup>96</sup>

巴伐利亚啤酒在德国酿制的所有这种饮料中最负盛名,自然,巴伐利亚人非常爱喝这种啤酒,而且消费量相当大。政府对啤酒规定了从价征收约一百先令的新税,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四天多的乱子。工人们为了对他们最喜爱的饮料的涨价进行报复,大批地集结起来,上街游行,袭击酒馆,砸窗户,毁家具,双手所及无不破坏。调来了军队,可是一个警卫骑兵团对要他们“上马”的口令,竟拒不听命。到处都被人民憎恨的警察遭到骚乱群众的痛击狠揍,原来驻有警官的每一个派出所都不得不由士兵们驻守,他们因为和人民关系较好而被认为不是那么敌对的,并且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不愿干涉的情绪。只有在王宫受到袭击时他们才真的干涉一下,那他们也是仅仅摆出一种能制止骚乱群众就行的阵势。第二天晚上(5月2日),国王——他家里刚刚庆祝完婚礼,因而宫廷里贵客很多——到戏院看戏。可是在第一幕演完后,有一群人聚集在戏院前,威胁着要袭击戏院,这时人人都走出戏院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国王陛下也只好和他的贵客们一起跟着出去,否则就会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法国报纸说,国王当时命令在剧院前站岗的军队向人民开枪,而士兵们拒不服从。德国报纸没有提到这一点,鉴于报

---

路德维希一世。——编者注



纸要在书报检查之下出版,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法国报纸由于有时对外国的事情了解得很差,因而我们不能保证它们的说法的真实性。然而从这一切看来,诗人国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写过三卷无法读懂的诗歌、为他的一所开放的宫殿<sup>97</sup>写过一本旅游指南等等、等等)在这次乱子中一直处于一种极其被动的地位。在慕尼黑这个遍地是军警的城市、王室朝廷所在地,尽管出动了那么多的军队,骚乱仍然持续了四天——最后,骚乱群众用暴力达到目的。国王下了一道命令,把一夸脱啤酒的价格从十个克劳泽铜币( $3\frac{1}{4}$ 便士)减到九个克劳泽铜币(3便士),这才恢复了平静。人民一旦了解到他们能够把政府吓得放弃它的征税办法,他们将很快懂得,在更重大的问题上恐吓政府也会是同样容易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5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5 月 25 日《北极星报》

第 341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 普鲁士的牧师专制<sup>98</sup>

这个国家里受到现政府的特别保护和恩宠的专制的牧师,表现得一天比一天目中无人。例如最近在柏林发生了这样的事:牧师们一个接一个地拒绝在星期六主持婚礼,拒绝的理由是,夫妇双方在星期日早上起床时决不可能具有适于参加主日礼拜的心绪,如果他们是在前一天结婚的话!根本不管在星期日要不要正正经经地做礼拜,相反地把它当作一个星期中最快乐的一天来度过的柏林人,对当权者要在他们中间实行“英国星期日”,自然大肆抱怨,他们不知道有比这更可怕的东西了。的确,英国星期日对大陆所有国家的情感和习惯来说是最不相容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5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5 月 25 日《北极星报》  
第 341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 圣彼得堡新闻

圣彼得堡发生了相当大的内阁变动<sup>99</sup>。财政大臣康克林先生被贬黜,据报道,被贬黜的还有警务大臣,即著名的本肯多夫伯爵。尼古拉显然在为保存一个正在迅速崩溃的制度而斗争。尽管尼古拉的大批雇佣文人那样卖力,反俄情绪在德国和大陆上其他国家正日益高涨。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一个大难题;宫廷的豪华排场,一支不计其数的警察和暗探队伍,向全欧洲派遣外交人员、密探、记者和在那里搞阴谋、行贿赂所需的费用,陆军和海军以及对切尔克斯人的无休止的战争<sup>100</sup>,这就把通过收税和借债所能聚敛的一切全都消耗殆尽了。康克林先生的限制性贸易政策使这个帝国的一些地方的对外贸易几乎成为不可能,也没有能够在国内建立起一个民族工业体系。在贵族中间,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三部分人,即宫廷官员、旧式乡绅和军官。他们总是相互倾轧,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别的,而是要把皇帝本人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皇帝和一切暴君一样毕竟只是他的宠臣们的工具。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5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5 月 25 日《北极星报》  
第 341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 法国消息<sup>101</sup>

在里昂附近的里夫-德-纪埃,由于工资和其他不满,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矿工罢工。这次事件整个说来与英国的罢工具有相同的形式:打着旗子游行,举行群众集会,严厉警告工贼,等等。罢工持续了大约六个星期,尽管看来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有几个人却以参与密谋的罪名被拘留了。据报道,工人最后回到了矿井,但是没有说明罢工的目的是否达到了。

### 共和党的示威游行

《每周快讯》记者就共和党势力为拉菲特先生的葬礼举行集会所写的下述报道值得一读,因为它表明共和党人在巴黎有很大的力量,并且那个国家肯定很快将发生一场革命。

“尽管上月30日著名的雅克·拉菲特的葬礼<sup>102</sup>没有发生骚乱,共和党却有力地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法学院和医学院的五千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向一个毕生(除一次致命的例外)致力于政治自由事业的人致敬。至于那个唯一的错误——就是说把皇冠授予路易·菲力浦<sup>103</sup>——他已经在众议院部分地赎了罪,他为他协助下给法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造成的重大损害请求上帝和人们的宽恕。为拉菲特送葬的五千名学生都是忠诚的共和党人——他们都热切地盼望着政治自由。这些具有崇高思想的年青人和综合技术学校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全都是青年法国的希望。只要他们从内心根除掉仅仅由于要在民族

间重新争个高低而投入战争那种荒唐的敌视英国的心理,只要他们学会把他们的海岛盟国当作在文明大道上和他們携手并进的一个强国而给予尊敬,总有一天,这些年青人——两国的保守报刊所看不起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将负起使命主宰法国的命运。在1830年的革命中,十六岁到十八岁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在这场同皇家军队的殊死斗争中成了人民的军事首领。在路易·菲力浦死后,共和党人无疑将宣布他们的原则是唯一适合法国和法国人利益的原则;巴黎的青年学生必定会象他们在十四年前领导人民走向胜利时那样心甘情愿地和忠诚地在政治舞台上同人民协力合作,成为他们的顾问。然而,共和党在为拉菲特先生举行葬礼时所显示的力量并不限于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秘密社团也不是没有行动。这些令人生畏的政治组织的成员大批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大部分是体面的商人、工匠和手艺人,根本不是《泰晤士报》和《辩论日报》曾多次描绘的那种被人鄙弃的暴民和下贱的败类。他们组成了一支四列纵队,走在学生的紧前面。送拉菲特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的还有共和党的第三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全是穿戴整齐、仪容端庄和举止出众的工人。因此,自由的朋友们这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的确,保守派报刊否认法国共和党人数众多和精神影响巨大这一事实是荒唐的。共和党在自己的行列中拥有法国的一些杰出人物——他们分别在军事、文学、艺术、科学和政治领域内享有盛名,它由于那些因国王暴虐才与奥尔良王室疏远的人投靠自己而不断增添力量,并且声称要遵循符合文明的新利益和新要求的原则,所以,一旦任何无法预料的突然事变或自然的发展过程动摇了奥尔良王朝的统治,共和党就将是众望所归的党。”

### “神圣战争”

摩洛哥皇帝已经宣布了对法国和法国人的“神圣战争”,现在正动员他的统治区内和邻近他的统治区的各族人民和部落为捍卫唯一的信仰,灭绝“异教徒”而武装起来。阿卜杜尔·卡迪尔这位非洲的华莱士,是这一次以推翻和驱逐法国征服者为目的的民族运动的领袖。<sup>104</sup>最新消息称,摩洛哥军队的先头部队似乎已经进入

---

阿卜杜尔·拉曼二世。——编者注

法国军队的视野。

据来自君士坦丁的消息,奥马尔公爵似乎吃了一些败仗,这看来是他自己轻率和缺乏经验造成的。从下面这段消息可以看出,留下来守卫比斯克拉的一小股军队遭到了突然袭击,法国驻军被杀死,全部辎重、弹药和财物都被当地人弄走了。

3日从土伦的来信说:

“我们收到了上月20日君士坦丁省最令人焦急的消息。奥马尔公爵在比斯克拉留下了一支人数很少的驻军,其中只有驻军司令珀蒂冈中尉,克罗沙尔少尉和军医助阿尔塞兰少校以及君士坦丁步兵营的大约四十名士兵。原来是打算让这一小队人成为从比斯克拉附近部落里募集的一个新营的核心。在所有这些人中,只有一个名叫佩利斯的上士逃出去了。新兵在夜间为阿卜杜尔-卡迪尔的哈利发·穆罕默德·塞吉尔及其追随者打开了卡斯巴城堡的大门,这些人在我们的人睡觉时进行了突然袭击,将他们全部杀死。开始了大掠夺,留给驻军司令发放的军饷70000法郎,全部大炮、火枪、弹药和其他财物都被抢走了。据说,这次不幸事件竟鼓舞了邻近的部落拿起武器。这个悲惨的消息传到王公那里时,他正在乌莱德-苏尔托山中,他立即率领3000人的队伍开赴比斯克拉。他在18日赶到那里,但是哈利发已经在前一天离开了。非洲轻步兵第三营在24日从君士坦丁开赴比斯克拉,以便成为那里的驻军。”

星期五,众议院以190票对53票的多数通过了拨款750万法郎作为扩充目前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的开支(96000人再加15000人,这样,在阿尔及利亚的兵力就增加到111000人)。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6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44年6月15日《北极星报》

第344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阿卜杜尔-卡迪尔所建立的国家的地方长官,受中央政府管辖。——译者注  
奥马尔公爵。——编者注

1844年6月7日。——编者注

## 瓦勒内战<sup>105</sup>

罗尼河的河谷,从其发源地罗尼冰川山麓到勒芒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河谷两旁是欧洲最高的山脉,两条平均高度为一万二千英尺的绵延不断的山脉,山上终年积雪,这就形成无数小溪,流入罗尼河,肥沃着河谷地带的草地和农田。从终年寒冬之乡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栗子树和葡萄藤宛如在四季常青的伦巴第平原上那样温暖的阳光下茂盛生长。这个河谷被称为瓦勒,部分地区住着德意志人,部分地区住着法兰西人。从东北方向进入这个地区的德意志人占据着河谷的地势较高和多山的地带,这里虽然不适宜发展农业,却是牧养牲畜的极好地区;因此,居民的这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处于几乎和他们的祖先占据上瓦勒时一样的原始状态。政治教育和宗教教育完全把持在少数贵族门阀和僧侣手里。他们自然是极力保持人民的愚昧和迷信。与此相反,法兰西人定居在下瓦勒,这里由于河谷变宽,可以从事农业和别种生产活动。法兰西人建立了瓦勒的比较大的城市,他们是开化和文明的,由于这些城市邻近勒芒湖和激进的窝州,所以他们能和外界联系,能跟上毗邻地区的思想发展。可是,上瓦勒的粗鲁的山里人在好几百年前却征服过——我不知道是怎样征服的——

---

日内瓦湖的法文名称。——译者注

法兰西人的下瓦勒,并且一直把这一部分看作一个被征服的行省,不允许这里的居民以任何方式参政。

1798年,法兰西人推翻了瑞士贵族专制的旧式贵族制度,下瓦勒才取得参政权,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全部权利。1830年,民主党在整个瑞士都占优势时,宪法在公正民主的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得到修订,可是上瓦勒受僧侣蹂躏的牧民和他们至高无上的思想统治者——牧师,从那个时候起总是企图复辟不公正的旧制度。激进党为了防止复辟,在他们自己人和窝州激进党人中间组织了一个叫作“青年瑞士”——“La Jeune Suisse”的协会<sup>106</sup>。他们受到了僧侣们最激烈的咒骂和诽谤,并且经常被当作异教徒加以攻击,可是这个罪名在大陆上与其说使人害怕,不如说使人发笑。1840年,“青年瑞士”遭到了第一次袭击,但是迷信和无知的受骗者在发现民主党人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后,就退回到他们那无法攻克的山路里去,以期在1844年3月再度出击。这一回他们把激进党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利用了对保守原则有利的普遍反应和居于首位的琉森州(联邦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是一个保守的州这一情况。瓦勒的民主党暂时被打败了。这将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干涉;亲自率领保守军队前来的僧侣们能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什么好处,以后自有分晓;但是不管怎样,要重建任何类似旧制度的东西,或者把下瓦勒及其生气勃勃的居民置于臣属地位,这即使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再过几年,不,再过几个月,民主党就会重新取得优势。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6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44年6月15日《北极星报》

第344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 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sup>107</sup>

人民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他们通过自己的坚定而持久的反抗迫使国王 放弃了他的得意措施——新的离婚法草案。这方面的现行法律是极其宽大的，当然也从来没有使这位基督教国王感到满意。国王自从即位以来，就一心要修订这项法律，使离婚只在极少数场合下才得到认可。必须尽可能严格地强化婚姻关系的神圣不可侵犯，并给牧师干预他人家庭事务打开另一扇门。然而，全国的理智都起来反对这项法律；报刊反对它，在一家民主派报纸 把这项法案的可靠的摘要弄到手并且予以发表之后，全国各地一片抗议声。<sup>108</sup>可是，国王一意孤行。法案被提交枢密院，以便为交付各省议会<sup>109</sup>讨论作好准备，因为根据普鲁士宪法，必须听取各省议会的意见。很难判定，是这项法案在枢密院内就已经遭到强烈的反对呢，还是国王意识到了这种措施决不会得到各省议会的赞同；但是，下面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有一道本月 11 日的国王敕令已经下达枢密院，它撤回了法案，屏弃了其中的全部原则，并宣布国王将只满足于改变现行法律中的一些手续问题。反对国王而取得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胜利必然会永久地加强民众的力量，它将在王国的每一个小村庄里受到人们的欢呼。这个胜利将向人民表明，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莱茵报》。——编者注

他们是强大的,他们如果团结起来,就可以废弃他们所不喜欢的任何措施,而且,它还表明,他们甚至只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就会使政府害怕,而去做他们愿意它做的任何事情。

在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骚乱,这个地区的几乎完全靠生产麻布为生和困苦不堪的工人,由于经受不住英国机器生产品的竞争,一个时期以来已经陷于与英国手工织工同样的境地。在竞争、机器生产和贪婪的企业主的压迫下,他们终于在彼得斯瓦尔登(西里西亚)奋起反抗,他们捣毁了一家企业主的房子,而且只是在军队来到后才被驱散。在兰根比劳也发生了同样性质的骚乱;军队遭到人民的反抗,只是在得到援兵并向骚乱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数人之后才恢复了平静。其他地区也出现了骚乱的集会,甚至省会(布勒斯劳)的平静也受到骚扰。

因此,显而易见,对工人阶级来说,工厂制度、机器技术进步等等带来的后果,在大陆上和在英国是完全一样的:对大多数人是受压迫和劳累,对极少数人是财富和享乐;在西里西亚的山岗上,也和和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等人烟稠密的城市中完全一样,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到处都存在着不满和骚乱。<sup>110</sup>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6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6 月 29 日《北极星报》

第 346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见本卷第 211—213 页。——编者注

现在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 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sup>111</sup>

正如我在上次通讯中所写的,骚乱是在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中心赖辛巴赫地区的彼得斯瓦尔登开始的。织工们聚集在最有身分的企业主之一,一个名叫茨万齐格尔的人的家门口,唱着一首谴责他虐待工人的歌<sup>112</sup>,这首歌看来是为这次行动编写的。茨万齐格尔先生找来了警察,几个带头闹事的被逮捕了,聚集在他门前的人群越来越多,威胁着要把被捕者救出来,而被捕者既然没有被释放,人们就立即开始进行破坏。大门被冲开,窗户被砸烂,人群冲进了住宅,双手所及无不破坏。茨万齐格尔一家险些来不及逃命,人们不停地向他们扔石头,他们感到必须让女眷披上被褥,用马车送到施魏德尼茨去。还派人送信到那里去请求军队援助,可是指挥官回答说,没有布勒斯劳省当局的命令,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人们这时已经完全捣毁了茨万齐格尔先生的住宅,接着又冲进库房,毁掉了全部账簿和票证,把他们发现的一千多镑现款扔到了街上,这些钱被一群越界过来想乘骚乱之机捞一把的波希米亚走私贩拣走了。成捆成袋的棉花,以及生产的全部棉纱和成品,都被尽量毁坏或弄得不能用了,邻近一家工厂的机器完全被砸毁了。

人们在这里干完了以后,离开被毁坏的房屋的废墟,接着前往

---

见前一篇文章。——编者注

兰根比劳；这个城市的工人立即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迪里希先生的工厂和库房遭到了袭击。迪里希先生起初试图出一笔钱来应付他们，但是，讲妥的那笔钱他刚付了一部分，听说军队已经向他那里开来，他马上拒绝付出其余部分。人群立刻冲进房子，完全象在彼得斯瓦尔登那样捣毁这些房子。这时，一支大约有一百六十名步兵的队伍和民政官员一起赶到了；宣读了惩治骚乱法，人们就向军队扔石头，以示回击；接着，下了开枪射击的命令，骚乱的群众中有十二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被激怒的人群向士兵冲去，并用石头打伤了许多士兵，已经被拖下马来遭到痛打的指挥官不得不和士兵们一起撤退，等待援兵，而这时人们仍在继续捣毁财产。最后，来了两个步兵营、一个猎兵连、一些骑兵和炮兵，骚乱的群众才被驱散。想进一步进行骚乱的企图被占领这个城市及其近郊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而且和往常一样，在一切都结束之后，地方当局便出面发布告示之类的东西，宣布这个地区处于戒严状态，并威胁要用最可怕的惩罚对付任何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骚乱并没有局限于这两个城市，阿耳特-弗里德兰和洛伊特曼斯多夫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尽管那里对企业主的敌对情绪没有表现得这样激烈；在军队恢复平静以前，有些人手臂被折断了，有些窗户被砸坏了。整个地区的人们这一次向企业主们明确无误地显示了自己的感情。

由于低工资、采用机器和企业主贪得无厌而造成的这些穷苦职工的难以置信的痛苦，是这些骚乱的原因。简直很难令人相信，这一被压迫阶级中一个家庭——父母亲和孩子们都在织布机上劳动——的工资收入所能买到的东西不会比在英国用六个先令所能买到的更多。此外，职工全都负债，这在工资极低的情况下根本不

足为奇,而企业主很乐意预付给他们少量的钱,这些钱工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但是满可以使主人对工人拥有绝对的主权,使工人成为企业主的奴隶。除此以外,还有英国产品的竞争,由于英国工厂的机器优良、工资很低,英国产品更有竞争力,并且也促使西里西亚织工的工资降低。简言之,正是工厂制度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压迫了西里西亚的织工,正象它过去和现在压迫着英国的工厂工人和手工织工一样,正是工厂制度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在这个国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多地引起了不满和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所有一切德国报纸的报道,在这一切骚乱中,挨饿的织工没有搞过一次抢劫。他们把钱扔到街上,而没有拿去自己用掉。偷窃和掠夺的事,都是波希米亚的走私贩和盗贼干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6 月下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6 月 29 日《北极星报》

第 346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4年9月—1848年2月

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

# 大陆社会主义<sup>113</sup>

看来大陆社会主义目前值得受到社会上相当多人的注意。现寄上《新道德世界》前撰稿人从普鲁士的巴门来信的几段摘要。

“我在回家途中,在巴黎<sup>114</sup>访问了神秘主义学派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是一位俄国人介绍我去的,他能讲极好的法语和德语,并且十分巧妙地提出费尔巴哈的论据来反驳神秘主义学派。他们所说的神这一术语正是罕考门派社会主义者<sup>115</sup>所说的爱的精神。不过,他们宣称,这是次要问题,实际上是和我们一致的,并且说, ‘enfin l’athéisme, c’est votre religion’——总之,无神论是你们的宗教。在法语中,‘宗教’的意思是深信,感觉,而不是崇拜。他们断言,资产阶级即中等阶级反对英国的叫嚣和喧闹都是无谓之举;他们急于使我们相信,他们丝毫没有民族偏见,法国工人并不关心摩洛哥,<sup>116</sup>他们只知道全世界的 les ouvriers——工人——由于具有共同的利益而都是盟友。法国中等阶级正象英国中等阶级一样,

---

显然指米·亚·巴枯宁。——编者注  
把神的观念归结为人。

是十分自私、贪婪的，是完全不能见容于社会的，而法国工人是非常好的人。我们在巴黎的俄国人中间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三四个正在巴黎的贵族和农奴主成了激进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我们在巴黎有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德文的共产主义报纸《前进报》。在比利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共产主义鼓动工作，并且有一家报纸《社会辩论报》已经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在巴黎，大约有六家共产主义报纸。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的等词在法国十分流行；而路易·菲力浦这个头号资产者靠金钱和庇护来支持《和平民主日报》。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表面的宗教信仰大半是虚假的；人民是完全不信教的，下一次革命的第一批牺牲者将是教士。科伦人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我们在一家旅店集会时，房间里坐满了我们的朋友，大部分是律师、医生、艺术家等，还有三四个骑兵中尉，其中一个是非常聪明的人。在杜塞尔多夫，我们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位颇有才气的诗人。在爱北斐特，大约有我的六个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在北德意志，几乎每一座城市我们都有几个反对私有制和主张无神论的激进党人。柏林的埃德加尔·鲍威尔由于他最近写的一本书刚被判处三年徒刑。”

我想上述事实会使您的读者感兴趣，特此寄上供贵报刊载。

弗·恩格斯约写于 1844 年 9 月 20 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4 年 10 月 5 日《新道德世界》

第 15 号

署名：盎格鲁·德意志人



载有弗·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  
一文的《1845 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的封面

弗·恩格斯

## 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 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sup>117</sup>

如果你同人们谈起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么往往会发现:他们认为就事情本身来说你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表示共产主义是某种十分美好的东西;他们接着又说:“但是,任何时候要使这类事情见诸实现是不可能的”。这种反对意见经常出现,本文作者认为,列举几个在德国还很少有人知道而且能把这种反对意见完全驳倒的事实作为回答,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會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

此外,只要稍许仔细探究一下那种反对意见,就会发现,它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没有工人会同意从事卑贱的讨厌的体力劳动;第二,在对公共财产享有平等权利的情况下,人们会为这种财产而互相争吵,使公社重新瓦解。对第一个反对意见的回答很简单:这种劳动一旦在公社中进行,就不再是卑贱的了;而且,这种劳动几乎完全可以因改进了的设备、机器等等而免除。例如,在纽约的一家大旅馆,擦靴子是靠蒸汽的力量;在英国“协和”共产主义移民区(下面还要提到),仿造了方便的英国式便所(设有抽水马桶的

厕所) ,这种便所不仅能自动冲刷 ,而且还设有管道 ,把粪便直接排入大的粪池。至于说到第二个反对意见 ,情况是这样 :所有共产主义移民区在最近十年到十五年内变得非常富裕 ,它们想要得到的应有尽有 ,而且比它们能够消费掉的东西还要多 ,因此 ,就没有任何争吵的理由了。

读者将会看到 ,下面记述的移民区 ,大部分来源于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 ,这些派别对各种事物往往持有十分愚蠢而荒唐的观点。对此 ,本文作者只想扼要指出 :这些观点同共产主义毫无关系。至于用事实来证明公有是可行的那些人究竟信一个神 ,信二十个神 ,还是根本不信神 ,这显然也无关紧要。如果他们信奉一种荒唐的宗教 ,那么 ,这是实现公有的障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这里还是实现了公有 ,那么 ,在摆脱了这种宗教狂的人那里就更有可能实现公有了。几乎所有新移民区都摆脱了宗教欺骗 ,英国社会主义者尽管主张信教自由 ,却几乎都不信教 ,所以 ,他们在笃信宗教的英国备受诽谤和咒骂。但是 ,一到要提供证据 ,甚至连他们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 ,所有这些恶劣诽谤都是毫无根据的。

最早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建立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公社的人 ,是所谓震教徒。这些人是一个奇特的教派 ,他们抱有非常独特的宗教观点 ,他们不结婚 ,根本不允许两性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 ,这一点在这里同我们无关。震教徒这个教派大约产生于七十年以前。它的创始人是穷苦人 ,他们联合起来 ,在兄弟友爱和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共同生活 ,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敬神。虽然他们的宗教观点 ,特别是禁止结婚 ,吓跑了许多人 ,但是 ,他们仍然找到了信徒 ,现在他们拥有十个大公社 ,每个公社有三百至八百个成员。每个公社是一座美丽的、按规划修建的城市 ,有住宅、工厂、作坊、

会议厅和粮仓,有许多花园、菜园、果树、树林、葡萄园、草场和耕地;还有马、牛、羊、猪等各种牲畜和家禽,其数量之多超出了他们的需要,而且都是最好的品种。他们的粮仓总是堆满了谷物,库房装满了衣料。因此,一个访问过这些公社的英国旅行家说:他不能理解,这些人什么都很富足,为什么还要劳动;除非他们劳动完全是为了消遣,因为,不然就无事可干了。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劳动,也没有一个人为了找工作白白操心。他们没有济贫所和救济院,因为没有一个人穷人和受苦人,没有被遗弃的寡妇和孤儿;他们不知道贫困,也就不害怕它。在他们的十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宪兵或警察,没有法官,律师或者士兵,没有监牢或者感化院;然而一切都有条不紊。国家的法律不是为他们制定的,如果说法律是为他们的,那么它也同样可以被取消,对此不会有人过问,因为他们是最安分守己的公民,从来没有一个人犯罪入狱。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在最完全的财产公有的条件下生活,他们之间没有商业,不用货币。去年,一个名叫芬奇的英国旅行家访问了其中一个城市,即肯塔基州累克辛顿附近的快乐山,他作了以下描述:

“快乐山有许多高大美观的砖石房、工厂、作坊、马厩和粮仓,所有建筑物都非常整齐,而且在整个肯塔基州也数得上是第一流的;震教徒的耕地很好辨认:四周有漂亮的石头围墙,土地精耕细作;大量膘满体壮的牛羊在田野里吃草,许多肥猪在果园里吃着掉在地上的果子。震教徒在这里拥有的土地约四千美国摩尔根,其中耕地面积约占三分之二。这个移民区是在1806年左右由一户人家开创的,后来有其他户加入,这样,户数就逐渐增多了;有些人带来一点钱,其他人则一无所有。他们同许多困难进行了斗争,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很穷,在开始时不得不忍受很多困苦,但是,他们勤俭节约,克服了一切

困难,现在样样都绰绰有余,并且不欠任何人一分钱。目前,这个公社大约有三百个成员,其中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有五六十个。他们没有主人和仆人,更没有奴隶;他们自由、富裕而幸福。他们有两所学校,一所是男校,一所是女校,学校里教的是读书、写字、算术、英语和他们的宗教教义;他们不教孩子们学科学,因为他们认为,这对升入天堂没有什么用处。由于他们不允许结婚,所以,如果经常没有新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势必会死光;尽管禁止结婚吓跑了许许多多的人,连他们最好的成员中也还有一些人因此而退出,但是,仍然经常有许多新的成员加入,使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从事畜牧业和农业,自己生产亚麻、羊毛和丝,在自己的工厂里从事纺织。他们把想过自己需要的产品拿到邻居中出卖或者交换。他们通常劳动到天黑。管理委员会有一个管理账目的公开的账房,每个成员有权在他愿意的时候检查账目。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富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从来不登记他们的财产。他们只满足于知道:他们手头的一切东西,都归他们所有,因为他们不欠任何人一点债。他们只是每年把邻居欠他们的债款结算一次。

这个公社分为五户(组),每户有四十至八十个成员,有它单独的经济,集体住在一幢宽敞美观的寓所里;每个人都能免费从公社的公共仓库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得到他所需要的数量。每户有一名执事,他负责照管所有的人,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并尽可能预先了解每个人的愿望。他们的服装是战栗教徒的服装式样,朴素而整洁。他们的食品丰富多样,而且质量都相当好。按照公社的章程,新接纳的成员必须把他的一切东西都交归公有,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退社的时候,也决不能收回;尽管如此,公社还是把每个退社的人在入社时带来的东西如数归还。如果退社的成员在入社时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来,那么,按照章程,他也不能要求给他的劳动以任何补偿,因为他在劳动期间吃饭穿衣都是公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是和和气气地离开的,通常也会赠送他一份临别礼物。

他们的管理机构是仿照早期基督教徒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每个公社有两个神职人员,一男一女,他们又有两个助理。这四个神职人员领导全公社,解决一切争端。公社的每一户又有两个长老和两个助理以及一名执事或者一名管理员。公社的财产由三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掌管,委员会看管全部设施,领



导各项工作,并且同邻居进行贸易。不经公社同意,管理委员会不得买卖土地。此外,各个劳动部门自然还有监督人员和管理人员,但是,谁也不能发号施令,而是应当善意地说服一切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规定了。”<sup>118</sup>

名叫皮特基思利的第二个英国旅行家于 1842 年访问了另一个震教徒移民区:纽约州的新黎巴嫩。皮特基思利先生仔细参观了拥有八百居民和七八千摩尔根土地的整个城市,调查了它的作坊、工厂、制革厂、锯木厂等等,认为整个设施是完善的。他对这些起初一无所有而现在一年年富裕起来的人拥有的财富也感到惊奇,他说:

“在他们中间,大家都幸福和愉快,那里没有纠纷,相反,他们的整个寓所充满了友爱的气氛,各个方面都秩序井然和有条不紊,而这一点是无与伦比的。”<sup>119</sup>

关于震教徒就讲这么多。上面说过,他们生活在完全的财产公有的基础上,他们在北美合众国有十个这样的公社。

在美国,除了震教徒以外,还有另一些建立在财产公有基础上的移民区。这里首先谈谈拉普派,拉普是维尔腾堡的传教士,他和他的教民于 1790 年同路德教派决裂,因此受到政府的迫害,于 1802 年出走美国。他的信徒于 1804 年也追随前来,这样,他就和将近一百户人家在宾夕法尼亚定居下来。他们的财产共约二万五千塔勒,他们就用这些钱来购买土地和工具。他们的土地是尚未开发的处女林,这块地使他们付出了全部财产;不过,他们是分期偿付这笔钱的。他们在财产公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订了以下公约:

(1)每个成员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交归公有,不得借此索取任何特权。在公社中人人平等。

(2)每个成员必须遵守公社的规章制度。

(3)每个成员只能为整个公社的福利从事劳动,而不是各人顾自己。

(4)退社者不得要求给他的劳动以补偿,但可以收回他带来的一切东西;凡是什么也没带来但和气而友好地离开的人,可以得到一份自愿赠送的临别礼物。

(5)公社有义务向每个成员及其家庭供应一切生活必需品,并使病人和老人得到必要的照顾。如果双亲死亡或退出公社,他们留下的孩子由公社教养。

在他们建社的头几年,要开垦荒地,每年还要偿还购置土地的欠款七千塔勒,这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很艰难的。这种情况吓跑了一些比较富裕的人,他们退出公社并且取回自己的钱,这就更增加了这些移民的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始终不渝地坚持下来了,过了五年,在1810年,他们就还清了全部债务。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1815年卖掉了他们的整个移民区,在印第安纳州又重新买进了两万摩尔根处女林。过了几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美丽的城市“新协和”,开垦了大部分土地,培育葡萄园,种植庄稼,建立毛棉纺织厂,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1825年他们以二十万塔勒把整个移民区卖给罗伯特·欧文先生,第三次迁入处女林。这次,他们在俄亥俄这条大河畔定居下来,建立了“节俭”城,它比以前他们住过的任何地方都宽广、美丽。1831年莱昂伯爵带领一群德国人,大约三十人,来到美国,要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欣然接纳了这批新来的人;但是,伯爵煽动一部分成员反对拉普,因此,在一次全社大会上作出决定:莱昂及其支持者必须离开。其他留下来的人向这些心怀不满者付出的钱超过十二万塔勒,莱昂用这

笔钱建立了第二个移民区，但是，它由于管理不善而告失败；它的参加者各奔东西，不久，莱昂伯爵成了流浪者，死于得克萨斯。相反，拉普的移民区至今还欣欣向荣。关于它目前的情况，上面提到的旅行家芬奇作了如下报道：

“‘节俭’城有三条既长又宽的街道，与五条同样宽的横马路相交叉；城里有一座教堂，一家旅馆，一个毛棉丝纺织厂，一个养蚕房，一个为满足本社成员需要兼向外人售货的小百货店，一个博物标本室，各种手工业作坊，农用建筑物以及为各家各户建造的宽敞美观的住宅，每所住宅都有一个大花园。这座城市拥有的耕地，其长度等于步行二小时的路程，宽度等于四小时的路程，它有大葡萄园和一个占地三十七摩尔根的果园，还有庄稼地和草地。它有将近四百五十名成员，人人穿得好，吃得好，住得舒适；他们是快乐、满意、幸福和有道德的人，已经多年不知道什么是贫困了。

他们也有一个时期非常反对结婚，但是现在他们也结婚、建立家庭，而且如果有合适的人到他们这里来，他们是很希望增加成员人数的。他们的宗教是以《新约》为基础的，但是他们没有特殊的信条，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只要他不妨碍其他人，不为信仰发生争吵。他们自称协和派。他们没有领取报酬的传教士；年过八十的拉普先生既是传教士又是管理人和公断人。他们喜欢音乐，有时举行音乐会和演奏晚会。在我到达那里的前一天，他们就在田野里举行盛大音乐会作为收割的开始。在他们的学校里设有读书、写字、算术和语言课，但是象震教徒一样，不教科学。他们劳动的时间大大超过他们必需劳动的时间，也就是不论冬夏，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人都参加劳动，冬季不在工厂做工的人就去打场，照管牲畜等等。他们有七十五头奶牛，一大群羊，许多马、猪和家禽，他们把自己积蓄中的一大笔钱贷给商人和银钱兑换商，尽管这笔贷款的相当一部分由于破产而受到损失，他们的闲置的钱还是逐年增多。

最初他们力图自己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为的是尽量不向他人购买而且归根到底是要使生产的东西超过他们的需要；后来，为了改进养羊业，他们花了一万五千塔勒买到一百只西班牙羊。他们是最先在美国开始生产羊毛织品的。以后他们开始培育葡萄园，种植亚麻，建立棉纺织厂，从事养蚕和

蚕丝的加工。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中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在出售任何东西以前,先要充分供应自己。

他们以二十至四十人为一户组织生活,每户有单独的房子和单独的经济。每户从公共仓库领取它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供给大家的东西绰绰有余,可以免费得到一切,并且需要多少就得到多少。他们需要衣服或鞋的时候,就到裁缝师傅、缝工或鞋匠那儿去,得到按自己的爱好订做的衣服或鞋。肉和其他食品,按人数分给每户,他们的一切都很富裕充足。”<sup>120</sup>

另一个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公社建立在俄亥俄州的佐阿城。

这些人也是来自维尔腾堡的分离派,他们和拉普同时与路德教派决裂,在遭受路德教派和政府长达十年的迫害之后,也移居国外。他们一贫如洗,只是靠伦敦和美国的慈善战栗教徒的支援,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在自己的传教士博伊姆勒的带领下于1817年秋到达费拉得尔菲亚,向一个战栗教徒买了土地,这些地至今还是他们的,面积有七千摩尔根。买地的钱将近六千塔勒,他们必须逐步偿付。他们到达目的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的钱,这时才发现平均每人只有六塔勒。这就是全部家当了;买地的钱还分文未付,仅有的几个塔勒必须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能维持到来年收获前的口粮。他们面临的是一片只有几间木房的树林,而且必须把它变成可耕地;但是,他们斗志昂扬地投入劳动,不久就把这块地变成了耕地,第二年就建成了一个粮食加工厂。起初,他们把耕地分成小块,每一小块地由一户自行耕种,并且作为这一户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行不通,因为每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们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森林伐光并把它变成可耕地,根本不能很好地互相帮助,因此,许多人负了债,而且有成为赤贫的危险。于是,一年半后,即1819年4月,他们联合成一个财产公有的公社,起草了章程,一致选举他们的传教士博伊姆勒为社长。现在他们还

清了公社成员的全部债务,并且可以延期两年付清买地的钱,他们干劲倍增,同心协力地从事劳动。有了这个新组织,他们干得很顺利,比预定日期提前四年把买地的钱连同利息全部付清。至于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可由两个目睹者的记述作证:

一个经常去佐阿的美国商人认为这个地方是清洁、整齐和美观的完美典型;这里有舒适的旅馆,有年老的博伊姆勒居住的高大宅第,有占地两摩尔根并配备了一个大花房的美丽公园,还有美观、设备完善的房子和庭园。他把这些人描写得十分幸福和满足,勤劳和正直。他的这篇记叙文曾在匹兹堡(俄亥俄州)的一家报纸(《匹兹堡每日辩护者和通告者》1843年7月17日)上发表。<sup>121</sup>

我们曾多次提到的芬奇认为,这个公社是美国所有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公社中组织得最完美的一个。他提供了一份很长的公社财产清单:他们有一个麻纺厂、一个毛纺织厂、一个制革厂、一个铸铁厂、两个粮食加工厂、两个锯木厂、两台脱粒机以及许多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作坊。他还补充说,他们的耕地比他在美国看到的其他一切耕地耕作精细。《芬尼杂志》估计分离派的财产为十七万至十八万塔勒,这全是他们在二十五年内挣得的,而开始的时候他们每人只有六塔勒。他们有将近二百人。有一段时间他们也禁止结婚,但是,和拉普派一样,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做法,现在可以结婚了。

芬奇援引了这些分离派的章程的副本,主要内容如下:

公社的所有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凡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员都可以被选为公职人员。这些公职人员是:

(1)三名管理员,每年必须重新选举其中一人,管理员可以由公社随时撤换。他们管理公社的全部财产,并且在情况许可的限度

内一视同仁地供应公社成员的生活必需品、住房、衣服和食品。他们可以在各劳动部门委派自己的助手,解决小的纠纷,可以与公社委员会共同颁布新的条例,但这些条例不得与章程相抵触。

(2)社长,他的任职期以受公社的信任为限,他以最高公职人员的身分领导公社的全部事务。他有权买卖,订立契约,但是,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只有取得三个管理员的同意才能行动。

(3)公社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每年必须有一人离职,委员会握有公社的最高权力,与管理员、社长共同颁布法律,监督其他公职人员,并且在争吵的双方对管理员的解决办法不满时解决纠纷。

(4)司库,每四年选举一次,在全体成员和公职人员中,只有他一个人有权掌管钱。

此外,章程规定:必须建立一所学校;全体成员把自己的全部财产永远交归公有,不得收回;凡在公社生活一年并经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者,方被接受为新成员;只有在三分之二的成员赞同的情况下,才能修改章程。

要把这些描述继续写下去并不困难,因为几乎所有前往美国内地的旅行家都访问过上述任何一个移民区,而且几乎所有的游记都描写了这些移民区。不过,没有一个旅行家在背后说这些人的任何坏话,相反,都只是赞扬他们,顶多也只能责备他们的宗教偏见,特别是震教徒的宗教偏见,不过这种偏见同财产公有的学说是毫无关系的。本来我还可以援引马提诺小姐、梅利什先生、白金汉先生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但是,上面已经说得够多了,而且这些作者报道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震教徒、协和派和分离派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人类社会新制度的普遍需要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促

使美国的其他许多人在最近几年来进行类似的尝试。例如费拉得尔菲亚的一位德国传教士吉纳耳先生组织了一个公社,公社在费拉得尔菲亚州买了三万七千摩尔根森林,在那里盖了八十多幢房屋,移居那里的已经有五百多人,多数是德国人。他们有一个大制革厂,有制陶业,有许多作坊和仓库,他们生活得很好。不言而喻,和下面列举的所有例子一样,他们是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组织生活的。匹兹堡(俄亥俄州)有一个铁工厂厂主希兹比先生在他本乡的城市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公社,去年这个公社在那个城市附近买了约四千摩尔根土地,并打算建立一个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移民区。其次,在纽约州的斯坎尼艾特勒斯有一个这样的移民区,它是由英国社会主义者约·安·柯林斯在1813年春和三十个同伴一起创立的。此外,在马萨诸塞州的明登,从1842年起约有一百人移居那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派克郡有两个公社,也是在不久前建立的。另外一个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在这大约二百摩尔根土地上居住着五十个成员和三十个学生,有一所在一神论派<sup>122</sup>传教士乔·里普利的领导下创办的非常好的学校。在这个州的北安普顿有一个从1842年起就存在的公社,有一百二十个成员在五百摩尔根土地上从事农业、畜牧业,有锯木厂、丝织厂和染坊。最后,在威斯康星州密尔窝基附近有一个移居伊阔利蒂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移民区,它于去年由托马斯·汉特建立并在迅速地向前发展。除此以外,据说还有几个新近建立的公社,但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还没有报道。——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尤其是纽约、费拉得尔菲亚、波士顿等大城市的穷苦工人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为了创建类似的移民区成立了许多团体,而且新的公社在不断地产生。美国人不再愿意为少数靠人民的劳动养活的富人当奴隶,而且由

于这个民族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精神,显然财产公有不久将在他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现。

但是,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都在从事实行财产公有的尝试。博爱的罗伯特·欧文三十年来就在这里传播这一学说,他把自己的巨大财产全部无遗地用于建立这个至今尚存的汉普郡“协和”移民区。他为此目的组成了一个团体,以后这个团体买了一千二百摩尔根土地,并根据欧文的建议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公社。公社现有成员一百多人,他们集体住在一幢大寓所里,到目前为止,主要从事农业。因为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个公社建成新社会制度的完美典范,所以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资本,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投资二十万塔勒。这笔钱有一部分是借来的,必须逐步偿还,这就产生了许多困难,许多设施由于缺乏资金而不能完工和带来收益。因为公社成员不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而是由该企业所属的社会主义者协会来领导,所以,有时也会由此产生误会和不满。但是,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正常进行;所有访问者都证明,公社成员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现在还是保证了企业的存在。主要的是,一切困难不是由公有造成的,而是由于公有尚未完全实现。假若公有完全实现,公社成员就不必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用来偿还利息和借款,而可以用来建成这个企业并更好地经营它;此外,他们就能自己选出自己的管理机构,不总是依赖协会的领导了。

有一个实践的经济学家关于企业本身写了一篇记叙文,他为了了解农业情况走遍了整个英国,并在伦敦《纪事晨报》上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为笔名叙述了自己的观感。他的记述(《纪



事晨报》1842年12月13日)<sup>123</sup>如下：

他经过一片耕种得十分粗糙、草多于苗的地区以后，在附近一个村庄里，生平第一次听到一些有关“协和”移民区的社会主义者的事情。那里，一个富裕的人对他说：他们耕种一大片土地，而且耕种得很好；所有关于他们的传闻都是不真实的；如果一个教士管区的居民哪怕有一半象这些社会主义者那样品行端正，那么这个教士也就能引以自豪了；如果邻近地带的土地所有者能象这些人一样给穷人那么多和那么有益的工作，那又该多好啊。他们对财产有他们自己的见解，然而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得很好，给邻近地带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补充说：他们的宗教观点各不相同，一些人到这个教堂，另一些人到那个教堂，他们从来不和村里的人谈论宗教或政治。有两个村里的人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确定的宗教观点，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信仰。当我们大家听到他们要来这里时，都感到惊慌不安，但是现在我们觉得他们是很好的邻居，给我们村里的人在道德上树立了好榜样，他们还为我们这里许多穷人找到了工作，由于他们从来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不满意。他们的特点全都是作风正派和彬彬有礼，在这一带，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道德品质妄加指责。

我们的作者从另一些人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情况，然后就前往“协和”移民区。在他又一次走过耕作粗放的田地之后，看到一块管理得很好、可望获得大丰收的芜菁田，于是对他的朋友，当地的一个佃户说，如果这是社会主义者的芜菁田，那么看来会长得很好的。过了一会，他遇到了社会主义者的七百只羊，这也是一些很出色的羊。然后，他们来到了一幢宽敞、美观别致、坚固的寓所。不过

房子还没有竣工：砖和建筑木料堆放着，围墙砌了半截，地尚未填平。他们走了进去，受到有礼貌而又热情的接待，并被带领参观了整个寓所。一楼是一个大餐厅和厨房，从厨房把丰盛的菜肴用机器送到餐厅，然后再把空盘空碟送回厨房。这台机器是由几个孩子指给客人看的，这些孩子的特点是衣服整洁、身体健康和举止大方。厨房里的妇女看上去也很干净和端庄；使来访者十分惊奇的是：尽管她们置身于油盘垢碟——午饭刚过——之间，还是显得那样动人和整洁。厨房内部设备漂亮，非笔墨所能形容。修造厨房的一位伦敦建筑师说：即使在伦敦也很少有设备如此完善和造价如此昂贵的厨房。我们这位访问者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在厨房旁边有舒适的盥洗室、浴室、地下室和单人房间，每个成员在下工后都可以在那里盥洗和沐浴。

第二层楼是一间大跳舞厅，第三层楼是布置得很舒适的卧室。

公园面积为二十七摩尔根，布局非常出色，而且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人们在这里制砖，烧石灰，修筑道路；已经在一百摩尔根土地上种了小麦，并打算开垦更多的土地播种小麦；挖了一个粪池，并且从分布在移民区的小树林中收集腐烂的植物作肥料。总之，他们千方百计地提高土地的产量。

我们的访问者最后说：

“我认为，他们的土地平均每摩尔根值年租金三镑（二十一塔勒），可是他们只付十五先令（五塔勒）。——只要他们合理经营，他们就会做成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不管人们对他们的公共住宅能说些什么，但是必须承认，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耕种得极好。”

我们再给这一记述补充一些有关这个公社内部的各种设备的情况。公社成员集体住在一幢大房子里，而且每人有自己的布置得

十分舒适的单间卧室。家务由一部分妇女共同为大家料理,这样,自然就把许多小家小户操持家务所耗费的大量杂费、时间和精力节省下来,从而创造了许多在小户人家根本不可能有的方便条件。例如,厨房的炉子把暖气同时送到这幢房子的所有房间;冷水管和热水管可通到每个房间,而且还有其他一些只有在公共建筑里才可能有的诸如此类的方便条件和优越性。孩子被送进这个企业附设的学校,依靠公费受教育。家长想看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去看,教育不仅考虑到体育和德育而且考虑到集体生活。孩子们不受宗教争论和神学争论的折磨,也不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折磨,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认识自然,锻炼自己的身体和发展他们的智力,而且要求他们坐课堂的时间不长,他们在野外能得到休息,因为教学不仅在室内进行,也经常在广阔的天地进行,而且劳动是教育的一部分。德育只限于运用这样一条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只限于实行完全平等和兄弟友爱。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移民区受社会主义者协会的主席和管理委员会的领导,这个管理委员会每年由各分会派一名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在协会章程的范围内有无限的权力,并对代表大会负责。因此,公社由生活在公社以外的人管理,就免不了要发生误会和争吵;然而,即使“协和”的实验由于这一点和由于资金困难而失败——不过,这样的前景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对于论证财产公有只是多了一个论据,因为发生上述两种情况的原因都在于公有还没有彻底实现。虽然如此,移民区的存在是有保证的,尽管它还不能如此迅速地获得发展和臻于完善,但是公社的反对者没有可能去庆祝公社的垮台。

因此,我们看到,财产公有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相反,所有

这些实验都十分成功。我们也看到,共同生活的人花费的劳动比较少,而生活得很好,他们有很多空余时间用于智力的培育,同他们那些保留私人财产的邻居相比,他们是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所有这一切,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以及很多德国人已经认识到了。所有国家都有一些人传播这种学说,并宣称自己是公有的拥护者。

如果说这件事情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那么,它对一无所有的穷苦工人就更是重要,他们今天挣得的工资,明天就花完,并且随时都可能由于意外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没有饭吃。这里展现在工人面前的前景是:独立的、有保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且同那些现在靠自己的财富把工人变为自己的奴隶的人完全平等。这件事情同这些工人的关系最大。在其他国家,工人正组成要求财产公有的党的核心,德国工人也有责任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

当工人彼此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并追求一个目的时,同富人相比,他们就无比强大。此外,如果他们抱有象财产公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和为所有人谋福利的目的,那么,不言而喻,富人中比较好的和比较有理智的人就会宣布自己赞同工人,并且会支持工人。在德国各地已经有很多富裕而又有教养的人公开表示赞同财产公有,并捍卫人民对有产阶级所把持的世上财富的权利。

弗·恩格斯写于 1844 年 10 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5 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  
达姆斯塔德 1845 年版,未署名

卡·马克思

## 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sup>124</sup>

(1)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

(2)事物的差别并不重要,因为实体被看作是自我区别,或者说,因为自我区别、区别、悟性的活动被看作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区别。

(3)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费尔巴哈特别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

(4)你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就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等于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的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还需要发挥。)

卡·马克思约写于 1844 年 11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5 卷

## 卡·马克思

### \*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sup>125</sup>

(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

政治制度的自我颂扬——同古代国家混为一谈。革命派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一切因素都具有双重形式,有市民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因素。

(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

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

(3)国家和市民社会。

(4)代议制国家和宪章。

立宪的代议制国家,民主的代议制国家。

(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

(8')司法权力和法。

(8'')民族和人民。

(9')政党。

(9'')选举权,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卡·马克思约写于1844年11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5卷

卡·马克思

\* 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sup>126</sup>

[ 李斯特的一般评述 ]

…… [2]既然资产阶级灭亡的预感甚至已经渗透到德国资产者的意识之中,所以德国资产者就十分直率地自己承认这个“使人发愁的事实”:

“因此,把当代伴随工业而来的灾祸作为否定工业本身的理由,也是同样使人发愁的。还有比无产者阶层大得多的灾祸:国库空虚——国家衰落——国家被奴役——国家灭亡。”(第 LXVII 页)

真正使人发愁的是: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使工业发达起来以前,无产阶级已经存在,已经提出要求,已经令人生畏。至于无产者本身,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库充实和国家强盛的时候,肯定会认为自己的状况差强人意。李斯特先生不过是说出了使资产者更加发愁的事情。我们还认为,使资产者十分发愁的是,他恰恰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德国资产者是愁容骑士,他恰恰在到处涌现警察和货币的时候,企图提倡游侠风尚。

(3)妨碍德国资产者追求工业财富的一个巨大障碍(干扰),是

他迄今信守的唯心主义。这个“精神”民族怎么突然想到要在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先生满满的钱袋中寻找人类的至善呢？德国资产者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包藏着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怯懦的灵魂。这种唯心主义已经进入了使德国资产者必然不得不泄露其秘密的时代。但他又是以真正德国人的矫揉造作的方式、以唯心主义的基督教徒羞怯心理来泄露其秘密。他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

李斯特体系的整个[.....]理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他到处使事物维持原状，而对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一点。正是这种空洞的唯心主义词句，使他能够无视那些阻止他的虔诚愿望实现的真实障碍，而沉溺于最荒谬的幻想之中（如果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首先乞求上层贵族、达官以及宗室同意赋予“工业以法律效力”，那么他们的情况会怎样呢？）。

德国资产者甚至在他是工业家的时候，也是信仰宗教的。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最初的（至少是在他们统治初期的）国民经济学的学术代言人，把财富奉为神明，并在学术上也无情地把一切献给财富，献给这个摩洛赫。如果人们看到的，一方面是这种坦率的古典的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这个在经济学中鄙视“正当



人”的财富和了解高尚目的的李斯特先生把事物理想化、玩弄辞藻、夸夸其谈的手法,那么一定会发现“同样使人发愁的”是:现在已不再是发财的日子了。

李斯特先生总是用扬扬扬格<sup>127</sup>诗韵说话。他常常以运用既笨拙又噜苏的言词而自鸣得意;这种言词的核心就是不断重复地讲保护关税和“真正德国的”工厂,这种言词的浑水浊浪最后总是把他推到沙滩上。他常常是可捉摸的又是不可捉摸的。

想发财的德国理想化的庸人,当然必须首先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财富理论,把财富说成是值得他去追求的东西。法国和英国的资产者已经看到即将实际消灭一贯被称为财富的那种东西的真实生命的风暴就要来临,而还没有取得这种恶的财富的德国资产者却试图对这种财富作新的“唯灵论的”解释。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德国资产者是以创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

### 3 李斯特先生如何解释历史 and 如何对待斯密及其学派。

李斯特先生对贵族、宗室和官僚怎样卑躬屈膝,他也就怎样“大胆地”反对那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秘密并使一切关于财富的性质、倾向和运动的幻想成为泡影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首创者是斯密。李斯特先生把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统统归到“学派”名下。既然德国资产者关心的是保护关税,那么对他来说,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经济学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

这里,德国庸人以多种方式暴露出他的“民族”特点。

(1)他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象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3]表现。这当然是李斯特先生觉察不到的。德国式理论家。

(2)因为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包藏有秘密目的,所以他觉得处处都有秘密目的。

李斯特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庸人,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是探求个人的秘密的恶的目的,并且由于他的狡猾,很善于发现(发掘)这些目的。他有过这一类伟大的发现:似乎亚当·斯密想用自己的理论欺骗世界,而且整个世界在伟大的李斯特先生把它从梦中唤醒之前都被斯密欺骗了。这倒有些象杜塞尔多夫的某法官硬说罗马的历史是中世纪的僧侣为了替罗马的统治辩护而捏造出来的。

但是,德国资产者完全知道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道德上诽谤敌人,怀疑其心术不正,探查其行动的恶劣动机,一句话,使其声名狼藉、怀疑他的人格,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也怀疑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散布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德国的庸人在商业中并不忽视最微小的赢利和耍花招,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并不忽视在引文上耍花招,使其对自己有利,他也不忽视给自己的劣等货贴上他对手的商标,以使用赝品来败坏他的对手的产品名声,或者甚至臆造彻头彻尾的谎言,使他的竞争者信誉扫地。

我们从李斯特先生的活动方式中举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德国的僧侣们相信,他们只要向我们讲述伏尔泰在临终时放弃了他的学说这种荒谬的奇闻和谎话,就能够给启蒙运

动以最沉重的致命打击。李斯特先生也把我们引到斯密临终的床前,告诉我们说:情况表明,斯密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主张自己的学说。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李斯特先生自己说的话以及他对斯密的进一步评判吧。我们把他的话同他的智慧的来源对照一下。

李斯特:

“我从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所写的传记联想到这个伟大的奇才在他的全部手稿被烧毁以前,是死也不能瞑目的;因此我想使人们知道,极其可疑的是,这些文稿包含着缺乏诚意的论证。”(第 LVIII 页)

“我曾经指出,他的理论如何被英国的内阁大臣利用来蒙蔽其他国家从而使英国得利。”(第 LVIII—L 页)“亚当·斯密的学说就其对国内和国际的关系而言,都只不过是重农主义体系的继续。它和重农主义体系一样,忽视了民族特性,而假定永久和平和世界联合是已经存在的东西。”(第 475 页)

弗·路·奥·费里埃《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 年巴黎版:

“斯密堆砌了那么多有利于自由贸易的错误论证,能说是真心诚意的吗?……斯密的秘密目的是在欧洲鼓吹这样一些原则,他十分清楚,这些原则如果被采纳就能为他的国家提供世界市场。”(第 385、386 页)“人们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斯密并不总是鼓吹同一种理论,否则对他由于害怕自己的讲课手稿在他死后流传下来而在临终时感受的痛苦,又当作何解释。”(第 386 页)他[费里埃][同上,第 388 页]责备斯密曾经是一个海关官员。“斯密差不多总是象经济学家 重农主义者那样去论证,而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利益分歧,并以世界上只存在一个社会为前提条件。”(第 381 页)“我们把所有这些联合的方案抛在一边吧。”(第 15 页)

(费里埃先生是拿破仑手下的海关督察,并热爱自己的职业。)

李斯特先生把让·巴·萨伊的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失败的投机。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他对萨伊生平活动的全面论断。但是在

这样做之前,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他是怎样援引其他作者的话以及怎样在援引时加以歪曲,以便攻击他的对手。

李斯特:

“看来,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对这本书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的书<sup>128</sup>至多是把标题看了一下或者读了一下而已;两人傲慢地把它抛到一边,指出:它仅仅涉及货币,而且它的标题已经表明,作者误认为贵金属是财富的唯一对象。如果他们读下去……”(第 456 页)

佩基奥伯爵《意大利

政治经济学史》1830 年巴黎版:

“一些外国人企图剥夺塞拉最早创立这门科学 政治经济学 的原则的功绩。我刚才所说的完全不涉及萨伊先生,他虽然总是指责塞拉仅仅把金银物质看作财富,却仍然赋予塞拉以第一个介绍工业生产力的荣誉…… 我的抱怨是针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 如果麦克库洛赫先生除了读标题以外再稍微多读一点东西……”(第 76、77 页)

可见,李斯特先生是如何有意地歪曲他所援引的佩基奥的话,以便败坏萨伊先生的名誉。他对萨伊的生平的介绍也同样是歪曲了的。

关于萨伊,李斯特先生说道:

“萨伊最初是个商人,后来是工厂主,以后又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他从事政治经济学,就象有人在旧的行业干不下去的时候又去从事新的行业一样…… 对毁灭了自己工厂的大陆体系的憎恨,对把他逐出谏议院的大陆体系炮制者的憎恨,决定了他要拥护绝对自由贸易。”(第 488、489 页)

这样说来,萨伊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制,是因为自己的工厂被大陆体系毁灭了,但是如果他在拥有工厂之前已经撰写了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情况会怎样呢?萨伊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制,是因为拿破仑把他逐出了谏议院<sup>129</sup>!但是如果他任谏议院议员的时候已

经撰写了这本书,情况会怎样呢?按照李斯特先生的看法,萨伊是一个只把著书立说当作一个企业部门来看待的不走运的企业家;但是如果萨伊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法国著作界有所作为,情况会怎样呢?

李斯特先生从哪里得到他的情报呢?来自沙尔·孔德为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所写的前言,即沙尔·孔德所写的《关于让·巴·萨伊生平和著作的历史评注》。这篇评注讲了些什么呢?它包含了同李斯特的全部说法正相反的东西。请看:

“让·巴·萨伊的经商的父亲 [4]要他去从事商业。然而他的爱好却把他引向写作。他在 1789 年出版了一本主张出版自由的小册子。他从革命一开始就为米拉波出版的《普罗凡斯信使报》撰稿。他同时也在克拉维埃尔部长的办公室任职。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爱好以及他父亲的破产,促使他完全放弃商业,以从事科学活动作为自己的唯一职业。1794 年,他成了《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的主编。1799 年,拿破仑任命他为谏议院议员。他利用谏议院议员的业余时间来完成他的《论政治经济学》,该书于 1803 年出版。他所以被逐出谏议院,是因为他属于少数几个敢于发表反对意见的人。有人向他推荐财政部门的一个肥缺,但是他拒绝了,尽管他要抚养六个孩子,而且几乎没有财产……因为如果不努力执行他认为对法国是极有害的制度,就不能履行向他推荐的那个职位的职责。于是他办了一所棉纺厂……”

如果说李斯特先生在这里对让·巴·萨伊的诽谤是借助于歪曲,那么他对让·巴·萨伊的兄弟路易·萨伊的赞扬也是这样。为了证明路易·萨伊具有李斯特的观点,他把路易·萨伊的一段话歪曲了。

李斯特先生在他的著作第 484 页上说道:

“按照他 路易·萨伊 的意见,国民财富并不在于物质财物和这些财物的交换价值,而在于不断生产这些财物的能力。”

按照李斯特先生的说法,下面是路易·萨伊自己的话:

李斯特先生的路易·萨伊:

“财富并不在于那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我们的嗜好的东西,而在于年年享用这些东西的可能性。”(《国民财富的研究》[1836年巴黎版]第10页)

真正的路易·萨伊:

“虽然财富并不在于那些满足我们的需要或我们的嗜好的东西,而在于收入,或者在于年年享用这些东西的可能性……”[第9—10页]

可见,萨伊说的不是生产的能力,而是享用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收入”所提供的能力。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同整个国家的特别是各个阶级的收入之间的不相称,恰恰产生出与李斯特先生最敌对的理论,例如西斯蒙第和舍尔比利埃的理论。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李斯特先生在评论“学派”时的无知。他这样谈论李嘉图(李斯特论生产力):

“一般地说,这个学派自亚当·斯密以来,在对地租性质的研究方面是令人遗憾的。李嘉图和继他之后的穆勒、麦克库洛赫以及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地租是对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报酬。李嘉图根据这个看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因为他只是着眼于英国的情况,所以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似乎英国农田和牧场向来就是这样一些由于所谓的自然生产能力而在今天应支付如此丰厚地租的农田和牧场。”(第360页)

李嘉图说:

“如果构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一种利益,那么,每年新制造的机器比旧机器生产效率要小一些便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会使全国制造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而且要向那些占有生产效率最大的机器的人缴纳租金。”“可使用的土地的生产力越是降低,地租就越是提高得快。凡是由于农业改良而无需相应地增加劳动量就可以增加产品,从而使地租增长得十分缓慢的国家,财富就增长。”(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和80—82页])

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地租决不是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结果,相反,它是土地的生产率越来越降低的结果,是文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结果。他认为,只要还有无限量的最肥沃的土地可供使用,就不会有任何地租。因此,地租是由人口同可以使用的土地数量的比例关系决定的。

李斯特先生所以要歪曲作为英国整个反谷物法同盟和美国各自由州抗租运动的理论基础的李嘉图学说(假定他对这个学说的了解比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多一些),那是因为这个学说明：“自由的、强大的、富有的资产者”是多么不乐意“勤奋地”为增加“地租”以及从蜂房里向他们[地主]输送蜂蜜而工作。李嘉图的地租学说无非是工业资产者为反对地主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经济学上的表现。

关于李嘉图,李斯特先生还进一步教训我们说:

“现在交换价值的理论已经落到如此软弱无力的地步……以致李嘉图……敢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土地的产品在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工人之间应如何分配的规律’。”(第493页)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对这一点作必要的考察。

[5]李斯特先生在他评论西斯蒙第时无耻到了极点。

李斯特:

“例如,他西斯蒙第企图抑制发明精神。”(第XXIX页)

西斯蒙第:

“我反对的不是机器,不是发明,不是文明,而是现代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夺走了劳动者双臂以外的一切财产,同时又不给他任何抵制竞争的保障,他必将成为竞争的牺牲品。假定一切都平均地共享他们参加生产的劳动产品,那么

技术上的每一项发明在任何情况下对他们全体都将是一件好事。”(《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33页])

如果李斯特先生从道德上怀疑斯密和萨伊,那么他只能从西斯蒙第的生理缺陷上来解释西斯蒙第先生的理论。他说:

“西斯蒙第先生用肉眼把所有红色的东西都看成黑色的,他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的精神眼光似乎也带有同样的缺陷。”(第XXIX页)

为了充分说明这种解释卑劣之至,必须了解李斯特先生是从哪里引出他的意见来的。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谈到罗马近郊平原的毁灭时说:

“罗马近郊平原的丰富色彩……在我们眼前甚至完全消失了,对我们的眼睛来说,红色光线已经不存在了。”(1838年布鲁塞尔翻印本[第2卷]第6页)

西斯蒙第解释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吸引所有其他旅客到罗马去的魅力”被破坏了,他“因此要更加睁大眼睛去观察罗马近郊平原的居民的真正可怜的状况”。

如果说西斯蒙第先生看不到在李斯特先生眼中出现的神奇般地照亮着整个(工厂)工业上空的红霞,那么他却看到了这些工厂屋顶(屋脊)上的红公鸡。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来[考察]李斯特的这个论断:

“西斯蒙第先生在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著作没有任何价值。”[第XXIX页]

如果说李斯特先生从斯密个人的功名心(第476页)和隐蔽的

---

德文原文为:“roter Hahn”,字面上是“红公鸡”,意思是“火灾”。马克思在这里作了文字游戏。——译者注



英国市侩精神来解释斯密体系,从复仇心和作为一种行业来解释萨伊体系,那么他在对待西斯蒙第方面却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要从西斯蒙第生理结构的缺陷上来解释西斯蒙第体系。

#### [5]4 李斯特先生的独创性

李斯特先生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不管他如何自吹自擂,他提出的原理没有一个不是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其中不仅有禁止性关税制度的维护者,甚至也有李斯特先生所臆造的“学派”的作家;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只有幻想和理想化的词句(语言)才是属于李斯特先生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向读者详细地证明这一点,而且必须要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枯燥的工作上。读者将由此确信:德国资产者是事后登上舞台的,他不可能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详尽阐发的国民经济学再向前推进,正象后者大概也不能对德国哲学运动作出什么新的贡献一样。德国资产者只能给法国和英国的现实添上自己的幻想和空话。但是,既然他不能使国民经济学得到新的发展,那就更不能在实践方面把迄今为止几乎已经在以往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发展了的工业再向前推进。

5 因此,我们的批判限于李斯特这本书的理论部分,而且也仅限于他的主要的发现。

李斯特先生想要证明的主要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探究一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1)资产者希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便攫取政权和财富。但是,既然[在德国]不象在英国和法国那样,他不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不能随意支配它,而是不得不诉诸请求,他就必须向国家——他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调整国家的行动方式(活动)——表明,他对国家的要求是他向国家作出的让步,而实际上他要求国家作出让步。因此,德国资产者通过李斯特先生向国家证明,他的理论同所有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他允许国家干预和调整工业,他对国家的经济知识有高超见解,只是请求国家让他的智慧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当然是带有条件的:这一智慧只限于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关税。他要求国家按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却把这种要求说成是对国家的承认,即承认国家有权干预市民社会的领域。

(2)资产者想发财,想赚钱,但是他同时必须同德国大众一直信守的唯心主义相一致,并且同自己的信仰相一致。因此他表明,他猎取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恶的有限的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无限的生产力。当然,这种精神本质会导致以下情况:“市民”借此机会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

[6]2 既然资产者现在希望主要靠“保护关税”来发财;既然只要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资产者自己对同胞进行剥削,而且剥削得甚至比外国人对他们的剥削更加厉害,保护关税才能使他发财;既然保护关税要求从消费者方面(主要是行将被机器排挤掉的工人,所有取得固定收入的人,例如官吏、地租所得者等)牺牲交换价值;因此,工业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们决不是追求物质财富,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为了精神本质而牺牲交换价值,牺牲物质财富。因此,说到底,问题只是在于自我牺牲,在于禁欲主义,在于基督教的崇高灵魂。甲作了牺牲,而乙把牺牲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这是纯粹

偶然的事情。德国资产者太无私了，连偶然与这种牺牲品连接在一起的私利也在所不计。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阶级，德国资产者认为自己的解放需要得到这个阶级的允许，而这个阶级同这种精神的理论却不能相容，那么这种理论必然被抛弃，而且与学派<sup>130</sup>相反，起作用的恰恰是交换价值的理论。

(3)既然资产阶级的整个愿望实质上在于使工厂制度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使工业主义成为社会的调节者，即引起社会的解体，所以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关心的仅仅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和谐，是社会的组织。他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对外贸易，他断言农业通过工厂工业将迅速达到它的高度繁荣。因此，社会组织总括起来就是工厂。工厂是社会的组织者。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联合。工厂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组织是真正的社会组织。

当然，资产阶级有理由把它的利益一般地设想为同一的利益，正象狼作为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一的(同样的)利益一样，而不管一只狼即不是其他狼在猛抓猎物时的利益有多么大。

(6)最后，李斯特先生的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我们将在各个相应的地方指出，李斯特先生的词句，如果从中作出结论的话，还是共产主义的呢！当然，我们决不是指责有那么一个李斯特先生和他的德国资产阶级玩弄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共产主义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善良的”、“唯心主义的”资产者内心虚弱、欺蒙诈骗和无耻伪善的新证明。它向我们证明，这种唯心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某种可厌的唯物主义的无耻的、无思想的伪装而已。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以谎言开始，而法国和

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到了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存在辩解的地步以后正是以这种谎言告终的。

(7)既然李斯特先生把迄今为止的所谓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同他的国民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后者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从这种学说谈起。此外,既然生产力的联合应该体现国家的统一,我们也要在考察上述的区别之前先考察有关这种联合的学说。这两种学说形成了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基础。

李斯特先生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现实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的唯物主义,个人唯灵主义,个人主义。他永远也想不到,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否则,他就应该把矛头指向现在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他抱怨国民经济学家在表现绝望的现实时没有加以美化。因此,他企图到处原封不动地保持这个现实,只是在表现它时有所改变罢了。他从未批判过现实社会。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论表现进行批判,指责说它所表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的幻象。

工厂变成了一位女神,工业力的女神。

工厂主就是这种力的祭司。

## □ III 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

(1)李斯特先生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限于以下主要几点:

(a)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 [李斯特,前引书,第 201 页];

(b)李斯特决不排斥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他只是主张政治经济学也应当

科学地加以发展 [同上,第 187 页];

(c)“那么,劳动的起因是什么呢?……促使头脑、胳膊和手从事生产并使这种活动产生效果的是什么呢?除了能激发个人热情的精神,除了使这些个人的活动产生效果的社会制度,除了供他们利用的自然力量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呢?” [同上,第 205 页]

(6)斯密“用物质关系解释精神力量因而走入歧途” [第 207 页]

(7)“这是阐明生产力如何被唤起和发展,如何被压抑或消灭的科学。” [同上]

(8)两个家族的家长之间 [差别] 的例子,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等。<sup>131</sup> [同上,第 208—209 页]

(9)“人们可以确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的概念,把它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而这样做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 [同上,第 211 页]

过渡。

(10)工场和工厂是市民自由的母亲和孩子。 [同上,第 212 页]

(11)关于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的理论。前者“生产交换价值,后者生产生产力” [同上,第 215 页]。

(12)不应该仅仅按照价值理论来判断对外贸易。 [同上,第 216 页]

(13)“国家必须牺牲物质的力量以便赢得精神的或社会的力量。保护关税是为了唤起工业力。” [同上,第 216—217 页]

(14)“因此,如果由于保护关税而使价值有所牺牲,那么这种牺牲将通过获得生产力而得到补偿。获得生产力不仅保证国家在将来有无限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将保证在战争情况下工业的独立地位。” [同上,第 217 页]

(15)“但是,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使个人得以成长的社会状况,取决于技艺和科学是否繁荣。” (第 206 页)

(2) 李斯特先生囿于旧经济学的经济偏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将看到,他比“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完全等同起来。但是,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

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当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换价值就降低，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以前和增加以后对人类的需要处于同样的关系。交换价值同质量没有关系。最有用的东西，例如知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因此，李斯特先生应该看到，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废除交换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相反，李斯特先生竟如此天真地认为，借助交换价值的理论，

“人们可以确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的概念，把它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而这样做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第 211 页）。

因此，无需考虑“生产力的理论”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人们就可以“确定”所有这一切。借助这些来确定什么呢？现实。那么例如借助工资确定什么呢？工人的生活。借助于工资可以进一步确定，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商品”，一种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的高低，提高或降低，取决于竞争，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借助于工资可以确定，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sup>132</sup>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劳动”。请忘记这一点吧。“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无非是物化的劳动。如果要给私有财产以致命的打击，那就不仅必须把它当作物质状态，而且也必须把它当作活动，当作劳动来攻击。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

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这种能够获得劳动的最好的组织,就是现在的组织,就是自由竞争,就是所有它先前的似乎是“社会的”组织的解体。

因此,如果工资能够按照价值理论来“确定”,如果由此“确定”说,人本身就是一种交换价值,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是一种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规定的商品,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国家的这些绝大多数人无需考虑“政治状况”;政治状况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的幻想;那种实际上沦为肮脏的唯物主义、使国家的大多数人变为“商品”、变为“交换价值”、使他们屈服于整个交换价值的物质条件的学说,当它在别的国家面前蔑视恶的“交换价值”的“唯物主义”而自己似乎只关心“生产力”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另外,如果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确定”资本、地租等的关系,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工业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在他们的活动中,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受利润、受交换价值所支配,而不是受对“政治状况”和“生产力”的考虑所支配;他们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不过是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资产者说:当然,交换价值的理论在国内不应受到破坏,国家的大多数人仍然应该只是一种“交换价值”,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必须自找买主,它不是被卖,而是自己把自己卖了。对你们无产者来说,甚至在彼此都是作为交换价值看待的我们资产者之间,普遍的买卖<sup>133</sup>的规律也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我们就必须不

让这一规律起作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售卖给其他国家。既然国家的大多数人“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服从于买卖的规律,上述原理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德国资产者不愿意由英国资产者采用我们剥削你们德国无产者以及我们之间相互剥削的方式来剥削我们。我们自己不愿意牺牲于我们要你们为之牺牲的交换价值的规律。我们在国外不愿意再承认我们在国内所承认的那些经济规律。”

[8]那么,德国庸人想要干什么呢?他想在国内成为资产者,剥削者,而又不想在海外被剥削。他在海外自我吹嘘为“国家”并且说:“我不屈服于竞争的规律,这有损于我的民族尊严;我作为国家,是一个超越买卖之上的存在物。”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sup>134</sup>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在国内,货币是工业家的祖国。因此,德国庸人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只有当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符合他的利益,符合他的阶级利益的时候,他才愿意承认它。他不想成为他要别人为之牺牲、而他自己在国内也为之牺牲的那种力量的牺牲品!在海外他想表明自己是而且被人看成是同他在国内的身分和行为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想保存原因而又要消除它的一个结果。我们将向他证明:在国内自我售卖的必然结果就是在海外售卖;竞争在国内使他有力量,但它不能阻止他在海外变得软弱无力;在国内他使国家屈服于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在海外这个



国家不能保护他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

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

(2)当然,也可以从与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现今不仅单个的商人,单个的工厂主,而且工业和商业的国家,也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来看待工业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

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

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但是有个可怜虫仍然停留在现有制度之内,他只想把现有制度提高到自己国内还没有达到的高度,并以忌妒的目光盯着另一个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国家,难道这样的可怜虫有权在工业中看到买卖利益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能说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对自然力的占有吗?这是卑鄙行为,正如奴隶监工夸耀他在自己的奴隶头上挥舞皮鞭,是为了让这些奴隶乐于锻炼他们的肌肉力一样。德国庸人就是奴隶监工,他挥舞着保护关税的皮鞭以便向自己的民族灌输“工业教育”的精神,并且教它运用自己的肌肉力。

圣西门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工业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混淆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象资产者想把他的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

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

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等量齐观。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停留于这种解释,他们继续前进,向交换价值、当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进攻。他们提出以联合代替竞争。但是,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看作牧师,而且也使他们[9]在最初的外部斗争之后又回到旧的幻想(旧的混淆)之中,不过现在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所混淆的两种力量的对立恰好在斗争中表面化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迪韦里埃先生、杜诺瓦耶先生使自己和资产阶级在整个欧洲面前受辱——后来,历史抛到他们面前的臭蛋被资产阶级魔术变成了金蛋——,因为三个人中的第一个人仍然保留旧的词句,不过赋予它们以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容,第二个人本身就是从事批发生意的,并且经售法国报刊,而第三个人则成为对现状的最狂热的辩护士,其无耻程度(无人性)超过了所有以前的英国的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德国资产者和

李斯特先生以虚伪、欺骗和卖弄辞藻开始,而圣西门学派则以此告终。

(3)英国工业对世界的专制,就是工业对世界的统治。英国所以能统治我们,是因为工业统治了我们。我们自己只有在国内摆脱了工业的统治,才能在外事务中摆脱英国的统治。我们只有在国内克服了竞争,才能结束英国在竞争领域里的统治。英国之所以控制我们,是因为我们使工业成为控制我们的力量。

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谁会对这种同义反复表示怀疑呢?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奴隶,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

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在他看来,一切都变成致富的手段,变成“致富的生产力”,谁会对这些表示怀疑呢?

(4)现代经济学是从竞争的社会制度出发的。自由劳动,即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它最初的原理是分工和机器。象现代国民经济学自己所承认的,分工和机器只有在工厂中才能达到自己的最高发展。因此,现代国民经济学是从工厂即从它的创造性的原则出发的。它以现在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因此,它就不需要详谈工业力<sup>135</sup>。

如果“学派”没有把生产力理论同交换价值理论并行地即没有把二者分开来进行“科学探讨”<sup>136</sup>,那么这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一种任意的抽象,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停留于一般词句。

(5)“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同财富本身相比 ,创造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李斯特 ,前引书 ,第 20 页]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 ,交换价值要求具有暂时现象的地位。这种力量表现为无限的 ,交换价值表现为有限的 ;前者表现为非物质的 ,后者表现为物质的 ;我们在李斯特先生那里看到了所有这些对立。因此 ,力量的超感觉世界便代替了交换价值的物质世界。如果说国家为交换价值而牺牲、人为物而牺牲的卑鄙性十分明显 ,那么与此相反 ,力量则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 ,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 ,即上帝 ,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德国人为幽灵牺牲恶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货币 ,似乎总是外在目的 ;可是生产力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 ,即目的本身。因此 ,我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牺牲了的东西 ,是某种外在于我的东西 ,我以生产力的形式赢得的东西 ,是我的自我获得物。——看来是这样的 :有人以词句为满足 ,或者象一个理想化的德国人那样 ,不为隐藏在夸张词句后面的肮脏现实而烦恼。

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 ,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 ,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

在现代制度下 ,如果弯腰驼背 ,四肢畸形 ,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 ,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 ,那么你的弯腰驼背 ,你的四肢畸形 ,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 ,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 ,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 ,等等 ,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

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

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象人一样从事活动因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

我们让英国工厂制度的品得,尤尔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机器体系的每一项改进的经常目的和倾向,就是使人的劳动成为完全多余的,或者以这种方式降低它的价格:用妇女和儿童的工业代替成年男工的工业,或者用粗工(非熟练工)的劳动代替熟练工匠的劳动。”(《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4页)“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而也就越不能适应机器体系……因此,对现代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科学同他的资本的联合把自己工人的任务变为进行管理……”(同上,第1卷第30页)

## 力量,生产力,原因

“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李斯特,前引书,第201页]

但是,如果说结果和原因不同,那么结果的性质难道不应该已经包含在原因之中了吗?原因应该已经带有后来由结果所显示出来的规定性。李斯特先生的哲学就只知道原因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

如果我把人说成是“交换价值”，那么这个说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如果我把人当作“生产力”来对待，那么我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我就是用另一个人代替了他，而他现在只是作为财富的原因而存在。

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

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结果仅仅是公开显示出来的原因。

李斯特先生装腔作势，似乎他不顾恶的交换价值，处处为了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

我们通过下述情况已经得到关于现代“生产力”的本质的一些启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生产效率更低了。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这同样地提高了……

### [III 第三章片断]

#### [论地租问题]

…… [22]地租消失。谷物涨价必然要削减工业家先生们的利润，——李嘉图相当明智地料定，工资不可能再压低了。

因此，由于谷物价格的提高而发生的利润的降低和工资的提高——因为任凭谷物怎样贵，工人总得消费一定数量的谷物；工人的名义工资随着谷物价格的提高而增长，但工资实际上没有增加，甚至实际上还下降了——也提高了工业家的生产费用，从而为他

---

手稿第9印张第4页到此结束。第10—21印张的内容看来应包括第2章的结束部分和第3章的开头部分，但均散失。——编者注

的积累和竞争带来了困难,一句话,削弱了国家的生产力。因此,为了公共的利益必须通过某种方式牺牲以地租的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的口袋并对国家的生产力造成很大损害(没有任何好处)的恶的“交换价值”——通过谷物的自由贸易、通过把一切赋税转嫁于地租,或者通过国家完全占有地租即地产(做出这个结论的还有穆勒、希尔迪奇、舍尔比利埃等人)。

当然,李斯特先生不敢把工业生产力的这个对土地所有权来说是可怕的结论告诉德国土地贵族。因此,他把揭示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真理的李嘉图大骂一顿,而且借他的口说出相反的即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地租不过是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的证明,这样就歪曲了李嘉图的观点。

李斯特:

“一般地说,这个学派自亚当·斯密以来,在对地租性质的研究方面是令人遗憾的。李嘉图和继他之后的穆勒、麦克库洛赫以及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地租是对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报酬。李嘉图根据这个看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因为他只是着眼于英国的情况,所以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似乎英国农田和牧场向来就是这样一些由于所谓的自然生产能力而在今天应支付如此丰厚地租的农田和牧场。”(李斯特,前引书,第360页)

李嘉图:

“如果构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一种利益,那么,每年新制造的机器比旧机器生产效率要小一些便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会使全国制造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而且要向那些占有生产效率最大的机器的人缴纳租金。”(《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页)“凡是由于农业改良而无需相应地增加劳动量就可以增加产品,从而使地租只是逐渐增加的国家,财富就增长。”(同上,第81—82页)

因此,李斯特对高等贵族不敢继续玩弄“生产力”的皮影戏。他



企图用“交换价值”引诱这些贵族,所以他诬蔑李嘉图学派,说李嘉图既没有从生产力的观点来判断地租,也没有从现代大工厂制度的观点来判断生产力。

这样,李斯特先生就是双料的说谎者。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对李斯特先生持公正的态度。在维尔腾堡的一家大工厂(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是克希林),维尔腾堡国王自己就有大量投资。特别是在维尔腾堡的工厂,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巴登的工厂,土地贵族通过掌握股票而起重要的作用。因此,贵族在这里不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资产者和工厂主本身,用金钱在“工业力”上入股以及……

…… [24]产生了整整一代的“生产的持续性和不间断性”——伪装的共产主义者李斯特也同样阐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生产的持续性和不间断性”不是留给工业家先生们的而是留给一代人的遗产(例如见布雷<sup>137</sup>)。

在英国,只有通过使租地农场主破产以及使农业工人陷于爱尔兰式的贫困(沦为真正的乞丐),才能保证地主(土地所有者)的高额地租。尽管有各种谷物法,尽管地租所得者本身常常被迫让租地农场主免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租,所有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从1815年以来,曾经通过了三种不同的谷物法,以便提高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和鼓励他们。在这个时期内,曾经设置了五个议会委员会,以便证实存在着农业的贫困状态并查明它的原因。一方面,租地农场主尽管对农业工人进行高度剥削并且最大限度地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他们还是不断地遭到破产;另一方面,土

---

指维尔腾堡国王威廉一世。——编者注

地所有者常常被迫放弃一部分地租。这本身就证明，甚至在英国——不管它的全部工厂工业——也没有产生高额地租。因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一部分生产费用由于契约和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关系，没有落入租地农场主的口袋，而是落入地租所得者的口袋，这种现象是不能被看作地租的。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他的土地，那么他会十分谨慎，不把经营资本的通常利润的一部分列入“地租”项下。

十六、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作者，仍然把英国的谷物出口看作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旧有的英国工业——它的主要部门是羊毛工业，次要部门是对大都由羊毛工业部门本身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的部门——完全依附于农业。它的主要原料是英国的农产品。因此不言而喻，它也促进了农业。后来，当真正的工厂制度兴起的时候，实行谷物关税的必要性很快就被感觉到了。不过，这些税徒有其名而已。迅速增加的人口，大量尚待开垦的肥沃土地以及科学发明，最初当然也提高了农业的水平。反拿破仑战争对英国农业特别有利，它给英国农业建立了一种正式的禁止性关税制度。但是，1815年便暴露出农业“生产力”实际上提高得多么少。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普遍大喊大叫，于是便颁布了现在的谷物法<sup>138</sup>。现代工厂工业的本质在于：首先由于工业主要加工外国的原料，并且以外贸为基础，工业就同国内基地相脱离（*ent-fremden*）。它的本质也在于，使人口同私有制下的土地开垦不成比例地增长。它的本质还在于：如果它引起谷物法的颁行，就象它以往一直在欧洲所造成的那样，那它是通过高额地租并通过用工厂方法经营地产把农民变成最贫穷的无产者的。相反，如果它成功地阻止了谷物法的颁行，那么它就通过使自己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依赖于

贸易而使大量的土地闲置起来,使谷物价格服从于外部的偶然情况,使国家完全外化,并且就破坏了土地所有权作为独立的财产的来源。破坏土地所有权作为独立的财产的来源,是英国反谷物法同盟和北美抗租运动<sup>139</sup>的目的,因为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表现。因此,托利党人一直关注着英国在生活资料方面例如依赖俄国的危险。

土地的开垦一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大工厂工业——当然,这里不包括象北美这样一些还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而保护关税一点也不能增加土地数量的国家,——肯定就具有束缚土地生产力的倾向,正如从另一方面说,用工厂方法经营农业,就具有排挤人和把全部土地(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变成牧场从而用牲畜取代人的倾向。

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简单归结如下:

地租丝毫不能促进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相反,地租的提高是土地生产力下降的证明。地租正是由可开垦的土地同人口以及同文明程度的比例关系决定的。谷物价格是由基于人口的需要而开垦(耕种)的最贫瘠的土地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如果人们不得不耕种质量较差的土地,或者收益虽少也不得不把资本投入这种土地,那么拥有最肥沃的土地的人会把他的产品卖得和耕种最差的土地的人的产品一样贵。他把最差的土地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用的差额装进自己的腰包。因此,耕种的土地越不肥沃,或者说投入同一土地的第二、第三份资本的生产性越小(收益越少),一句话,土地的相对生产能力越降低,地租就越提高。如果想使土地普遍肥沃

.....

## IV 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

拿破仑时代的海关副警察费里埃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是李斯特先生剽窃过的一部作品。在李斯特的书中没有一个基本思想不是费里埃的著作已经说过而且是说得比较好的。

费里埃是拿破仑的官员。他维护大陆体系<sup>140</sup>。他谈的不是保护关税制度,而是禁止性关税制度。他决没有写过关于一切民族的联合或国内永久和平的词句。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词句。我们将从他这本书中作些简短的摘要,以便向读者说明李斯特的高超见解的秘密来源。如果李斯特先生歪曲路易·萨伊是为了能够使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那么相反地,他到处剽窃费里埃的话,却没有一个地方引证费里埃的话。他企图把读者引入歧途。

我们已经引证了费里埃对斯密的评论。费里埃更加坦率地表示赞成旧的禁止性关税制度。

### 国家的干预。国家的节约

“国家有节约和浪费之别,但国家是浪费还是节约,只能从该国同他国的关系来看。”( [费里埃,前引书],第143页)

“认为资本的利用对占有资本的人最有利也必然对工业最有利,这是错误的……资本家的利益同一般的利益决不是一致的,它几乎总是同一般的利益相对立。”(第168—169页)

“国家的节约是有的,但跟斯密所说的完全不同。国家的节约在于,购买外国产品的数量不能超过能用本国产品支付的限度。有时这种节约在于完全

不要外国产品。”(同上,第 174—175 页)

## 生产力和交换价值

“斯密确定的国家节约的原则,是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为根据的……这一区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非生产劳动。”(同上,第 141 页)

“他 加尔涅 在银币中只看到银的价值,而不考虑它作为货币所具有的属性:使流通加快,从而增加劳动产品。”(同上,第 18 页)“因此,当政府力图防止货币外流的时候……这并不是由于这些货币的价值……而是因为同它们相交换的那个价值在流通中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货币本身……不可能在每一次交易中都产生一个新的创造物。”(同上,第 22、23 页)“把‘财富’这个词应用于作为货币进行流通的货币,必须从它便于再生产来理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国家当它增加了自己的货币量的时候就富足起来,因为随着货币的增加,全部劳动生产力也提高了。”(同上,第 71 页)“当人们说某个国家有二十亿财富,意思是说:这个国家拥有借助这二十亿来维持比它大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价值进行流通的资料,或者这样说也一样:它能生产出这些价值。国家由于有了货币而拥有的这些生产资料,人们称之为财富。”(第 22 页)

由此可见,费里埃是把货币具有的交换价值同货币的生产力区分开来的。且不谈他把生产资料都称作财富。总之,再也没有什么比把费里埃对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生产力的区分应用于一切资本更容易的事了。

但是,费里埃走得还更远,他总是以禁止性关税制度确保国家的生产资料为理由,为这一制度辩护:

“因此,只要禁止性关税制度有助于国家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它就总是有益的……我把用自己的现金购买外国商品的国家——这些商品国内也可以制造,虽然不那么好——比作一个园丁,这个园丁不满意自己收获

的水果,就向他的邻居购买更美味的水果,为此他拿出自己的园艺工具来同邻居做交易。”(第 288 页)“对外贸易在竭力扩大生产性资本时,总是有利可图的。它要是不扩充资本,而是要求让渡资本,那就无利可图。”(第 395—396 页)

## 农业,工业,商业

“政府对商业和工厂的赞助是否应该优先于农业?这个问题仍然是政府和著作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第 73 页)

“工业和商业的进步是同文明、艺术、科学、航海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农业几乎无能为力的政府,对工业却几乎能办一切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的有些习惯和癖好会阻碍工业的发展,政府就应当运用它的一切手段同这些习惯和癖好作斗争。”(第 84 页)

“鼓励农业的真正手段是鼓励工业。”(第 225 页)“它的范围 工业的范围,即费里埃先生所理解的工厂工业的范围 既不限于它的成就,也不限于它的改进的手段…… 工业的创造力如同想象力那样深远,那样活泼和丰富,除了每天赋予它以新光彩的人类精神本身的限度,它是没有任何限度的。”(第 85 页)

“对一个农业-工业国来说,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再生产和劳动。它应当把自己的资本用于工农业,应当在它能够从事运输和销售他国商品之前,先考虑运输和销售本国的商品。”(第 186 页)“人的财富的这种增长,应该主要归功于早在民族与民族进行交换之前很久就存在的国内贸易。”(第 145 页)“按照斯密本人的意见,在两份资本中,一份投入国内贸易,另一份投入对外贸易,那么,前一份资本对国内工业的支持和鼓励要比后一份大二十四倍。”(第 145—146 页)

但是,费里埃先生至少懂得,没有对外贸易,国内贸易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 146 页])。

“如果让一些私人从英国进口五万匹天鹅绒,他们就会在这笔交易中赚很多钱,并且很容易销售自己的商品。但是,他们缩减了国内的工业,使一万名工人失业。”(第 170 页,参看第 155—156 页)

费里埃先生象李斯特一样,注意工商业城市与纯消费城市的区别(第 91 页);但是他至少是很忠实的,以致在这样做的时候,引证了斯密本人的话。他引证李斯特先生如此喜爱的麦特温条约<sup>141</sup>以及斯密在评论这一条约时的尖刻意见(第 159 页)。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斯密的评论一般说来同李斯特的评论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并见论运输业,第 186 页及其他各页。

费里埃同李斯特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大陆体系)而写作,后者是为渺小的、愚蠢的资产阶级而写作。

读者将会同意:李斯特先生的一切都概括地包含在摘自费里埃的引文中。如果再加上李斯特先生从费里埃以来的国民经济学发展中借来的词句,那么属于他所有的东西就只剩下空谈生产力的空洞的理想——以及追求统治权的德国资产者的[.....]伪善。

写于 1845 年 3 月

原文是德文

---

在手稿上,这里有一个字笔迹不清楚。——编者注

## 卡·马克思

\*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sup>142</sup>

摩莱里  
马布利  
巴贝夫  
邦纳罗蒂

社会小组<sup>143</sup>  
阿贝尔  
勒鲁  
勒克莱尔克

边沁  
葛德文

霍尔巴赫  
傅立叶

——

爱尔维修  
圣西门

欧文  
(拉兰德)<sup>144</sup>

孔西得朗

学派的著作

《生产者》。《地球报》；

卡贝

德萨米。盖伊  
以及

《博爱》,平等论者等等,人类卫护者<sup>145</sup>

蒲鲁东

卡·马克思写于 1845 年 3 月 7 日和  
17 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5 卷

原文是德文

显然是指雅克·卢。——编者注



卡·马克思

\* 笔记本中的札记<sup>146</sup>

神灵的利己主义者同利己主义的人相对立。

革命时期关于古代国家的误解。

“概念”和“实体”。

革命——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

卡·马克思约写于 1845 年 4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5 卷

卡·马克思



载有弗·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  
一文的《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的封面

弗·恩格斯

## 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sup>147</sup>

### I 英国的一次罢工

在我那本论述上述题目的书中,我不可能逐点提供事实的依据。为了使那本书不致于太厚和太不好读,我在引用了官方文件的材料,没有偏见的作家的材料,或者引用了我反对其利益的那些党派的文章来证明我的论点之后,不得不认为我的这些论点是有足够依据的。而在我不是根据亲自的观察来对一定的生活状况进行详细描述的情况下,这样做足以使我经得起反驳。但是这还不足以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此外,当事情涉及重大结论、当事实概括为原则的时候,当要描述的不是个别的一小部分人民的状况,而是整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事实就十分必要了。我不能由于上述原因而在我的书中到处提供事实。现在,我将在这里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随时从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提供事实。为了同时证明我的描述即使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只引用了去年我离开英国后才发生并且在我那本书出版后才得知的事实。

我那本书的读者还会记得,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现在我再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此外,对于这些英国资产者我已经充分发泄了我的愤激之情,我不想再在补充评述时再一次由于他们而情绪激动,因而我将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和善的先生和好当家人,是一位老朋友,或者确切地说是两位老朋友。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早在1843年就同他们的工人发生了争执——天晓得是第几次了。工人不管怎么说也不肯放弃他们提出的增加了工作就要增加工资的要求,因而停了工。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这两个雇有许多烧砖工、木工和其他工人的建筑业大承包商招雇了别的工人,这样就引起了争执,最后,在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发生了一场动用枪枝和棍棒的流血战斗,这场战斗以六个工人被放逐到凡迪门岛而告终。<sup>148</sup>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在我那本书中可以读到。可是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年总要对他们的工人耍点花招,否则他们就不舒服。于是,他们在1844年10月又挑起了争端。这次是博爱的建筑业承包商打算为木工谋福利。自古以来,在曼彻斯特及其四郊的木工中间就通行一种习惯,从圣烛节到11月17日不用“点灯”,这就是说,在天长的日子里,从早晨六点劳动到晚上六点,在天短的日子里,天一亮开始劳动,天黑就收工。从11月17日起就要点灯了并

且出全工。波林和亨弗莱早就讨厌这个“野蛮的”习惯了，他们决定用煤气照明来消灭这个“黑暗时代”的残余。于是有一天晚上，不到六点钟，干活已经看不清楚了，木工就放下工具，去拿自己的外衣，这时工头点燃了煤气灯并且说，他们必须劳动到六点钟。对这件事感到不快的木工召开了一个同业工人大会。波林先生非常惊奇地问他工人，既然他们召开大会，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有几个工人说，这个会不是他们直接召开的，而是手工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波林先生回答说，他跟手工业者联合会毫不相干，不过他倒愿意向他们提个建议：只要他们同意点灯，他准备每星期六让他们提前三小时收工，而且还允许——慷慨大方的先生——他们每天额外多干一刻钟，为此他们将获得额外的报酬！当然，这样一来，在所有其他工厂都开始点灯的时候，他们就要多劳动半个小时！工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建议并且算了一下，照这样办，在天短的日子里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每天将赚到整整一个劳动小时，每个工人就得分文不拿地总共额外多劳动 92 小时即  $9\frac{1}{4}$  天，而这两位先生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在冬天的月份中从公司雇用的全体工人身上节省工资 400 镑（2 100 塔勒）。因此工人召开了他们的大会，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说，假如有一个公司实行这个计划，所有其他公司都会仿效它，结果就会出现一次普遍的、间接的降低工资，使这个地区的木工每年被夺去约 4 000 镑。于是作出决定：波林和亨弗莱雇用的全体木工都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个季度后辞职的声明。如果他们的雇主置之不理，届时他们就停工。为此手工业者联合会保证，一旦发生罢工，就用普遍募捐的办法来支援他们。

星期一，10月14日，工人前去提出辞职声明。他们得到的答

复是,他们可以马上就走。他们当然照办了。当天晚上召开了另一次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在会上,建筑业各工种的所有工人都保证支援罢工者。星期三和星期四,附近地区所有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木工都停了工。这样一来,罢工就全面展开了。

如此突然地陷入窘境的建筑业承包商们随即派人到各地去,甚至派人到苏格兰去招雇工人,因为在整个附近地区找不到一个愿意为他们干活的人。过了几天,果然从斯泰福郡来了十三个人。可是罢工者一找到机会和他们谈话,向他们说明由于什么纠纷和什么原因才停工,有些新来的人就不肯继续干下去了。对付这种情况,老板们倒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违抗者连同他们的“教唆者”一起带到治安法官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去。但是,在我们跟随他们到那里去之前,必须首先对丹尼尔·莫德先生的品德作一番应有的了解。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曼彻斯特的“stipendiary magistrate”,或者说领取薪俸的治安法官。英国的治安法官一般都是由内阁在富有的资产者或地主中,有时也在神职人员中委任。可是这些“道勃雷”<sup>149</sup>丝毫不懂法律,所以总是大大失策,给资产阶级丢脸,使资产阶级受到损害,因为即使碰上一个工人,只要这个工人有一名机智的律师为他辩护,他们就常常仓惶失措,不是在判决他时忽略了某些导致胜诉的法律程式,就是被弄得只好宣布他无罪。此外,大城市和工业区富有的工厂主没有功夫天天在治安法庭消磨时间,他们宁愿找一个代理人。因此在这些城市里多半是应城市本身的要求任用领薪的治安法官,即谙熟法律的律师,这些人善于利用英国法律的诡计多端和微妙差别,并且在必要时加以补充和修改,从而使资产阶级受益。我们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是



怎样做的。

丹尼尔·莫德先生是辉格党内阁大量任用的自由派治安法官之一。至于他在曼彻斯特市法院内外的英雄业绩,我们且举出两件事。1842年工厂主迫使南郎卡郡的工人于8月初在斯泰里布雷芝和埃士顿举行了起义,8月9日以宪章主义者理查·皮林为首的约一万名工人从那儿向曼彻斯特进发,

“去同曼彻斯特交易所中的工厂主谈判,并且看看曼彻斯特市场的情况如何”。<sup>150</sup>

在城关迎接他们的是丹尼尔·莫德先生和全体可敬的警察,一队骑兵和一连步兵。不过,这一切只是为了走走形式,因为使起义扩大,强行废除谷物法138,是符合工厂主和自由派的利益的。在这一点上,丹尼尔·莫德先生和他那些可尊敬的同僚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开始和工人谈判,允许他们进城,条件是他们保证“不扰乱治安”和走一条指定的路线。他清楚地知道,起义者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也根本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他要是稍加努力也许会使整个被迫举行的起义在萌芽状态中瓦解,但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为他那些要求废除谷物法的朋友谋利益而是为皮尔先生谋利益了;所以他撤回武装部队,让工人进了城,工人立刻使城里所有的工厂停了工。可是,既然起义带有坚决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根本不理睬“可诅咒的谷物法”,丹尼尔·莫德先生就重新摆出了他的法官的威严,成批逮捕工人,并且以“破坏治安”为名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进监狱,——可见是他首先破坏治安,然后又惩办工人的。

下面是这个曼彻斯特的所罗门的生涯的另一特点。反谷物法同盟自从在公开场合多次遭到冲击以后,在曼彻斯特举行了必须

凭票入场的秘密集会,可是在广大群众面前却要把这种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公开集会的决议和请愿书,当作曼彻斯特的“舆论”的反映。为了制止自由派工厂主的这种欺人之谈,有三、四个宪章主义者,其中有我的好朋友詹姆斯·李奇,弄到几张票去参加了一次这样的集会。当科布顿先生站起来要发言时,詹姆斯·李奇向大会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次公开的集会。这位主席没有作任何答复,反而叫来警察,立即将李奇逮捕!第二个宪章主义者又提出这个问题,接着是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聚集在门口的“绿头苍蝇”(警察)抓住并押送到市政厅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出现在已经得悉一切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他们被控告扰乱会场,他们刚要说话,又不得不聆听丹尼尔·莫德先生的训话。他对他们说,他认识他们,他们是政治游民,专门在所有集会上起哄,闹得规规矩矩坐着的人不得安宁,这种事情必须制止。丹尼尔·莫德先生清楚地知道,他无法给他们判处真正的刑罚,所以他这次就判决他们缴纳诉讼费。

正是在丹尼尔·莫德先生这个刚被我们描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品德的人面前,波林和亨弗莱的不服管束的工人被拖来受审了,工人为了谨慎起见带了一位律师来。第一个受审的是从斯泰福郡新来的工人,他不肯在别人为了自卫而停工的地方继续干下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手里有来自斯泰福郡的工人的书面合同,现在这份合同已经交给了治安法官。工人的辩护律师反驳说,这份合

---

这份合同包括以下内容:工人履行为波林和亨弗莱劳动六个月的义务,并且同意他们付给他的工资。但是,波林和亨弗莱不受雇工六个月的约束,可以随时通知他一周后解雇。波林和亨弗莱虽然预付工人从斯泰福郡到曼彻斯特的路费,但是应该每星期从他的工资中扣除2先令(20银格罗申)来偿还这笔钱!——你们喜欢这个美妙的合同吗?

同是在一个星期天签订的,因而是无效的。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带骄矜之气承认,在星期天签署的“业务协定”是无效的,可是他不能相信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会把这个合同看成是“业务协定”!于是,他不再问一问这个穷工人是否把这个文件“看成”“业务协定”,就向他宣布,他要么继续干下去,要么就到踏车上玩三个月。——噢,曼彻斯特的所罗门!这个案子结束以后,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把第二个被告带了上来。这个人姓萨尔蒙,是公司里停工不干的老工人之一。他被控威胁新工人,唆使他们也举行罢工。证人——一个新来的工人——作证说,萨尔蒙曾经拉着他的胳膊和他说话。丹尼尔·莫德先生问,被告有没有威胁过他或者打过他?证人说,没有!丹尼尔·莫德先生在对资产阶级尽了义务之后,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显示他的公正无私,他宣布对被告的起诉不能成立。被告完全有权在街上散步并且和别人交谈,只要他不说出威胁的话或作出威胁的行动。——因此,他宣布此人无罪。不过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起码得到了这样的满足:已经把萨尔蒙拘留了一夜,以抵偿他们所付的诉讼费,——这总算够本了。萨尔蒙高兴的日子并不长,因为他在星期四,10月31日,获释之后,在星期二,11月5日,就再一次被告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那里,说他在街上袭击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在萨尔蒙获释的那个星期四,来了一批苏格兰人,他们是被诸如什么纠纷已经结束、波林和亨弗莱在他们那个地区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来完成他们扩大的承包合同等等谎言骗到曼彻斯特来的。星期五,有不少长期在曼彻斯特干活的苏格兰细木工前来向自己的同乡说明

---

用人力或畜力踩动装在滚筒上的踏板以产生动力的装置。这里指当时在监狱里用踏车劳动惩罚囚犯。——译者注

停工的原因。他们有一大批同行，大约四百人，聚集在苏格兰人下榻的客栈周围。可是他们让苏格兰人象囚犯似地呆在那里，还派了一个师傅在门口站岗。过了一会儿，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来了，打算亲自护送他们的新工人到工作地点去。当这些人走出来时，聚集在外面的工人就劝告这些苏格兰人，不要违反曼彻斯特手工业者的规章去干活，不要给自己的同乡丢脸。果然有两个苏格兰人有点退缩，波林先生亲自赶上去，拉着他们往前走。人们一直沉住气，只是不让这些人走得太快，并且劝告这些人不要参与别人的事情，还是回家去等等。亨弗莱先生终于发怒了，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几个老工人，其中有萨尔蒙。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就抓住了萨尔蒙的胳膊。波林先生抓住了他的另一条胳膊。两个人扯着嗓子呼唤警察。警官来了并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一问倒弄得这两个合伙人非常尴尬，但是，他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噢，警官说，这就够了，我们可以暂时放他走了。急需对萨尔蒙提出某种控告的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遵照他们的律师的建议，提出了上述控告。在讯问了所有认为萨尔蒙有罪的证人以后，威·普·罗伯茨——“矿工的总顾问”，所有治安法官都害怕的人——突然站起来为被告辩护。他问道，鉴于对萨尔蒙根本没有提出什么控告的理由，他是否应当把自己的证人带来？丹尼尔·莫德先生让他讯问了他的证人，这些证人证明，直到亨弗莱先生抓住萨尔蒙时为止，后者一直是心平气和的。在辩护和控告的发言都结束以后，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他将在星期六作出判决。显然总顾问罗伯茨的出庭促使他在作出判决之前要考虑再三。

星期六，波林和亨弗莱除了原先的控告外，又对他们的三名

老工人——萨尔蒙、司各脱和梅洛，提出了搞阴谋和恐吓活动的刑事诉讼。他们想借此给手工业者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为了有把握对付这位可怕的罗伯茨，他们从伦敦请来一位著名的律师蒙克先生。蒙克先生首先把新雇用的苏格兰人基卜生带上来当证人，上星期二控告萨尔蒙时这个人也作过证人。他作证说，星期五，11月1日，他和他的同事从客栈出来时，一群人连推带拉地围住了他们，这三个被告就在人群中。现在罗伯茨开始讯问这位证人，让他同另一个工人对质并问道，他，基卜生，昨天晚上是否对这个工人说过，他上星期二作证时不知道这是起誓作证，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和怎么说。基卜生回答说，他不认识这个人，他昨天晚上同两个人在一起，但由于天黑，所以他不能说这个人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鉴于苏格兰的起誓形式和英格兰的不同，他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不过他记不太清了。这时蒙克先生站起来说，罗伯茨先生没有权利提出这类问题。罗伯茨先生回答道，假如有人要为一桩丑事辩解，提出这样的指责是完全恰当的，不过他有权利问他想问的问题，不仅要问这位证人出生在哪儿，而且还要问以后他每天住在哪儿以及每天吃些什么。丹尼尔·莫德先生承认罗伯茨先生有权利这样做，只是善意地劝他尽量扣住主题。罗伯茨于是让这位证人证实，他是在指控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日，才真正开始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在这之后，罗伯茨先生就让他走了。现在亨弗莱先生自己出来作证，他对这个事件的供述同基卜生的一样。对此罗伯茨先生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力图超过您的竞争者，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蒙克先生对这个问题又一次提出反驳。罗伯茨说，好，我把它说得更明确一点。亨弗莱先生，您知不知道曼彻

斯特木工的劳动时间是按一定的规章确定的？

亨弗莱先生：我不管这些规章，我有权利制定我自己的规章。

罗伯茨先生：完全可以。亨弗莱先生，您发誓，同其他建筑业承包商和木匠铺老板相比，您不是要求您的工人劳动的时间更长吗？

亨弗莱先生：是的。

罗伯茨先生：大约是几小时呢？

亨弗莱先生记得不太准确，于是掏出他的记事簿来计算。

丹尼尔·莫德先生：您用不着花许多时间来计算，您只要告诉我们大约共计多少小时就行了。

亨弗莱先生：好吧，在通常点灯前的六星期内大约是早上一小时和晚上一小时。在通常停止点灯那天以后的六星期内也是这样。

丹尼尔·莫德先生：那就是说，您的每一个工人在点灯前那段时间多干 72 小时，点灯后那段时间多干 72 小时，也就是在十二个星期内多干 144 小时？

亨弗莱先生：是的。

这一番供述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蒙克先生气得瞪了亨弗莱先生一眼，亨弗莱先生不安地看着他的律师，波林先生则拉了一下亨弗莱先生的衣角——但是太晚了。已经清楚地看到今天又得扮演公正无私的角色的丹尼尔·莫德先生，听完了自供并且把它当众宣读。

又讯问了两位无关紧要的证人以后，蒙克先生说，针对被告而提的证据现在可告结束。

这时丹尼尔·莫德先生说，起诉人没有提出被告犯刑事罪的

根据,因为他没有证明这些受到威胁的苏格兰人在11月1日以前就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因为既没有雇工合同,也没有证明这些人在11月2日前已经受雇的任何证据,而起诉是在11月1日提出的;可见这些人在这一天还没有在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工作。被告有权利以任何合法手段阻止他们到波林和亨弗莱那里去工作。——蒙克先生反驳说,这些起诉人从他们离开苏格兰上船时起就被雇用了。丹尼尔·莫德先生指出,诚然,有人说订过这样的雇工合同,但是这个文件没有交出来。蒙克先生回答说,这个文件在苏格兰。他请莫德先生在文件拿来以前暂缓处理这件案子。这时罗伯茨先生插话说:这对他来说倒是新鲜事。已经宣布起诉的证据提完,而起诉人为了提出新的证据却要求延期处理案子。罗伯茨坚持继续进行。丹尼尔·莫德先生宣布:这两种要求都是多余的,因为起诉没有任何根据。——于是被告就被释放了。

与此同时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他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在木工会堂或社会主义者会堂召开大会,向各手工业者联合会呼吁支援(这种支援源源而来),随时随地揭露波林和亨弗莱的所作所为。最后,他们向各地派出代表,在波林和亨弗莱招工的地方向自己的同行揭露这次招工的原因,从而劝阻他们别去为这家公司做工。罢工开始后几个星期就有七位代表奔赴各地,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街头巷尾张贴的启事则要求失业的木工对波林和亨弗莱保持警惕。11月9日几位归来的代表作了关于他们执行任务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位到苏格兰去的名叫约翰逊,他说,波林和亨弗莱派去的人如何在爱丁堡招雇了三十名工人;但是,这些人从他那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马上就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在这种情况下到曼彻斯特去。第二位代表是到利物浦去监视抵岸船只的,但是没有

一个人前来,所以他无事可做。第三位代表走遍了柴郡,而他在所到之处都无事可做,因为工人的报纸《北极星报》已经到处宣传了事情的真相,打消了人们去曼彻斯特的任何念头;甚至有一个城市,也就是在麦克尔士菲尔德,木工已经募集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捐款,并且答应必要时每人再捐助一先令。在其他地方他鼓动同行募集这种捐款。

为了再一次给波林先生和亨弗莱先生提供同工人洽商的机会,星期一,11月18日那天全体建筑业工人在木工会堂集会,推选了一个代表团去向这些先生递交请愿书,然后举着旗子和会徽结队游行,向波林—亨弗莱公司的所在地进发。代表团走在前面,罢工组织委员会随后,接着是木工、砖模工和烧砖工、短工、泥瓦工、锯木工、镶玻璃工、粉刷工、油漆工、一个乐队、石工、细木工。他们路过自己的总顾问罗伯茨下榻的旅馆,一边走一边向他欢呼致敬。到了公司所在地,代表团走出队伍,其他的人则继续前进,到斯蒂文森广场去举行群众大会。代表团遇到了警察,警察盘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后,才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走进办公室,沙普斯先生和波林先生这两个合伙人向他们宣布:不接受仅仅出于威吓的目的而纠集起来的群众的请愿书。代表团否认有这种目的,因为游行队伍甚至没有停顿就立即继续前进了。在这支拥有五千人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的同时,代表团终于受到了接待,被领入室内,在场的有警察局长,一名警官和三名新闻记者。沙普斯先生——波林和亨弗莱的合伙人——以主席自居,指出代表团讲话应当慎重,因为全部讲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有可能在法庭上被用来反对他们。然后开始问代表团有什么不满等等;并且说,他们想按照曼彻斯特通行的规章给这些人工作。代表团问道,在斯泰福郡和苏格兰招来



的这些工人是不是按照曼彻斯特的手工业规章工作的？——回答说：不，我们同这些工人订有特殊的合同。——那么您的工人应该重新得到工作，而且是按通常的条件？——噢，我们不和任何代表团谈判，而只要让这些人来，他们就会知道我们愿意按什么条件给他们工作。——沙普斯先生补充说：所有在他名下的公司总是宽待工人并发给他们最高的工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他象他们听说的那样参加了波林—亨弗莱公司，那么，这家公司是强烈反对工人的切身利益的。——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烧砖工被问道，他的同行究竟有什么不满。——噢，这会儿倒是没有，以前可多呢。——哦，你们以前的不满可多了，是吗？波林先生冷笑着回答，并且趁此机会大谈手工业者联合会，罢工等等，大谈它们给工人带来的贫困，——对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指出，工人决不愿意让人把他们的权利一点一点地夺走，例如就象现在要他们做的那样，每年白干144小时。——沙普斯先生说，也应该算一下，游行参加者由于那天没干活所造成的损失，如罢工的花费、罢工者的工资损失等等。——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要求您为这件事从您的口袋里掏一文钱。谈到这里代表团就离开了，并向聚集在木工会堂的工人作了汇报，同时发现不仅所有在这个地区为波林和亨弗莱干活的工人（他们不是木工，因此没有停过工）都来参加了游行，而且不少新招来的苏格兰人也在今天早晨罢工。一个油漆工也说道，波林和亨弗莱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正如向细木工提出的那样，同样无理，不过他们也要反抗。为了加快事件的进程和缩短斗争的时间，作出了决定：波林和亨弗莱公司的全体

---

见前述有关波林和亨弗莱的制砖厂里的流血斗争。

建筑工人应当停工。工人执行了这一决定。星期六油漆工停了工，星期一装玻璃工停了工。几天以后，在波林和亨弗莱承包修建的新剧院里干活的只有两名泥瓦工和四名短工，而不是二百名工人。在新来的工人中也有许多人停了工。

波林、亨弗莱等人气得发狂。当又有三个新来的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就在星期五，11月22日，把工人拖到丹尼尔·莫德先生面前受审。先前的失败对他们毫无作用。首先受审的是一个叫里德的工人，他们控告他违反了合同；同时交出了被告在得比签订的一份合同。又一次担负起自己职务的罗伯茨马上指出，合同和起诉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丹尼尔·莫德先生立刻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严厉的罗伯茨已经把这一点指出来了，但是，他费了不少力气才让对方的辩护人明了这一情况。最后，这位辩护人要求允许改变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又来提出起诉，这次起诉比第一次更糟。当他发现这也行不通时，他请求继续延期。丹尼尔·莫德先生允许他考虑到星期五，11月29日，即考虑整整一个星期。他这次是否达到了目的，我不能断定，因为我正好缺少应该刊登判决的那一号报纸。这时罗伯茨转入进攻，他把几个招雇的工人以及波林和亨弗莱的一个工头传上法庭，因为他们闯入一个罢工工人的家里，侮辱了他的妻子；在另外两件案子中几个罢工工人遭到了袭击。丹尼尔·莫德先生不得不遗憾地判处全体被告，不过他尽量从宽处理，只要他们担保今后安分守己。

在12月底，波林、亨弗莱等先生终于达到了对他们的两个反

对者进行判决的目的，理由仍然是殴打了他们的一个工人。不过这次法庭就不那样宽大了，它立即判处他们一个月徒刑，并且要他们保证刑满后安分守己。

此后有关罢工的消息少起来了。1月18日那天罢工还在全力进行。以后的消息我就没有看到了<sup>151</sup>。大概它同其他大多数的罢工一样已经停止了；波林、亨弗莱等人逐渐在外地、在罢工的个别叛逃者中招到了足够的工人；大多数罢工者经过长期或短期的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对此他们足以自慰的是，他们没有损害自己的尊严，而且维持了自己同志的工资——之后，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至于争议之点，波林、亨弗莱等人已经明白，不能一意孤行，因为罢工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损失，而在这么一场激烈的斗争以后，其他的企业主也不想马上改变木工业原有的规章。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下半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6年1月和2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署名：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维多利亚女王的访问。——“王室”  
之间的不和。——维克同德国资产阶级  
的争执。——对巴黎木工的判决<sup>152</sup>

贵国的小女王把她到普鲁士的访问搞得可真不妙。她对待国王如此傲慢无礼，致使国王很愿意摆脱她，并且在她离开以后就很坦率地表示了这一点。中等阶级由于她蔑视科伦“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也感到怒不可遏。科伦市长的女儿向“女王陛下”献了一杯茶，维克却不接过杯子，因为这只杯子被一个非“贵族”的手触摸过了（！）。她只是拿起茶匙，并转过脸去用茶匙呷茶，对女孩表示了极端露骨的蔑视。这个可怜的女孩站在那里直发抖，不知道是留下呢还是走开才好。她这是活该；这些仗着有钱而目空一切的资产阶级，尽管百般狡诈，但是他们拜倒在国王和女王们的脚下，毕竟都是傻瓜，受到这样的待遇也是自作自受。贵国女王举止如此傲慢，以致激起了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点骨气，要略表抗议。她给科伦大教堂建筑基金捐助了3500元（500镑），而被羞辱的科伦资产阶级就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不失体统地把这零钱退给她！会议被警察和军队解散了。不过，我听说，他们仍然打算

在他们中间认捐这笔钱，并把钱送到英格兰或爱尔兰去救济贵国饥饿的贫民。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为了吸血的德国王公，约翰牛已经被榨取了大量血汗钱，德国资产阶级把他们无耻地从不幸的约翰身上搜刮来的财富归还一点，这才公平。我听说：贵国女王对我国亲爱的国王及其宫廷官员的露骨的蔑视起因于普鲁士的跛足王后 拒绝阿尔伯特亲王的搀扶而宁肯要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大公搀扶，因为他出身更高贵。看看这些王公之间的不和以及资产阶级同王公们的不和，真是十分可笑；他们一直看不到就在他们周围的最底层掀起了运动，而等到他们看到自己的危险，已经为时太晚了。

您一直没有在《星报》公布巴黎法庭对举行罢工的木工——被指控非法集会——的判决。<sup>153</sup>木工领导人万桑被判处三年，其他两个人被判处一年，还有另外几个人大概被判处六个月（徒刑）。然而，木工们还是不上工，至少在那些老板不让步的地方是这样。有三分之二的老板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由于上述判决，锯木工人（*scieurs-à long*）以及同建筑业有联系的其他行业也举行了罢工。这次事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 9 月 14 日和  
18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5 年 9 月 20 日《北极星报》  
第 410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伊丽莎白。——编者注  
《北极星报》。——编者注

## 弗·恩格斯 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sup>154</sup>

### 密谋反对教会和国家！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发表了一篇显然是官方写的关于“无神论者组织的遍及整个瑞士的巨大密谋”的冗长报告。现摘要如下：

不久以前发现了纽沙特尔州的共产主义秘密协会以后，又发现了另一个更危险的组织——一个布满瑞士联邦的组织，其宗旨为借助无神论推翻基本的道德原则，并且借助一切手段，包括谋刺国王的手段，使德国革命化。这个称作“青年德意志”<sup>155</sup>或“勒芒联盟”的组织的成员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德国工人，还有一些长期在外的政治流亡者。根据在密谋的大本营洛桑得到的消息，逮捕了绍德封的大俱乐部的领导人，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下面揭发的事实是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这个秘密协会从1838年就存在了，为首的是德语教员施坦道先生和德莱克先生，他们所办的报纸的编辑威·马尔，以及药剂师霍夫曼。看来，同这个协会有联系的还有德国流亡者法伊恩博士和劳申普拉特博士——前者由于参加不久以前的内战在琉森州被逮捕，后者在斯特拉斯堡被逮捕。

这个组织的章程包括以下几点：协会按其性质必须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宗旨是进行政治宣传。每一个会员必须坚持留在组织内直到四十岁，必须

---

《现代社会生活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207—208页。——编者注

全力以赴地实现本会宗旨，必须不怕任何牺牲。每一个会员必须销毁有可能暴露本组织或其会员的一切书面文件。在瑞士设有中央机关，同返回德国的那些会员保持通讯联系并领导全部活动。凡是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和革命者的人，不得吸收为协会会员。

这个协会由于会员在德国工人——在瑞士约有二万五千流动人口——中间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已经在瑞士二十六个城市中成功地建立了分会：卡鲁日、尼翁、罗耳、奥邦、莫尔日、洛桑、厄格尔、斐维、伊韦尔登、穆东、佩埃恩、绍德封、弗廖尔耶、伯尔尼、俾尔、圣伊米耶、波尔兰特留伊、布格多夫、库尔、楚格、苏黎世、温特图尔、巴塞尔、琉森、弗里布尔以及日内瓦；此外在法国建立了两个协会：斯特拉斯堡和马赛。这些分会的代表每六个月在上述的一个地方集会，并责成该地的分会负责领导以后六个月的一般会务。这些宣传员为吸引德国工人而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和采用的确实毒辣的手段，实在是可怕。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从苏黎世给中央机关写信说：

“鉴于新近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德意志各邦的法令和威胁吓坏了，我们必须十分谨慎。除非向他们讲明协会不是政治组织，他们是决不会参加的。因此我们对待他们必须非常谨慎，逐渐地把他们引上正确的道路，而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告诉他们，宗教无非是一堆废物和粪土。我们在这里唯一能做的事是为他们参加瑞士法语区的协会做准备，并把想要离开苏黎世的人派到那里去。”

当莫尔日分会需要同本市那些还没有人入会的白铁工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就立即给中央机关写信，要求给他们派一名精明能干的白铁工人，以便吸收这些工人参加协会。各分会彼此之间以及同中央机关都有通讯联系。这种通讯联系已经被部分查获，它的内容表明，整个密谋浸透了革命精神。每一个分会都有一个为进行讨论而准备题目的委员会。辩论涉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和宗教的问题。有些分会比较有钱，拥有图书馆、阅览室、钢琴，等等；它们设置了一切能够吸引工人的设备。影响最大的分会在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洛桑以及绍德封等地；最后提到的那个分会（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拥有二百名会员；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这同一个城市中，除了“青年德意志”以外，还存在着一个会员众多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我们就可以有权利说，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在瑞士已经成千上万了。这个组织有一个秘密的鼓动委员会，广大会员一般是不知道的；但是每一个分会都有一个或两个“宣传员”，

他们的任务是振奋会员的士气、指导会议并发扬无神论精神和革命精神。不幸的是，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他们在这方面干得很有成效，由马尔出版的“青年德意志”的“可怕的”定期报刊，仅在工人中间就有订户五百户以上。报纸公开宣称无神论是它的原则。这家报纸说：“德国需要一次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革命；如果宗教和政治能在这次革命的进程中化为乌有，那就太好了；经过这次清洗的适应社会需要的人将更纯更好。”

这就是完全用无耻诽谤的笔调所写的报告。“青年德意志”从1831年就存在了，当时，由于德国发生多次起义，大批青年、大学生、工人等等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大量活动，这个组织到1837年瓦解了，那时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已经把政治鼓动的风气镇压下去。可是没有多久，在“青年德意志”的老家勒芒湖畔开始出现了共产主义俱乐部，并且同这个纯粹政治性的组织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这次辩论在两派之间造成经常性的争吵与明显的不和；然而，辩论的主要结果是“青年德意志”不得不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且不仅要更好地阐明他们的政治原则是激进的、共和主义的和民主的原则，而且还要探讨社会问题。这时德国的中等阶级在消磨时间，他们跟着隆格搞“德国天主教徒”运动和“新教改革”运动，玩弄“光明之友”的把戏，<sup>156</sup>从而把在宗教问题上实行某些十分琐细的、几乎看不见的、于事无补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我国工人却在阅读和领悟最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如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并且接受了他们研究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是激进的。德国的人民不信教了。怎么能在短短一年内，不仅在瑞士，而且在法国、英国以至我们德国，使那么多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呢？请看前一个星期

---

日内瓦湖的法文名称。——编者注



---

期我曾经就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所讲的那些话<sup>157</sup>。我认为所揭露的这些事实充分证实了我的论述。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 9 月 20 日和  
26 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5 年 9 月 27 日《北极星报》  
第 411 号，编辑部注：本报德国通讯员  
来稿

## 弗·恩格斯

# 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驱逐

德 国

本月 11 日黑森大公国当局在达姆斯塔德,即在出版社的所在地没收了皮特曼编辑的共产主义杂志《莱茵年鉴》第一期。不过只查获了 55 本,本期其余的份数已经售完。出版人列斯凯先生同时接到通知说,该杂志已置于警方监督之下,每一期出版前必须呈报警方,获得发行的特许证,如有违犯,将课以罚金 500 佛罗伦(45 镑),或酌情处以徒刑。不过这种针对共产主义者,同时也针对我们在德国的少数自由报刊的打击,将被证明是无效的。要逃避这种非法干涉,办法多得很,这种干涉无疑是在可恨的普鲁士政府的唆使下进行的。这同一个普鲁士政府已经通过萨克森当局将几个知名作家驱逐出莱比锡,其中有我在上一封信里提到的“青年德意志”<sup>155</sup>在瑞士进行密谋活动的一位领导人威·马尔先生。对他的案件也同去年对魏特林的案件<sup>158</sup>一样,当局不敢将这批人逮捕法办,尽管他们有充分的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只满足于将

---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编者注

见本卷第 294—297 页。——编者注

这些人驱逐出境。

## 瑞 士

窝州的民主政府已经将有才华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奥·贝克尔先生，以及属于同一党派的西·施米特先生和库尔曼博士驱逐出境，并解散了洛桑的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苏黎世的激进政府已经同样将上述《莱茵年鉴》的编辑、也是属于共产党的皮特曼博士驱逐出境。

弗·恩格斯写于 1845 年 10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5 年 10 月 25 日《北极星报》  
第 415 号，编辑部注：本报通讯员来稿

## 卡·马克思

### 珀歇论自杀<sup>159</sup>

法国人对社会的批判,至少部分地具有很大的优点:它不仅在各个阶级的关系上,而且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矛盾和反常现象,同时对它们的论述既有直接生活的激情,又有视野广阔的见解,既有世俗的细腻刻划,又有大胆的独创之见,象这样的论述在任何其他国家是找也找不到的。只要对照一下例如欧文和傅立叶对当前交往 [Verkehr] 的批判性论述,就可以了解法国人的这种卓越之处。对社会状况的批判性论述决不仅仅在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家本身那里能够找到,而且在每一个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文学和回忆文学的作家那里也能够找到。我从雅克·珀歇《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一书中作了一些关于“自杀”的摘录作为这种法国批判的范例,这些摘录同时能表明慈善的资产阶级的下述想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好象问题只在于给无产者一些面包和教育,好象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只有工人生活不愉快,而就其他方面来说,现存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

许多老一辈的、现在几乎都已去世的法国实践家经历过自1789年以来的多次变革,经历过多次迷惘、激动、宪法、统治者、失败和胜利。正象在他们那里一样,在雅克·珀歇那里,对现存的财产关系、家庭关系和其他的私人关系的批判,一句话,对私生活的



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一文  
和卡·马克思的著作《珀歇论自杀》的《社会明镜》杂志的封面

批判,都是他们的政治经验的必然结果。

雅克·珀歌(生于1760年)从研究文学改为研究医学,从研究医学改为研究法学,又从研究法学改为从事行政工作和警察事务。在法国革命爆发之前,他曾同修道院院长莫尔莱编辑一部商业词典,可是只出版了这部词典的内容说明书;当时他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从事行政工作。珀歌只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是法国革命的追随者;他很快就投靠保皇党,有一段时期担任《法兰西报》的主编,后来,甚至从马莱·迪庞那里接管了臭名昭著的保皇党的《信使报》。同时,他在革命年代非常狡猾地随机应变,时而受迫害,时而又在行政和警察部门工作。他在1800年出版的《商业地理》<sup>160</sup>五卷集对开本引起了第一执政波拿巴对他的重视,被任命为商业和艺术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在弗朗斯瓦·德·讷夫沙托的部里获得了一个相当高的行政职位。1814年,复辟使他成了监察员。百日<sup>161</sup>时期他辞去了职务。随着波旁王朝的再起,他获得了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的职位,一直任职到1827年。珀歌无论是直接地也好,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也好,对制宪会议、国民公会、谏议院的发言人以及复辟时期的众议院的发言人都有影响。在他的许多(大部分是经济学)著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商业地理》外,以《法国统计学》(1807年)<sup>162</sup>最著名。

珀歌在撰写他的回忆录——部分取材于巴黎警察局档案,部分取材于他在警察局和行政机关工作的长期实践经验——时已经年迈了,而且他只准回忆录在他死后出版,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算作“早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众所周知,这些人如

---

《法兰西信使报》。——编者注

此缺乏我们这里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作家、官吏和从事实践活动的资产者所具备的那种惊人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

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这位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是怎样谈自杀的吧！

自杀的年数字在我们这里多少可说是合乎常规的,而且是周期性的,它应当被看作是我们的社会这个不完善的机体的一种症状,因为在工业萧条和发生危机的时期,在生活必需品昂贵的时期以及在隆冬季节,这种症状就更加明显并具有流行病的性质。这时卖淫和盗窃也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尽管自杀的最大根源是贫困,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阶级中,在无所事事的富人以及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中间,都有自杀。自杀原因的多样性似乎在嘲弄道德家们的单调而冷酷的指责。

现代科学并不重视而且无力医治的肺结核,友谊被损害,爱情被欺骗,名利未遂而灰心丧气,家庭的痛苦,竞争狂热受挫,厌弃单调的生活,热情被压抑等等,毫无疑问是促成多种多样性质的自杀的原因,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强大的个人动力,又常常驱使人去了结可厌的生命。

斯塔尔夫人的最大功绩在于使老生常谈别具一格,她试图指出,自杀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她首先认定,值得嘉许的不是屈服于绝望,而是同绝望作斗争。但是,诸如此类的理由很难使那些为不幸所压倒的人回心转意。如果他们相信宗教,那就寄希望于美好的世界;相反,如果他们相信虚无,那就在虚无中寻求安宁。在他们看来,哲学上的长篇大论毫无价值,而是对痛苦作一番言之无物的安慰。首先,断言如此频繁地发生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这是荒谬的;自杀决不是反常的行为,因为我们每天都亲眼看到。反常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许多自杀现象的出现倒是由于我们社会的性质,而鞑靼人就不自杀。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有同一种产物,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为改造我们这个社会而工作并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至于谈到勇敢,如果说,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始终令人惊心动魄的战场上的临死不惧看作是勇敢的行动,那么,没有东西能证明:一个人由于凄惨孤独而一死了之就必定是缺乏勇气。这样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用侮辱死

---

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者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关于自杀所说的一切就在同一个思想范围内转来转去。人们针对自杀提出了天命,但自杀的存在本身是对这个不可理解的天命的公开抗议。人们跟我们大谈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对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却避而不谈,也不付诸实现,最后还言过其实,认为克服痛苦比屈服于痛苦功大千倍,而这种功绩同它所展示的前景一样,是令人沮丧的。总而言之,自杀被看成是一种胆怯的行为,是对法律、社会和荣誉的犯罪。

尽管有这么多的谴责,人还是要自杀,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绝望者的血管里血液并不象有暇侈谈这类空话的冷酷无情者的血液那样流动。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似乎是个谜;人们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了解他。当你看到统治着欧洲的制度怎样轻率地对待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当你看到文明的司法机关为了使它们没有把握的判决得到承认而怎样滥用监狱、惩罚和死刑刑具等设施,当你看到那些全面陷于贫困之中的阶级,其人数之多达到前所未闻的地步,看到人们也许是嫌麻烦,不愿把社会贱民从卑贱地位拯救出来,而以极端轻蔑和防范的态度对待他们,当你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无法理解:根据哪一项条款竟能命令一个人去珍视被我们的习惯、偏见、法律和一般风俗横加践踏的生命。

有人以为用凌辱性的制裁、给罪犯死后的名誉打上侮辱性的烙印就能制止自杀。侮辱已经死去的、不能为自己的事辩护的人是多么不足取,这还用得着说吗?然而,不幸的人对此是没有顾忌的;如果自杀要归罪于谁,那首先是活着的人,因为在这批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值得别人为他而活下去。人们想出来的幼稚而又残酷的措施能战胜使人走绝路的念头吗?一个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才不在乎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对着他的尸体辱骂呢!他只是把这种做法看作是活人的又一胆怯表现。一个人生活在千百万人之中竟感到极端孤独,一个人竟能被不可动摇的自杀念头所征服而无人察觉,象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这种社会不是个社会,正如卢梭所说,它是野兽栖身的荒漠。我在从事警察局行政工作时所担任的职务中,自杀事件是我的职权范围的一部分,我想知道,在某些自杀的原因中是否能找出一些原因从而使我们能

---

“社会”一词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在珀歌的著作中,这里是:“对自杀案的审讯”。——编者注

防止其后果呢？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发现，除了彻底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外所有其他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绝望是促使神经脆弱的即狂热的和多愁善感的人去寻死的原因，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事实是严厉的父母和长者对依附于他们的人的虐待、不公和暗罚。革命没有消灭所有的暴虐行为，任意施加暴力的恶劣做法还在家庭中存在，它在此引起了类似革命的危机。

实际上在我们中间必须先建立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而自杀只是普遍的、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斗争的一千零一种征兆中的一种。有那么多斗争着的人放弃了社会斗争，因为他们不愿被列为牺牲品，或者是因为他们一想到可能在刽子手中间占有一个荣誉地位就反感。如果需要例子，我可以从真实的记录中摘列一些。

1816年7月，一个裁缝的女儿同一个屠宰工，一个品德优良的年轻小伙子订了婚，他勤劳节俭，非常钟情于他的漂亮的未婚妻，她对他也十分眷恋。年轻的姑娘是裁缝，她受到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重，她的未婚夫的父母对她也极为钟爱。这两个善良的人从未放弃过任何机会使她早日成为他们的儿媳妇；他们想出种种娱乐性的聚会，在会上她成了王后和偶像。

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了，两家已把一切准备就绪，婚约也都订好了。在约定到市政局去的当天晚上，年轻的女儿和她的父母应该到未婚夫家赴晚宴；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意外地发生了。裁缝和他的妻子为了向他们的一家有钱主顾交付订货要呆在自己家里。他们请求谅解，但是屠宰工的母亲亲自前去接儿媳妇，后者经父母许可后就跟她走了。

尽管两位主要客人没有出席，但宴会充满了欢乐气氛。人们尽情地说了许多只有在参加婚礼时才许可说的有关家庭的玩笑，他们喝啊，唱啊。他们把未来作为话题谈开了，非常热闹地议论美满婚姻的乐趣。直至深夜，筵席未散。年轻小伙子的父母出于一种容易理解的温情，不去注意这对未婚夫妇的默契了。他们手拉着手，爱情和亲昵行为使他们陶醉了。而且，人们认为这个婚姻已经圆满结束，何况两个年轻人来往已久，对他们也无可非议。未婚夫的父母激动情绪，夜幕沉沉，两个年轻人由于陪席者的温情而彼此无拘无束

---

这句话是马克思加的。在珀歌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我不谈理论，而是引证事实。”——编者注

的眷恋之情,通常总是笼罩着这种宴会的尽情欢乐,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以及现成的良机和冲人头脑的葡萄酒等等,都促成了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灯火熄灭后,一对爱人又在黑暗中会合了。人们装作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什么都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幸福在这里只引起人们的赞助而没有一个人忌妒。

年轻姑娘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她父母那里。她是独自一人回来的,这已证明她是多么相信自己没有过失。她悄悄走进自己的房间,梳洗换装;但是,她的父母一看到她就勃然大怒,用最下流的称呼和恶言秽语冲着她大骂起来。闹得没完没了,这一点邻居是见证。由于羞愧和自己的秘密被人无礼地点破,这个女孩子所受的刺激是可以想象的。不知所措的姑娘徒劳地向她的父母诉说:是他们弄得她名誉扫地,她承认自己没有理,糊涂,不听话,但这一切都是可以改正的。她的理由和痛苦并没有使裁缝夫妇息怒。

最胆怯最无抵抗能力的人一当能行使父母的绝对权威,他们就会变成铁石心肠。这种滥施权威好象是对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自愿或不自愿地表现出来的许多屈服性和依赖性的一种粗野的补偿。

好管闲事的男男女女都闻声赶来,一齐叫骂。这种令人极其难堪的场面所引起的羞耻感使这个女孩子下狠心去断送自己的生命。她飞快地跑下楼梯,穿过正在谩骂、诅咒她的那些好管闲事的人群,她神思恍惚,奔向塞纳河,投入河中;船夫将她从水中打捞起来时,她已经死了,身上仍穿着她的婚礼服。不出所料,起先冲着女儿叫嚷的那些人现在又马上转向她的父母了;这场灾难吓坏了他们的空虚的灵魂。几天以后,这对父母到警察局去索取女孩子所戴的金项链——她未来的公公的一件礼物,一只银表和另外好几件珠宝饰物,所有这些物品都存放在办事处。我不放过机会去狠狠谴责这种人的不明智和残暴。要求这样的疯子向上帝陈述他们那样做的理由,是不会有什效果的,因为他们具有那种在低下的打小算盘的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狭隘偏见和独特的宗教信仰。

驱使他们前来的是贪心,而不是想要有两三件纪念品;我认为,由于他们的贪心,可以惩罚他们。他们要索取年轻女儿的珠宝饰物;我拒绝给他们,扣

下了他们从通常存放东西的出纳处领取物件时所需要的证件。只要我担任这个职务,他们的请求都会落空,而我觉得抵制他们的侮辱是一种快乐。

同年,在我的办事处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克里奥洛人,他容貌俊秀,出身于一个最富裕的马提尼克家族。他坚决反对把一位少妇即他的嫂嫂的尸体移交给申请人即他的哥哥、死者的丈夫。她是投水自尽的。这种自杀最为常见。尸体是由被派去打捞尸体的人员在离阿尔让台的堤岸不远的地方找到的。出于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处于完全绝望状态下的妇女也具有的本能的害羞的本能,溺死者谨慎地用自己衣服的下摆系住双脚。这种怕难为情的预防办法十分清楚地证明她是自杀的。死者被找到后马上送往陈尸所。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和豪华的服装,成了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原因作出许多猜测的根据。首先认出她的是她的丈夫,他的绝望是没有尽头的,他不理解自己的不幸——至少有人对我这样说:我本人同他素不相识。我告诉这位克里奥洛人说,她的丈夫要马上为他不幸的妻子建造一座华丽的大理石墓碑的请求应当首先考虑。克里奥洛人大声叫嚷:“在他杀害了她之后,这个恶魔!”同时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从这位年轻人的激动和绝望,从他希望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提出的恳切请求,从他的流泪来看,我认为可以断定他是爱她的,而且我把这一点对他说了。他承认他爱她,但是,他激动地断言,他的嫂嫂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发了誓。只要能挽回他嫂嫂的名誉——而舆论照例都把她的自杀归结为男女私情——,他就要把他哥哥的野蛮行为公之于众,哪怕他自己会坐上被告席。他请求我给予支持。我从他断断续续的、激动的表白中所知道的是这样:M先生即他的哥哥是一位富裕而爱好文艺的人,喜奢侈,爱同上层打交道,大约在一年前同这个年轻女人结了婚——看来是出于互相爱慕,他们是人们能看到的最美满的佳偶。结婚后,一种血病,也许是一种遗传病在年轻丈夫的身上突然而且十分厉害地发作了。这个以前为自己漂亮的外貌、文雅的举止,为无人匹敌的十全十美的身材而十分自豪的人,突然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疾病,它的破坏力科学尚无能对付;他从头到脚都可怕地变了形。他的头发脱落,脊梁也弯曲了。憔悴和皱纹使他每天都在发生最显眼的变化,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自尊心使他试图否认这一最明显的事实。不过,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瘫痪在床,铁的毅力好象战胜了这种疾病的袭击。他拚命地使自己被损坏的病躯活下去。身体虽已残废,精神却是振作的。他继续举行宴会,参加狩

猎,照样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这似乎成了他的性格和本性的规律。然而,当他骑着马在大道上兜风时,学生和街上的顽童对他进行侮辱、挖苦和嘲弄,他热衷于对女人献殷勤而闹了许多笑话,因而引起朋友们不礼貌的讥笑、善意的告诫——所有这一切终于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并促使他对自己采取谨慎的态度。一当他承认了自己的畸形模样,一当他明确了这一点,他的脾气粗暴了,他变得沮丧起来。他似乎很少有热情带自己的妻子去参加晚会、舞会、音乐会,他移居于他在郊外的住宅;停止一切邀请,找种种借口避免同人们接触,就连他的朋友对他妻子略进恭维之词——这种情况在高傲感使他确信自己优越时他尚可容忍——也使他忌妒、疑心和冒火。他把所有坚持来看望他的人一概视为抱着顽强的决心来征服他妻子的心,而他的妻子是他仅存的最后的骄傲和最后的安慰。在这个时候,这位克里奥洛人从马提尼克来办事,事情办成就能促使波旁王朝在法国复位。他的嫂嫂优礼相待;在她中断了与人们频繁来往的情况下,新到的客人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在M先生看来他作为弟弟而具有这一优越条件是十分自然的。我们的克里奥洛人预料到,无论是他的哥哥同许多朋友发生直接口角,还是无数次用间接的方式对来访者下逐客令,使他们不敢登门,都必然会使他哥哥的家庭与外界隔绝。克里奥洛人正是在没有认清使他自己也变得忌妒起来的爱的动机的情况下,对这种与外界隔绝的想法表示赞同,甚至还用自己的劝告去促成它。M先生终于完全退居帕西的一所豪华住宅,这个地方不久就门庭冷落了。忌妒以最微小的事情为食料,当它不知道去纠缠什么的时候,就吞食自己并变得富有发明创造能力;一切都成了它的食料。这位少妇也许在渴望她这种年龄所应有的娱乐。高墙挡住了眺望邻舍的视线;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

不幸的女性遭受到最不堪忍受的奴役,而且只是由M先生来执行这种奴役,他依仗的是民法典和财产权,依仗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使爱情不受相爱男女的自由情感的支配,它允许忌妒的丈夫用锁把自己的妻子禁闭在家里,就象吝啬鬼对待自己的钱柜一样;因为她只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

夜间M先生携带武器围绕住宅来回走动,带着狗巡逻。他想象在沙土上发现了足迹;一架梯子被园丁移动了一下位置,他就想入非非,作了种种古

怪的假设。园丁是个年近六旬的酒鬼，被派去看守大门。这种容不得外人的情绪毫无节制地任其发展下去并达到愚蠢的地步。这个弟弟，这个无罪的但参与了这一切的同谋者，终于意识到，他促成了这位少妇的不幸：她每天都受到监视、凌辱，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使她消愁的丰富而幸福的幻想。她以前是多么自由和快乐，而现在又是多么凄惨和忧伤！她饮泣吞声，又要掩泪藏悲，然而泪痕仍斑斑可见。克里奥洛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决定坦率地向嫂嫂解释一下并把一个确实是由于隐而不露的爱情所造成的错误改正过来。一天早晨，他钻进了这个被监禁的女性经常来呼吸新鲜空气和照料她的花草的小丛林。显然，她知道她在利用这点有限的自由的时候受到好忌妒的丈夫的监视，因为这位少妇一看到她的小叔子第一次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她面前就惊愕万状，她攥紧自己的双手，害怕地对他喊道：“你走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走吧！”

实际上，当M先生突然出现的时候，他刚刚来得及躲进花房。这个克里奥洛人听见叫嚷声，便想仔细听听；但他的心脏怦怦跳动，使他听不清声音很低的申辩，要是他的躲避被丈夫发觉，那就有可能使申辩产生可悲的结局。这件事使小叔子深感不安，他在这时看到有必要从这一天起做受害者的保护人。他决心不再对爱情保持任何沉默。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唯独不能牺牲它的保护权，因为后一种牺牲是胆小鬼的牺牲。他一直继续去看望他的哥哥，准备坦率地同他谈一谈，开诚相见，倾诉一切。在这方面M先生还没有起疑心，然而，他弟弟的这种坚持性倒使他疑惑不解了。M先生尚未完全弄清这种关心的原因，就开始不信任他的弟弟了，并预先估计到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克里奥洛人不久就发觉，他的哥哥并非经常不在家，而他哥哥后来却坚持说，人们常常在帕西住宅门前按门铃而不见开门，是因为他不在家。有一个锁匠的学徒，仿照他师傅为M先生铸造的大门钥匙的模型，给克里奥洛人做了一把钥匙。十天睽违之后的一个夜间，被恐惧所激怒、被狂想折磨够了的克里奥洛人，翻过围墙，拆开大院的篱笆，用梯子爬上房顶并顺着水落管滑到一个贮藏室的窗户下。狂叫声提醒他悄悄地躲到一扇玻璃门后面。他一眼望去，心如刀绞。灯光照亮了卧室。帐幔下M先生头发凌乱，由于发怒而脸色铁青，半裸着身体，蜷伏在床上他妻子身边。她尽管竭力躲避他，但还是不敢离开床。他尖刻地对她大声呵斥，好似一只猛虎准备将她撕得粉碎。他对她说：“对，我非常难看，我是一个怪物，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使你产生了恐惧。你希

望有人把你从我的手中解脱出去,不再为我的外貌而苦恼。你渴望使你获得自由的时刻到来。你用不着反驳我,我从你的恐惧、你的反抗中猜出了你的心思。你为我自己招来的卑鄙的讥笑而面红耳赤,你打心眼里恨我啊!毫无疑问,你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流逝的时光,直到我不再以我的身体缺陷和我的在场缠住你。够了!一种可怕的愿望和狂想支配着我,我要把你变得丑陋不堪,变得跟我一样,使你不能由于不幸结识了我而指望用情夫作自我安慰。我要把这房子里所有的镜子统统砸碎,使它们不能再照出你的容貌来反衬我,使它们不再能助长你的骄傲。我应该把你带到社会上去,或者放你一个人去,眼看着每一个人都怂恿你来憎恨我,对不对?不,不,在你把我杀死之前你离不了这所房子。你杀死我吧!你先下手干我每天想干的事情吧!这个野蛮的人在床上,在这个为他浪费了最温柔的爱抚和最感人的哀求的不幸妇女身边打滚,大叫大嚷,呲牙咧嘴,口角喷沫,一派发疯的症状,并且由于狂怒而捶胸顿足。最后她制服了他。毫无疑问,怜悯代替了爱情,但这对这个变得如此可怕的男人来说是不够的,他的情欲还方兴未艾呢!此情此景使得这个克里奥洛人看得呆若木鸡,继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闷闷不乐。他感到恐惧不安,不知道去找谁才能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致命的折磨中解救出来。显然,这种情景每天都得重现,因为M夫人在他接着发生痉挛时就求助于为此准备的药瓶,使她的刽子手稍微安静一会儿。在巴黎,当时只有这个克里奥洛人是M先生的家庭的唯一代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受到诅咒的是诉讼程序拖拉迟缓,是丝毫未打破周密的陈规旧套的法律冷酷无情,特别是在问题只涉及一个妇女即涉及很少得到立法者保护的人时更是冷酷无情。一纸逮捕令或另一种强制措施也许就能预防曾经目睹这种发疯行为的人所准确地预料到的不幸。然而,他决心不择手段地冒险一试并承担一切后果,因为他的财产使他有可能承担巨大的牺牲,不怕为冒险行动负责。在他的朋友中有几个象他本人一样坚决的医生,正准备闯进M先生的住宅,以便查明这种疯狂行为的原因并且立即强制这对夫妇离婚,可是自杀事件证明为时太晚的预防措施是正确的,并且把问题解决了。

不用说,任何一个不局限于从字面上理解一个词的全部含义的人都认为这次自杀是丈夫进行的谋杀,但它又是忌妒心大发作的结果。忌妒的人需

要一个奴隶,忌妒的人可以爱人,可是爱对他来说只是忌妒心的华丽陪衬。忌妒的人首先是私有者。我阻止了这个克里奥洛人去做不仅无益而且危险的蠢事,说它危险,首先是指他所爱慕的女人死后的名誉而言的,因为闲得无聊的公众会控告牺牲者同她丈夫的弟弟私通。我参加了葬礼。除了这个弟弟和我以外,谁都不明真相。我听到四周的人对这次自杀表示怀疑的低声议论,我不予理会。但是你面对着眼前这些人的满面愠色和肮脏的猜测,不禁会因这种舆论而脸上发热。舆论由于人们的不相往来而分歧太大,太无知,也太肮脏了,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是陌生的,所有的人彼此也是陌生的。

附带说一下,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给我送来类似这样的揭露材料。同年,我登记了一起由于父母不同意而以两枪结束生命的恋爱事件。

我同样也记下了一些由于壮年时期阳萎而自杀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恣意享乐使他们陷入不可自拔的忧郁症。

许多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在有害无益的处方使自己长期经受无效的折磨之后,他们感到医学无能将他们从病痛中解救出来。

用著名作家的引文和绝望者以铺张的手法来安排自己之死而写的诗歌,也许能编辑一部出色的文集。在寻死的决心下定之后接着来到的奇妙的冷静时刻,一股富有感染力的灵感从内心流露出来,跃然纸上,甚至在被剥夺了一切受教育机会的阶级中也是如此。他们一心只想牺牲,深得牺牲之奥妙,他们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以使用一种鲜明、独特的表达方法倾吐一番。

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收藏在档案馆,都是杰作。一个把自己的心思都用在自己的生意上、把商业奉为自己的上帝、头脑迟钝的资产者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十分浪漫的,而且也许会对他所无法理解的苦楚冷嘲热讽;不过,他的蔑视态度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对那些甚至没有意料到自己每日每时都在一点一点地扼杀自己,扼杀自己人性的三分利者,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

---

这句话和下面一句由马克思加了着重号的话,是马克思摘自珀歌对另一个自杀事件的描述。——编者注

这句话由马克思摘自珀歌对另一个自杀事件的描述并加以自由表述,“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是陌生的,所有的人彼此也是陌生的”这两句结尾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然而,关于那些自以为是虔诚的、有教养的而又不断重复这种可恶行为的好人能说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极端重要的是使穷苦人忍受这样的生活,尽管这只对这个世界的特权阶级有利,因为贫民的普遍自杀也许会使它们倾家荡产;但是,除了凌辱、冷嘲热讽和说几句漂亮话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这个阶级的生活勉强过得去吗?此外,大概这类一贫如洗的人具有某种伟大的灵魂,因为他们一旦下决心去死,就自己毁灭自己,而不是去选择一条经由断头台来达到自杀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商业时代,越是向前进,穷人的这种高尚的自杀就越是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有意识的敌对,穷人毫无顾忌地走上盗窃和谋杀的道路。得到死刑比得到工作要容易得多了。

我在翻阅警察局档案的时候,在自杀事件登记表上仅仅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明显的胆怯事例。问题涉及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威尔弗里德·拉姆赛,他是为了不与人决斗而自杀的。

对各种不同的自杀原因进行分类,就是对我们社会本身的缺陷进行分类。有的人自杀,是因为阴谋家盗窃了他们的发明,而发明人由于必须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陷入极端的贫困,甚至连发明专利特许证也买不起。有的人自杀,是为了躲避巨额开支以及在经济拮据时免遭屈辱性的迫害,而经济拮据又频频发生,以致受托管理公共利益的人对此都无动于衷了。还有的人自杀,是因为他们在长期遭受我们中间那些可以任意分派工作的人的凌辱和盘剥之后,仍然不能找到工作。

有一天,一个医生跟我谈论一起死亡事件,他认为,在促成这个事件上,自己是有罪的。

一天晚上,他返回住地伯利维尔的时候,在他家门前的一条小街上被一个头戴面纱的妇女在黑暗中拦住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她诉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在踱来踱去,这个人的面容他看不清楚。她是被一个男人监视着的。她对医生说:“先生,我怀孕了,这件事一旦被发觉,我就会名誉扫地。我的家庭、社会舆论和那些规规矩矩的人是不会原谅我的。被我骗取了信任的那个女人会发疯的,而且肯定会同她的丈夫离婚。我不为自己的事情辩护。我是丑事的根子,我只要一死才能不让这件丑事败露。我想一死了事,但有人要我活下去。他对我说,您是有怜悯心的人,这使我相信,您是

不会做杀害一个婴儿的同谋者的，尽管这个婴儿还没有出世。您知道，这是指流产。我不会低三下四到哀求别人掩饰在我看来是最不体面的罪过的地步。我只是对别人的请求作了让步才来见您的，因为我知道怎么去死。我自己去死，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我可以造成在花园里浇花取乐的假象：为了浇水趿拉着木屐，选择一个人们每天都来取水因而容易滑跤的地方，这就为落入水塘作好安排，然后人们会说，这是‘不幸事件’。先生，我一切都想好了。我打算这件事就在明天早晨做，我会一心一意地去做。为此一切都准备好了。有人要我把这事告诉您，我就对您说了。您必须决定，是杀害一个还是杀害两个。由于我的怯懦，有人让我发誓：我无保留地听从您的决定。请您决定吧！”

医生继续说：“二者必须择一，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妇女的声音听起来清晰悦耳；她那被我握住的手纤细柔嫩；她那坦率而坚定绝望的念头显示出一种超群的气质。但是事情涉及的是确实使我害怕的问题，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碰到难产时，外科医生的问题是救母亲还是救婴儿，这时他总是毫不踌躇地自己酌情决定，或者随机应变或者坚持人道主义态度。”

我说：“你逃到国外去吧！”她回答说：“不可能，用不着往这上面想啦！”

“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吧！”“我不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我同那个被我背叛了友谊的女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她是你的亲戚吗？”“恕我不再回答您了。”

医生继续说：“为了挽救这个女性，使她不自杀或不犯罪，或者使她在没有我帮助的情况下能避免这场纠纷，我本来可以贡献出最大力量的。我责备自己残忍，因为我害怕参与谋杀。斗争是激烈的。后来，魔鬼来指点我了：乐意去死还不等于自杀；只有剥夺了名誉不好的人做坏事的权力，才能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恶习。根据她袖口上刺绣的花边，我猜出她是奢侈的，根据她风雅的谈吐，我猜出她是富有的。有人认为，对富人不应当给予同情。我的自尊心使我反对那种以金钱作诱饵的思想，尽管对方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这是多余的审慎态度，也是尊重我的人格的证明。我作了不同意的回答。女士迅速离去了，二轮马车的声音使我确信，我已经不可能将做了的事改正过来了。”

十五天后，报纸给我解了这个谜。巴黎一个银行家的年轻外甥女在维尔蒙布勒她监护人的庄园中，失足跌入水塘，淹死了；她年纪不到十八岁，母亲死后，舅母不忍让她离开自己，便成了她舅母所钟爱的养女。她的监护人极端

沮丧,这个胆怯的诱奸者只能以舅舅的身分在世人面前表示自己的悲哀。”

我们看到,在缺少一个更好的办法的时候,自杀是逃避私生活纠纷的最后一着。

我常常见到的自杀原因有:被罢官,被拒绝工作,突然减薪,以致家庭弄不到必需的生活费用,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现挣现吃。

在宫廷裁减卫队的时候,有一位正直的人也象其余的人一样被毫不留情地解职了。他年龄大了,再加上无人保荐,使他不能重新入伍;由于没有知识,也进不了工业部门。他试图进入民政部门,可是,这里同别处一样,竞争者比比皆是,他的这条路又被堵死了。他内心苦闷、悲观失望,终于自杀了。在他的衣袋里,发现有一封陈述自己的遭遇的信。他的妻子是个贫苦的裁缝;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同她一起做活。塔尔诺,我们的这个自杀者,在他的遗书中说:“因为他对他的家庭已不再是有用的人,他勉强活着就成了他妻子和孩子的负担,为了减轻这种额外负担,他认为有义务剥夺自己的生命;他将自己的孩子委托给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照顾;他希望这位公爵夫人慈悲为怀,对她们如此不幸予以垂怜。”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警察局长昂格勒斯,在经过必要的手续之后,公爵夫人给塔尔诺的不幸的家庭寄去六百法郎。

在遭受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这种赈济无疑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如果全面考虑,目前整个法国尚且不能把所有不幸者养活,一个家族对他们又何济于事呢!即使我们整个民族都信仰宗教,靠富人行善也还是不够的,何况我们整个民族离全部信教还远着呢!自杀解决最严重的困难,而刑场则解决其余部分。只有改革我们的整个工农业体系,才可望获得收入的来源和真正的财富。在羊皮纸上颁布宪法是很容易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工作、首先是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权利。但是,把这些慷慨的愿望写在纸上并不等于全部都做到了,真正的任务是把这些自由的思想变为物质的和理智的,变为社会的设施。

古代世界,异教把伟大神奇的万物播撒到人间,现代的自由会落后于自己的对手吗?谁来把力量的这两个强大因素结合起来呢?

---

在珀歌的著作中是:“皇族”。——编者注

“社会的”一词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珀歇就写到这里。

在结尾时,我们还想把他做的巴黎年度自杀事件统计表之一援引于后。

在珀歇提供的另一个统计表中记载着 1817—1824 年度(包括 1824 年)巴黎 发生 2808 起自杀事件。当然,数字实际上要大得多。特别是溺死者,他们的尸体存放在陈尸所里,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知道他们是否是自杀的。

#### 1824 年间巴黎自杀事件统计表

数量	上半年.....	198	共计.....	371
	下半年.....	173		
	其中自杀未遂.....			125
	其中自杀致死.....			246
	男性.....			239
	女性.....			132
	未婚.....			207
	已婚.....			164
	跳楼 .....			47
	自缢 .....			38
	自刎 .....			40
死亡类别	枪杀 .....			42
	服毒 .....			28

在珀歇的著作中是：“在塞纳省”。——编者注

	煤气中毒 .....	61
	溺水.....	115
	恋爱、家庭的争吵和苦恼.....	71
	疾病、厌世、精神脆弱.....	128
原    因	恶劣行为、赌博、抽彩落空、害怕 遭到谴责和惩罚 .....	53
	贫困、饥馑,丧失地位、停止工作.....	59
	原因不明 .....	60

卡·马克思写于 1845 年下半年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6 年《社会明镜》杂志

第 2 卷第 7 期

署名 :卡尔·马克思

## 弗·恩格斯

### 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sup>163</sup>

#### [前 言]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就被一大批投机分子视为奇货可居。这些人以为，他们把在法英两国已经不足为奇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并把这种新的智慧当作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德国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就算是创造了奇迹。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有那么一点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味道，而且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范畴的模式，这种理论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sup>164</sup>。这种最劣等的德国理论<sup>165</sup>，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制服了”它，把它“提高”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的对象本身，

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要使德国理论光辉地战胜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针对不朽的德国理论的这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从研究社会问题以来所有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现在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最近一年来才终于知道一鳞半爪，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重新发现了它，却又把它当作崭新的发现，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至于说德国人也有自己的东西，这只能是他们在表达这种思想时所用的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最一般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社会制度。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真正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毫不介意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真正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魏特林，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都是用轻蔑的口吻提一下，或者干脆就不提他。

我想向这些聪明的先生推荐傅立叶著作中不很长的篇章，他们可以把它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很遗憾，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由于这个缺点，很遗憾，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谢利

叶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海水变柠檬汁、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sup>166</sup>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描述,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使人愉快,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机智和非常幽默的批判,所以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是可以谅解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立叶派在1845年初发行的《法郎吉》杂志第1册。我从中删去了有关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以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抱着一定宗旨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一宗旨的读者所理解,我这种不受原文拘束的做法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也不是他论述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哪怕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提并论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那本《法郎吉》杂志,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刊载的傅立叶手稿,价值很不相同。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先生们已经成了德国式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奥的、抽象的、严肃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

---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创刊第14年第1辑,八开本,1845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傅立叶手稿集:论三种外在统一的大纲,第1—2月号第1—42页。



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第1册上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象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欣喜若狂。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所发表的一个题目。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 167

我们现在接触到文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发表反对当今的愚蠢行为、反对正在流行的幻想的议论,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

如今反对商业上的荒谬行为就象在十二世纪反对教皇和领主的专横一样,意味着要被开除教籍。如果必须对这两个危险的角色进行选择,那么我认为用严酷的真相去冒犯一个君主,要比触犯现在象暴君一样统治着文明时代甚至统治着君主们的重商主义精神,危险性要小些。

而且只要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商业制度正在腐蚀和瓦解着文明时代,并且在商业中也象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一样,我们在不精确的科学的指导下正日益走入歧途。

关于商业的争论进行了近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版了千百册书籍。可是这一争论的发起者没有看到商业机构是直接违反一切常识而组织起来的。它使整个社会从属于一个寄生的和不从事生产的代理人阶级,即商人。社会上一切基本的阶级:所有者、农民、工场主甚至政府,都受治于一个非基本的、次要的阶级,受治于商人。商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属员,受他们雇用的代理人,可以更换的而且对他们负责的代理人,可是商人随心所欲地引导和阻碍流通的一切原动力。

关于与商业无关的其他谬误,舆论界和学术团体就比较容易商讨了。他

---

“社会上”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不应忘记,傅立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们几乎一致认为,哲学体系是危险的幻想,经验驳斥了我们有关完善化能力的高谈阔论,我们的自由学说与文明时代不相容,我们的德行是社会闹剧,我们的立法是迷宫。他们甚至嘲笑时髦的争论对象——意识形态<sup>168</sup>。但是商业上的信口雌黄及其关于商业来往、抗衡、平衡和保证的理论成了使一切都为之拜倒的圣约柜。可见,这才是我们必须打破的幻想。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现在受人盲目崇拜的商业制度是与真理和正义对立的東西,因而也是与统一对立的東西。

很难向当代人讲清楚,他们认为是一切智慧的典范的行动不过是在他们全部政策上打上的愚昧无知的印记。我们且看人所共知的后果吧:海上垄断、国家垄断、国债增加、由纸币引起的接连不断的破产、在一切贸易关系中增长着的欺诈行为。现在我们可以非难自由商业——即自由欺骗的机构,可以非难这种真正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上的可怕力量了。

为什么社会机体中最善于欺骗的阶级最能得到“真理的使徒们”的庇护?为什么宣扬蔑视肮脏财富的学者如今一心吹捧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的阶级,即证券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阶级?过去哲学家异口同声地谴责过某些昧着良心硬说拿不是偷这种论点的团体。同样是这些哲学家,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一个更不道德的阶级的辩护人?这个阶级宣称,做买卖不等于欺骗,蒙骗顾客同偷盗他是两码事,证券投机和囤积居奇绝不意味着掠夺生产阶级,总而言之,人只应该为了钱,而绝不应该为了荣誉去工作;——因为商人齐唱的迭句就是:“我们不为荣誉做生意。”如果现代科学支持那些公开信奉这种原则的人所干的事,因而走入歧途,那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商业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既然商业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枢纽,只要存在着社会状态,就有商业。一个民族从它开始进行交换时起就是社会的,就组成了一个社会。因此,商业在蒙昧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它具有直接交换的形式。它在宗法时代变成了间接交换。在野蛮时代商业方法的基础是垄断、规定的最高价格和政府的强行征集,而在文明时代则是个人竞争

---

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社会上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真理的使徒们”一词的引号和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德国商人也有这句口头禅。

或者是欺骗性的和混乱的斗争。

关于不知道货币为何物的蒙昧人之间的直接交换,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一个人打猎碰到了好运气,他就拿一块兽肉去换另外一个人制造的箭,后者不打猎,但需要食物。这种办法还不是商业,而是交换。

第二种办法即间接交换,是原始的商业,它要通过中介人进行。中介人成了不是他所生产的而且他也不想消费的物品的所有者。这种方法尽管很不好,尽管为恣意胡为留下很大的活动余地,它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毕竟是非常有用的:

(1)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的新开发地区;所有的殖民地在初期都处于这种状况。

(2)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如在西伯利亚和非洲的沙漠,一个商人不避酷暑严寒把必需品运到远方去,这个商人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人。

(3)在受压迫和不自由的地区,在那里贝都英人掠夺商队,向商人勒索赎金,并且经常杀害商人;对于那些置危险于不顾而把用品运到远方去的商人应给予一切保护。如果这样的商人发了财,那也是他应得的。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商人既不是证券投机商,也不是囤积居奇者。他们不是把供消费用的货物卖给一个又一个投机商;他们一到当地就在商场或者公共集市上把货物公开卖给消费者;他们是工业发展的促进者。他们希望赢利,这在文明世界是再公平不过的了;谁播下了种子,谁就应该收获。但是,商人很少满足于这样起作用,他们单独或者合伙施展诡计,以便阻碍商品流通,随即抬高物价。

当中介人由于人数过多而成为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物,当他们取得默契,将商品囤积起来,借口这种人为的匮乏来抬高商品价格,总之,当他们用投机手段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充当这两者的简单的、公开的中介人的时候,商业就腐败了。我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小集市上还能看到那种公开的中介活动。谁要是买一百只牛犊或公羊,他对二十个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有益的中间商人,否则这些农民要花费整个整个的劳动日把牛羊送到城里的市场

---

恩格斯在这一段中用自己的话转述了傅立叶的《各个时期所用商业方法的序列》一览表的内容。——编者注

“社会机体上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上去。如果这个商人一到市场上就公开摆出他的牲畜来卖,那么他就是为消费者服务了。可是如果他后天晓得什么鬼花招串通别的“商业朋友”,把四分之三的公羊藏起来,对肉商们说,公羊很缺,因而他只能供给少数几位朋友,在这种借口下把公羊的售价提高一半,使买主感到恐慌,然后把藏起来的公羊一只一只牵出来,借着事先散布的恐慌情绪,按照抬高了的价格把公羊卖出去,从而向消费者勒索到一大笔钱——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流通,不再是公开地、不施诡计地提供商品了。这是复杂的流通,它的变化无穷的手段制造出我们商业制度的三十六种独特的罪恶,并且同合法的垄断势均力敌。如果人们施用奸计霸占所有的产品,使产品涨价,那就等于说施展诡计所攫取的要比垄断以武力手段攫取的还要多。

我不准备多谈野蛮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规定最高价格、强行征集和垄断,这些现象到了文明时代也还是很普遍的。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讲过,各个时期的各种行动方式有重迭相同的地方,所以不必对文明时代兼有发展的较高阶段和较低阶段的个别特征而感到惊奇。可见我们的文明时代的商业机构是各个时期的特征的混合物,不过在这个混合物中,文明阶段的特征占统治地位,而这些特征比野蛮时代的特征更令人鄙弃,因为我们的商业无非是在法律的伪装下有组织的合法的强盗经济,投机商人和中间商人可以因此联合起来,造成各种生活资料的人为涨价,既掠夺生产者,也掠夺消费者,从而迅速积累起五千万可耻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占有者还抱怨说,人们不保护商业,商人无法生存,人们无所事事,假如商人不能再赚到五千万以上,国家就要衰落了!

这时,一门新的科学教导我们,应该给予这些人充分的自由。人们告诉我们,让这些商人去干吧,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本来赚五千万的囤积居奇者或许只能赚到一百万,他那个体面的家庭就不得不靠五万法郎的年金度日了。

神啊!请防止这种情况吧!

对商业的蔑视——所有的人生来就有的蔑视,除了几个从商业的勒索和

---

“商业朋友”一词的引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新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是味吉尔的史诗《亚尼雅士之歌》第三卷中的一行诗。——编者注

诈骗中得到好处的沿海的经商部族以外,在一切值得尊敬的民族中都是很普遍的。靠商业获利的雅典人、泰尔人和迦太基人不可能嘲笑商业;任何人都不会嘲讽自己的生财之道。金融家绝不会嘲笑这种艺术:怎样在账单上加几个圈儿,或者让敌人把账簿拿走,而自己把钱箱放到保险的地方,虽然还要说是敌人把钱箱也拿走了。

实际上,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一切可敬的阶级都把商业当作嘲笑的对象。诚实的土地所有者靠自己丰富的经验、辛劳和努力来经营自己的土地,才勉强使自己微薄的收入略有增加,人们怎么能尊敬一种完全为人唾弃的职业、怎么能尊敬这样一些满口谎言并以这种恶劣的手法赚取百万钱财的人呢?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门被称为经济学的新科学把买卖人、证券投机商、囤积居奇者、高利贷者和破产者、垄断者和商业的寄生虫捧到了荣誉的顶峰。负债日益加重,总是想方设法借钱的政府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宽容这个掌管文明时代的钱箱并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幌子下榨取它们全部财富的商人吸血鬼阶级。商业要搞运输、供给和分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它做起来却象一个仆人那样:他每年提供的实际工作值一千法郎,而他从他的主人那里偷走一万法郎,相当于他提供的价值的十倍。

一个年轻的败家子每星期都要到犹太人那里去让他剥削自己。败家子心里很蔑视这个犹太人,但又总是十分客气地问候他。现代政府就象这种败家子一样,满怀明显的蔑视同商业签定了一个停战协定,而商业呢,它越是善于同被它掠夺的工场主结合在一起,它就越得势。在这种商业混合物中发现了新教条的苗圃、各种制度的宝库的经济学家,把道德连同他们对真理的梦想全部抛弃了,以便把他们的宠儿,证券投机商和破产者扶上宝座。接着所有的学者都争着降格以求,起初科学允许那班“商业朋友”同它平起平坐——伏尔泰为一个英国商人写了一部悲剧。如今,哪位学者想写一部悲剧献给证券投机商,那就会引起他们哄堂大笑!证券投机摘下了假面具,它不再需要学者的谄媚,它要秘密地而且很快就要合法地参加政府!我们不是也看

---

“商业朋友”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弗·伏尔泰的《扎伊拉》(作者献给自己的崇拜者兼保护人,英国大商人埃弗拉德·福克纳的一部悲剧)。——编者注

到了吗,在亚琛会议上,两位银行家<sup>169</sup>不来就什么也决定不了。

任凭经济学的体系怎样赞扬商业的金牛犊,都不能消除各民族对商业的天生的蔑视。商业仍旧为贵族、僧侣、所有者、官吏、律师、学者所蔑视,为艺术家、士兵以及任何受人尊重的阶级所蔑视。它徒劳无益地一再通过诡辩向他们证明:必须尊重从事证券投机的吸血鬼,但是对这类暴发户天生的藐视仍然很普遍。每个人都屈从于鸿运亨通的教条,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都照样蔑视这条商业九头蛇,它对此倒不在意,而且继续搞它的掠夺。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发表的著作揭露了这么多的人的罪行,甚至连那些仅仅在1815年存在了一个月的联邦主义者<sup>170</sup>的罪行也不例外;为什么这个世纪在它收集的罪行中既不放过国王的也不放过教皇的罪行,却丝毫没有想到公布商人的罪行?作家们异口同声地抱怨说,他们缺乏材料。为了向他们证明这种材料多得很,我想只系统地分析一下文明时代商业的罪行(三十六种)之一。我们的充满了个人竞争、混战和欺诈的商业具有的这三十六种令人鄙弃的特征,有如下述:

## 文明时代商业特征一览表

枢纽:中介所有权与农业的解体:

- (1)商业的两重性。
- (2)价值的任意规定。
- (3)欺骗的自由。
- (4)不团结,缺乏连带责任。
- (5)资本的侵吞和转移。
- (6)工资的降低。
- (7)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 (8)引起萧条的过剩。

---

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傅立叶著作中这个一览表放在引言部分《问题的提法》(有些条目是恩格斯意译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缺乏连带责任”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 
- (9)不合理的干预。
  - (10)破坏性的政策。
  - (11)停滞或普遍丧失信用(反作用、反应)。
  - (12)废币。
  - (13)财政混乱。
  - (14)流行性的犯罪。
  - (15)蒙昧主义。
  - (16)寄生现象。
  - (17)囤积居奇(accaparement)。
  - (18)证券投机。
  - (19)高利贷。
  - (20)无效劳动。
  - (21)工业彩票(冒险投机)。
  - (22)间接的集团垄断。
  - (23)国库垄断,即由于伪造所迫而实行的国家管理。
  - (24)异国的或殖民地的垄断。
  - (25)海上垄断。
  - (26)封建的、等级的垄断。
  - (27)无根据的挑拨离间。
  - (28)损失。
  - (29)伪造。
  - (30)健康的损坏。
  - (31)破产。
  - (32)走私。
  - (33)海盗行为。
  - (34)规定最高价格和征集。
  - (35)奴隶投机业。
  - (36)普遍的利己主义。

在这三十六种特征中,我只准备详细地分析一种特征,即破产。在这样做

以前,我还要对其他几种特征略作说明。

## 二

### 关于流通的经济原则的虚伪性

(用表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这三种特征,即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引起萧条的过剩以及纸币来证明。)

我们这个世纪虽然有这么多关于工业运动的理论,但总是不善于区别流通和阻塞。它把间歇的流通和连续的流通,简单的流通和复杂的流通混为一谈。还是论我们撇开这些枯燥的差别吧,事实将会说话,并将成为我们的、与经济学原则截然相反的原则基础。

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认为,应当判处纸币制造者以死刑,不管他伪造的是货币,还是国家有价证券。对于银行券和硬币的伪造者也应处以死刑。这是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可是为什么商业事有这种制造纸币的权利,而别人这样做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呢?

商人签发的每张期票都包含有纸币的萌芽,因为很难确定这张期票是否真会得到支付。每个行将破产的人都使自己的期票涌进流通,而且根本不打算支付它们。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制造和推行纸币。

人们会反驳说,任何其他人都享有这样的特权,一个所有者也能象一个商人那样把期票投入流通。

并不是这样。一个所有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种权利是人们不能行使的,那么它就是虚幻的权利。人民在宪法上享有主权就是明证,尽管规定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特权,如果平民的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那他就连一顿午饭也吃不上。诚然,从对于主权的权利到对于一顿午饭的要求之间相距甚远。有许多权利就是这样存在于纸上而不存在于实际中,赋予这样的权利就是侮辱那些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的人。

让所有者发行期票就是这种情况。他有权发行期票就象平民有权要求主权一样。但是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所有者签发期票,他不提供保证就找不到愿意接受他的期票的人;而且人们就会象对待一



个发行纸币的人一样对待他。人们就会要他用完全没有债务的不动产作抵押,此外还要加上高额利息。有这些代价,人们才肯接受他的期票,在这种保证下,他的期票就成了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而不是象旧货商的期票那样的伪币,旧货商借助于“商业朋友”的称号,想方设法使他在没有百分之一的保证金,没有一万法郎作为一百万法郎的保证的情况下,把这一百万“可靠的”期票投入流通。

政府被大大地愚弄了,它自己不去利用这种能力,却保证商人去利用!一个拥有一万法郎保证金的商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发行总计为一百万的期票。他这样做是得到赞助和许可的。他有权把这一大批票据投入流通,而法律不能过问他的资本是怎样安排的、他拥有多少保证金。就国库来说,如果它拿出一千万保证金,就肯定能按这个比例发行价值十亿的有价证券。可是,如果一个政府尝试这样做时不征询公众的意见,不向他们说明动机,那么这个政府将眼看着自己丧失信用、使国家遭受政治动乱,而政府只不过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利用了许许多多阴谋家利用过的特权而已。这些阴谋家往往拿不出这种保证金的百分之一,而且不能经营他们的生意。

有人会回答说,这些阴谋家善于向愚人游说,骗取他们的信任;因此,提出如下的商业原则:欺骗和掠夺好心人和轻信者的技巧应受到一切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当只给予商人,政府不得受惠。我并不主张允许商人和政府使用这种高明的技巧,而是相反,必须禁止商人和执政者这样做。

由此可见,商人具有发行期票形式的伪币(第十二种特征)的能力——这同制造纸币是同样的罪行,如果其他类型的骗子犯了这种罪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可是文明人的商业制度却使这种欺骗竞赛(第三种特征)合法化并加以保护。

对于制造纸币的责难也象对于其他罪状的责难一样,有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为了实现流通,就必须有商人;如果给这些代理人戴上脚镣手铐,生意就没法做了;那时国家就会破坏社会信贷,使它的全部工业受到毁灭性的威胁。

商业确实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社会机体表示反抗,它就会把我们的枷锁上得更紧。只要一个行政措施妨碍商业施展阴谋诡计,商业就会紧缩信贷,

使流通瘫痪,而国家本来想消除一种痛疾,结果却染上了新症。这种效果在一览表中称为反应(第十一种特征)。

人们借口上述危险而奉行这样的原则:让商人去干吧,他们的充分自由是流通的保证。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原则,因为恰恰是这种充分自由制造了补种阻碍流通的诡计,如:证券投机、囤积居奇、破产等等。由此产生两种特征:

(7)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8)引起萧条的过剩。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特征对于流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商业并不满足于把商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者手中,它阴谋通过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人为地造成那些不太充裕的生活资料涨价。1807年,由于证券投机,糖的价格在五月份突然涨到五法郎,而同样的糖在七月份就跌到两法郎,尽管没有增加一点儿新的供应。人们用假消息挫败了证券投机,就使糖又回到它的实际价值,并且排除了阴谋诡计和人为的害怕停止供应的恐慌情绪。这种阴谋诡计和人为的恐慌情绪每天都在某种生活资料上捣鬼,在并不真正缺货的情况下使它成为稀有物品。1812年,当收获有了保障,囤积居奇者的希望落空时,人们突然看到大量的谷物和面粉从他们的仓库中运出来。可见,只要把这些粮食加以合理的分配,就根本不会缺粮,根本不会有闹饥荒的危险。不过商业具有的特性是:早在危险发生以前,在看到有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时就停止供应、中断流通、制造恐慌情绪和人为的饥荒。

在过剩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那时商业会人为地造成对过剩的恐惧,阻塞供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商业积极地活动,囤积和预购粮食;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消极地活动,不进货,把物价压低到使农民连成本都收不回的程度。这就是第八种特征:引起萧条的过剩。

商业回答说:当它预见到无利可图时,就不需要进货,它不会糊涂到去囤积根本不可能涨价的谷物,它可以把它的资本更有利地投到那些通过囤积很容易变得更加稀少从而使自己获利的商品上。

我认为,这就是在只是空谈相互保证的社会制度下推行的方便而惬意的原则。因此,商业,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摆脱为社会机体服务的义务。商业这样做就象一支军队,人们允许它在有危险的时候拒绝战斗,在履行职责时可以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商业政策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

义务都规定得如此片面。

1820年,各省的谷物价格下跌到三法郎以下,而在这些省份,谷物价格只有到四法郎才抵得上成本。如果法国商业象它在适应双方利益的互惠制度下应当做的那样,为三千万人预先备办六个月的粮食,谷价下跌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这批从流通中抽出来保存在仓库里的储备粮将维持其余谷物的价格,农民也不会因为他的产品贬值和滞销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可是我们的商业制度起着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加重了由于过剩而产生的压力和由于饥荒所造成的灾难,因而在这两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我选择第八种特征即引起萧条的过剩来表明现存的商业方法本身就具有消极的罪恶和积极的罪恶,它经常由于不介入,由于玩忽一项对它来说是很容易履行的职责而犯罪。因为如果在一次饥荒中需用五亿法郎来收购粮食,那么这笔钱马上就能筹到手。可是如果要把这笔钱用于预防措施:在过剩的时候增加库存,那就连五百塔勒也收集不起来。在社会机体和商业机体之间缔结的契约中,既没有互惠也没有保证。商业机体只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所以,它所使用的大量资本是从整个生产中偷盗来的。我在一览表中把这种偷盗列为第五个特征:“资本的转移”。

因此,商业的两个方面对社会机体都没有最起码的义务,社会机体被捆住手脚,听凭米诺托的摆布,并且保证这个怪物有处置资本和生活资料的专制权力。是啊,专制权力,人们针对专制主义的高谈阔论如此之多,却一直没有发现真正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商业专制主义,即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总督!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明机构保证商人犯了制造货币罪而完全不受处罚,其他阶级犯了这种罪就被判处死刑;商人不受处罚是借口他们似乎帮助了流通,其实他们是积极地利用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消极地利用引起萧条的过剩来拒绝对流通提供帮助。

除了后果具有这种欺骗性外,还要加上毫无原则。经济学家承认,他们的科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原则。准许象商人这一类如此腐败的代理人享有充分

---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下面还有两段话,恩格斯没有摘录。——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

这段话是恩格斯把傅立叶的原文删节后意译的。——编者注

的自由,这可真是登峰造极的无原则。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商业运动断断续续地在各种各样的痉挛状态,意外现象和越轨行为中进行,正象人们在当今的商业机构中天天可以看到的一样,这个商业机构只能造成既缺乏有规则的分阶段也没有均衡和保证的时断时续的流通。

这种混乱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人民敢于谴责政府在金融方面滥用职权,却毫无勇气谴责商业滥用职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sup>171</sup>双双破产就是明证。破产不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很早就察觉它们会来临;只要及时作出部分牺牲就可免受损失。但是尽管有这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公众还是不予宽恕。他们理所当然地宣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是贻币、是武力的掠夺。

为什么同一些公众能平心静气地容忍商人发行伪币,却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哪怕政府十分谨慎地通过缓慢的贬值这种使纸币持有者有可能脱身的办法来准备破产也不允许。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是没有逃脱破产的可能性的。破产象闪电一样向他们袭来。有些人今天入睡时拥有三十万法郎,明天早晨醒来时就会因破产而剩下不到十万法郎了。国民公会仿效这种手法实行了三分之一公债值<sup>172</sup>。人们不厌其烦地谴责国民公会,说它的这种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偷盗。可是他们却让每个商人有权进行更令人恼火的掠夺,在一次破产中窃取他所得的三分之二,而国民公会却侵吞自己从未得到的三分之二款项。如果把商业的罪行同其他罪行相比,甚至同重大的政治的丑行相比,前者是多么令人气愤!

以下的详细论述将证明,现代政治把商业交给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义务约束的商人,是把狼引入羊圈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偷盗。

现在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破产。

### 三

## 破产的等级

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麻木

---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后面有“例如国民公会的丑行”一语。——编者注

不仁的目击者。<sup>173</sup>在意大利或西班牙,人们极其冷漠地目睹刺客杀死他要谋刺的受害者而逃进教堂,在那里逍遥法外。在意大利可以看到父亲为了使孩子的音色完美而阉割和残害自己的孩子,“和平之神”的仆人却鼓励这种残忍行为,以便得到唱诗班的好歌手。这种罪恶行径如果发生在其他文明民族,就会引起他们的愤怒,——然而这些民族同样有其他令人愤慨的习俗,这些习俗一定会使意大利人情绪激愤。

在文明时代,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在习俗和见解上尚且如此不同,那么一个社会时代同另一个社会时代在习俗和见解上又该多么不同啊!在文明时代可以容忍的罪恶,在比较不完善的社会阶段会多么令人憎恶啊!几乎无法相信,自称秩序井然的国家竟能一度容忍象破产这样可恶的事情。

破产是前所未有的最巧妙的和最无耻的骗局。它保证每个商人有能力从公众身上窃取相当于他的财产或信用的一定数额,因此,一个富人能够说:我从1808年开业经商;我打算在1810年的某一天窃取不管是谁的数百万钱财。

让我们把暂时的偶然现象即法兰西新法典<sup>174</sup>及其惩罚破产的意图撇开不谈。既然人们对这种意图的结果意见不一,并且已经有办法回避新法典,我们想在这里首先让实践来作出判断,暂时把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我们论证的基础,并且考察由哲学体系和原则引起的混乱:让商人有充分的自由,却不要他们每一个人对慎重、正直和支付能力作出任何保证。

由此可见,除了其他舞弊行为外,破产是比拦路抢劫还要可恶得多的抢劫。可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安之若素,以致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也会承认这是诚实的破产。

我们来详细地描绘一下这种在古代很少有人知道的英雄行为。这种英雄行为自那时以来已经发扬光大。它使分析者有可能考察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将为我们的完善化能力的进步提供证据。

---

傅立叶指出这些民族是“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编者注  
最后这句话是恩格斯节译的。——编者注

破产的等级。第三十一种特征。  
商业的罪行。由三个等级、九个种和  
三十六个类构成的自由系列<sup>175</sup>

右翼或上升翼。——轻松的色调。

#### I 无罪的破产

- (1)幼稚的破产。
- (2)冒险的破产。
- (3)悄悄的破产。
- (4)死后的破产。

#### II 可尊敬的破产

- (5)糊涂人的破产。
- (6)狂想的破产。
- (7)无原则的破产。

#### III 诱惑性的破产

- (8)友爱的破产。
- (9)体面的破产。
- (10)风流的破产。
- (11)善意的破产。
- (12)有情意的破产。

系列的中心。——宏伟的色调

#### IV 战术家的破产

- (13)富裕的破产。
- (14)世界主义的破产。
- (15)充满希望的破产。
- (16)先验的破产。

(17)渐进的破产。

#### V 善于机动者的破产

(18)连续发射的破产。

(19)密集队形的破产。

(20)纵深队形的破产。

(21)散兵队形的破产。

#### VI 捣乱家的破产

(22)大规模的破产。

(23)大型的破产。

(24)阿梯拉式的破产。

左翼或下降翼。——卑鄙的色调

#### VII 狡猾的骗子手

(25)有补偿的破产。

(26)别具一格的破产。

(27)得寸进尺的破产。

(28)虔诚的破产。

#### VIII 笨伯的破产

(29)出于幻想的破产。

(30)衰朽者的破产。

(31)受压抑的破产。

(32)蠢猪似的破产。

#### IX 伪善的伙伴

(33)骗子手的破产。

(34)恶棍的破产。

(35)溜之大吉的破产。

(36)令人发笑的破产。

## 四

### 破产者的上升翼

在一个十分腐败、十分贪婪的世纪里,如果有人想以教育者的口吻来反对已被认可的罪恶即反对破产,就会遭到众人的嘲笑。聪明得多的做法是随声附和流行的论调,观察社会罪恶的有趣的方面。因此,我将证明:破产是骗局,是比它的帮凶和庇护者所认为的还要可笑得多的骗局,这些人认为破产这种商业上的掠夺行为无非是可笑的小事。

在恶行中如同在德行中一样,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强盗对于正义和荣誉也有他们的定义。因此破产者承认在他们之间卑鄙行为有其原则和有程度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打算把这一点作为我进行分类的依据。按照通常的规则,我把他们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轻松的优雅的色调,第二部分具有动人的崇高的性质;第三部分是不太显著的平凡的一类。右翼开始行进。

#### 无罪的破产

(1)幼稚的破产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初次进入商业生涯,不知深浅,没有准备好策略就轻举妄动,宣告破产。公证人很容易把这种事办妥。他把这种事说成是青年人的愚蠢行为,而且说:“青年人期待着你们宽容,债权人先生。丑事变成了公众的笑料,因为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总是夹杂着有趣的事件,例如受骗的高利贷者,被愚弄的吝啬人等等。”

这类破产者敢于冒险干出大量的卑鄙勾当,侵占商品,不光彩的借贷,盗窃亲属、朋友、邻人,这一切都被同伙用下述理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个同伙向怒气冲冲的债权人说:“您能怎么样,他是一个不懂行的孩子,对年轻人的事不必深究了,他会逐渐在行的。”

这些幼稚的破产者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嘲笑。在商业中人们喜欢嘲笑。人们批评骗子,但更乐于嘲笑受骗者。如果一个破产者有嘲笑者站在他这

---

“债权人先生”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被愚弄的阿巴公”(阿巴公是莫里哀的喜剧《吝啬人》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一边,他一定会看到他的大多数债权人立即投降,并很快达成协议。

(2)冒险的破产,这是一些凭运气来决定要么债务加倍要么债务勾销的初试身手者的破产,他们恣意妄为,疯狂地投机经营,挥霍巨款,装扮成大人物,以便迅速得到临时信贷并巧妙地通过某些暗中的牺牲保全这笔信贷。这些冒险家一干起来,就连连失策,最后往往是逃之夭夭。人们把事情谅解为草率从事,并且很容易调解,因为它同前一种破产一样提供笑料。

这些冒险家在法国屡见不鲜,在这里荣膺投机家之名。他们最有把握的赌博是这样来加速终局的到来,在他们栽跟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每一个为他们的第一笔生意提供信贷的人还以为:他在第一年不至于马上垮台呢。

(3)悄悄的破产,暗中破产,是指陷入困境的债务人建议达成“小小的协议”,或者打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或者把商品提价百分之二十五来抵偿。中间人向债权人指出,这样做对他们是很有利的,因为如果对某个债务人施加压力,迫使他破产,那么至少要损失百分之五十。

在商业中人们十分坚持这种比较算法。有这样一批骗子,他们在窃取了您百分之三十的钱财之后,还要向您证明,您占了许多便宜,因为他们不是骗走了百分之五十。另外一些骗子还声称不得不忍受严重的损失,因为他们对您身上只赚取了百分之四十,本来是应该赚取百分之六十的。这种看来可笑的计算方法在商业中到处得到承认。它使暗中破产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人们还证明,这种百分之二十五的小折扣同由于破产所要损失的百分之五十相比,显然是一笔纯利润。债权人被这种论证的力量所动摇,同意了这种“小小的协议”。原来应该得到四千法郎的人,现在得到三千法郎,而且这绝不能叫作破产。

(4)死后的破产是在主人公死后宣布的破产,死亡成了为死者辩解的口实,说死者希望重振他的事业,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体面地做到这一点。因此人们称赞他那高尚的品质,深切同情他那可怜的孤儿。债权人哪里还肯打扰一个泪眼汪汪的寡妇呢!另外,如果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那这样做就是一种残忍行为!在此期间,这个寡妇依靠几个知己的帮助,在查封前就弄走了大量财物。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死者身上,说他没有时间来料理他的事业,再说死者也不能死而复生,揭穿这区区谎言。如果亏空是百分之二十五,很可能就把它抬高到百分之五十,而要这么干是不费什么事的。此外,既然破产百分

之五十的人还算是诚实的,尤其是这涉及到非常值得尊敬的死者的罪责,而诋毁死者的名声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只宣告破产百分之二十五该是多么愚蠢啊!

### 可尊敬的破产

上述四类破产是虚构的无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无罪的破产。如果因为十分之九的破产者都是无赖,就侮辱所有的破产者,这是不公道的。我将举出三个真正可以原谅的类型。我们只应该谴责那些罪恶太多的人;因此我们先从这类同行中找出几个诚实的人,自从革命以来这伙人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以致在有些城市人们不再问谁破产了,而是问谁没有破产。

(5)糊涂人的破产是不幸者的破产。他一文钱也没有拿,把一切都交给债权人,老老实实地任凭债权人处置。其他破产者嘲笑他,说他是傻瓜,认为他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实际上,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同我们这个讲求完善化能力的世纪是不相称的。

(6)狂想的破产是绝望者的破产,他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有时竟开枪自杀或投水自尽。这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做一个老实人,尤其是在商业上做一个老实人,简直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我必须愉快地说,在商业界还会遇到这样的人物,但这是非常少有的,茫茫大海内罕见的游泳者。谁都能预卜他们的命运,因为谁都知道,十个搞商业的骗子九个会走运,而十个老实人就有九个会破产。

(7)无原则的破产是头脑简单的人的破产,他听任司法干预,听任它作出侮辱自己和把自己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裁决,不象许多机灵的人那样善于体面地有利地摆脱困境。——这三种诚实的骑士根本不能和那些高贵的同行相提并论,我只是粗略地提一下。我们还是来谈谈更能赢得行家赞赏的那一类人吧。

### 诱惑性的破产

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象受到其他许多邪恶者的诱惑那样受到破产者的诱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复兴”。——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若克里斯”(若克里斯在莫里哀的喜剧《斯加纳列尔》中是傻瓜的形象)。——译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编者注

惑呢？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那些充满魔力和赢得人心的家伙。

(8)友爱的破产,节约的破产是谄媚者的破产,他只希望他的债权人幸福,如果不得已而使他们破费,就会觉得难过,他迫使他们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以免吞没一切的司法从中干预。他使债权人明白,他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他珍视他们的利益。他深切感谢他们向他表示的好意,他一想到还得让他们负担诉讼费就心里不安。于是这些花言巧语和其他的阴谋诡计诱惑了一些人,也使另一些人由于害怕吞没一切的司法而作出让步。

(9)体面的破产是那些在上流社会中深孚众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能够保住家庭体面的人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是规矩人,所以他们有一大批保护者,如果他们掠夺的不超过百分之六十,那就很容易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利用家里的夫人和女儿当恳求者,再加上决心运用桑切斯的办法<sup>176</sup>:当她们去洽谈重要事务时,让她们披着薄如蝉翼的披肩,那就更容易达成协议。

(10)风流的破产是漂亮妇女的破产。对此抱怨是不体面的,对女性要有所照顾。一个漂亮的妇女作买卖,破产了,窃取了您一千塔勒;如果您使她烦恼不安,这只证明您不懂人情世故。她有权痛斥那些倔强的人。我曾听到这样一位太太谈起一个债权人,她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据说,他还有怨气,说实在的,我劝他去抱怨自己那五十个金路易吧,我该向他赊取加倍的钱才好呢!”他和这位太太过从相当亲密,她有权说他忘恩负义。

(11)善意的破产,这显然是使债权人占便宜的破产。这是怎样做到的呢?只要破产者窃取的不多,只窃取百分之四十,并且对余下的作出保证,十分可靠的保证。这被看成是幸运的事,以致公证人都向聚在一起的债权人祝贺,祝贺他们做了一桩极好的买卖,赢得了幸福之神的“真正的善意”。一万法郎只损失四千,收回六千,这是真正的利益。对商业还不习惯的人是不会珍惜这种善意的,他想全部索回他的一万法郎,并且认为,有人偷了他四千法郎。这是多么不体面的态度啊!一个人从您那儿只拿走了百分之四十的折扣,而且在其他方面象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您,却硬说他偷了您的财产!

(12)有情意的破产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向您说些动人心弦的话,对债权人谈其同情心和美德,以致债权人如果不马上让步,如果认为替这样的好人——这些人十分热爱被他们侵吞了钱财的债权人——承担义务

---

“作买卖,破产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

并不是幸福,那就成为野蛮人了。这一类人付出的是动听的理由和谄媚的赞词,他们抓住债权人的同情心,同他只谈论他的和他们的美德。在谈话结束时,债权人就会感到关系大大改善了,并且发现自己有许多美德,这些美德足以抵偿被侵吞的钱数。他少了几千法郎,却多了一些美德,这对好心肠的人来说来是一笔纯利润。

有一天,这些演员之一对我说:“我对于这些先生们非常抱歉,他们都是十分善良、十分可敬的人。”好心的小伙子为了表示他的敬意,在第一次交易中就利用期票掠夺他们,这是他给他们的礼物和表示欢迎的意思。他提走这笔钱是为了同他们结识,一个月后他破产了。对这些先生来说,用一万法郎换取他的尊敬,是何等的快事啊!

我信守诺言,我答应描述一群诱惑者。在所有这一类真正友爱的破产者中间,看到的不外是友谊、善意、好风度和温情。如果说这一类破产是为了猎取人心,那么其他类别的破产则引起人们的惊叹,展现出振奋的精神和超凡的品质,表现自己的英雄。

## 五 中心。——宏伟的色调

现在我们来研究商业精神的伟大发展,研究那些能证明本世纪在走向复兴和完善化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大规模活动。破产在这里施展它的才能,并且按照广泛的计划进行活动,对于这些计划的叙述将证明下述原则的英明:让商人去干吧,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靠欺骗和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崇高计划吧。

### 战术家的破产

(13)富裕的破产,这是具有商业天才的高级投机家的破产。银行家多朗特拥有两百万法郎<sup>177</sup>,他希望尽快地不择手段地弄到四百万至五百万法郎的财产。他倚仗自己那笔尽人皆知的资本,得到了价值八百万法郎的期票、商品等信贷。因此,他可以用一千万法郎的资金进行投机。他从事高级的投机活

---

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动,即买卖商品和国家有价证券。到年底时,他也许没有使自己的二百万翻一番,而是损失了二百万,您以为他破产了——绝对没有,他依然得到四百万,就好象他买卖做得不错似的,因为他手里有他早先得到的八百万,而且他借助“诚实的”破产来处理,可以将借贷的半数在几年内付清。这样一来,他在失去了自己的二百万以后,又重新拥有了从公众那儿掠夺来的四百万。多妙啊,这样的商业自由,现在您该明白为什么天天都听说某商人自从破产以来过得很好!

破产者的另一种可能是:多朗特在侵吞了四百万后,不是作为幸运的骗子,而是作为不幸的商人,完全保持了自己的荣誉和社会的尊敬。我们来说明一下这种情况。

多朗特在考虑自己的破产时,就已经控制了舆论。他在城里的宴会和乡间的游乐为自己争取到热情的拥护者。纨绔子弟支持他,漂亮的女子为他的不幸——在今天不幸是破产的同义语——而惋惜。人们称赞他的高贵的、应该有更好的命运的品质。按照他的辩护人的说法,他几乎比被他掠夺了财产的那些人还要倒霉。全部过失都推到政治事件,糟糕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如善于制止愤怒的债权人进攻的公证人所常用的空洞词句上。在第一次风波过后,多朗特就派出几个调停人,及时送几笔钱,很快就钳制住舆论,以致谁敢反对多朗特,就说谁无人性。此外,那些被他窃取了大笔钱财的人都远隔一、二百英里,在汉堡或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已经平静下来,这些人已经无关大局,他们在远方的怨言影响不了巴黎的舆论。再说,多朗特也只是让他们损失了一半,而习惯认为,只窃取半数的人,与其说他有罪,倒不如说他不幸,因此,多朗特在公众眼里一开始就是个一清二白的人。一个月以后,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更为轰动、损失达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破产事件上。这位只窃取了半数的多朗特又显赫起来了;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人们早已忘怀。多朗特的家又慢慢开始接待大家,他的厨师又重新施展他那左右人的食欲的故伎,某些对不幸无动于衷并且对上流社会也不照顾的怒气冲冲的债权人的叫喊,由于无人重视也销声匿迹了。

这样,多朗特和他的同伙窃取公众数百万钱财的活动不到半年就结束了,许多家庭破落了,其财产却到了他们手里,诚实的商人遭到了破产,破产把这些商人化为同样的骗子。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使诚实的人陷入骗子一样可耻地位的社会犯罪行为。诚实的商人尝够了二十个无赖破产的苦

头,最后也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支付。

由此可见,所有破产的骗子中有十分之九把自己说成是遭遇不幸的诚实的人,并且同声喊道:与其责备我们,还不如可怜我们。如果听信他们的话,他们全都成了小小的圣人了,正如那些被罚做苦工的人硬说他们根本没有做过坏事一样。

为此,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提出采用惩罚性的法律和法庭。真行啊!用法庭对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顺便讲一下,俗语说:绞死小偷,放走大盗。这在商业中可不适用,因为甚至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的庇护下逃避司法追究。

(14)世界主义的破产。这是商业天才和哲学天才的联盟。一个破产者在掠夺了一个国家后,又在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制造破产,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这是一种可靠的投机。他初到一个国家时是个陌生人,如有必要就象犹太人做的那样,改名换姓,他凭借上次破产时积聚的资金马上就得到了信贷。现代政治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就是把工业产品全盘交给那些和自己的祖国没有固定联系、没有大地产可依恋的人管理,他们作为世界主义者可以倚仗准备在巴黎、伦敦、汉堡、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和加迪斯接连制造的六次破产进行投机。我将在连续发射的破产那一节中描述这种破产,这种破产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它搞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15)充满希望的破产。这种破产是在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过去,年轻人进入商界没有这样早,他们不到三十岁根本当不了经理。现在,他们十八岁就经营管理一个商店,二十岁就可以制造第一次破产,这次破产使他们有理由对继续制造破产抱很大希望。在他们中间有人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制造了三次破产,并且不只一次侵吞了他们同伙的数以百计的塔勒。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会说:“他太年轻,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年轻人的世纪里。”

(16)先验的破产需要有广泛的计划,宏伟的精神,三十到四十个伙计的办事处,大量的船只,在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然后是突然的垮台和可怕的崩溃,其反响遍及世界各地,出现一片倒闭的混乱现象,商人依靠这种混乱得到的油水可以维持十年之久。这是商业天才大放异彩的做法。这种做法至少

---

“放走大盗”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复兴”。——编者注

要使四分之三的人受到损失,因为在这样巨大的场面中一切都必须是大规模的。

(17)渐进的破产是投机者的破产。他机智地布置自己的活动,可以经历七次到八次连续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走的道路必定不同于只筹划一两次破产的人所走的道路。

原则是:

(1)第一次破产时只宜适度地掠夺。掠夺百分之五十就够了。不应该一开始就马上激怒人家,如果初次行动就因大肆掠夺而失去了信用,要搞第二次破产就很困难了。

(2)第二次破产时只宜掠夺很少很少,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便证明破产者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的做法已经比较灵活和比较谨慎,等他从第二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商人,一个值得尊敬的“商业朋友”。

(3)在第三次破产时则要大量掠夺,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并且为自己表白,这不是寻常的亏空,而是由意外事件引起的亏空。借口一些紧急的情况来为亏空开脱,强调在第二次破产时自己行为良好,以便证明过失全在于意外事件。

(4)在第四次破产时只掠夺百分之五十,以便证明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如果不是环境所迫,他知道怎么安分守己。

(5)在第五次破产时可以掠夺到百分之六十了,因为公众对此已经习惯了;在舆论对此已经习惯的情况下,多百分之十或少百分之十是无损于这类投机的,因为人们知道,制造了四次破产的人,也会制造第五次和第六次破产。我就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在第四次破产后,因为戴着象征虔诚和善行的天主教神父的帽子而被人们取笑;他并不感到困惑,而是准备第五次破产。

至于第六次和第七次破产那就任意而为了。人们制造这类破产只是在接近老年或者踌躇满志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原谅第六次破产,人老了,改也难了,没有人再感到惊奇了。不过人们对政府却有些议论,说它不想保护商业,说它是使诚实的商人遭受小小的损失的原因。

如果我在这里举出破产时所用的几个原则,人们是不会惊奇的。

这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就象它所由产生的经济学一样,它还没有固定的原则,甚至还没有一套系统的术语。因此在渐进的破产中只给前面四个等级命名。

完成第一次破产者只称“骑士” ,  
第二次破产时称“王子” ,  
第三次破产时封为“国王” ,  
第四次破产时则称“皇帝”。

第五、第六和第七级在商业界还没有命名。一个真正的“商业朋友”应该上升到最高的第八音阶。为了做一个“和谐”的破产者 ,他必须完成七次平均损失为百分之五十的“诚实的破产” ,然后制造一次加强的 ,十足的破产作为一系列破产的中心 ,同时允许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 ,以补偿其他几次破产由于只作适度掠夺而遭到的损失。以前各次破产掠夺百分之五十 ,的确是诚实的定率 ,是人们无权非难的一笔微薄收入 ,因为这是宣布破产时人们能够接受的定额 ,也就是如同买点心和乘马车的价格一样的固定价格。

### 善于机动者的破产

我们在这一节里要研究一些大规模的机动行动 ,它们要求不同的破产者为了商业的利益和崇高真理的胜利而协同动作。这些集体的机动给我们提供了四个善于机动行动者的类型。

(18)连续发射的破产。这种破产通常是由反击引起的 ,由一个波及一个的、一连串破产引起的。我将描述一个中间类型的、资产阶级型的破产 ,因为这种类型是广大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我们将找前面未作解释的那个世界主义行家来充当连续发射的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犹太人伊斯加里约带着十万法郎 资本来到法国<sup>178</sup> ,这些钱是他在第一次破产时赚到的。他在一个城市里开业经商 ,在那里有六家受人尊敬和有信用的商号是他的对手。为了夺走他们的主顾和声誉 ,伊斯加里约马上开始按成本出售他的商品 ,这是招徕顾客的可靠手段。不久 ,他的竞争者就以非常藐视的态度责备他 ,他们对他的埋怨付之一笑 ,并且一不做二不休 ,继续按成本抛售他所有的商品。

于是人们欢呼 :竞争万岁 !犹太人万岁 !哲学和博爱万岁 !自从伊斯加里约到来后一切商品都便宜了 ,公众对他的对手说 :“正是你们 ,先生们 ,才是真

---

“骑士”以及下面的“王子”、“国王”和“皇帝”等词的引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利弗尔”，——编者注



正的犹太人,你们赚钱总想多多益善,唯独伊斯加里约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有适当的利润就满足了,因为他不象你们那样生活挥霍无度。”老商号都说伊斯加里约是一个伪装的骗子手,他早晚要跳出来的,但是白费力气。公众反而指责他们忌妒他和诽谤他,并且越来越倒向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强盗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用按成本出售商品的办法,他损失的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就算每年一万法郎吧,但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在这些海港城市获得了大主顾的称号并且在如期付款的条件下得到了巨额信贷。这个诡计一直搞了两年,在此期间伊斯加里约虽然大量出售商品,但分文未赚。他的机动行动无人知道,因为犹太人只使用犹太人当伙计,这些人是一切国家的暗藏的敌人,他们从来不会泄露“自家人”所策划的欺骗行为。

当一切都成熟到可以展开活动的时候,伊斯加里约就利用他的全部信贷在各海港城市发出大批定货单,赊购了总数达五十万至六十万法郎的商品。他把他的商品运往国外,同时廉价出售他的全部库存货物。当所有商品都被变成现金时,善良的伊斯加里约就带着他的公事包销声匿迹,回到了德国,在那里,赊购的商品已经先期运到,他就赶快卖掉商品,结果,他离开法国时比他刚到法国时富裕了三倍,他拥有四十万法郎,他又前往伦敦或利沃诺,以便策划第三次破产。

现在面纱一下子掉了下来,在遭到伊斯加里约突然打击的那个城市里,人们清醒过来了。他们认识到,让犹太人,让那些无所牵挂的流浪汉经营商业是多么危险啊!不过伊斯加里约的这次破产只是讽刺剧的第一幕。让我们来研究连续发射的破产。

这个以色列人有六个竞争者。我们称他们为A、B、C、D、E、F。

A 长期以来陷入困境,他已经没有财产,只靠他的好名声支撑着。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到来夺走了他所有的顾客,这种竞争他只能对付一年。A 对于这种保护流浪汉的新哲学体系还不甚了解,认为自己不得不在伊斯加里约的策略面前低头并且宣告破产。

B 经受这种打击的时间比较长;他早就看出犹太人的骗局,他期待着这场风暴赶快过去,以便把骗子手伊斯加里约夺走的顾客再夺回来。但是在这个期间他受到国外的一个破产的牵连,这就加速了他的垮台。他以为能够支撑两年,然而在十五个月后却不得不宣告破产。

C 同一家外国商号合伙,这家商号让第二个伊斯加里约(这种人每个城市都有)弄得破产了,C 由于他的伙伴破产而受到连累,C 为了支持同希伯来的恶棍竞争而作出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牺牲以后,也认为自己不得不宣告破产。

D 貌似老实,实际并不老实。他虽然二十个月来身受犹太人竞争之苦,但还有资金来维持。不过,由于犹太人加到他头上的损失使他很恼火,他只好跟着干起那不乏先例的罪恶勾当。他看到,他的同行中有三个人已经开步走了,他将作为一个同盟的第四个人在真不幸或假不幸的借口下加入他们的行列。因此,对二十个月来反对伊斯加里约的斗争感到厌倦的 D,除了宣告破产就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E 贷给他的四个相继破产的伙伴巨额款项。他相信他们都有支付能力,而在伊斯加里约的机动行动毁掉他们的事业之前,他们确实也是有支付能力的。E 被这四家商号的破产搞得精光,另外,他自己再也没有主顾了,所有的公众都跑到按成本价格抛售商品的伊斯加里约那里去了。E 看到他的资金完了,他的信用毁了,人们向他逼债,而且他已经无力清偿债务,终于宣告破产。

F 拥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上述五个人的破产使人们推断他即将成为后继者,于是他在各海港城市便失去了信用。此外,还有几个达成了协议的破产者现在削价出售商品,以便能够在最初的支付期限还款。为了加速销售,他们削价十分之一,仍能赚回十分之四,因为他们是按损失百分之五十达成协议的。这可把 F 完全压垮了,他走投无路,只有象他的竞争者一样,宣告破产。

由此可见,一个流浪汉或一个犹太人的开业足以使一个大城市的整个商业界解体,使最诚实的人去犯罪,因为任何破产或多或少总是一种犯罪行为,虽然往往还用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我所描述的上述六种破产的借口来加以辩解,而所有这些借口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人都贪婪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

有时连续发射的破产还会以跳射的形式在远方发生作用,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席卷十二家商号。这些商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一家主要的商号破产就会引起所有同它有利害关系的附属商号垮台,就象一列铅制的小兵,在为首的一个受到打击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这是在一些大的机动行动中值得注意

的重大配合,这种在远方发作的跳射无论如何应当在比较精确的分类中构成一个特别的种类。

(19)密集队形的破产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来进行辩解以及使大多数商人敢于作决定命运的跳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互支持,以多取胜,就象一个团那样,组成密集队形,以便用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样,当有利时机一到,破产者就集合起队伍,每天在交易所宣布几起破产,他们这样迅速地接连宣告破产,以致舆论被弄得晕头转向,而鉴于事态严重也就容易达成协议。在伦敦可以定期看到这类破产,巴黎在1800年也对密集队形的破产作了一次十分漂亮的尝试,它使很多“商业朋友”十分幸运地获得了成功。

(20)纵深队形的破产是指彼此相关的一系列破产,但是每隔三个月才爆发一次。纵深队形的破产同天天相继宣告破产的密集队形的破产不同,它必须在内部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轮番宣告破产,即在前一个破产者刚刚达成协议时宣告破产。例如A破产后三个月达成了协议,这时B必须立即宣告破产,因为调停人现在认为公众思想上有准备并且会说:“这件事同A的事是一样的,前者必定引出后者,因此应该作出同样的安排”。同样,C在三个月后宣告破产,然后是D、E、F、G;如果他们的行动配合得好并且保持一定的间隔,那么他们全都可以达成同样的协议。如果指挥得当,纵深队形是一种十分可靠的机动行动,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唯独破产的天才能够确定什么时机采取这种机动行动。

(21)散兵队形的破产是由一些小骗子开始的,他们发起一场大运动,而且就在自己的小商业中到处制造小型破产。由此可见,经营将是困难的,运动将白热化,过了不久人们就确实听到重炮轰鸣,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注意的数以百万计的破产爆发了。最后,运动以后卫散兵即小城市零售商、食品杂货商的破产而告结束。

### 捣乱家的破产

什么!这样恼人的事情还不够,那你们能给我们举出比上述一连串的情形更糟糕的事吗?

我举出的只是最诚实的人。现在我们来研究下降的即可恶的——翼,在

---

“可恶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里我们列举的破产者都按远大的计划行动,但是忽视道德方法,从而损害了高贵的同业公会的声带。

(22)大规模的破产波及社会上的一切阶级直到十足的小人物、仆人以及把自己有限的积蓄存放在伪善者那里的其他人。破产迅速地掠夺数以百计的地主、小资产阶级和善良的人们。整个城市都卷进去了。一般说来,这类破产对社会上不从事商业的阶层打击特别大,而且严重伤害同业公会,因为这类破产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一些对行为规矩的商界人士不以为然的看法。

(23)大型的破产是某个不知名的暴发户制造的破产,他既无资金又无信用,却成功地投身于大事业,并且在那里制造了象身居高位和实力雄厚的银行家们所制造的那样巨大的破产。人们普遍要问:这么一个无赖怎么能够建立那样多的联系并且搞出这样有油水的破产。

这种人同前一种人不同,他是从另一条道路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即唤起舆论来反对商人的阴谋诡计,反对给这些买卖人以充分自由的荒谬法律。

(24)阿梯拉式的破产把破产者的荣誉捧上了天,使一个国家被蹂躏得象遭到汪达尔人的整个军队洗劫一样。在这种类型的破产中可以举出1810年奥尔良城一个名叫T的外行人所搞的一次高明的破产。这个家伙以一千六百万的亏空宣告破产,这笔钱如此巧妙地分摊给不幸的奥尔良城,以致这个城市一下子就垮了。市民的各阶层都遭到洗劫。难民一直逃到里昂,传出消息说:奥尔良完了,我们全都被毁了,T把一切都推入了深渊。他根据详细的报告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诱骗掠夺各阶级,从富有的资本家直到贫穷的仆人,后者一辈子就攒了几个塔勒,存在商人那里,却让这个商人在漂亮原则的掩护下拐骗了。这个原则就是:让商人去干吧,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是什么样的强盗行为啊!仅仅在商业的英雄业绩这一个方面就有多少罪行啊!说仅仅这一个方面,是因为应当看到破产只不过是这种欺骗性商业的第三十一种特征。科学借口商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而要求给商业以充分的自由。的确,商人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然而他们对国家和工业的利益所在却太不清楚了。因此,科学是用它那给商人以绝对自由的理论来愚弄我们。

## 六

### 下降翼。——肮脏的色调

现在我们由叙述伟大的英雄业绩转入叙述比较一般的成绩。破产并不象中心的三个种类一样全都是伟大的。不过我们在左翼也还可以举出一批值得注意的色调温和的破产者,这些富有资产阶级的优点和缺点的人将使我们在看了这么多光彩夺目的丰功伟绩之后一饱眼福。我们还将看到一些能使读者兴奋的种类,特别是最后一类即败坏破产者团体声誉的伪善的伙伴。让我们从比较严肃的色调开始。

#### 狡猾的骗子手

(25)有补偿的破产。实行这种破产,是为了使自己在一次不幸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例如,一个投机者今天由于诉讼失败,花掉了十万法郎,于是他第二天宣告破产,而这却给他带来了二十万法郎。这样,他非但没有损失掉诉讼费,反而赚了钱。商业的这种使自己在不利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的能力,是它的绝妙的特性之一。他懂得利用任何陆上和海上的灾难来为自己谋利益的艺术。一个船主如果遇到船只失事,他第二天就可以利用一次成功的破产使他的境况再次好转。这样的破产会无可非议地达到目的,因为公证人会说:这不是他的过错,事情迫使他这样干的,与其指责他,不如可怜他。

一个同样被夺去了存款的地主对此反驳说:如果冰雹、洪水毁了我的庄稼,而我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就得不到补偿。——真是妙论!难道地主不知道,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是一个依赖他人的阶级即依赖于非生产者、依赖于被称为商人的阶级吗?这些商人用自己的魔爪攫取了所有的工业品,靠大众的花费来赚钱,就象一支雇佣军,在没有敌人可掠夺时,便搜刮自己的朋友和善良的人们。商人就是这样,他是真正的工业哥萨克,他的座右铭是:我不是为了荣誉去工作,我必须多少捞一点。每个商人都想捞一把,如果有人以为借助诉讼或其他办法可以从他身上捞一把,那么他自有对策,这就是利用有补

偿的破产从别人身上捞回来。

(26)别具一格的破产。这是聪明人的破产,他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拿出一部分钱应付风暴和制服难对付的人。如果他想在破产中赚二十万法郎,他就窃取三十万法郎,拿出三分之一来派用场,即送礼等等,他懂得如何安抚大喊大叫的人并使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儿送一笔钱,那儿送一笔钱,自己的事情也就畅行无阻。结果破产给他招来了许多朋友,这些人都尝过一点甜头,都说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规矩人。

(27)得寸进尺的破产。这种破产表演的是剧情发展越来越有趣的多幕滑稽戏。起初把事情说成是小小的困难,即资金周转不灵,因此要求打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以免垮台。债权人有点坐立不安了,就悄悄地进行交涉,因为有人提醒他们事情也许还会恶化,必须支持某某人。但是过了三个月这个人又不行了。他再一次到债权人那里去,弄得债权人又为他的破产担心;他承认事情比预想的更坏,必须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有几个债权人发火了,事情纠缠不清了,于是便宣告破产,而条件却如此之好,不是损失百分之五十,而是损失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并且余款可以过几年才还清。而所以能这样容易地达成协议,是因为债权人受人巧妙地摆布,逐渐习惯了最初是百分之三十,后来是百分之五十,最后是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他们已疲于争斗,只好签字了事,在这件可恶的事情上彻底认输,虽然最初言明只损失百分之三十。这种方法并不是最坏的,可以推荐给那些恪守原则的投机家。

(28)虔诚的破产。这是从事各种宗教慈善事业、在举行宗教游行时手持华盖饰带<sup>179</sup>的圣徒的破产。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信贷和存款人,并能秘密地组织大规模的破产。我见过这一类破产,损失达百分之九十。这种破产的优点在于破产者能得到相当多的人原谅:咳,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要说他在商业上不走运,那是因为他不关心尘世的财富。——这种虔诚被用来促成妥协,虔诚的使徒通过妥协保住了一大笔尘世的财富,再加上对另一个世界的财富的希望。

### 笨伯的破产

在每一种职业中都可以发现一些无知的人,他们不按规章办事,用最好的材料做出最差的活。破产者当中也有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只会把黄金变成铜,在别人能进行出色交易的地方,他们却非常愚蠢地陷入破产。这里略述四

种破产,因为这一类真正诚实的破产没什么意思。我举这一类例子只是为了保持分析的完整性。

(29)出于幻想的破产。这是上当受骗者的破产,这些人受花言巧语的引诱去从事商业,他们不懂商业的狡猾奸诈,当然象扑灯蛾一样,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1789年以来,可以看到许多根本不必卷进这场混战的大财主,怎样在混战中白白地丢掉了大笔遗产,以丧失财产和荣誉的破产而告终。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在破产中失去荣誉,而懂得商业的伟大原则的骗子手则善于利用自己的破产来获得财产和荣誉。但是处于商业这个马蜂窝里的大人先生们还想按照诚实的方法办事,他们遭到阴谋家的包围和戏弄,必然以出于幻想的破产而告终。许多小财主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受商业狂的引诱,抛弃了自己的田园,卖掉了自己的小片地产,到城里去开一家小店铺,走向他们的不可避免的破产。

(30)衰朽者的破产。这是至死还想手持武器的不可救药者的破产。有不少本应退休的人,他们因年龄所累,办事糊涂,不了解最新成果,在衰朽之年失去了慢慢积累起来的财产,并且顽固地坚持干下去直到不断重复的失败造成无法避免的破产。一个人年已八旬,独身,拥有二百万法郎,这对一个老光棍来说真是绰绰有余,但是他在应该退休思过之年还要顽固地继续从事商业这一行。应该怎样称呼这个人呢?如果这样一个人破产了并且在八十高龄时失去了自己的富足的财产,那可真是一个商业狂。这样的人就是衰朽的破产者,他是这一节的典型人物,对每一类破产我都举了一个典型人物,以免人们说我夸大其词。此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能发现许多这样的高龄狂人,因为他们坚持继续搞商业,应当落得不光彩的下场。现在,一切都是精挑细选的,在商业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需要的是对新战术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如果破产在年轻人看来不过是逢场作戏,那么对在二十年以前就应该考虑退休的富裕的老年人说来,就无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了。

(31)受压抑的破产。这是激烈的竞争者的破产,他们故意走向破产,他们破产是为了从对手身上争夺一点利润。可以看到他们中间许多人常常作亏本生意,希望对手先于他们而破产,于是自己便成为战场上的获胜者。特别是在运输公司和象波克城<sup>180</sup>那样的纺织品集市上充满着这种混战,其结果是“受

---

在傅立叶的原稿中有这些典型人物的名字。

压者”被迫宣告破产。

(32)蠢猪似的破产。这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不按原则进行活动,使妻子儿女和自己一起破产,而且还落入司法机关的魔爪,遭到“商业朋友”的歧视,因为他们只尊重遵守原则的富裕的破产者。对于使妻子儿女同自己一起破产的人,商业上有一句行话:“这是一头十足的蠢猪。”假如他制造了一次有油水的破产,那么人们将称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头脑聪明的人。

### 伪善的伙伴

我把那些使可尊敬的破产者团体遭到公众歧视的人称为伪善的伙伴。这种人有的令人愤慨,有的则令人发笑。我没有把那些盗窃数百万钱财的先验的破产者归入这一类,因为他们始终受人尊敬,不会损害团体的名声。在文明时代,大盗从来不受人歧视,而小偷倒是真正要处以绞刑的。既然他们激起舆论反对欺诈行为和小的破产,他们就不配加入团体,而只配得到伪善的伙伴的称号。

(33)骗手手的破产。这是一些小无赖制造的破产,他们在破产时尽干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小偷小摸行为,以致邻人说应该对他们判处绞刑。如果掠夺十万塔勒,人们倒不会这样说了,可是偷窃一百塔勒就会使人想到绞刑,不过这种想法对骗子手来说并不危险,因为破产者团体是不允许触动自己的同伙的。否则,司法机关会很快认为自己有权从追究小偷到追究大盗,而这对于那些按照伟大原则办事并且在一次“诚实”的破产以后在上流社会已占有地位的人将会是很麻烦的事。

(34)恶棍的破产。这是除了使用卑鄙的无赖手腕还使用巧妙诡计者的破产,例如他先自盗,然后再运用动之以情的策略。

小商人斯嘉本<sup>181</sup>制造了一次只有四万法郎的可怜的破产;他占有了三万法郎作为这一行动的利润,然后把余下的一万法郎交给债权人。如果有人问他为何亏空三万法郎,他就会说:他不善于象大商人那样记账,说他遭到了“不幸”。你们也许以为斯嘉本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一个只盗窃三万法郎的小偷。——债权人难道不知道,如果司法机关插手,他会把其余的一万法郎当作一顿早餐吃掉,所以即使丢掉这一万法郎,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想

---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这里和下面均用“利弗尔”。——编者注



把斯嘉本判处绞刑,那也许得再拿出一万法郎,而且还不知道行不行。因此收下这不多的一万法郎,总比损失一万法郎,甚至还得花费这么多的钱要好些。斯嘉本通过他的公证人提出这种理由,这样一来,破产者就以司法机关来威胁他的债权人。而债权人又何必对斯嘉本发火呢?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学习他的崇高榜样,另一些人的经历已经超过了。正象狼不会互相残杀一样,斯嘉本不久就找到了一批人签字同意他的建议,另外一些人由于害怕司法机关干涉也签了字,还有一些人是死硬派,他们说:哪怕牺牲一切也要把坏蛋送去吃苦工。于是斯嘉本就指使自己的妻子儿女以他们所擅长的哭诉去博得这些人的怜悯。这样斯嘉本和他的公证人在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签字,那些拒绝签字、现在已用不着的人却受到了揶揄。人们拿这些人的愤怒来取乐,斯嘉本则报之以讨好话和深鞠躬,而且在第一次破产顺利结束后已经考虑新的破产了。

(35)溜之大吉的破产。这种破产多为大城市的一些小租赁人所采用,他们在付款期临近时就在夜幕的掩护下携带着自己的可怜的家当悄悄地溜走了。这种形式的破产在里昂的丝织工中极为常见。此外还必须把那些追逐时髦的男女计算在内,他们在餐厅、服装店和鞋店订购最好的物品,价钱在所不计,因为一旦债权人开始变得使他们烦恼,他们就存心以花言巧语相报,并且溜走了事。

这种形式的破产是很可笑的,使团体遭受不良影响。人们在指责这种人欺骗了二十个小店主时,也容易习惯于指责那种由于宣告破产而使二十个家庭遭殃的规矩人。为了不损害诚实破产的“商业朋友”应有的尊严,必须压制这种批评的自由。

(36)令人发笑的破产。这是小零售商的破产,这种人也象那些地位高势力大的银行家一样以最合适的形式来制造破产,而付给自己的债权人的数额不超过百分之五。里昂就有一个因扮演滑稽角色非常出色而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制造了这样的破产,他按照通例愿给自己的债权人提供百分之三的数额。有些债权人很愤怒,要法警去找他,但是他却象在舞台上演《律师巴特兰》一剧时所做的那样愚弄司法机关,而所有的公众都站在他一边。他的破产是一出非常滑稽的、有许多精彩场面的喜剧。债权人很想破口大骂,而公众却象嘲笑《律师巴特兰》中的吉约姆那样嘲笑他们。

我已经约略阐述了所有这些破产的定义。但是我列举的也是挂一漏万,

只能把它看作一个轮廓,每个人都可以对遗漏的特征加以补充。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注意的。前几天巴黎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名叫Y的人所搞的一次十分出色的破产,他只用一万法郎就办起了一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机构。它好象是叫商业振兴所或者别的什么响亮的名称,他利用这块招牌从几个呆头呆脑的人那儿弄来了百万法郎,这笔钱他照例以一次成功的破产相报。总之,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所收集的破产种类的数目增加一倍。

## 七 结 论

如果考虑到破产仅仅是商业的三十六种特征之一,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毫不留情地对待社会一切阶级的罪行甚至还公布国王和教皇的罪行的世纪里,这个如此可怕的罪恶之源即商业机构还未得到剖析。

人们在阅读这本有关商人的劣迹恶行录时,立刻就会问道:这个自称为崇高真理之友的世纪怎么能借口商业是必不可少的而真心诚意地热衷于骗人的商业呢?因此人们似乎只得忍受我们就商业的罪行之一即破产所列举的那些欺骗盗窃行为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有关破产的话说完吧。

俗语说:司法机关只绞死小偷,这在商业上已被证明是谎话。破产,哪怕是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自己的庇护下逃脱司法追究。这在最后一类(伪善的伙伴)即小破产者中可以看到。

要想举出几个狡猾的破产者受惩罚的例子,那是枉费心机;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人都成功,如果第一百个人失败,那这个人一定是个不善于玩弄阴谋的傻瓜;因为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保险,以致老一套的谨慎的措施早就被人遗忘了。从前破产者都逃往特里扬,列日或卡鲁日,但是自1789年复兴时期以来这种习惯已经被抛弃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制造破产。人们

---

恩格斯把傅立叶著作中这一段话的开头和末尾加以改写。——编者注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关于破产的结论》。——编者注  
括号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可以不动声色地策划,而当破产发生时,他们就到乡间亲友家里去呆上一个月,在这期间公证人会是一切事情安排好。几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露面,公众对这些事情早就习以为常,视同儿戏,称之为“分娩”,并且若无其事地说:“某某刚生完孩子,又抛头露面了。”

我曾经指出,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硬把诚实的人拉上无赖汉道路的社会犯罪行为。如果除破产之外再加上证券交易和许多其他罪恶行径,那就会发现我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文明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象他们从事商业以来那样干过这么多政治上的蠢事。只梦想平衡和保证的哲学家从来没想到要为社会机体争取对象政府——颇有预见地——要求其国库代理人所提出的那种保证。君主采用缴纳保证金和坚决惩罚胆敢挥霍或盗用公款者的办法来保证收税官的忠诚可靠。因此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收税官把税款攫为己有,却上书政府说什么“由于时世艰难,境况险恶,种种不幸事件,等等,一句话,我已破产,没有偿债能力,或者随便怎样说都行。您的金库应有一千万,我付给您一半,五百万,五年内付清。望您对可怜的税收员遭遇的不幸给予同情;请继续信用我,为您掌管金库,否则我现在要付给您的那一半也无力支付。如果您保留我的职务和收入,我将尽力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也就是说,当金库再度充实时,我将以第二次破产来报答您”。

所有破产者上书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这样。收税官之所以不效法这个榜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任何哲学学说都不能使他们免受惩罚,而破产者却能在下列原则的庇护下逃避惩罚:给商人以充分自由,不要求他们保证不搞阴谋诡计。

## [结 束 语]

傅立叶写的就是这些。《法郎吉》第2册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现象等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sup>182</sup>一书中发表。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前面摘录的片断已经完全可以达到我的目

的,所以我的摘录也就到此为止。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而且首先致力于钓取“社会主义”的“原则”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一学店员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在这方面谈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注意。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同样是“抽象的”,他靠自己的谢利叶方法构思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傅立叶的毕竟是天才的奇想不能用来为干瘪的德国理论的枯燥无味的所谓发展进行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有了对未来的构思,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整理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指点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例如,可以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代(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作一番比较。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终于不顾有四个世界帝国<sup>183</sup>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构思,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构思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被颠倒了,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构思就没有任何内容了。

现在该是德国人真正停止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几份贫乏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最初从第三手材料中得到的事实向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

---

双关语:德文“grundlos”,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洞的”意思。——编者注

的,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就是这样。在德国,哪一个论述社会问题的人不对傅立叶评论几句从而最彻底地暴露了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啊!其中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sup>184</sup>,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搞起世界史的构思,这种构思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所依据的全部事实都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确定了他在“绝对观念发展中的地位”——每一次确定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德国的理论每一次实质上都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不太可靠的文件为根据。也正因为这样,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内容贫乏透顶。稍微谈谈近来大家称为“人性”的东西,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不如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是来自第三手或第四手材料——稍微谈谈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谈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sup>185</sup>,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却茫然无知,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有人却想用这些无聊的东西使德国走向革命、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那些半共产主义的和十足共产主义的讲师们花功夫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倒是和任何一本德文书一样容易买到),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构思并达到其他目的!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少新思想——即使在目前对德国来说也还是新的思想,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当前的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处境,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主要问题,但是对当今社会的批判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

他的后期著作以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他提供了这样的证明,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现存社会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一个人仅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不涉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留情地揭穿上流社会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无聊;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们为使日趋完善的完善化能力臻于完善和为追求最高真理而作的努力。傅立叶嘲笑他们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遭到他的精辟批判的和平的商业,把他们的并非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被他们当作婚姻关系的组成部分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存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人们有时谈论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空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家庭不和抱怨几句——连个杂种都没生出来!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这个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都属于这个运动的实践,——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象他们的邻国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象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很拙劣。这种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

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弄到,有一部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1845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兴趣的材料。这些著作的宝贵内容即使在今天对德国也还是新鲜的,为了使它们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象法国人那样从事编选工作,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一切材料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国外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流畅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sup>186</sup>。可以预期,这一工作将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拉芒什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孰是孰非来了。他们只有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过些什么,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下半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6年德国公民手册》年鉴

1846年曼海姆版

署名:弗·恩格斯

## 弗·恩格斯

### 费尔巴哈<sup>187</sup>

(a)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归结为(1)自然哲学——消极地崇拜自然,如醉如痴地膜拜自然的壮丽和万能,——(2)人类学,即( )生理学,——这里所讲的,没有任何新东西,全是唯物主义者已经说过的有关肉体 and 灵魂的统一,只是讲得不那么死板,而是多少有点夸张,( )心理学,归结为把爱捧上了天的颂歌,类似自然崇拜,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新东西,(3)道德,要求——符合“人”的概念;生效的无力 188。参看 § 54,第 81 页:“人对于胃的道德的和理性的态度,在于不把胃当作一种兽性的东西看待,而是当作人性的东西看待。”—— § 61:“人……作为道德存在物”以及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道德问题大发议论。

(b)人们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在社会内部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所有这一切,费尔巴哈是这样来表述的:

“单个的人本身并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性中,包含在人和人的统一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之间的差别的现实性



上。——人本身就是人(在一般意义上),和人结合起来的人,自我和你的统一,则是上帝”(即超出一般意义的人)(§ 61, 62, 第 83 页)。

哲学竟到了这种地步:它提出人们之间必须交往这样一个平凡的事实——一个不予以承认就决不会产生曾经存在过的第二代人的事实,在性的区别中就已经存在的事实——作为自己的全部经历终结时的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还采用了“自我和你的统一”这样一种神秘的形式。如果费尔巴哈指的主要不是性行为、种的延续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这句话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既然费尔巴哈的共同性成了实际的,它也就局限于性行为以及对哲学思想和问题的谅解、“真正的辩证法”(§ 64)、对话、“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产生”(第 67 页)。这个“产生出来的”人除了又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产生人”以外,以后再做什么,——关于这一点,只字未提。费尔巴哈知道的也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

“是这样一个真理:任何存在物本身都不是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存在物,真理和完善只是两个本质相同的存在物的结合和统一”(第 83, 84 页)。

(c)《未来哲学》一开头就表明我们同他之间的区别:

§ 1:“新时代的任务,是把上帝现实化和人化,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和溶解为人类学。”参见:“否定神学,是新时代的本质。”(《未来哲学》第 23 页)

(d)费尔巴哈在 § 2 对天主教和新教加以区别——天主教:“神学”,“关心什么是上帝自身”,具有“思辨的和直观的倾向”,而

正是因为人=头+心,为了创造人而需要两个人,——在他们的交往中一个作为头,另一个作为心——男人和女人。否则就不可想象,为什么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圣西门主义的个体。

新教只是基督学,把上帝留给上帝自身,把思辨和直观留给哲学,——这种区别不外是由与不发达的科学相适应的需要所产生的分工。费尔巴哈只从神学内部的这个需要来解释新教,而独立的哲学历史后来也自愿附和这种解释。

(e)“存在并不是一种可以同事物分离开来的普遍概念。存在和存在的东西是一回事……存在是本质的肯定。我的本质是怎样的,我的存在也就是怎样的。鱼在水中,但是你不能把鱼的本质同这种存在分离开来。语言已经把存在和本质等同起来。只有在人的生活中,而且只有在反常的、不幸的情况下,存在才会同本质分离,这里会出现这种情形,即并不是在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有了他的本质,但是正因为这种分离,当人的肉体实际存在的时候,他的灵魂并不就真正存在。只有你的心存在的时候,你才存在。但是,一切事物——违反自然的情况除外——都乐意在事物所存在的地方,都乐意是事物所存在的样子。”(第 47 页)

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除了违反自然的情况,除了个别反常的情况,你乐意在七岁时成为矿井的守门人,每天单独一人在昏暗之中度过十四个小时,既然你的存在是这样,你的本质也就是这样。走锭精纺机的拈接工也是一样。你的“本质”就在于,你应当服从某一个劳动部门。参见《信仰的本质》189 第 11 页,“得不到满足的饥饿”……

(f) § 48, 第 73 页:“只有时间是把对立的或矛盾的规定以不矛盾的方式联结在同一个存在物中的中介。至少对于生物来说,是这样的。例如在人中间就表现出这样的矛盾:时而是这种规定、这种企图支配着我,充实着我,时而又完全是完全另一种甚至直接对立的规定、企图支配着我,充实着我。”

费尔巴哈把这叫作(1)矛盾,(2)矛盾的联结,并且认为(3)这

---

是由时间来实现的。当然,是“充实了的”时间,但终究是时间,而不是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论点= 只有在时间中才可能有变化。

弗·恩格斯约写于 1845 年秋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5 卷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 对布·鲍威尔反批评的回答<sup>190</sup>

布鲁塞尔,11月20日。布鲁诺·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第138页及以下各页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1845》作了几句结结巴巴的回答。首先布·鲍威尔宣称恩格斯和马克思对他不理解,他极其天真地重弹他那些自命不凡的早已变成毫无价值的空话的老调,并且抱怨这两位作者不知道他的那些警句,如“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批判家过去工作而且现在还工作”,以及诸如此类的响亮的誓言和感人的表露。鲍威尔的回答本身就直接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的新的令人信服的样板。就是说,“勤劳的”批判家认为,不以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而以《威斯特伐里亚汽船》(5月号第208页及以下各页)所载的对这本书的平庸而混乱的评论<sup>191</sup>作为他感叹和引证的对象才更符合他的目的——这是他抱着批判的谨慎态度不让他的读者知道的一种把戏。

鲍威尔在抄写《汽船》杂志时,只是用默默地然而意味深长的耸肩来中断抄写的“艰巨的工作”。一当批判的批判没有什么好说了,它就耸耸肩。它求救于两片肩胛骨,尽管它憎恨感性,它只知道

把感性想象成一种“棍子”(见《维干德季刊》第 130 页),一种对它的神学的贫乏进行惩罚的工具。

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勤劳的”批判家把评论员编造的东西抄下来,强加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然后对非批判的群众——他用一种眼色置他们于死地,又用另一种眼色向他们卖弄风情——得意扬扬地喊道:“请看,我的反对者就是这个样!”

现在我们逐字逐句比较一下记录下来的这些材料。

这位评论员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写道:

“为了杀害犹太人,他布·鲍威尔把他们变成神学家,把政治解放的问题变成人类解放的问题;为了消灭黑格尔,他把黑格尔变成辛利克斯先生;为了摆脱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费尔巴哈,他就叫嚷‘群众,群众,群众!’并且一再叫嚷‘群众,群众,群众!’为了赞美精神,他把群众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精神就是批判,就是绝对观念在沙洛顿堡的布鲁诺身上的真实体现。”(《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同上,第 212 页)

“勤劳的批判家”写道:

“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人最后”变得“幼稚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小丑”,并且“想使我们相信”,“他十分严肃地断言,为了杀害犹太人,布鲁诺·鲍威尔,云云”——后面是一整段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逐字逐句抄来的、在《神圣家族》中根本找不到的话。(《维干德季刊》第 142 页)

请拿这些和下面的论述相比较:在《神圣家族》中关于批判的批判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和对政治解放的态度,主要是第 163—185 页;关于它对法国革命的态度,第 185—195 页;关于它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第 22—74 页,第 211 页及以下各页,第 243—244 页和关于盖罗尔斯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一整章,第 258—333 页。<sup>192</sup>关于批判的批判对黑格尔的态度,见

“思辨结构”的秘密和以下的叙述,第 79 页和以下各页以及第 121 和 122、126—128、136—137、208—209、215—227 和 304—308 页,关于批判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态度,见 138—141 页,最后,关于对法国革命、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斗争的结果和趋向,见第 214—215 页。

从这些引证中可以看出,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给这些论述作了一个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概括,这个概括是“纯粹的”和“勤劳的”批判家用“建设和破坏”的巧妙手法强加于原著的。

不仅如此!

这位评论员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写道:

“他即布·鲍威尔打算用庸俗的自我礼赞来证明,凡是在他过去受群众的偏见束缚的地方,这种束缚都只不过是批判所必需的外表。对他的庸俗的自我礼赞,马克思答应写以下的烦琐的论文《为什么正是必须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圣母马利亚怀了孕》来予以回答,云云。”(《汽船》第 213 页)

“勤劳的批判家”写道:

“他对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的人‘要向我们证明’,并且最后他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欺骗:凡是在鲍威尔过去受群众的偏见束缚的地方,鲍威尔都想把这种束缚说成只不过是批判所必需的外表,而不是相反地说成批判的必然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愿写以下的烦琐的论文《为什么圣母马利亚怀了孕……》来回答这种‘庸俗的自我礼赞’。”(《维干德季刊》第 142—143 页)

在《神圣家族》第 150—163 页<sup>193</sup>读者可以找到专门论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申辩的一节,遗憾的是在那里烦琐的论文连影子都没有,因此根本谈不上象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所臆想的那样,用它去回答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申辩,而甘愿效劳的布鲁诺·

鲍威尔却把这些当作引文从《神圣家族》抄下来,甚至把有些话加上了引号。实际上这一论文在另外一节中而且是在联系到别的问题时提到的。(见《神圣家族》第 164 和 165 页<sup>194</sup>)至于在那里是什么意思,读者可以自己去研究,并且会再次对“勤劳的批判家”的“纯粹的”狡猾感到惊讶。

最后“勤劳的批判家”大叫道:

“这些东西 指布鲁诺·鲍威尔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摘抄下来并强加于《神圣家族》的作者的那些引证 当然驳得布鲁诺·鲍威尔哑口无言,并使批判恢复了理智。相反,马克思却为我们演了一出戏。他自己最后扮演了滑稽的喜剧演员。”(《维干德季刊》第 143 页)

要理解这个“相反”,就必须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在威斯特伐里亚评论员那里是当抄写员的,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向他的批判的和勤劳的抄写员口述如下:

“世界历史性的戏剧 指鲍威尔的批判反对群众的斗争 不需要许多技巧 就变成了最滑稽的喜剧。”(《威斯特伐里亚汽船》第 213 页)

在这里不幸的抄写员跳起来了:去抄写他自己的判决,那他可力不胜任。“相反!”——他打断了正在口述的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相反…… 马克思……是最滑稽的喜剧演员!”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

写于 1845 年 11 月 20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6 年《社会明镜》杂志  
第 2 卷第 7 期,未署名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sup>195</sup>

## 第一章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片断

[1]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哲学家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其余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 [2]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消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消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

---

这里马克思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地质学的、水文学的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编者注  
本页手稿下端残缺,少了一行字。——编者注



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就再次消除这些无稽之谈。当然，在象德国这样一个只有很可怜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废物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但这是具有地方性意义的斗争。

[29] 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它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施蒂纳说，这种矛盾是他们自己的矛盾，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而且他们可

---

这里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和现实的运动。词句对德国的意义。”——编者注  
这里马克思加了边注：“语言是现实性的语言。”——编者注

以或者安于这种环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满，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这种环境。同样，这同圣布鲁诺的责难也没有区别，布鲁诺说，这些不幸情况的发生是由于那些遭到不幸的人陷入“实体”这堆粪便之中，他们没有达到“绝对自我意识”，也没有认清这些恶劣关系产生于自己精神的精神。

### 第三章 《圣麦克斯》的片断

…… [资产者……表示……所有者的统治……如今所有者多半成了资产阶级 ]

[……]“7月8日奥顿主教 和巴莱尔所作的声明已经摧毁了关于每个人、单个人在立法中似乎有作用的假象 ;声明指出选民完全无能为力 ;代表的多数成了局势的主宰。”

“奥顿主教和巴莱尔所作的声明”是前者在7月4日(不是8日)提出的提案,巴莱尔同提案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在7月8日同其他许多人一起支持过它。<sup>196</sup>提案在7月9日通过,因此十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圣麦克斯说是7月8日。这个提案决没有“摧毁关于每个人、单个人似乎有作用的假象”等等,而是摧毁了交给代表们的委托书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它没有摧毁“每个人、单个人”的影响和“作用”,而是摧毁了177个封建的司法区和431个按等级划分的单位<sup>197</sup>的影响和“作用”;由于这个提案的通过,议会便

---

这个片断前面的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17页(前两段)。——编者注

这一行引文残缺不全。——编者注

指达来朗,他从1788年到1791年在奥顿当主教。——编者注

失去了陈旧的封建的三级会议的性质。此外,当时所说的并不是人民代议制的正确理论,而是十分现实的迫切的问题。布洛利的军队长期威胁着巴黎,并且日益向它逼近,首都极为动荡不安;网球厅的集会和御临法院的会议<sup>198</sup>过后还不到两个星期;宫廷同一批贵族和僧侣阴谋反对国民议会;最后,在大多数省,由于那里还存在封建的关税,并且由于整个农业带有封建性质,到处发生饥荒而且感到资金严重不足。达来朗亲自宣布,在这个时刻必须有特别有效的议会,而贵族和其他反动派的委托书则使宫廷有可能以选民为借口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议会通过达来朗的提案后,就宣告自己是独立的,并夺取了它所需要的权力,当然,在政治领域中,这种事情只有在政治形式的范围内,并且只有在运用卢梭等人的现有理论时才能发生。(参看巴莱尔·德维约扎克出版的《黎明报》1789年第15和17号)国民议会迫不得已采取了这一步骤,因为拥护它的广大群众推它向前。可见,由于这一点,它决不会成为“脱离了脐带的、不讲情面的完全利己的议会”,相反,它第一个成为法国人民大众的真正机构,否则它就会被人民大众打倒,就象后来“脱离了脐带的”、“完全利己的”代表被打倒一样。但是圣麦克斯通过自己的历史事务经纪人,说这只是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他竟把攻占巴士底狱前六天召开的制宪议会看作教父们对教条中的某个地方进行争论的宗教会议!不过,关于“每个人,单个人的作用”的问题只有在民主选出的代议机构中才会发生,而且在革命时期根据相同的经验原因,这个问题也象目前关于委托书的问题一样,只在国民公会中提出。制宪议会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统治阶级的

代议机构和统治等级的代议机构之间的区别,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统治受每个单个人的地位的制约,因而也受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代议机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十分特殊的产物,很难把它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开,就象很难把单独的个人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开一样。

如同圣麦克斯认为 177 个司法区和 431 个按等级划分的单位是“单个人”一样,他随后也把专制君主制及其 *car tel est notre plaisir* 看作与君主立宪制,与“怪影的统治”相对立的“单个人”的统治(第 141 页),而把贵族、行会的成员再一次看作与国家的公民相对立的“单个人”(第 137 页)。

“革命的目的不是反对现存的东西,而是反对这个现存的东西,反对这个特定的状况。”(第 145 页)<sup>199</sup>

可见,不是反对现存的土地所有制、税收制、到处阻碍交易的关税制和……

写于 1845 年 11 月和 1846 年初之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载于 1962 年《社会历史  
国际评论》杂志第 7 卷第 1 部分

---

“因为这是我们的意愿”——法国国王敕令的结尾的格式。——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sup>200</sup>

第一个问题：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

答：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第三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呢？

答：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

第四个问题：他们的财产公有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

答：第一、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和殖民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

第二、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

第五个问题：这是一些什么原理呢？

答：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等等。

第六个问题：你们打算用什么方法为实现你们的财产公有作好准备呢？

答：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

第七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sup>201</sup>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因而这一阶级的祸福和存亡取决于生意的好坏，一句话，取决于竞争的波动。

第八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者几乎一向都是穷人。但无产者却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一样。

第九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这些机器发明于上个世纪中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机、纺纱机和织布机。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机器，挤掉了当时的工人，因为用机器生产商品比原来的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商品又便宜又快。这样一来，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主要是他们的工具、织布机等，变

得一钱不值,以致资本家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从此就实行了工厂制度。当资本家看出这样做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时,他们就力图把工厂制度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劳动部门。他们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多了;结果,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每个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了。这种简化的劳动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这时人们才发现:几乎在一切劳动部门都可以使用机器。一个劳动部门只要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它就象纺纱业和织布业一样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

我们逐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劳动者早先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先进国家里几乎独占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机器、工厂、工场等)。这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无财产者阶级,他们仅仅为了换得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第一个阶级,即资产者。由于在这种劳动交易中买卖双方不

是平等的,而是资产者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无财产者就不得不接受资产者提出的苛刻条件。这个依赖于资产者的阶级叫作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而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是某一个主人的奴隶,如果没有人需要他的劳动,就没有人购买它,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奴隶被看作物,不算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奴隶通过成为无产者,并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就能解放自己。无产者却只有废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十一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使用一块土地,也就是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为此,他要交出或多或少的一部分收入。无产者用属于他人的生产工具做工,这个他人把由竞争所决定的一份产品让给无产者,作为对他的劳动的报酬。在农奴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的,因而也是由他自己



决定的。在无产者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竞争决定的,因而首先是由资产者决定的。农奴的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把他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从而进入竞争领域并暂时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即特权阶级的队伍。无产者则通过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而获得解放。

第十二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答: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三个问题: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共产主义是关于奴隶、农奴或手工业者不可能实现而只有无产者才可能实现的那种解放的学说，因此它必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以往任何时候是不可能的。

第十四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第六个问题吧。如果他们打算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答：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的发展都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暴力引起革命。

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么，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象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五个问题：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

第十六个问题：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第十七个问题：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第十八个问题：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第十九个问题：你们在过渡时期怎样实施这种教育呢？

答：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在国家设立的机构中受教育和学习。

第二十个问题：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绝不会。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此外，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历史的进程中，家庭关系随着所有制关系和发展时期而经历过变动，因此，私有制的废除也将对家庭关系产生极大影响。

第二十一个问题：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

答：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排斥现有的各种宗教吗？

答：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	主席
海 德	卡尔·席尔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

恩格斯手书的原文到此为止。——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卡尔·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 卡·马克思

### 保护关税派<sup>202</sup>

(1)他们从来没有保护过小工业，只是保护机器工业。例子，德国的李斯特学派。居利希。

(2)如果相信保护关税派说的话，他们最多是维持现状。保护关税制度任何时候也不能使受到保护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出售。因此它是反动的。

(3)保护关税派的最后的安慰就是：国家不是受外国资本家剥削，而是受本国资本家剥削。

(4)而且他们说，在设想自由贸易以前，必须先实行国内的改革。保护关税制度本身没有被授予改革各阶级状况的权力。但是，他们说，在改革国内关系以前去改革国际关系，是愚蠢的。但是，什么是保护制度呢？证明：实行这一制度的阶级手中有统治权力。因此，只要保护制度有效，资本家就不会作任何让步。此外，先生们，重大的社会改革和历史改革绝不是通过让步、通过统治阶级的乐善好施来实行，而只能是由于客观必要性。必须强迫实行这些改革。因此，认为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甚至通过对进口商品课税的形式，就能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一些改革，那是无知。我将不再谈论保护关税派。

卡·马克思约写于1847年9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6卷

卡·马克思

需 求<sup>203</sup>

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几乎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需求。需求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它的普遍推广——首先取决于世界各国相互间对产品的了解。如果说，在发展过程中，需求创造贸易，那么，最初的贸易又是由需求创造的。需求是贸易的物质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用来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商品的总和。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需求的增长，直接和首先以各国现有的产品相互进行交换为保证。需求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等等，而带有广泛扩展的性质。这样，各国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这一或那一国家居民的消费。

例如，使东方产品更出名的十字军征讨，大大增加了西欧对东方产品的需求。（见 J 第 III 本笔记第 106 页）凡是这些产品汇集以便进行交换的地方，都变成了世界市场的城市；在发现美洲大陆以前，世界市场主要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这就是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各城市、布鲁治和伦敦。直到现在，这些地方还有某种类似集市的东西，就是说，它们还是商队汇集的地方。到十九世纪，集市就只具有次要意义了。（见 J 第 III 本笔记第 166 页）这些市场很少依靠本身的工业，一般说来，

它们的繁荣正是由于它们是普遍的贸易场所才形成的，——这种情况可以由下面这一点得到证明：1498年以后，从里斯本逐渐成为印度纺织品和香料的主要市场时起，意大利各城市的贸易就衰落了。安特卫普在十六世纪也保持着从前布鲁治等城市所保持的那种局限性。

贸易方面的领导地位。第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民族是荷兰人（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在这个时期以前，只有大的商业城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形成从商业城市占优势到商业民族占优势的过渡。但是，商船航运和渔业仍然是荷兰领导地位的决定性的组成部分。

东北欧和它作为农业地区对西欧的关系。随着这里手工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对东北欧的原料的需求增加了，同时，它的原料的生产也增长了。

荷兰，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中的第一个工商业民族，也是本国的农业不能满足需要、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国内农业生产发展的第一个民族。因此，它是第一个开始大量购买谷物的国家。阿姆斯特丹成了西欧的主要粮仓。（见J第III本笔记第167页）

卡·马克思写于1847年12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1968年 [在巴黎出版的]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第二卷》

卡·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sup>204</sup>

- (1) // 批判// 。批判的空想的体系。(共产主义的。)
- (2)
- (1) 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宗教的，小资产阶级的。
- (2)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 (3) 德国的哲学的社会主义。
- (4) 批判的空想的文献。欧文、卡贝、魏特林、傅立叶、圣西门、巴贝夫的体系。
- (5) 直接的党的文献。
- (6) 共产主义的文献。<sup>205</sup>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12 月底—  
1848 年 1 月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32 年国际版第 1 部分第 6 卷



卡·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草稿的一页<sup>206</sup>

……无产者，有利于十小时工作日法，不赞同他们对这一措施产生的结果所抱的幻想。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

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新的私有制理论。他们只是肯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生产资料//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不再// 适应// 社会生产力的// 最发达的社会……// 发展，因此不再// 适应工业本身的发展// ，……

既然你们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 对抗//。你们的观念本身// 仅仅是适应于// 是// 现存//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 你们的// 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 仅仅是// 历史的、暂时的、仅仅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 成熟性// 程度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

---

这两行是马克思夫人的手笔。——编者注

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过去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和已经灭亡了的阶级所共有的！

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而你们终究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在资产阶级//工业发展//过程中//，单方面的……

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新的所有制理论。他们只是肯定事实。你们否认最明显的事实，你们不得不否认。你们是求助于过去的空想派。

卡·马克思写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 1908 年  
3 月 17 日《诚实的雅科布》杂志第 565  
(6) 期

弗·恩格斯

改革派的利尔宴会。——  
赖德律-罗兰先生的演说<sup>207</sup>

对“为工人们，——为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他们至今未被承认的神圣利益”的祝酒致答词。

“公民们！是的，为工人们干杯！为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他们至今未被承认的神圣利益干杯。为人的不容转让的权利干杯，这些权利是由两次光荣的革命从原则上宣布的，但是由于种种欺诈而未付诸实行，并且被人逐渐地从人民手中夺走了，现在只成了一个光荣而又痛苦的回忆！给人民以政治权利，据说这是发疯。在人民处于无能、无知和道德沦丧的状态下，怎么能把这些权利交给他们？给人民以政治自由，这是纵容盲目的和危险的力量；这是革命——流血——无政府状态——混乱！先生们，你们了解人民；你们生活在这个既如此富裕又如此贫穷的工业城市，你们怎能相信这样的描绘！啊！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某些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事物的重要方面在他们看来是琐碎庸俗的，他们追求的是滑稽可笑、想入非非、离奇古怪的效果，——人民就是这样的。他们把某一地方的情况当作我们城市的正常生活，在这里逃脱法网的罪犯找到庇护所，在这里有社会渣滓的生活方式，他们说，‘人民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唯利是图的作家的话，当然人民也就成了这个样子，这些作家为了吓唬富人，大叫野蛮人入侵了！野蛮人！他们把这个称号加在人民头上，这是极其不能令人容忍的侮辱。嘿！如果野蛮人这个词始终是指那些单纯质朴、强壮有力、和蔼可亲、充满青春活

---

显然是指 1789—1794 年和 1830 年的革命。——编者注

力的人,那么也只有这些野蛮人才能挽救我们那个在衰败腐化中迅速走向崩溃的老朽不堪的官方世界。不,一千个不!人民不是这样。不是到罪恶和荒淫的舞台上去寻找他们。要认识他们,我们必须转入工业城市,在那里工厂主正同挤垮他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搏斗,正处于资本的无情压力和雇佣工人的反抗这两股吞噬着他的力量中间,他不得不降低工资,以免破产和名誉扫地。啊!不要以为通情达理的人民总是控诉主人造成了这一残酷的不可避免的状态。他们哪能不知道我们的工业由于产品滞销而凋敝,世界的大多数市场拒我们于门外,在我们的旗帜遭到践踏的地方我们的贸易一落千丈呢?可是,在这命运多舛、动荡不定、工资恐慌的状况下,工人面临的是什么呢?父亲的劳动已经不能养家活口,女儿为了饭碗而出卖肉体,孩子不得不去照看庞大的机器,耗尽他的尚未发育好的体力;在漂亮的织物——我们的工业产品旁边,看到的是佝偻的男孩,憔悴的女孩和被过早的劳动压弯了腰的精疲力尽的男人。而体力虚弱的人中间,凡是幸免于衰竭、疾病,长到正常高度的人,将为他们的国家走上战场,准备在它的旗帜下高尚地死去!这就是城市的人民,他们和蔼、善良、忍耐着每天的折磨,此外,他们从自身吸取如此吝啬地分给他们的知识之光,他们读书,有时写诗抒发自己的苦难和希望,他们出版报刊阐明有关人类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准备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被某些只凭自己的皮相之见来审度事物的作家称为野蛮人的城市人民!……在这简略而不充分的描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每天的斗争;但是,如果发生一场从未见过的天灾,来势凶猛、席卷一切的特大洪水,熊熊大火,或者突然发生严重的霍乱,那么是谁会首当其冲去解救人类呢?是谁会忘却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忘却卧病在床、明天就可能死去的孩子呢?是谁会无代价地贡献生命,尽了义务就悄然离去,甚至不留下自己的名字呢?——人民!因此,就智慧和忠诚,理智和良心来说,人民应当行使他们所要求的权利。而谁能比公民们更了解这一点呢?他们依靠人民的超凡的努力战胜了贵族和僧侣的双重暴政。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上曾对这些僧侣,对这些贵族说:‘你们,是我们的老兄,你们,是我们的老弟,因为我们都是兄弟,我们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僧侣和贵族企图封住这位勇敢的第三等级代表的口,噤使其爪牙叱骂他,说平民属于被征服的劣等种族……人民不仅应当代表他们自己,而且说句公道话,也只能由他们自己来有效地代表人民。那么,现在是谁在立法议会里最了解他们的利益、他

们的要求并且敢于为他们辩护呢？…… 先生们，许多人都会赞同我们的改革原则，因为改革的必要性现在已很清楚。但是他们仍然惧怕民主主义的进展；而在人类前进的进程中，任何重大的运动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好预兆！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吧。一个高踞于一切人之上的人，他的预言已经深入人心。拿破仑说过，‘不出五十年，欧洲不是哥萨克人的，就是共和党人的’……在这个爱国的城市，有权这样说，欧洲不会是哥萨克人的。如果说有人在这方面可能发生怀疑，那么肯定不是出自那些人，他们对民族独立和 1792 年革命的热爱使每个公民都成了英雄！至于说欧洲是共和党人的，——那么，先生们，我在这里要停一下，——九月法令<sup>208</sup>是有效的，为了变得强大有力，我们在武装起来捍卫正义事业时一定要懂得怎样保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所以我只须挑选少数几个为国争光的人的名字作为我的思想的表达者就可以了。例如，那个为正统主义高唱赞歌，试图恢复往日陈迹而卓著声名的人，沙多勃利昂，由于为人诚实，也不能不正视目前世界正走向民主…… 贝朗热，他的爱国主义的赞歌将万古流传，只要还没有为滑铁卢的惨败雪耻，我们这些和他同时代的人就应当用他的赞歌作为祈祷文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贝朗热相信人民将当家作主。又如焕发着诗人和雄辩家才华的拉马丁，已经越过了正统主义，——穿越平原的沼泽地，为的是更靠拢我们。尽管他是吉伦特派的热情仰慕者，但是他秉性高尚率直，使他作出有利于激进派的结论。不过，还是有某种东西把他同纯粹的民主主义分隔开来了；至于我自己，我看见的只是他每天朝着我们迅速迈动的巨大步伐。著作界的情况就是这样，先生们，这些例证的一致表明支持我们的党，应当足以增强党的希望。再看一下科学界的情况。请看那位出类拔萃的、两个大陆都想同我们争夺的人——阿拉戈吧，要不是有紧急任务，他已经来到这里，来到你们中间了。他会向你们讲民权问题，比我讲的要好得多；因为在另一个集会上他是第一个起来为他们的事业辩护的人，在那里要这样做需要不小的勇气。可见，阿拉戈不是完全赞成民主吗？再看看艺术界，是谁用他那有力的凿刀给最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人雕刻大理石雕像？是谁把伟大的革命人物铸成不朽的铜像，供后代景仰？大卫·丹热，他不是也支持人民的事业吗？好，既然这样多的杰出人物都说赞成民主或者为实现民主而斗争，那么除了认为正义和上帝都同我们一起战斗并为我们而战斗以外，又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这些是有识之士的教导。而人民的教导不是也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吗？请

看波兰——英雄的波兰——她的心脏的最后一跳仍然是为自由而搏动——它再也没有军队了；每天都有新的烈士为她的事业献身。再看意大利；她也在渴望统一。她从曾经是她的光荣的废墟中崛起，以便赢得新的荣誉。但愿她不要轻信自己的觉醒；她要记住马赞尼洛。再看瑞士；我感到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应当很好地斟酌自己所说的话。先生们，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我们通过回忆、通过思考能够立刻同那些和我们情同手足的人团结在一起，但愿胜利属于他们，犹如正义和理智一直属于他们一样！瑞士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先生们；激进派正在那里同两种人即我们时代的瘟神——贵族和无用的僧侣——作斗争。尊重我们的信条，但是要同那些在宗教的幌子下为专横暴虐效劳的人作战。目光短浅的人呵，他们看不出天才和人民这两者的联合正意味着平等的弥赛亚即将降临！所以，我愿为之献出全部忠诚和力量的人民呵，希望吧、相信吧。在这旧的信念已经破灭、新的启示尚未倾注到你身上的时期，请你每夜在简陋的住处虔诚地反复吟诵这不朽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是的，一切都要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交往自由；因为人不和他人交往就不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而为了更好地压制人，腐败的制度就力图孤立人。他们知道，一捆柴是折不断的。同样，一切都要平等，民法面前平等，政治上平等，教育上平等，以便除了在道德上或者情操上谁也超不过谁！博爱是产生高尚的和为人称颂的风尚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团结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到那时劳动再也不是权利，它将是义务。但愿除了劳动所得的和给予劳动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收入了。的确，这是拯救的办法。呵，伟大的不朽的象征，你快来临了！人民，让我们把你的恭顺的讲解员获得的掌声回敬给你，掌声同时也给你带来安慰和希望！”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2 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7 年 12 月 18 日《北极星报》  
第 530 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  
来稿

---

在赖德律-洛兰的演说中是：“伟大的风尚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信任、联合、团结的源泉。”——编者注

弗·恩格斯

## 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sup>209</sup>

科多尔省民主派的这次聚会无可争辩地是改革派举行的一系列宴会中最盛大的一次。出席宴会的有一千三百人。几乎所有邻近的城市都派代表团前来参加，甚至还有由纽沙特尔、日内瓦和琉森等地的公民组成的瑞士代表团。从主讲人的姓名——路易·勃朗先生、弗洛孔先生、赖德律-洛兰先生、埃蒂耶纳·阿拉戈先生——就可以很清楚地判明聚会的性质，他们都属于以《改革报》为代表的极端民主派。不消说在这次宴会上没有为路易·菲力浦干杯。

从邻近一座城市格雷前来的西尼亚尔先生，为“利尔的民主派”祝酒，说他们在该市最近举行的宴会上坚决拒绝同假自由派妥协，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和智慧保全了民主主义的声誉。

接着埃蒂耶纳·阿拉戈先生——巴黎著作界的知名人士，他的喜剧《贵族》不久前在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就——发表了题为《文学、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的祝词；他在自己卓越的演说中指出，文学和科学在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一定会获得迅速的发展。

在为“法国未来的进步”干杯时，主席请受到与会者极其热

---

见本卷第 387—390 页。——编者注

在路易·勃朗的演说中是：“法国的未来”。——编者注

烈欢迎的路易·勃朗先生发言。他发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说，就法国过去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有关未来的结论、革命给予法国民主运动特有的不可磨灭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醒人耳目的意见。他的演说理所当然地一再被掌声打断。这不愧为法国当今第一流历史著作家的演说。不过，我们想对其中某一点提出一些意见，希望人们也能以善意对待我们抱着善意写下的这些意见。

勃朗先生说道：

“我们必须在民主的范围内团结一致。希望大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思想，我们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法国，而且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法国的未来就是全人类的未来。其实，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优越的地位，我们一方面始终是属于本民族的，一方面却又必然是世界主义者，而且我们身上世界主义的成分要比民族的成分强。任何人如果自称为民主主义者，而同时又想做一个英国人，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历史，因为英国所起的作用一向就是为了利己主义而反对友爱。同样，法国人如果不想同时做一个世界主义者，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作用，因为法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种思想占上风，除非这种思想有利于全世界。先生们！在十字军征讨，欧洲进军夺取圣墓的时候，是法国卫护了这一进军。以后，当天主教神甫打算强迫我们套上教皇最高权力的枷锁的时候，是教皇权限制派的主教们捍卫了信仰自由。是谁在旧君主制的末日支持了年轻的共和政体的美国？<sup>10</sup>是法国，就是这个法国！如果我所说的话对君主政体的法国来说都是正确的，那么对共和政体的法国来说又怎么能不对呢？法兰西共和国虽然已在本国的疆土上和刑场上流尽了鲜血，但为了巴达维亚弟兄们，仍然不惜流血牺牲，历史上哪里能找到哪怕有一点类似这种惊人的、充满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的例子啊！<sup>11</sup>无论在失败的时候或是胜利的时候，法国甚至以自己的天才的光芒照耀着自己的敌人！让欧洲开拔十六个集团军来进攻我们吧，我们将以自由来回答欧洲。”

我们完全不想抹煞法国革命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的意义，也不想抹掉全世界对共和国伟大活动家的深厚谢意，但是我们认为，上

---

在路易·勃朗的演说中是：“历史”。——编者注



述引文以世界主义<sup>212</sup>的观点来比较法国和英国的地位，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根本否认强加在革命前的法国身上的世界主义的性质，路易十一和黎塞留的时代就是明证。但是勃朗先生强加在法国身上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法国永远不会让任何一种思想占上风，除非这种思想有利于全世界。但是我们认为，路易·勃朗先生无法向我们举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不同于他所说的法国。就以勃朗先生用来直接和法国对比的英国为例吧。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们认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可是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么，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sup>213</sup>不是英国，又是谁呢？法国曾经为解放一个共和国而出了一点力，可是为这个共和国奠定基础的是谁呢？是英国，就是这个英国！如果说，法国支援过美利坚共和国摆脱英国暴政的解放斗争，那么早在二百年前，英国就已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过荷兰共和国<sup>214</sup>。如果说，法国在上世纪末给全世界做出了光荣的榜样，那么我们也不能避而不谈这一事实：英国还比它早一百五十年就已做出了这个榜样<sup>215</sup>，而那时法国还根本没有准备学习这个榜样呢。至于讲到思想，那么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兰贝尔和其他人大力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和舍夫茨别利有了更为出色的法国继承者便忘记了他们。

勃朗先生说，如果英国人“自称为民主主义者……那就会否定他本国的历史”。

而我们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主要的证明就是应当否定本

国的历史，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负任何责任。法国人还是不要在其他各国的民主主义者中间标新立异吧；不要为他们过去的国王和贵族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吧。因此，勃朗先生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缺点的，我们倒认为是英国民主主义者的一大优点，那就是他们应当抛弃过去而只展望未来。

“法国人必然是世界主义者”。是的，在法国的影响，法国的道德、风尚、思想和政治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就是这样。在每个民族都习染了法国民族性的特征的世界里，就是这样。然而，其他民族的民主主义者所不赞成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已决心抛弃本民族的粗鲁的一面，同时希望法国人也能这样做。他们不满意法国人自称是世界主义者的论断；这样的论断等于强求所有别的人都成为法国人。

我们拿德国来做比较吧。德国是许多发明——例如印刷机——的诞生地。德国产生的卓越思想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比法国和英国的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在实际上，德国却总是受到侮辱，总是陷于失望。德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能说明，法国的世界主义究竟是什么。法国可以埋怨——这完全正当——英国政策的背信弃义，可是德国也同样领略过法国从路易十一到路易·菲力浦的背信弃义的政策。如果我们采用路易·勃朗先生的衡量标准，那么德国人就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奢望。

关于这一点就谈这么多吧。我们所以希望就这一点展开讨论，因为这只会导致英法两国民主主义的相互了解，导致它们的稳固的联合。

继勃朗先生之后，弗洛孔先生为“欧洲的民主派”祝酒。

弗洛孔先生说道：

“请你环顾四周，听一听来自别的国家的声音；不是抱怨就是威吓；不是叹息就是希望；它们都说些什么呢？它们诉诸法国革命的原则；它们在一切专制制度面前宣布法国革命的不朽的座右铭：自由、平等、博爱！是的，正是那些由于受奴役，由于愚昧而被引入歧途的人民对革命进行了不光彩的进攻；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举起它的旗帜，并且保证要成为他们过去所不理解的光荣原则的最热忱的捍卫者。这一明显的事实就呈现在全世界面前，而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我们的敌人害怕，更能有效地使我们想起我们的责任了。在英国，在原有的派别之外，在世界上最富有最专横的贵族面前，人民正组织起来。由富有经验的领导人领导的庞大组织，每天都吸收许许多多将为人类雪耻的工人加入自己的队伍。人权在英国不是新的口号。还在过去的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党派已经从宗教狂热和政治热情中清楚地看到了伟大的社会真理：

亚当耕地，夏娃纺纱，  
老爷们那时在哪里？<sup>16</sup>

这种情况差不多在三百年前就由圣约同盟派<sup>217</sup>公诸于世了。现在同一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棉织业的巨头们就象过去的地主一样不屑于倾听劳苦人的怨言。所以，仅仅问什么是权利，那是不够的，人民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权利，而英国人民是知道这一点的。眼下在比利时正在组织一个联合各国民主派的团体，正在筹备召开民主派代表大会<sup>218</sup>。在德国，虽然各邦君主在玩弄恩赐宪法的把戏，人民却在设法自救。”

讲演人接着简略地回顾了波兰、意大利和瑞士的运动，并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

“是的，革命的种子正在发芽，土壤是肥沃的，绚丽的希望之花点缀着未来的原野。但是冬日漫漫，我们应该赶快拿起镰刀，收割我们的庄稼。让我们接过我们父辈留下的革命工作。让我们抓紧时机，不然我们还得从他们开始的地方做起。”（热烈鼓掌）

---

“国内”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接着是议员赖德律-罗兰先生“为人民的主权”祝酒。

宣读了弗朗斯瓦·阿拉戈，拉梅耐和杜邦·德·累尔几位先生写来的道歉信，随后散会。

这次示威证明，地方上的民主派正越来越脱离《国民报》派，以便团结在《改革报》派的周围。

弗·恩格斯写于 1847 年 12 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47 年 12 月 18 日《北极星报》  
第 530 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  
来稿

# 弗·恩格斯

## 宪章运动<sup>219</sup>

[“民主派兄弟协会”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

“民主派兄弟协会”在它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告工人书由《北极星报》编辑部哈尼先生起草，发表在该报最近一号上。<sup>220</sup>

告工人书在对目前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情景作了如此简练而又如此明确的描绘之后，号召两岛工人补充自己党组织的队伍。

资产阶级到处为你们设置圈套。它为了诱使你们放弃人民宪章<sup>221</sup>——这是你们应该达到的唯一目的——炮制了各种各样表面改革的计划。可是，就在这么几年内，你们已经两次得到严重的教训，这就使你们能够深信：资产阶级提出的任何改革计划，对你们来说，就象传说中长在死海边上的果子：外表好看又新鲜，但里面已经全烂了。要记住为改革法案<sup>222</sup>进行的鼓动和争取废除谷物法<sup>138</sup>的运动！

……但是，全国消除舞弊行为同盟，反国教会协会，根除贪污、改革金融制度、废除某些捐税等等各种各样的协会，还要求你们支持。所有这些计划的作者的唯一目的就是巩固和扩大已经在不列颠帝国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全都联合起来了，为的是拒绝批准你们的公民权；可见，他们是

你们的公开的敌人。如果他们真的想改善你们的命运，他们就会帮助你们掌握最高权力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当你们能够选出立法机关的议员，他们所力求达到的一切改革以及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都将实现。他们既然拒绝你们的选举权又怎能自称是你们的朋友呢？

但愿每一个工人都充分懂得这样的伟大真理：复兴工人阶级和拯救整个社会是出生在茅屋里和阁楼上的人的事业。你们要友好地接纳每一个不承认阶级差别并寻求与你们联合的出身于特权阶级的人；但是，千万别期待这个或那个高踞于你们之上的阶级来解放你们…… 特权阶级使你们得不到法律保护，你们应该在自己文明的头脑、无畏的心灵和有力的双手中寻找复兴自己的手段。

……你们必须注意一切改革的敌人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为反对你们的利益而制造的最卑鄙的阴谋。这些阴谋家力图重新挑起目前几乎已经平息的旧的民族纠纷。这种纠纷曾一度激起一个国家的工人遵照自己的统治者的示意去屠杀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以法国人民似乎想侵占和奴役英国为借口，竭力在我岛人民中燃起对法国人民的极端仇恨。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们！你们的国家已经被敌人侵占和奴役，但这是内部的敌人，他们既从政治方面也从社会方面把你们贬低到赫罗泰的地位。你们不能在增加这些敌人的武装力量的同时又从他们那里获得解放。我们深信：真正的法国人民即无产者根据亲身的经验知道，他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一样，不是在国外，而是在本国。在法国也象在英国一样，大资产阶级独霸天下，蹂躏着劳动的子孙。法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一样，正进行战斗，反对这个敌人并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

暂且假定，国家遭到敌人侵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人民已经得到解放，那么英国就不用担忧了。真正保卫国家的决不是军队、舰队和堡垒；唯一的卫国者是真正自由的人民……

但愿特权阶级篡夺的权利被剥夺，但愿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得到确立——那时，英国也将不怕全世界的军队了。反之，只要英国的实力用于捍卫全人类的自由和社会解放，各国人民就会兴高采烈地欢迎英国实力的增长。

---

赫罗泰是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他们固着在土地上并且必须向斯巴达地主缴纳一定的贡赋。赫罗泰的状况与奴隶的状况毫无区别。——译者注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们！你们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你们为什么要为维护你们参加不了的机构而战斗呢？为什么要为维护那些不是保护而是压制你们的法律而战斗呢？为什么要为维护财产——你们只能把它看成是从你们这里夺走的劳动果实的积累——而战斗呢？你们的手工业产品被抢走了，然后你们的贫穷却成了剥夺你们的公民权的借口！你们受尽了所有者的奴役、抢劫和侮辱，可是还要求你们为保护这些所有者而流血！让享有特权的人，让所有者自己去为自己的利益、特权和财产斗争吧！如果他们自己力不能及，那就让他们把人民应有的东西给人民吧！但愿他们学会服从人民的意志；到那时整个民族就将在不列颠群岛周围筑起一道任何外国侵略者在任何时候都攻不破的城墙！

你们首先要取得为你们的社会解放所必需的政治权力。在没有获得这种权力时，你们要公开声明：没有投票权，就不拿武器！给我们选举权，否则我们不打仗！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工人们！……阴谋家力图用不同国家的人都是天生的仇敌这种可耻的和伪造的借口，挑拨一国人民去反对另一国人民，你们要给以反击！在写着人人皆兄弟的民主旗帜周围团结起来！

代表“民主派兄弟协会”签名的有：乔治·朱利安·哈尼，厄内斯特·琼斯，托马斯·克拉克，查理·基恩（大不列颠）；米歇尔，贝尔纳（法国）；卡尔·沙佩尔，约·莫尔（德国）；雅·沙贝利茨，克雷尔（瑞士）；彼得·霍尔姆，隆特贝格（斯堪的那维亚）；路德维克·奥博尔斯基（波兰）；波泽，勃鲁姆（俄国）。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9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8 年 1 月 10 日《改革报》，  
未署名

## 卡·马克思 法国的局势<sup>223</sup>

政府在干什么？什么也没有干。

议会的正式反对派在干什么？什么也没有干。

法国能期待现在的议院干点什么？什么也干不了。

基佐想干什么？继续当大臣。

梯也尔、摩莱一伙想干什么？重新当大臣。

法国靠这样一伙“你滚开，让我来干”的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也得不到。

可见，政府和反对派都注定是无所作为的。

只有谁能完成未来的法国革命？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为此能干些什么？什么也干不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48 年 1 月 9 日和  
14 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8 年 1 月 16 日《德意志—布鲁  
塞尔报》第 5 号和 1848 年 1 月 19 日  
《改革报》，未署名



弗·恩格斯

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  
——基佐的外交政策

刚刚公布了一份有趣的材料<sup>224</sup>，它就象是送给众议院的一份新年礼物。这是用事实来说明一位伯蒂先生怎样获得巴黎附近的科尔贝收税官职位的声明书，而且是由伯蒂先生本人公布的。伯蒂先生所以被迫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他和他妻子的离婚案以及审案时硬说他靠他的妻子卖身给一位和基佐先生有密切关系的绅士先生才买到了官职。他在他公布的材料中说道：

“是的，我的官职是买来的，正如当今一切官职都是买来的一样；不过它不是靠卖淫，而只是用现金买的。”

他接着详细地叙述了他最初怎样追求审计院副审计官的职位；部里如何许诺他这个官职，只要他能够设法弄到一位副审计官的辞呈；大臣的秘书如何向他暗示，哪一位副审计官比较愿意出卖自己的职位；他后来如何以一万五千法郎弄到了想要的这份辞呈；以后又如何告诉他，必须设法弄到一份不是二等而是一等副审计官的辞呈，因为政府需要这样一份辞呈来实践它在上台时许下的诺言；如何经过讨价还价，才补上了两份辞呈的差价；如

---

指财政大臣拉卡弗-拉普拉涅。——编者注

何在最后才弄到了这份辞呈；然后内阁又表示不仅需要这份已经提出的辞呈，而且还要一份更高的，即审计官的辞呈；这份新的辞呈又是如何设法付了“现金”才弄到的；最后又如何建议伯蒂先生接受科尔贝收税官职位而不再谋求审计院的职位；伯蒂先生怎样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怎样在不同的辞呈上签了字并按预先讲妥的金额相交换；两天以后如何发布了所有敕令，接受辞呈，并按成交的条件提升和任命若干有关人员。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要事实。还有其他一些次要情节证明伯蒂先生如何一旦上了钩，付出第一笔钱，就势必要越付越多。不过这些姑且略而不谈。我只指出，在伯蒂先生公布的材料中，所有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巴黎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所有报纸都整版刊登它的消息，而当亲自策划上述交易的财政大臣（审计院受财政部管辖）在众议院受到吕诺先生质询时竟公开否认发生过这一类事情，报纸更是大登特登了。吕诺先生当时声称该部出卖职位是人所共知的丑闻。议会的多数派知道这件事，反对派也知道这件事。简言之，人人都知道，看来，唯独大臣本人除外。拉卡弗先生对此矢口否认<sup>225</sup>。现在事情已经弄得无法暗中了结了。虽然整个巴黎几乎有一个星期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政府一直保持缄默。

我们只把大杜班先生当吕诺先生将这件事提交众议院时所讲的话重述一遍：

“如果容忍这可耻的制度重新抬头，那就根本不值得搞一次革命来消除卖官鬻爵。”

占据报纸的另一个题目，是阿卜杜尔·卡迪尔的被俘和政府

行将作出的关于他未来的放逐地的决定。<sup>226</sup>毫无疑问,政府将承认和实现奥马尔公爵的约言,将这位酋长送到埃及去。<sup>227</sup>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反对派的报纸,从《国民报》到《立宪主义者报》,都要求毁约。无疑,约言是有条件的,承认与否由政府自行决定。拒绝承认,在《太阳报》看来,不能说就是无耻行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其他任何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干出这样的事,就会被这些报纸认为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十分明显,既然事情无法恢复到阿卜杜尔·卡迪尔有条件地投降时的状态,那么拒绝承认他的投降条件就未免太不宽大了。但是对于这种问题这些国民的报纸一概视而不见,它们谴责别人的所作所为,它们也同样会这么干。主张承认同阿卜杜尔·卡迪尔所签订的条约的,只有《新闻报》和《改革报》这两家报纸。前者是一家保皇派的报纸,它所以要求承认是因为政府不能否定国王的儿子,法兰西的儿子所说的话,这样它就为王公们恢复了革命前的老称号。《改革报》声称,不,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事关我国的信用;在这类问题上,最好是宽大为怀,不要斤斤计较,所以,应当承认说过的话,即便是王公说过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唯独《改革报》意见正确。

我们认为,这位阿拉伯领袖的被俘,总的说来是很值得庆幸的。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柏柏尔国家的海盗行径——英国政府从来不予干涉,只要他们不骚扰英国的船只——,只有靠征服其中的一个国家才能被制止。而征服阿尔及利

亚就已经迫使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两个海湾，甚至迫使摩洛哥的国王踏上了文明的道路。他们只好放弃海盗行径，为人民另谋生路，并且不靠欧洲小国的进贡而用其他手段来充实他们的国库。如果我们因沙漠中的贝都英人的自由被摧毁而感到遗憾，那么不应当忘记正是这些贝都英人是强盗民族，他们的主要生存手段不是相互袭击，就是袭击定居的村民，他们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杀掉所有的反抗者，并把剩下的俘虏当作奴隶卖掉。远远望去，所有这些自由柏柏尔人的民族好象很骄傲、高贵和荣耀，但是走近一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和比较文明的民族一样，被贪欲所支配，而且只会采取更粗暴和更残酷的手段。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

基佐先生向众议院提交了一部分涉及瑞士和意大利的外交信函。前者再次证明他总是为帕麦斯顿勋爵所愚弄，而两者都证明法国已开始和奥地利结成紧密的同盟。这是路易-菲力浦的法国迄今还未蒙受过的最大的耻辱。以最无耻的手段实现的专制和压迫的化身，停滞和反动的国家，竟成了经过两次革命改造的法国的盟友！它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不过这也很好。资产阶级使这个国家堕落得越深，算账的日子就越近。而且这一天不等资产阶级想到就会到来。有一部分人他们未加考虑，这就是高尚的、慷慨的、勇敢的法国人民。

《改革报》和《国民报》之间的争论，已交由双方选出的评审委员会去研究。所有的敌对活动暂时停止。本月底将作出结论。不

管结论如何，我们希望《改革报》今后继续执行这条唯一能够拯救法国民主的路线。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10—13 日

原文是英文

左右

载于 1848 年 1 月 22 日《北极星报》  
第 535 号，编辑部注：本报巴黎通讯员  
来稿

## 弗·恩格斯

# 宪章运动

[支持全民请愿书群众大会]<sup>228</sup>

宪章派委员会上星期二 在伦敦为通过全民请愿书召开了第四次群众大会。朱利安·哈尼先生任主席。代表宪章派中央委员会<sup>229</sup>的克拉克先生和狄克逊先生,麦克尔士菲尔德区的威斯特,斯克尔顿、基恩和富塞尔先后发言。但是,这天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哈尼和琼斯。下面是他们的讲话摘录: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我们在这里集会,为的是敦促通过一项反政府的非常法,为的是施加外部压力,这种压力甚至会把可怜的小约翰·罗素勋爵压成一个国家活动家。我们需要这种外部压力,因为目前这个议会无疑是我们过去的所有议会中最仇视工人的。(有个人喊:不是,不是!)有人说“不是”。但是我再说一遍,从来还没有一个特权阶级象我们的资产阶级那样,如此敌视工人。(赞同声)它从左边击溃贵族,从右边击溃民主派,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宝座。我决不是想使贵族复兴。不!不要去碰被压伤的蛇,它会咬伤想把它治好的人的手……在贵族的统治下,劳动阶级是尚能吃饱的奴隶;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先生,在你们的统治下,他们是快要饿死的奴隶。(掌声如雷)

---

1848年1月11日。——编者注

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琼斯的发言中,这句话的措词如下:“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尚能吃饱的奴隶;先生,在你们的统治下,他们是瘦弱的奴隶。”——编者注

因为我们的议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是资产阶级的,从而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敌视我们,组织反抗的时候到来了。而且人民是知道这一点的……我们也增加我们的军队;宪章运动的老近卫军又踏上光荣的战场。我们也征集自己的民军——几百万赫罗泰。我们也加强我们的“国防”:心中的大无畏精神,自己队伍中的纪律,行动中的一致!(热烈鼓掌)

但是,到会的也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对这一切感到不满足,他们声称,几百万坚决的、组织良好的和完全自觉的人,还不足以争得宪章……这些先生号召人民致富,硬说到那时人民就自由了。而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必须争得自由,那时你们才会富裕!(鼓掌)

……要你们富裕起来!不过,怎样致富?是在习艺所,还是在监狱?或者,你们能在贵族狩猎的禁苑内致富?或者,每周拿六先令(八法郎)就能富裕?或者,在饥饿的爱尔兰的墓地上?(鼓掌)把这个告诉被抛在街头的曼彻斯特工人或两万失业的布莱德弗德人吧!把这个告诉倒在自己那间被地主焚毁了的茅屋旁就要饿死的爱尔兰农民吧!试把这个告诉站在格罗夫纳广场贵族大门口的乞丐吧!你们干脆对他说:他应当继续做奴隶;但是在要他致富时别侮辱他穷!我知道,你们将引用我们光荣的土地共用社<sup>230</sup>来证明人民可以富裕起来……莫非你们真的以为政府会让你们自由行动吗?……这个共用社拯救了五万户,使之免于破产,但你们要相信,如果你们不争得政治权力,议会就要阻挠你们建立其他这样的共用社!……但愿共用社的成员回想一下自己的祖先即曾经拥有土地的英国自耕农的命运。他们是怎样失去土地的?捐税把他们压垮了。

……好吧!聚钱吧,养活民军需要钱,扩充军队需要钱!你们的钱!建筑新的宫殿,建立新的主教管区,养活未来的王室子孙,需要你们的钱!聚钱吧,把自己变成资产者,瞧吧,那时资产阶级就不再在你们面前发抖了!聚钱——这种不能实现的事似乎就是你们唯一的拯救手段!可是为什么不谈选举,不谈我们在诺定昂的有重要意义的胜利<sup>231</sup>,不谈我们的组织,不谈我们的全民请愿……和全国公会的筹备工作?

---

“地主”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你们的钱!”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句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不，我的朋友们，首先我们需要选举权……而你们，伦敦人，为争取选举权能够比你们地方上的兄弟做得更多……我们勇敢的北方人离这里很远；他们的呼声早在到达议会以前就已消失，况且无数的军营和军事哨所把他们同议会隔开了。而你们，伦敦的居民，有可能亲自敲打圣斯蒂凡<sup>232</sup>的大门，一直敲到你们的享有特权的债务人心惊胆战地把几个世纪以来欠你们的债还清为止！使劲地敲，正义必胜，决不停止！（掌声如雷）

朱利安·哈尼先生。——我们在这里集会，为的是通过递交议会的请愿书……但是，我们既不要求怜悯，也不要求发慈悲。即使我们能低首下心地这样做，那我们也会知道，对于我们的压迫者的慈悲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我们的祖先不就是没有央求暴君发慈悲而从查理一世这个背叛者的压制下获得解放了吗？美国人也是没有央求慈悲就抛掉了自己的桎梏。法国人民也是没有哀求慈悲就推翻了封建主义、教会和君主专制的暴虐统治。（热烈鼓掌）

不，如果我们去恳求资本的恩典，这是徒劳的。我们的一切请愿如果没有其他措施配合，将会一无所获。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要恩惠，我们要求正义。我们不仅用自己的请愿，而且用自己的鼓动，自己的已经开始使议会中的资产者惶惶不安的组织来要求正义。可见，在国内不要停止鼓动，因为你们一停止鼓动，你们的一切请愿都将成为空话。

……的确，为这一斗争的目的而奋斗是值得的。看看你们祖先用双手的力量建立并用他们的鲜血巩固起来的这个大帝国；……看看这个拥有一亿六千万居民、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帝国，太阳不落<sup>233</sup>的帝国。你们这些千百万平方英里的占领者和所有者居然没有一英尺自己的土地。这个美丽帝国的千百万继承者居然饿得要死？它的成千上万的居民居然没有能够躲避冬季严寒的栖身之处？不列颠帝国内生产各种各样的财富，有天然产品，也有工业品……我们的工厂引起了全世界的惊讶和忌妒。我们的手工业者、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水手以灵巧、勤奋、大胆而驰名天下。宏伟事业和繁荣昌盛的一切因素都具备，可是你们却为贫穷所困。这个帝国按理说是全体人民的财产，而不是一小撮游手好闲者、投机分子和享有特权者的财产。难道它不值得花费力量去夺取吗？你们通过宪章去夺取它吧！（鼓掌）如果僭位者要你们拿起武器去保卫国家，只要你们没有得到你们那份所得利益，你们就拒绝他们……如果你们武装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你们呢？请记



住不久前因拒绝服从而在印度被枪决的那个可怜的士兵,这就是你们应得的份额。请拿这个同威灵顿公爵从国库中取得的二百五十万镑(六千万法郎)巨款比一比,这就是贵族应得的份额。

好吧!如果贵族担心自己的领地,那就让他们为保卫自己的领地去厮杀吧!如果教会害怕失去自己的大宗收入,那就让牧师和主教拿起武器吧!如果交易所街<sup>234</sup>的高利贷者和掠夺者为自己的资本担忧,那就让他们去保护资本吧!如果工厂主、商人害怕抢劫,那就让他们拿起武器并为自己的财产战斗吧!.....可是你们,来自人民的人,工作繁重而且工资菲薄的劳动儿女,无家可归的受特权支配的人,你们没有土地,没有收入,不收租,不收什一税,没有国家有价证券,没有股票,没有利润,没有高利贷利息,没有选举权,君主既不保证你们安全,又不让你们受保护法的保护——你们应当为另一种事业战斗或者根本不战斗!(高呼“好极了”)如果你们必须战斗,那就为自己而战斗。(鼓掌)当贵族、牧师或资产者要求你们去打仗,你们就回答他们:没有投票权就不拿武器!某些骗子和蠢人在侈谈国防;对于宪章派来说,国防的唯一意思就是:土地归全体人民,给每个人住房,给每个人投票权,给每个人枪!(掌声如雷)

弗·恩格斯写于 1848 年 1 月 16—  
18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8 年 1 月 19 日《改革报》,  
未署名

## 附 录

# 附 录

## 附 录

## 致《社会明镜》杂志的 读者和撰稿人<sup>235</sup>

目前到处表现出一种赶快援助多灾多难的人类的高尚意愿，这是十九世纪的光荣。但是这种意愿在德国还缺少一个中央的机关刊物，这样的刊物既能报道应予消除的灾难，又能公布为了消除灾难而希望实行或已经实行的办法，并且能较详细地阐明这些办法的成败得失。现在我们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个刊物的创刊号，同时希望每个仁爱之士把支持《社会明镜》当作自己的义务，为它写一些合适的报道。

为了找出并采用一些办法来切实而彻底地消除我们社会生活中各式各样的而且还被人为地掩盖着的罪恶，首先必须查明这些罪恶。因此《社会明镜》打算把社会机体的所有弊病提交自己的读者裁判；它将刊登一般评论、专题文章、统计简讯和关于某些典型事例——这些事例将使我们能够正确地说明一切阶级的社会关系并将有助于为消除社会罪恶而成立的团体<sup>185</sup>——的记叙文；杂志将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

我们首先要注意工人阶级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在现代文明社会的所有罪恶中是最突出的。我们特别欢迎记叙文、统计材料和来自德国各地、首先是来自那些灾难深重的地方的各种有说服

力的事实，也欢迎关于需要救济的人即一般无产阶级同有产阶级之间的数量比例的报道；关于赤贫现象增长情况的报道，等等。

我们把工人的精神状况、智力状况、道德状况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列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并乐意收到关于无产者的健康情况——只指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的报道，关于他们的教育和道德情况的报道。对犯罪行为、卖淫行为的统计，特别是附有在关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生活条件下的对比材料的这类统计，也将受到重视。

在这方面对于《社会明镜》的宗旨来说最能获得成果的调查范围是：

(1)大城市。离开人数众多的拥挤在狭小地区的无产阶级，它们就不能存在。在这里我们除了要注意贫困到处引起的通常后果，还将注意，人口如此集中对劳动阶级的身体情况、智力和道德情况的影响。记叙文、统计、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报道，以及能揭露我们的大小城市中那些多半被掩盖起来的“贫民窟”的各种事实，都将受到欢迎。

(2)工业区和工厂区。它们的存在同样取决于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这里我们希望我们的撰稿人尤其要注意以下因素：

a 劳动的性质本身；按劳动性质来说或者由于在这一生产中劳动条件不合适和劳动时间过长而对健康有害的各个工种；工厂里的儿童劳动和妇女劳动及其后果；对无产者的已经工作和没有工作的妻子儿女的漠不关心态度，家庭的离散，成年男子的劳动被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所排挤，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等等。

b 工人对其雇主的依赖关系。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支持没有保护的工人阶级去反对权力，也就是说，反对资本

家令人遗憾地不断滥用权力的行为。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责,而且将对我们的撰稿人就这类事件撰写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表示特别的感谢。如果工厂劳动时间延长太久,甚至延长到黑夜,如果还要工人在工余时间擦洗机器,如果工厂主粗野地或残暴地对待自己的工人,订出苛刻的劳动条例,用商品而不用货币付工资,——对这种昧心的“实物工资制”,我们特别要加以追究,而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和用什么形式实行,——如果工人在有碍健康的地方劳动,并且被迫住宿在归工厂主所有的破旧房屋里,总而言之,资本家不管在什么地方对待工人有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我们都要请每一个能够向我们报道这类消息的人,尽快地寄来确实的报道。我们打算把一切违反为保护穷人不受富人欺压而制定的法律的行为,以及每一个这样的违法行为的卑鄙无耻的情节都公诸于众。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些目前还只是一纸空文的法律真正有效。

c.一般说来,当工人由于竞争、更完善的机器的采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使用、商业的波动、外国的竞争等而失去工作,或者由于疾病、重伤和年老而丧失工作能力以及由于工资降低而使他们的状况日益恶化的时候,社会对工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们不仅将描写无产阶级的而且也将描写有产阶级的内部状况和外部状况。我们将以事实证明:私人企业主自由竞争而没有劳动和交换的组织,这将使中等阶级贫困化,将使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间接地恢复垄断;大地产的分割使小土地所有者破产并间接地恢复大地产;把我们全都卷进去的竞争毁坏着社会的基础,并用贪婪的自私自利使整个社会道德败坏。

《社会明镜》将不仅记述物质贫乏和精神道德贫乏交织在一起

的情况,而且还打算描绘一切形式的贫乏,因此也将描绘高高在上的阶级的贫乏。在这种描绘中它将不限于写统计简讯和对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的记述,还将用一些篇幅刊登散文和诗歌等文艺作品,当然只刊登那些真实地反映生活的文艺作品。它欢迎来自生活本身的特写,同样也欢迎以生活为基础的特写。

如此无情地揭露我们的工业居民、农业居民和其他居民的状况,——这种状况迄今多半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或掩盖着,——象《社会明镜》杂志所计划的那样公开地描述我们整个社会的秩序,将使一些人大为头痛心烦,这些人是不会友善地对待我们这个创举的。但愿他们仔细想一想:正视罪恶所需的勇气和由于了解了情况而产生的沉着镇定对心灵和感情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要比胆怯的理想化的伤感主义好得多,伤感主义只是从建立在幻想上因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虚构理想中寻求安慰,以逃避悲惨的现实。一当人类的苦难成为政治丑闻的对象,——如同我们在西里西亚发生骚乱<sup>236</sup>时看到的,当时所有报纸和杂志突然谈起所谓的社会主义来了,——这种理想化的伤感主义就伪善地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但是骚乱一停止,又重新让穷人无声无息地饿死。

最后,《社会明镜》感兴趣的还有为消除社会灾难和社会动乱所作的努力——一方面是指目前正在创建的协会的活动,另一方面是指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一些灾难但又招致另一些灾难的强制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永远把罪犯屏弃于社会之外的侮辱名誉的判决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对普通监狱中惯犯的待遇,宾夕法尼亚式监狱中的单独监禁,偷猎惩办法令所引起的大量杀人,济贫法和卫生警察法的情况和实施,典型的刑事罪,等等。

我们向一切有可能就上述各点或类似于《社会明镜》纲领中包



---

含的各点给我们写报道的人呼吁友好的帮助 ,特别是向牧师先生、教员、医生和官吏呼吁友好的帮助 ,如果需要 ,我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为作者姓名保守秘密 ,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撰稿人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至于发表的责任由编辑部承担。

写于 1845 年 1 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45 年《社会明镜》杂志第 1 卷

要求卡·马克思  
作出的不在比利时发表  
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的保证<sup>237</sup>

1845年3月22日

为获准在比利时居住,我同意保证自己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著作。

卡尔·马克思博士

第一次载于1924年《欧洲新闻》杂志  
第346号

原文是德文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sup>238</sup>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 第一章 同盟

第一条 同盟的目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

第二条 同盟分为支部和区部，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作为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

第三条 对每个志愿入盟者的要求：

- (a)行为正当；
- (b)决不做可耻的事；
- (c)承认同盟的各项原则；
- (d)有公认的谋生手段；
- (e)不属于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
- (f)必须获得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入某一支部；
- (g)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保守机密。

第四条 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他们都是兄弟，因而有义务在一切场合下互相帮助。

第五条 盟员皆有盟内化名。

## 第二章 支部

第六条 支部的组成至少三人至多十二人,超过十二人时须另立支部。

第七条 每个支部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主席主持各种会议,副主席管理盟员缴纳的盟费。

第八条 支部成员应满腔热忱地努力吸收能干的人入盟,以壮大同盟的队伍,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

第九条 接收新盟员由支部主席和充当介绍人的盟员办理。

第十条 各支部互不相识,须有各自选定的特别名称。

## 第三章 区部

第十一条 区部辖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支部。

第十二条 区部委员会由这些支部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区部委员会从委员中选出领导人。

第十三条 区部委员会是区部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四条 各独立的支部须加入已有的区部委员会,或同其他单个的支部成立新的区部。

## 第四章 中央委员会

第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

第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

## 第五章 代表大会

第十七条 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

第十八条 每个区部派遣一名代表。

第十九条 代表大会于每年八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有权召集非常代表大会。

第二十条 每届代表大会指定本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

第二十一条 代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提交各支部通过或否决。

第二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有义务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因此应出席代表大会,但无表决权。

## 第六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 凡行为不正当或违反同盟原则者,视情节轻重或令其离盟或开除出盟。凡开除出盟者不得再接收入盟。

第二十四条 犯有罪行的盟员由区部委员会审理,区部委员会还应督促判决的执行。

第二十五条 各支部必须对被令离盟者和被开除出盟者进行最严密的监视,同时还应密切监视该地区的可疑分子,如发现他们有危害同盟的活动,必须立即报告区部委员会,然后由区部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同盟的安全。

第二十六条 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

第二十七条 支部每周或每月缴纳盟费,数额由各区部委员会规定,盟费将用于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和支付邮费。

第二十八条 区部委员会每六个月向所属各支部报告收支情况。

第二十九条 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一年后必须重新当选,方可连任,否则由他人替换。

第三十条 每年九月进行选举。选举人如认为自己的担任公职的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可随时召回。

第三十一条 区部委员会应关心其所属支部有可供进行有益而必要的讨论的材料。中央委员会有义务将所有对我们的原则有重要意义因而应予讨论的问题交给各区部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 每个区部委员会、尚未成立区部委员会的支部以及单独活动的盟员,必须同中央委员会或某个区部委员会保持定期的通信联系。

第三十三条 任何一个盟员改变住址时均须事先报告本支部的主席。

第三十四条 每个区部委员会可以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区部的安全并加强其活动。但这些措施不得违反总章程。

第三十五条 有关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必须送交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请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 第七章 接收盟员

第三十六条 在宣读章程后,由第九条中规定的两位盟员向被接收入盟的人提出下列五个问题。如果后者对这些问题回答:“愿意”,那么就要他许下诺言,然后宣布他为盟员。

这五个问题是:

(a)你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吗?

(b)你认为要尽快地实现这些原则,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同盟是必要的吗?你愿意加入这样一个同盟吗?

(c)你保证始终不渝地用言语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吗?

(d)你保证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吗?

(e)你保证服从同盟的决议吗?

那么请向我们许下你的诺言作证!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并受代表大会的委托

秘书 主席

海 德 卡尔·席尔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

威·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卡·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

##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 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 1847年6月

### 代表大会致 同盟

亲爱的兄弟们：

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事会)于今年2月<sup>239</sup>宣布召集,并于今年6月2日在伦敦这里开幕的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鉴于我们同盟的整个处境,大会的各次会议未能公开举行<sup>240</sup>。

然而,我们代表大会的成员有责任事后把会议的情况向你们公开,至少向你们提供我们讨论的概况。

我们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前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作过总结报告,而我们现在应向你们声明,代表大会对这个总结报告是满意的。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还因为我们在新章程中加了一条:代表大会的一切立法性决议须经各支部表决<sup>241</sup>;因此,至少就我们决议的这一部分来说,我们已经出于双重原因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理由了。

---

在原稿中,莫尔亲笔在这里加了“汉堡”二字。——编者注



在审查了代表资格证以后,前议事会首先向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它的领导工作的总结报告和关于同盟情况的报告。代表们对议事会维护同盟利益和着手改组同盟的活动深表满意。于是这一项就完成了。我们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呈交代表大会的书信原件中引用了一些材料,现概述如下。

在伦敦,我们同盟最坚强有力。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极其便于宣传,并且使许多能干的盟员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以利于同盟及其事业。为此目的,同盟利用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sup>242</sup>和它的怀特柴泊分会。此外,盟员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法国共产主义讨论会<sup>243</sup>等组织。

巴黎的前议事会自己认识到,伦敦的同盟比它更有能力担任对同盟事务的中央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的妥善保管和中央委员会成员本身的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里有保障。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有充分的机会看到,伦敦各支部拥有足够数量的有才干的人,可以把同盟的最高执行权托付给他们。因此,代表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仍然设在伦敦。

在巴黎,同盟最近几年来大大地堕落了。<sup>244</sup>区部委员会成员和议事会成员长期以来只进行关于形式的争论和关于所谓的违反章程的争论,而不注意整个同盟的或同盟各区部的事务。在各支部内,也是讨论这样一些浪费时间的、多余的而且会引起分裂的琐事。至多也不过是讨论那些自魏特林的《保证》<sup>245</sup>发表以来就反复讨论而且讨论得厌烦了的老问题。巴黎同盟本身丝毫没有进步,丝毫没有参加阐明原则的工作,没有投入无产阶级的运动,而这一切在其他地方的同盟组织中,以及在同盟之外都做到了。结果是,所有那些对在同盟内得到的东西感到不满的人,就在同盟外寻求

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寻求解释的需要被一个文坛上的骗子和工人的剥削者——德国著作家卡尔·格律恩利用了。这家伙看到共产主义的著作能赚钱时，就附和共产主义。过了不久，他看到今后充当共产主义者会招致危险，于是就在新近由他译成德文的蒲鲁东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一书<sup>246</sup>中，为自己的退却找到了借口。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把这本一般说来毫无意义的书中提出的国民经济学推论作为自己在巴黎向盟员讲演的基础。听他讲演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对共产主义已经感到十分厌烦；第二种人也许希望在这个格律恩那里找到支部会议上未能解决的一大堆疑问和问题的解答。后一种人数相当多，他们是巴黎各支部的最有才干和最有发展前途的成员。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用自己的空话和徒有虚名的博学曾在一段时间内迷惑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因此，同盟分裂了。一方是在人民议事会和区部中完全占优势的一派，即魏特林派，另一方是那些仍然认为还可以向格律恩学点东西的人。可是这些人也很快就看到格律恩发表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恶毒言论；看到他的全部学说根本不能够代替共产主义。激烈的辩论发生了，在辩论中表明，几乎所有的盟员都仍然忠于共产主义，只有两三个盟员为上面说到的那个格律恩和他的蒲鲁东体系辩护。同时查明，就是这同一个格律恩惯于欺骗工人，把他们为波兰起义者募集的总共三十法郎的捐款<sup>247</sup>用于他的私人目的，并且为了出版论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这本毫无价值的小册子<sup>248</sup>，向工人骗取了大概数百法郎。结果是，格律恩以前的听众多数不到场了，他们另外组成了一派，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阐述共产主义原则的所有结论以及这个原则与社会状况的联系。由于这次分裂，巴黎的同盟组织瓦解了。中央委员会在去年冬天派去了一名

特使，他尽了最大努力把组织恢复了起来。但是不久争论又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和三种不同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进步派借助于魏特林派让三四个顽固的、直接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离盟。可是在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时，两派在区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又互相争吵起来。分裂已不可避免；至少是为了进行选举，进步派力量最强的三个支部作出决定：同作为魏特林派的主要支柱的两个支部分开，并且在自己的全体会议上选举一名大会代表。这些都实现了。这样，魏特林派被暂令离盟，盟员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代表大会研究了两派提出的辩护之后，声明同意这三个支部的做法，因为魏特林派到处阻碍同盟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伦敦和瑞士都是经历过的。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让巴黎的魏特林派离盟，并让巴黎多数派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这样，巴黎的盟员的人数固然大为减少，可是起阻碍作用的分子被清除了，并且由于这场斗争人们振奋起来从事新的活动。一种新的精神、一种崭新的毅力出现了。警察的搜捕看来已经停止，而且一般地说，搜捕并不是针对现在取得了胜利并且只有一个成员被驱逐的那一派，而几乎只是针对格律恩派的，这证明，整个搜捕是以普鲁士政府的情报为根据的，这一点马上就会看到。如果说政府驱散了城门附近的几次公开集会，那么这主要也是与在那里大放厥词并激烈地攻讦共产主义的格律恩分子——因为在这里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可能自由地还击他们——有关的。这样一来，现在在巴黎的同盟的情况比它同意让人民议会迁走时好得多。现在我们的人数少了一些，但是我们是团结的，而且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有

---

约·莫尔。——编者注

弗·恩格斯。——编者注

才干的人。

在里昂 ,同盟有了有组织的成员 ,看来他们是在尽力地参加工作。

在马赛 ,我们同样建立了组织。关于那里的盟员 ,有人写信告诉我们 :“马赛同盟的情况不很好。通过信件来鼓励未必会有什么帮助。”我们将设法在今年秋天从我们中间派几个人到那里去 ,把同盟重新组织起来。

在比利时 ,同盟也站稳了脚跟。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干练的支部 ,它的成员是德国人和比利时人 ;在列日 ,他们已经在瓦龙族的工厂工人中建立了第二个支部。在这个国家里 ,同盟的前途非常令人鼓舞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利时有一些代表出席。

在德国 ,我们曾经有几个支部在柏林 ,今年春天这些支部突然被警察强行解散。盟员们可能已经从报纸上得知 ,警察驱散了由盟员主持的一次工人集会 ,进行了追查 ,结果有好几个领导成员被逮捕。在逮捕的人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门特尔的人 ,是个裁缝 ,出生在波茨坦 ,大约二十七岁 ,身材中等 ,长得很结实 ,等等。他以前在伦敦和巴黎呆过 ,在巴黎时属于格律恩派 ,是一个伤感主义的惯会说关于爱的呓语的人 ,此外 ,他在历次旅行中 ,对同盟情况了解得相当详细 ,这个人没有经受住这次小小的考验。这一事件再次表明 ,这种低能、思想混乱、多愁善感的人最终只能在宗教中得到满足。就是这个门特尔在几天之内就完全被一个牧师感化了 ,并在监禁期间两次参加圣餐礼这种滑稽剧。一个柏林的盟员给我们来信说 :“……他在法庭上讲了巴黎、伦敦、汉堡和基尔的支部(这些支部他全都亲自访问过)的情况 ,并且供出了海尔曼·克利盖往柏

林邮寄自己的《人民论坛报》时使用的地址。他同另一个被告当面对质：难道我没有把这些书卖给你吗？难道我们没有在某处和某处集会吗？难道你不是正义者同盟的盟员吗？当所有这些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时，门特尔说：你能为此对全能全知的上帝负责吗？还说了许多类似的蠢话。”幸好这个门特尔的卑鄙行为没有能够使其余的被告上当，这样，政府别无办法，只好把被捕者暂时释放。这个门特尔的告密显然是与在巴黎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一事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格律恩分子门特尔错把格律恩分子当作同盟的真正领导人来告发了。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般没有受到迫害。当然，由于这个事件，整个柏林区部在组织上就乱了。可是，由于那里的盟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毅力，我们希望，很快就会着手同盟的改组工作。

在汉堡，也建立了组织。诚然，柏林的迫害事件使那里的盟员有些害怕了。不过联系却一直也没有中断。

此外同盟在阿尔托纳、不来梅、美因兹、慕尼黑、莱比锡、科尼斯堡、托恩、基尔、马格德堡、斯图加特、曼海姆和巴登-巴登也建立了组织。在斯堪的那维亚，同盟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组织。

在瑞士，同盟的情况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令人高兴。在这里魏特林派一开始就占优势。瑞士各支部在发展上的缺点特别表现在：一方面，它们没有能够把过去同青年德意志派的斗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它们只是以宗教精神来反对青年德意志派，并且听任例如象霍尔施坦的傲慢的格奥尔格·库尔曼那样一些最卑鄙的骗

---

现在称作 加里宁格勒。——编者注

现在称作 托伦。——编者注

子任意愚弄自己。由于警察的迫害,瑞士的同盟在组织上遭到很大破坏,以致大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重建组织。不言而喻,关于这些措施的结果和性质,支部只有以后才能得知。

关于美国,首先必须等待中央委员会所派去的特使的详细消息,然后才能对那里的同盟的活动情况提出确切的报告。

从这个报告和交来的同盟信件本身,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当伦敦的人民议事会担负起领导职责时,同盟的处境无疑是很困难的,前中央委员会<sup>249</sup>一点也不重视它所承担的义务;它完全忽视了同盟的团结,除了同盟这次遭到的组织上的破坏外,在个别支部中还逐渐产生了敌对分子。在这种威胁到同盟生存的情况下,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特使,让危害整个组织的生存的个别盟员离盟,重新建立联系,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和拟定须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同时,它采取步骤,吸收其他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而一直在盟外的人士加入同盟,<sup>250</sup>这些步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代表大会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便对章程进行审议。这次讨论的结果是章程的所有条款获得一致通过;大会建议把新章程提交各支部最后通过。为了陈述进行修改的理由,我们特作如下说明:

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事被通过了,因为:第一,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个门特尔的无耻叛变,旧的名称已被政府知道,因此改变名称是适宜的。第二,而且也是主要的一点,因为旧的名称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才采用的,这些

---

文件到这里为止是威·沃尔弗的手迹;以下是另一人(不是约·莫尔就是亨·鲍威尔)的笔迹。——编者注

事件与同盟的当前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丝毫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一个能表明我们实际是什么人的名称,于是我们选用了这个名称。按照同样的精神,我们换掉了从政治联合遗留下来的名称:“区”和“议事会”,这些名称带有德意志特性,这种特性会对我们同盟的已向各国人民公开的反民族主义的性质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把这些名称换成另一些真正能表达所应表达的意思的词。采用这样简单明确的名称,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带宣传性质的同盟去掉敌人竭力想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密谋性质。

大会没有任何争议就一致认为:必须重复召开现在在这里首次召开的代表大会,定期地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并且在保留各支部批准权的条件下把同盟的全部立法权移交给代表大会。——我们希望,在这里作出的决定中会找到一些重要的条文来保证代表大会为整体利益进行有效的活动。

一些条款被删去了,其中属于盟章规定的,用明确的盟章条款来代替,而其中属于一般共产主义原理的,则用共产主义信条来代替;这样,章程就具有更简单和更划一的格式,同时更准确地规定了每个领导机构的作用。

在章程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转入讨论由中央委员会准备的或者由各代表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首先讨论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六个月后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

会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届大会是在同盟的组织被削弱的时候宣布召集和举行的,它作为第一次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把自己看作是组织建设的大会。它认为,为了彻底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新的章程规定例行代表大会应在八月份召开,这样只有两个来月的间隔时间,又由于不能把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1848年8月,于是就决定,今年11月29日(星期一)在伦敦这里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不管是恶劣的季节还是又要增加费用都挡不住我们。——同盟已经经受了一次危机,在当前的情况下决不应当害怕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新的同盟章程包括关于选举代表的必要规定,因此我们希望,将有许多区部派遣代表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

同一位代表提出的关于拨出一定的基金用来派遣特使的建议,也获得了全体的赞同。——大家认为,我们的同盟要派遣两种特使。第一种是用同盟的费用派到一定地方去执行特殊的使命;或者在同盟还不存在的地区建立同盟,或者在同盟已经瓦解的地方重建同盟。这种特使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第二种是要回自己的故乡或者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工人。这些工人往往是很能干的人,只要同盟补偿他们为同盟而花费的额外开支,就可利用他们去访问一些距离他们旅居之处不远的支部,这将对同盟有很大的益处。这样的临时特使当然只能受区部委员会的直接监督,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向每个区部委员会收取一定的经费,并用这笔钱来建立派遣第一种特使的基金。此外,委托各区部委员会比过去更经常地以上述方式利用外出旅行的能干盟员作为临时特使,并从区部委员会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给他们额外的旅费。——



在特殊情况下,区部委员会可以请求从中央委员会的基金中拨给这笔费用;至于是否满足这类金钱要求,当然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每个特使应对给他提供经费的委员会负责并向它汇报工作。

你们大家都将看到,通过特使来组织宣传并使宣传服从集中的领导是多么需要。——我们希望,我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并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良好的效果。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大家没有任何争议地认为,这样的刊物极端需要。大家还同样没有争议地认为,这个刊物只能在伦敦出版,最多每星期出一期,最少每月出一期。——刊物名称、题词、开本已经确定,你们将通过在7月出版的试刊看到。有一个委员会负责编辑工作,直到杂志出版为止;然后将由一个编辑——已经任命——在委员会的协助下担任领导工作。——这一点讨论完以后,代表大会就转到开支问题。首先为了使印刷所完善,还需要很多东西,特别需要一台铁制印刷机,为此中央委员会受托向各区部收取一笔费用。然后对开支进行了估算。——结果是:如果一个印张的周刊每期售价2便士=4苏=2银格罗申=6克利泽,那么为了弥补开支就需要有相当多的订户,可是目前还不可能精确估计到是否有这么多订户。——如果出月刊,没有编辑,也许订户少些就能维持,可是月刊满足不了同盟的要求。——但是,如上所述,我们能否为周刊征求到必要数量的订户,是没有把握的,以致我们无法为此承担必需的义务。——因此我们决定如下:在7月份暂时免费发行一期试刊。然后各个支部通过它们的区部将自己有多少盟员呈报上来,因为大会决定,至少在

杂志每月发行一期的时期内,每个盟员要付一本杂志的钱,而每个支部只能得到一本,剩余的免费分发。——此外,盟员必须调查清楚在自己的地区里肯定可以推销多少份,必须征求订户,并汇报这方面的情况。——然后代表大会将在11月根据中央委员会提供的情况作下一步的决定,而且,尽可能在新年前出版杂志。目前伦敦印刷所将用于印刷传单<sup>251</sup>。

最后是关于共产主义信条的问题。——代表大会认识到:公开宣布同盟的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步骤;一种信条,过几年,也许过几个月,就不再合乎时宜,不再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了,这种信条一定会起有害的作用,而一个有用的信条将会带来益处,因此,对待这一步骤必须特别慎重,不应操之过急。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同盟机关刊物的问题上一样,大会深深感到,它不应拿出最终的方案,而只应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以便通过对信条提纲的讨论给正在复苏的同盟生活提供新的养料。因此,代表大会决定草拟这个提纲,把它发给各支部讨论、编写,各支部要把修改建议与补充意见寄给中央委员会。提纲 随信附上。——我们把它推荐给各支部进行严肃的、仔细的考虑。——我们一方面想离一切粗制滥造体系的行为和庸俗的共产主义远一点,另一方面又想避开多愁善感的共产主义者关于爱的粗俗无聊的呓语。相反,我们力求通过对共产主义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考察,永远保持一块稳固的基地。我们希望,中央委员会将从你们那里收到很多的补充意见和修改建议,并且再次要求你们就这个问题进行特别热烈的讨论。

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概况，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很乐意以最终决定的形式解决向我们提出的各项问题，很乐意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很乐意以信条形式宣布共产主义原理。但是为了同盟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应当在这里限制自己，应当再次向大多数人呼吁并把准备好的东西留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通过。

亲爱的兄弟们，现在你们应当来证实你们对同盟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关心。同盟胜利地度过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时期。优柔寡断和萎靡不振已经克服，同盟自身中出现的敌对分子已被清洗。新的成员已加入了。同盟的前途有了保证。可是，亲爱的兄弟们，我们的处境不允许我们有片刻放松我们的努力；还不是所有的创伤都已治好，还不是所有的漏洞都已填补，我们所进行的斗争的某些痛苦后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同盟的利益和共产主义的事业还要求你们在一个短时期内进行紧张的活动；因此，在几个月之内，你们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有片刻厌倦。特殊的情况要求特殊的精力。我们的同盟经历过这样的危机时刻：在此期间，我们首先必须同由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迫害的沉重压力，更多地是由于迅速改善社会状况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引起的沮丧作斗争；在此期间，我们不仅必须同我们的敌人，即受资产阶级控制或者与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反对我们的各国政府的迫害作斗争，而且要同我们自己内部的敌人作斗争；我们考虑到同盟的危险处境，考虑到讲德语的整个共产党有瓦解之虞，还必须不顾情面地战胜这些内部敌人并使之不能为害。——兄弟们！这样的危机是不可能一夜之间

就克服的。尽管同盟存在,尽管组织的力量又得到加强,但也还需要几个月的连续工作,然后才能说: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同盟盟员尽了自己的责任。

兄弟们!我们坚信,你们象我们一样,也会感到这些情况的重要性;坚信你们也完全能对付这种困难的情况,现在我们满怀信任地向你们呼吁,向你们对共同事业的热忱呼吁!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无耻的利欲使你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去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把你们靠艰苦劳动换取的微薄工资压到最低限度;我们知道,现在正处于饥荒和商业萧条时期,你们的负担特别沉重;我们知道,一旦你们终于找到时间和拿出钱来为共同事业进行活动时,资产阶级就会迫害你们,逮捕你们,损害你们的健康,威胁你们的生命;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你们再捐献一些钱,号召你们加倍努力。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为谋求整体福利作出决定而把我们选举出来的人,也准备努力和毫不犹豫地执行我们的决定;如果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同盟内,没有人不把共产党的利益,把推翻资产阶级以及把公有制的胜利视为他自己切身的、最宝贵的利益;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足够决心参加同盟,不怕因此而招致巨大危险的人,也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甘冒这种危险,使同盟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强大组织;最后,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遇到的障碍越大,他们就越勇敢、越积极、越受到激励;如果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就该羞得面红耳赤,退出整个运动。

兄弟们!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享受这次变革的成果。可是我们知道,这次变革来势迅猛,日益临近,我们看到,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到处都有愤怒的无产阶级群众投入运动,并且用一种有时还是嘈杂的但越来越响亮和清楚的声音,要求从金钱的统治下、从资产阶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资产者阶级越来越富,中间等级则日益破产,这样,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人民的苦难和富人的骄横,这场革命有朝一日终将爆发。兄弟们!我们大家都希望活到那一天。即使革命没有象议事会的信件<sup>252</sup>中所预料的那样在今年春天发生,即使我们未能有机会拿起武器,那么你们也不要因此而迷惘!这一天必将到来,那时人民群众将集结自己的队伍,打垮资本家的雇佣军,——那时将显示出,我们的同盟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怎样工作的!即使我们享受不到这场伟大斗争的所有成果,即使我们有千百人牺牲在资产阶级的霰弹之下,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牺牲者,终究是经历了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和这一胜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

就此结束。祝一切顺利!

以代表大会的名义

秘书                      主席

海·德                      卡尔·席尔

1847年6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

威·沃尔弗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卡·沙佩尔的盟内化名。——编者注

##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致汉堡同盟支部<sup>253</sup>

1847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兄弟们：

你们本月18日的来信及柏林的附件我们都按时收到了。你们准备一如既往地用言论和行动来争取我们的权利，这使我们感到高兴。

现在我们把代表大会致同盟的通告信以及新的章程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寄给你们，并且请你们对下面六个问题尽速作出答复，以便我们现在就能开始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 1 你们是否满意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否同意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
- 2 你们对新章程是赞成还是反对；
- 3 你们能否每一季度或每半年为我们提供一次用于代表大会通告信中规定的目的所需的经费，以及能提供多少；
- 4 你们是否已经组成区部，如果尚未组成，那么你们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和最妥善地将它组成。——见章程第十四条；

5 在你们那里能否发行将在八月份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以及能发行多少册;

6 社会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否在你们那里的居民中间得到传播,是以什么方式传播的,它们在居民中间有什么反应。

其次,我们请你们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进行一次认真的讨论,并且尽快地把你们认为适当的补充和修改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能够加以整理和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从而由大会确定信条的最后文本。

你们是否单独地或者同另一地方一起派一名代表出席下次代表大会。此事现在如已商妥,把情况告诉我们,那也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你们尽一切努力巩固和组织阿尔托纳、马格德堡、柏林等地的同盟,因此,请你们一有机会就把章程、信条草案以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转交上述地方的盟员。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因为现在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章程,所以你们应当简单地表明,你们对章程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你们认为必须修改和补充,请把你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寄给我们,然后由我们把这些建议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和作出决定。

兄弟们,再见!我们希望不久将得到你们的好消息,衷心地问候你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秘书 主席

约瑟夫·莫尔 卡尔·沙佩尔

既然威·马尔在汉堡,你们或许还认识他本人,那么请问,吸收他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是不可能和不恰当的吗?

通讯地址：伦敦肯宁顿路切斯特街 44 号  
罗斯夫人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

##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47年9月

### 中央委员会致同盟<sup>254</sup>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兄弟们！

自从代表大会结束和把大会的通告信发给你们以来，已经三个月过去了。因此，我们向你们再作一次关于过去这段时期的工作总结，并且向你们概述一下同盟的当前状况。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告诉你们十分令人高兴的消息，可是我们决定把一切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们，而不管它是令人高兴还是令人忧虑。有些人大概会认为，始终应该强调情况的最好方面，以便使人们不致失去勇气。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应当让大家知道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那些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困难。——谁是一个真正的人，谁就不会被困难吓倒，相反，却会受到激励而采取新的行动。

当我们的同盟还没有强大和巩固起来的时候，当它还没有积极地参与时事的时候，我们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的确，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基础，而且某些地方似乎也在以新的热情进行工

---

见本卷第424—437页。——编者注

作,可是总的说来,离我们早就应该做到的还很远。——在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发出之后,我们就希望能从各地得到对这封信的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回答。——中央委员会随通告信发出了一封附信,在附信中再次强调了必须答复的问题,并请求迅速而明确地作答。

直到现在,我们只收到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明确答复,其他地方则通知我们已收到通告信,对我们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发表了一些一般性的意见,这就是全部情况。

这种懈怠是从哪儿产生的?它要把我们引向何方?——许多德国无产者希望获得解放,可是,如果他们不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那么他们的确将不会有所进展。——烤鸽子不会自动飞入我们口中。——他们精神上的怠惰妨碍着许多人去行动;另一些人虽然说得很多,但是一旦要求捐款,他们就满脸的不高兴,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一文钱也不给;还有一些人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怯懦;只看到巡警和宪兵,并且总是认为,行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看到这一切,真是气得肚子痛。西里西亚、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黑森等地的绝大多数无产者,而且是最有活动能力的人,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领导,至少没有共产主义者的领导。

因此,我们再次要求我们的盟员能最终从睡梦中觉醒,着手工作,并要求首先对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作出明确的回答,以便至少使我们知道,我们能依靠谁。

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我们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新章程、共

---

见本卷第 438—440 页。——编者注

在原稿中有这样的脚注：“昨天收到莱比锡来信,见下文”(见本卷第 447 页)。——编者注

产主义信条和中央委员会的附信寄往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瑞典的十个建有支部的城市。——此外,我们还从伦敦派出了全权特使,两个到美国,一个到挪威,一个到德国,一个到荷兰。——所有的特使向中央委员会保证尽力工作,并且在他们将要逗留的地方立刻建立新的支部,使这些支部与我们取得联系。

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新的同盟机关刊物必须在八月份出版,大家答应为这个刊物投稿,并给予财力支援。此外,要求所有的盟员尽力予以帮助。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绝大部分诺言又停留在口头上了。除布鲁塞尔支部目前每月为报刊提供一镑,为宣传提供五法郎以及海德兄弟寄给我们一篇文章以外,直到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收到。——有人答应给编辑委员会送必需的稿件来,可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最后编辑委员会还是不得不亲自动手,包办一切,以便至少能出版一个试刊。如果我们今后得不到比以往更多的支援,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无法前进。要使我们的印刷所设备齐全,除了印刷同盟机关刊物之外还能印刷传单和小册子,我们还缺少六百法郎。这笔钱如单独在伦敦筹集,我们是办不到的。

自从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发出以来,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地方的消息:

瑞典。我们收到从这里派出的一位特使——他经过赫尔辛格到达瑞典并且徒步走遍了个国家——的信,信上注明:5月23日于乌普萨拉。这位特使在伦敦这里别无长物,就在他的手提箱

---

大概指约·多尔。——编者注

《共产主义杂志》。——编者注

在原稿上本段开头有个数字1。——编者注

指奥古斯特·安德斯,后来他有个绰号叫“拉普人”。——编者注

里装满了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顺利地越过边界把传单带到瑞典。——他给我们写道,在所有有德国工人的城市中,他就在作坊里访问这些工人,在他们中间散发我们的传单,他的宣传得到工人巨大的响应。遗憾的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不能在一个地方逗留那么长的时间去建立支部。——在斯德哥尔摩他把中央委员会最初的两份告同盟书<sup>255</sup>转交给地方支部(我们在北方的共产主义前哨),他带去的消息给那里的兄弟们增添了新的勇气。——他从斯德哥尔摩到乌普萨拉,又从乌普萨拉到耶夫勒,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去乌默欧和托尼欧的路上。这真是拉普人中的一位共产主义特使!

从卡尔斯克伦纳到伦敦来的一个盟员告诉我们说:以前在巴黎和伦敦的C兄弟在W建立了支部,并且那里的盟员已经超过一百名。从卡尔斯克伦纳来的兄弟给了我们C的地址,我们把这个告同盟书连同新章程、以及给那里的盟员的一封专函一起寄给了他。——我们收到从斯德哥尔摩寄来的一封注明日期是7月8日的信。我们那里的兄弟们满腔热情地赞同我们的原则。盟员福尔塞尔兄弟在他用瑞典语写的一本小册子<sup>256</sup>中反驳了一个公开攻击共产主义的教士,同时也在这本小册子中向人民阐明了我们的原则。——瑞典最大的报纸《晚报》也捍卫共产主义,反对僧侣主义。此外,他们给我们写道:“我们以前把斯德哥尔摩这里的教育协会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可惜现在它已落入市侩的手中。然而,在这里的斯堪的那维亚协会<sup>257</sup>内部大半是真正的民主分子,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而且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人是这个协会的主席,我们正从这个协会中召募我们的盟员。”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我们立刻用拉丁字体抄写了代表大会的通告信,共产主义信

条和章程 ,因为多数瑞典人不认识哥特字体 ,我们通过邮局把所有这些文件寄给了他们。——我们等待着对最近这次信件的答复。

德国。约在六个星期以前 ,一位特使从这里到柏林去 ,他给那里的兄弟们带去了我们的信 ,他一定会鼓励那里的兄弟们坚持下去。——他想在那里只逗留大约一个星期 ,然后到莱比锡去 ,并从那里给我们写报告。我们希望不久就得到消息。

在 Br . 的兄弟们通知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寄件 ,并且答应在最近给予详细的答复 ,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兑现。

汉堡的兄弟们确认已经收到我们的寄件 ,并对改变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表示遗憾 ,他们希望恢复这个名称 ;其次 ,他们声明 ,象在代表大会的通告信中所说的那样 ,如此激烈地攻击威·魏特林的追随者和格律恩的追随者 ,这使他们深为不满。他们主张温和、团结 ,并且说 :“一个人在原则方面不管是站得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攻击他和分裂自己的队伍 ,因为 ,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们表现得如此片面 ,我们能够行动吗 ?我们要把所有进步力量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并设法通过说服的方法逐渐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思想。”

我们必须答复汉堡的兄弟们 ,在代表大会通告信中陈述的关于改变同盟名称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 ,如果提不出重要的反对理由 ,中央委员会将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坚持保留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恰恰表明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要求什么 ,而老的名称却反映不出这个情况。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是模糊不清的 ,然而我们必须明确的。——因此 ,但愿汉堡的兄弟们再读

一代表大会通告信中提出的理由。如果他们能驳倒这些理由,那么我们就同意他们,如果相反,光是感情用事,我们将不予理睬。

关于第二点,我们想指出,我们决不是攻击魏特林分子和格律恩分子,而只是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觉醒的时候到了,因此我们不能再同失去所有活力的梦幻者和贩卖体系者打交道了,我们不愿意拖着尸体走。格律恩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喋喋不休地空谈平等,但并不懂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批评一切,唯独不批评自己,一句话,他们是说得很多而什么也没有做的自命不凡的人。我们不是圆滑的资产者,因此我们说话不是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也就是直言不讳。

十余年来,有人在同盟内鼓吹温和、宽容和团结,尽管进行了这些说教,尽管宣传兄弟友爱,可是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而且在最近一年来濒于瓦解。——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做法,如果要求我们一辈子庸庸碌碌,耽于空想,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看法是:一千个盟员,其中有一半不坚定和不热心,还不如一百个能干的盟员。——我们不是停下来,去扶助那些裹足不前的人,而是勇敢地向前进,这样,也许能使其他人快一点行动起来。——此外,汉堡的兄弟们尽管提倡温和,可是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关于为宣传和办刊物寄钱来的事,他们只字未提;关于同盟机关刊物的事,他们说,由于失业增加,只能购买很少几期刊物。

我们在这里必须说清楚,每个盟员必须购买一本杂志,如果盟员付不起钱,就让他所在的支部代付。

再说一遍,兄弟们,不要为了不合时宜的温和,为了互相对立的力量凑合而消耗掉我们的全部力量,从而使成为其他党派嘲笑的对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工作。如果我

们愿意 ,我们不要别的 ,要的只是 :勇气 !勇气 !勇气 !如果人们不能或者不愿象我们那样走得那么远 ,—— 好吧 ! 只要他们心怀诚意 ,我们就不会不尊重他们 ,可是要我们为了同他们联合而倒退 ,那我们声明 :永远办不到 !

不久以前 ,我们莱比锡的兄弟们来信说 ,一些盟员被中央委员会的措词有点激烈的书信吓倒 ,从而退出了同盟。其余的盟员答应同心同德 ,尽力工作。—— 我们只能祝贺莱比锡的兄弟们 ,因为他们摆脱了那些没有勇气成为真正的人的人。昨天我们收到了莱比锡的来信 ,这已经是以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更为坚强有力的语调写成的信。—— 可以看出 ,那里的支部摆脱了犹豫不决的状态。

首先 ,莱比锡支部认为 ,必须把信条制订得更科学 ,更适合于社会各阶级。—— 它建议对信条进行差不多是全面的修改 ,并为此申述了理由。我们将把这些建议修改的地方提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同意信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其次 ,莱比锡支部声明 ,为了推销我们的杂志 ,它除了为盟员购买的份数外准备还购买十二份。如果所有的支部都学习莱比锡支部的榜样 ,那么同盟的机关刊物就可以每个星期出版而且半价出售了。—— 我们要求把为宣传和办刊物而收集起来的捐款尽快地寄来。—— 我们估计 ,在莱比锡很快会成立第二个支部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第一个支部就可能并入 B1 . 的支部 ,我们将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没有从 Mn . 得到一点消息 ,也不知道那里的通讯地址 ,因为我们在那里的通讯员想必是到巴黎去了。—— 我们将设法尽

---

大概指柏林。—— 编者注

大概指慕尼黑。—— 编者注

快地同那里的支部恢复联系。

我们不可能把代表大会的通告信由邮局寄往美因兹。——这里的一个盟员刚刚在一个月之前动身前往,我们已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随身带去。——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得到那里的答复。不久以前我们收到美因兹的盟员的一封来信,信中告诉我们说,那里正打算成立第二个支部,从而组成一个区部。——我们的美因兹的兄弟们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然而这只能更加促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努力地工作。——光荣属于勇敢的美因兹的无产者;如果在德国到处都象那里一样行动,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了。

荷兰。在阿姆斯特丹有一个教育协会同我们保持着联系,协会中有些能干的人。——三个星期以前我们派去一个全权特使,打算成立一个支部。<sup>258</sup>

美国。今年春天从这里前往纽约去的特使,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同盟在新大陆的状况的可悲图景。——当魏特林到达那里并在同盟内播下不和的火种的时候,纽约的同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各次会议上都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吵,结果是整个组织瓦解。——纽约的支部以前经常劝告我们要温和,固请我们同魏特林和解;可是,现在,在魏特林到达后十四天,这些支部自己就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通讯员情绪低落,以致为了避免把那里的同盟的可悲情况揭露出来而不想再给我们写信了。——这些情况是在那里的特使写信告诉我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纽约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于是就到威斯康星州去,他答应在那里为我们的事业尽力工作。

---

约·多尔。——编者注  
在1847年初。——编者注



在菲拉得尔菲亚还有好多盟员,我们坚决要求他们在那里重新建立支部。——我们委托几个星期以前从这里前往纽约和菲拉得尔菲亚去的两个特使,要他们尽最大努力按照修改了的章程在这两个地方把同盟恢复起来。

法国。马赛的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有几个盟员从里昂往那里去了,他们答应尽他们的最大可能使那里的同盟获得新生。

里昂来信说,那里的盟员在尽力地工作,并在讨论信条。——除关于接收新盟员问题的第七章以外,里昂区部同意全部新章程。——里昂的盟员认为,没有必要要求被接收者宣誓,因为有许多例子证明,有的人什么事都满口答应,结果一点也不履行;主要应该看一个人的品行怎样。——我们向里昂人指出,我们要求的决不是誓言,而是诺言。此外,里昂人写道:

“因为我们在九月又处于危急状态,所以我们请求你们征询巴黎人的意见,他们能否派出一些愿意为共同的事业牺牲、愿意在里昂居住一些时候的能干盟员。老的盟员都想离开,因此缺少能够担任领导的人。

因此你们要设法防止可能发生的瓦解。

关于即将在你们那里出版的杂志,我们还不能确定能要多少份,因为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关于为办刊物和宣传而寄钱来的问题,他们在信中没有提到。

我们坚决要求巴黎的兄弟们尽快地派一些能干的盟员到里昂去。

巴黎来信告诉我们说,章程在那里获得一致通过,各支部正在讨论信条,盟员的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我们还没有获悉讨论的结果,也没得到关于他们是否为办刊物和宣传而筹集经费的消息。但

是,我们必须说,巴黎人值得赞扬的是:他们最近捐了不少钱,用于派遣一个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和一个特使到瑞士。

很遗憾,从一位在巴黎的盟员写给中央委员会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在巴黎的各支部中还有许多人尚未摆脱格律恩的谬论和蒲鲁东的稀奇古怪的观念。奇怪的是,这些身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人,似乎在屏弃共产主义;他们只要平等,此外什么也不要。——看来这些内部纠纷也是我们很少从巴黎得到消息的原因。蒲鲁东成了这样的真正德国的哲学家,以致连他自己也不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格律恩把蒲鲁东的观点弄得更含糊了,因此,当然不能要求这两个人物的学说的追随者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求蒲鲁东的信徒和格律恩的信徒读一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我们听说,这本书也译成了德文<sup>259</sup>。他们将会明白,他们噜噜苏苏和拐弯抹角地要求的平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现代的国家。——可见,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思想圈子里打转,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们要求巴黎的共产主义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使错误思想在各支部中消失。如果格律恩的信徒和蒲鲁东的信徒坚持他们的原则,那么只要他们还是正直的人,他们就应该退出同盟而单独行动。——在我们同盟中只能有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的支部中有格律恩的信徒,那就不管是他们还是我们,都不能进行有效的宣传;力量将会分散,年轻人会泄气。——可见,分裂要比内部纠纷好<sup>260</sup>。

---

弗·恩格斯。——编者注

斯·波尔恩。——编者注

可能是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被清除的魏特林分子又给我们写来一封冗长的信,在信中攻击我们和巴黎的支部并硬说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信的结尾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可靠的通讯地址,因为他们大概还有事要委托我们办。——但是,他们丝毫没有谈到:他们虽然是少数,却把巴黎各支部的全部储金扣留,掌握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手中。——这样的行为同他们的领导者的盗窃理论<sup>261</sup>无疑是一致的。

我们很客气地给他们回信说,我们是根据义务和信念行动的,我们也将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诽谤不能损害我们。——我们把他们索取的地址寄去了,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

瑞士。中央委员会把一个特使 即将到达的消息告诉了在拉绍德封的兄弟们,并要求他们尽力协助他改组瑞士的同盟。

伯尔尼支部从前些时候起就已经表现得模棱两可。那里来信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出版一个共产主义的刊物《漫游者》,并请求我们予以支持。

我们给洛桑和拉绍德封寄去二十五法郎和一张五十法郎的支票。但是,这笔钱却被伯尔尼人用于印刷当时已经表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最凶恶敌人的卡尔·海因岑的小册子。——6月29日,我们又收到伯尔尼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们,青年德意志派<sup>262</sup>用尽一切手段来反对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信中还要求我们尽快地创办一个同盟机关刊物。同时给我们寄来了一本小册子《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主们》,并请求我们为了使《战争条例》、《准备》等<sup>263</sup>能继续

传播而自愿捐款。信中写道：“共和派中的某某人，也就是勇敢的海因岑，的确怀有高尚的意向，但是他的双手被缚住了，他不是德国共和运动的灵魂，现在他是得力助手，等等。”

海因岑极端疯狂地反对共产主义者，但是伯尔尼支部却印刷和传播他的小册子，看来是同他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对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有怀疑。——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每一个正直的人今天都应当亮出自己的旗帜。因此，我们给伯尔尼支部写了一封严肃的信，请它立即作出解释，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

我们的特使从日内瓦来信说，在那里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十分可喜的进展。——今年春天，有两个盟员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支部；当特使在那里逗留时，成立了第二个支部，而且第三个支部也可望成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公开的协会，正被用来培训能干的共产主义者。因此，看来我们的党在日内瓦又站稳了脚跟，如果我们的兄弟们在那里继续象以前那样努力工作，那么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不久就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正如特使在信中所说的那样，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已经往拉绍德封写了许多信，这些信充满着对一些盟员的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并要求那里的盟员加入他们一伙。但是，拉绍德封各支部没有接受这些人的要求，而是等待我们的特使到达，再给予明确的答复。我们的特使在日内瓦同洛桑的彼得逊取得了联系，后者对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愿我们的特使能够争取他参加我们的运动。

巴黎的魏特林分子用从我们的同盟那里强占去的钱把一个叫霍恩舒的人作为特使派往瑞士，他的任务是把那里的支部拉到他

们那边去。这个霍恩舒现在在洛桑。他以前在伦敦呆过,因此我们对他很熟悉,可以断定,他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宣传。——他是一个非常无聊的空谈家,根本没有多大用处。他在离开伦敦的时候请求他的支部垫付一小笔旅费,答应在最短期间内归还。支部同意给他二十五法郎。——从那时起两年过去了,尽管时常提醒他,但他还是分文未还。象霍恩舒这类以迎合自己好逸恶劳和傲慢自负的脾气为唯一目的的人,至今还有机会糟蹋无产者辛辛苦苦挣得的钱,这确实是可悲的。

我们的特使现在正在日内瓦湖周围的各城市旅行,然后将到拉绍德封等地去。——为了能完成这次旅行,他请求我们继续提供经费,我们立即给他寄去五十法郎,但这些钱是我们借来的,因为我们的储金已经用光了。

比利时。在比利时,我们的事业很顺利。——自代表大会以来,在这个国家已成立了两个区部。其中一个在列日,我们与它尚无直接联系,但是,每天都在等那里的来信。

布鲁塞尔区部同莱茵普鲁士建立了联系,工作很努力。<sup>264</sup>它已建立了歌咏团和教育协会。<sup>265</sup>这两个团体都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它们是入盟者的预备学校。

章程在布鲁塞尔获得通过;不过提出两处修改意见交下次代表大会讨论。——第一处修改涉及第一章第三条的“e”,第二处涉及第五章第二十一条。<sup>266</sup>布鲁塞尔人说:“我们认为,禁止盟员加入任何政治的或民族的组织是不策略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丧失能影响这些组织的一切机会。”其次,关于第二十一条,“如果处于革命高潮时期,那么这种限制就会束缚代表大会的全部活动能力。我们记得,1794年贵族们在国民公会上曾提出过同样的要

求,想使它的所有活动瘫痪。”

我们要求各支部仔细审查上述建议,并向自己的大会代表发出与这两项建议有关的指示。

关于共产主义信条,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我们将把它们提交代表大会讨论。

上面提到,布鲁塞尔区部同意为办刊物捐款二十五法郎,目前每月为宣传捐款五法郎。——我们请其他区部尽快地仿效这个范例。

伦敦。在伦敦,新的章程一致通过了。所有的支部都在热烈地讨论共产主义信条。——讨论一结束,这里的区部委员会便会把所有的修改和补充意见送交我们。——最近两个月,有一大批盟员离开这里,但是,我们一定会在近期内把这个已经形成的空额重新补上。教育协会是我们的预备学校,它们的巨大效果正日益明显。

伦敦区部十分团结,而且有为我们的事业尽力工作的良好意愿。——最近半年,我们在这里支出了一千多法郎用于书刊,用于杂志、邮费、印刷费、与代表大会有关的各项开支和派遣特使等等。——其次,每个盟员每周须向教育协会储金会交纳三便士,此外,几乎没有一次晚间会议不为急需救济者进行私人募捐。——我们的盟员一半以上没有工作,生活贫困。因此,我们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单独承担所有的费用。——因此,为了使同盟的印刷所能有齐全的设备,为了继续发行我们的杂志以及为了宣传,我们不得不恳切请求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尽力和尽快地给予我们以金钱上的

帮助。目前,我们的钱已全部告罄。以前一当别人需要钱时,我们总是把钱寄去,因此,现在我们可以料想到,人们不会把我们抛开不管。

我们同盟的杂志的试刊在伦敦销路很好,并且引起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的重视。——我们把它陈列在许多书店和报亭里销售。杂志已按所有地址寄去,而且还存有一千份,以便能寄到还需要它的地方去。

关于同盟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就到此结束;现在你们自己可以判断一下:我们的事业的情况怎样,中央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在最近三个月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你们将会看到,如同我们已在告同盟书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虽然到处都在积极地工作,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离早就应该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因此,兄弟们,我们希望你们现在贡献出你们的全部力量,使我们能迅速前进,并能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比以往更为令人兴奋的消息。

然而在结束这个报告之前,我们还要求你们认真考虑以下各点。我们坚决要求:

1 所有的区部和独立支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选举一名代表出席下次代表大会,并设法使代表能于今年11月29日抵达伦敦。——你们知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未能作出最终决定,因此,认为有必要在今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sup>267</sup>——第二次代表大会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大会不仅要拟定共产主义信条,而且还要作出关于同盟及其机关刊物的最终组织以及将来如何进行宣传的决定。——因此,有尽可能多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兄弟们!我们希望你们要为履行

自己的职责而不惜牺牲。

2 凡是还没有为办刊物和宣传募集捐款的区部和支部必须毫不迟延地做到。——如果大家都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工作。——没有钱我们就不能进行宣传。——我们要求那些已经募集了捐款的区部和支部尽快把款寄来。

3 凡是还没有对代表大会通告信作出明确答复的区部和支部必须迅速地作出答复。

4 凡是还没有说明自己需要多少份我们的杂志的区部和支部,必须立即告知所需之数。其次,务必把能够最迅速、最安全地将杂志投递到各有关地点的路线通知我们。

5 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必须向我们报告: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否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以及宣传的方式是怎样的。

6 欢迎所有盟员给我们的杂志编辑部投寄文章和诗歌。我们已经说过,不少盟员曾答应为第一期撰稿,但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我们显然不应有的懈怠。

希望不久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和明确的消息。向你们致敬。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并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卡尔·沙佩尔 亨利希·鲍威尔

约瑟夫·莫尔

1847年9月14日于伦敦

又及。正当告同盟书要付印时,我们收到德国和瑞士特使的来信。

德国的来信说:我们在柏林的兄弟们,特别是在那里发生了尽



人皆知的事件<sup>268</sup>之后,热情空前高涨。——政府正好帮了我们的忙。——由于围绕着共产主义者掀起的喧哗,我们的原理已为大家所熟知,人民对我们的原理不但不畏惧,反而受到鼓舞。特使在他的信的结尾写道:兄弟们,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到处都有捍卫正义事业的能干的人。

来自瑞士的消息最为可喜。——同盟在那里已组成,并且在十个以上的不同地区已经有了组织。——彼得逊被争取过来了。

特使写道:在拉绍德封和勒-洛克尔,我们有在我看来是最好和最热心的盟员。——他们的斗志不可动摇。——好啊,兄弟们,前进吧!——被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到处碰壁。——与伯尔尼支部的误会消除了。——我们现在声明:我们对那里的兄弟们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他们是坚定地遵循我们的原理的。——我们为能作这样的声明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其余的在下次报告中再谈。

中央委员会

卡尔·沙佩尔 约瑟夫·莫尔

亨利希·鲍威尔

第一次发表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  
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  
汉堡版

原文是德文

## 《北极星报》关于 1847 年 11 月 29 日 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 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的报道<sup>269</sup>

11 月 29 日,上星期一,在德鲁里街德意志协会大厅召开了群众大会,纪念 1830 年的波兰起义。

大会是由“民主派兄弟协会”和复兴波兰民主委员会联合召开的。大厅挤满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波兰的代表。

约翰·阿诺特先生当选为主席。他在说明了会议的目的以后,请斯托尔伍德先生宣读第一项决议案。

斯托尔伍德先生叙述了勇敢的波兰人在华沙的英雄行为和他们对自由事业的无限忠诚,并且称赞《克拉科夫宣言》<sup>270</sup>是民主纲领的典范,然后宣读了下述第一项决议案:

“我们认为肢解波兰是应当永远遭到人类唾骂的滔天罪行。我们以敬佩的心情缅怀波兰人民在 1830—1831 年为恢复自己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尊敬地悼念那些在使本国人民摆脱奴役的光荣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并且对目前一切遭监禁、戴镣铐、被流放的受迫害者寄予同情。”

接着要对决议案表示附议,主席请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发言。琼斯先生说:“十七年前的今晚,波兰从沉睡中醒过来进行殊死的

斗争 ;十七年前的今晚 ,她用力活动她那绑在俄国刑具上流着血的四肢 ,挣断了她身上的绳索 ;十七年前的今晚 ,她从一个省变成了一个国家 ! (欢呼声)华沙是一片沉寂。俄国丝毫没有料到起义 ,可是起义的烽火突然燃烧起来了。”接着琼斯先生生动地描述华沙起义的进展和胜利 ,同时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一情况 在人民武装起来之前 ,结局是难以预料的。“随后的实际情况是令人震惊的 几小时后 ,康斯坦丁大公就带着他的一万一千名俄国人撤出了莫克斯托夫哨卡 ,并且不得不象一个冻得发抖的流浪汉那样在光秃秃的树下过夜。”(掌声)接着讲演人提到了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情况 ,并表示相信 ,“如果起义是人民的起义 ,而不是贵族的起义 ,如果它有一个象光荣的克拉科夫宣言那样的宣言作为根据 ,那么就一定会成功。(欢呼声)但是我们也无须沮丧。—— 波兰准备进行新的斗争。—— 有许许多多烈士需要我们为它们树碑立传 ,也会有许许多多新的英雄涌现出来 欧洲的局势预示着他们胜利的前景”。讲演人接着指出了欧洲各国已处于国内变革的边缘 ,分析了列强存在的隐蔽的弱点 ,他在对爱尔兰谈了一些有力的鼓舞人心的话以后 ,号召他的听众做好准备 ,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内外的斗争 ,从而结束了他的演说。琼斯先生的讲演极其雄辩有力 ,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米歇洛先生用法语作了生动的演说表示支持 ,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卡尔·沙佩尔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 ,宣读第二个决议案 ,他说 :“公民们 ,当人们在伟大的事业中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的时候 ,虽然他们起初也许不会成功 ,但是他们最后一定会胜利 ;而这样的人应当博得最大的尊敬 ,因此他表示向英勇的波兰人致敬。(大声欢呼)向在华沙城下牺牲的人们致敬 ,向被刽子手屠杀的人

们致敬,向在西伯利亚矿井中遇难的人们致敬,向在克拉科夫阵亡的人们致敬,向一切为自由捐躯的烈士致敬。(经久不息的掌声)

1830年7月法国爆发了革命,后来在11月,普遍响起了要求自由的呼声,许多人希望波兰摆脱俄国的羁绊,但是并不希望波兰废除农奴制;可以确信,如果不是波兰贵族力图使这一奴役群众的制度永远保持下去,革命就已经成功了,整个斯拉夫民族现在都已经自由了。(大声欢呼)可是波兰的无产者问道:‘如果波兰摆脱俄国的统治,而我却还要挨波兰贵族的鞭子,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说得对,说得对!)这样一来,革命失败了,波兰的儿子们被迫流亡,他们把自由的种子带到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而在1845年又精神焕发地回到波兰的国土上,并以克拉科夫共和国的名义颁布了他们那具有民主精神的著名的永远光荣的宣言。(经久不息的掌声)但是啊,努力是徒劳的,1830年播下的恶种结出了恶果,专制君主们得以利用农民来反对爱国者,<sup>271</sup>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梅特涅的黑心又一次由于看到阵亡的波兰烈士的鲜血而幸灾乐祸。(说得对,说得对!)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兄弟情谊飞传四方,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原则遍布各地。(大声欢呼)请看瑞士<sup>272</sup>。(经久不息的掌声)不管土伊勒里宫的干瘪的老蜘蛛怎么样,自由仍然取得了进展。(一提到“蜘蛛”,全场哗然。)瑞士的激进派战胜了路易·菲利浦和基佐。接着漂亮的帕麦斯顿勋爵来了,他说道:‘让我们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吧。’无能为力的巴黎老蜘蛛答道:‘可不是吗,这正是我所想的。’(笑声)因此连一个团也没有开进瑞士,老蜘蛛不敢派他们去。(大声欢呼)这也是民主的胜利。现在谁是阴谋家呢?是梅特涅,是法国的干瘪的老蜘蛛,是帕麦斯顿勋爵和耶

稣会派。(大声欢呼)但是人民将很快识破他们的阴谋。”(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讲演人说,他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布鲁塞尔成立了民主协会,即民主派兄弟协会,该协会派了一名代表即博学的马克思博士前来出席这次会议。(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沙佩尔公民宣读了致在伦敦集会的“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这一文件:

“我们,下列签名的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为了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兄弟情谊,荣幸地委派本委员会副主席卡尔·马克思博士为代表前往你处,以便建立两个协会之间的通讯联系和友好关系。马克思先生将代表本委员会全权处理上述有关事宜。

致兄弟般的敬礼

名誉主席 梅利奈(将军)

主 席 若特兰

副 主 席 安贝尔

秘 书 皮卡尔

格奥尔格·维尔特

列列韦尔

1847年11月26日于布鲁塞尔”

这一文件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卡·沙佩尔高度赞扬了伟大的波兰爱国者列列韦尔和鬃发斑白的老战士、“法兰西共和国的儿子”梅利奈将军,最后提出如下决议案:

“在保证全力支援波兰爱国者的同时,我们坚决不赞同对1830年的斗争有决定性影响的贵族精神。我们认为包含有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的广泛原则的1846年克拉科夫宣言,是波兰进步

的表现,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自由和社会幸福。”

鲁卡斯附议这一决议案,他为见到这样多的民主派兄弟表示满意。他相信:如果英国的民主派(宪章派)获得了自由,他们就能够对“巴黎的老蜘蛛”以及所有的专制君主说:“站住,不准前进一步”。(欢呼声)

决议案随即被一致通过。

接着来自布鲁塞尔的代表马克思博士走上讲台,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用德语发表了一篇生动的演说,其中心内容是:布鲁塞尔的民主派委派他前来以他们的名义向伦敦的民主派,并通过他们向英国的民主派呼吁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以便在全世界争得自由。(大声欢呼)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已经召开了会议<sup>273</sup>,不过他们的兄弟情谊是单方面的,一旦他们发觉这样的会议很可能有利于工人,他们的兄弟情谊马上就会中止,会议马上就会被解散。(说得对,说得对!)比利时的民主派认为英国的宪章派是真正的民主派,只要他们实现了他们宪章上的六点,就会为全世界敞开走向自由之路。讲演人说:“英国的工人们,努力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吧,那时你们将被誉为全人类的救星。”(热烈欢呼)

朱利安·哈尼宣读了另一个决议案如下:

“本会欣悉布鲁塞尔成立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消息,为响应该会提出的团结的倡议,与会者怀着深厚的兄弟感情接待了它的代表马克思博士;本会热烈赞同关于召开各国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建议,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兄弟协会’不论何时召开代表大会,本会届时保证派代表出席。”

讲演人读完决议案后,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讲到1830年的

波兰起义,宪章运动的进展,在英国为实现宪章<sup>221</sup>而开展的强大运动的前景,“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重要意义以及拟议召开的各国民派代表大会能够带来的巨大益处。他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呼

斯托尔伍德先生表示附议,决议案被一致通过。

接着向光荣的列列韦尔发出三次雷鸣般的欢呼,向英雄的梅利奈将军三次欢呼致敬,向布鲁塞尔民主派三次欢呼致敬。

查理·基恩宣读第四个决议案如下:

“我们承认一切人的兄弟情谊,同时认为,为争取民主的原则在各国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相信实现‘人民宪章’将促使大不列颠人民比英国政府迄今所发表的纸上‘声明’更有效地支援波兰的事业,我们欢呼英国人民为使他们长期被剥夺的权利和参政权得到立法机关的承认和议会的批准而进行的巨大努力。”

讲演人说,他们宣传普遍的兄弟情谊,因为他们体会到由于缺少它而造成的恶果。诚然,礼拜天在教会和教堂里有人告诉他们:“我们都是兄弟”,可是如果在他们离开教会或教堂的时候下起雨来了,他们想搭乘他们那些有钱的兄弟的马车,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大吵大闹啊!(大笑)可是,十分钟以前正是这些人还在应答这样的祝词:“人人皆兄弟。”(说得对,说得对!)尽管这样,兄弟情谊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且只有普遍地承认它并且实践它,才能获得真正持久的和实际的效果。(大声欢呼)他们集会纪念波兰革命,而问题是他们能做些什么来援助波兰呢?没有权力——就什么也谈不到。他们争得了宪章,他们也就有了权力。(欢呼声)

公民恩格斯(来自巴黎)表示附议,他说:公民们,这次纪念波兰革命不仅对波兰,而且对全世界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使民主的

原则传播得既远且广。(说得对,说得对!)他作为一个德国人,特别关心波兰的成功,因为它将促进德国的解放,而德国已经下定决心迟早要争得自由。(大声欢呼)他坚信任何民族不为所有其他民族谋利益,就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他在英国住过几年,并且为能够称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宪章派而自豪。(经久不息的欢呼声)现在谁是他们的主要压迫者呢?不是贵族,而是那些守财奴和吝啬鬼,即资产阶级。(大声欢呼)因此,各国的工人阶级有义务团结起来争取大家的自由。(热烈鼓掌)

公民特德斯科(来自布鲁塞尔,他用法语向大会致词,这里引述的几句话还不能公正地反映他的雄辩的口才)说道,比利时人把英国的民主派看作是起领导作用的党并且相信他们一定会实现人民宪章这一伟大措施。他喜欢这里普遍具有的精神。他将回到布鲁塞尔,并且讲述英国无产者富有美好热烈的感情以及他们决心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实现他们的宪章,他相信宪章这一措施能做到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说得对,说得对!)而且这一措施将推动进步事业的发展,使整个欧洲大陆向它学习,从而争得普遍的自由。(大声欢呼)

波兰流亡者奥博尔斯基上校说,波兰革命爆发时,两百军士牵制了俄国三个团,当这些团中有人发现他们是在对波兰作战时,他们就掉转枪口对准他们的压迫者。旧波兰虽然已经死去,可是新波兰必将兴起,而且必将变得出她的先辈强大得多。(大声欢呼)他还希望看到波兰是争取自由的最早的战场。他怀着对英国人民的感激的心情高呼“民主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

公民恩格斯接着说,他最近才从巴黎来,巴黎的真正民主派都赞成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大声欢呼)



决议案随即被一致通过。

朱利安·哈尼再次走上讲台,宣读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辩护词的摘录,梅洛斯拉夫斯基是1846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现正关押在柏林的监狱并被判处了死刑<sup>274</sup>。宣读上述摘录使与会者十分激动。朱·哈尼接着说,他的朋友恩格斯的发言使他感到特别满意。他高兴地看到,德国人对波兰人怀有深厚的兄弟情谊。他相信,德国人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就会立刻采取重大的民族补救行动,即破坏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帮助叶卡特林娜完成的事情——毁灭波兰。他知道如果法国人获得自由,如果他们打倒了使法国蒙受极大耻辱的丑恶的专制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将会是波兰的解放。(欢呼声)下一次法国向莫斯科进军,就不会由一个皇帝来担任她的指挥者了。拿破仑有一句格言:“政治错误比政治罪行更糟糕。”他是既犯了罪,又犯了最大的错误,因为他在向俄国进军途中抵达华沙时,拒不宣布波兰的复兴。如果他宣布波兰共和国拥有昔日的全部版图,他就再创造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两千万人民就会成为他的后备军——一支为不可战胜的热情和对自己的解放者的忠心所激励的军队。但是,不,拿破仑虽然是国王们的威胁,他却是人民的暴君;虽然是“神权”的死敌,却同样是人民主权的敌人。他想和北方的专制君主讲条件,但这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波兰和在这个君主的铁蹄下备受蹂躏的其他民族。他的自私自利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当拿破仑在逃避哥萨克的复仇利剑和更为可怕的阵阵冰霜风雪以及伴随而来的饥馑和瘟疫时,他在波兰却找不到一块防御地带来藏身,使他的疲惫不堪的士兵稍事喘

息,以便向追兵反攻。他拒绝使波兰得到重生,所以当他需要她助一臂之力来摆脱莫斯科人的打击时,却无从借用这一力量。不过未来的共和国一定会补救这位皇帝的政治罪行,而法兰西成为共和国和英国人民获得自己的宪章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讲演人最后建议向主席表示感谢。

卡尔·沙佩尔表示附议,伊萨克·威尔逊先生也表示支持,他说,同两个星期以前在包令博士主持下于“王冠和锚”举行的那次会议相比,他刚才亲眼看到的会议经过情形真使他大为高兴,在那次会议上他不得不提出修正案。(欢呼声)

接着鼓掌通过了这一建议,向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对大家的赞许表示谢忱,然后会议向“英雄的受难者梅洛斯拉夫斯基”三次欢呼致敬,向《改革报》和法国民主派三次欢呼致敬,向《北极星报》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三次欢呼致敬;三次愤怒高呼反对《泰晤士报》、《辩论日报》和《奥地利观察家报》。

接着公民莫尔引吭高歌《马赛曲》,这次有意义的会议就此结束。

载于 1847 年 12 月 4 日《北极星报》  
第 528 号

原文是英文

##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告瑞士人民书

### 建立于布鲁塞尔(比利时)以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目的的民主协会致瑞士人民

我们的瑞士兄弟！

在你们国家中刚刚结束了一场折磨人的斗争<sup>275</sup>。各国人民都怀着与忧虑交织在一起的不安心情注视着你们国家，在目睹内战场面时，这种心情总是会在高尚的心灵中产生的。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谈论这次冲突的原因。双方都希望自行解决，而不需任何调停。

有些人未被邀请而竟想为你们的内部争端充当自愿仲裁人的角色，让他们的有罪的冒失行为受到谴责吧！

但是，这种冒失行为有变成另一种性质的危险。

自由的所有朋友们即使不是为此警觉不安，那也有权对这种行为表示愤慨。

至于那些或多或少强烈的、或多或少真诚的愿望，甚至对这方或那方提供援助，一开始就可以用政治观念或宗教观念领域中的意见分歧来说明，而用不着去寻求其他的动机。

现在谈的是另一个问题。

君主会议干涉你们的事务<sup>276</sup>，只能理解为或明或暗地攻击你

们的制度 ,特别是攻击你们近十五年来在制度上所获得的合法发展。

被封建篡夺者从欧洲所有其他部分彻底赶走了的自由 ,你们保存了将近六百年 ,你们瑞士人 ,我们的兄弟 ,在各国人民准备要求与你们分享自由这个关键性时刻 ,你们应该为我们 ,为你们自己最后一次保卫这笔宝贵的遗产。

如果你们让人从你们那里夺走这笔遗产 ,那么 ,持久警惕的六百年时光 ,对于你们以及对于欧洲所有其他部分 ,就一去不复返了。由于你们这种持久警惕 ,我们向你们深致谢意。

你们的民主制度如果被赶到大洋彼岸 ,赶到新土地上去 ,就会在长时期内不再是我们经常学习和可以效法的榜样。

由全民选出的执政者治理国家 ;—— 管理国家事务 ,没有繁重的苛捐杂税 ,劳动者不会因支付许多无用官吏的薪金而破产 ;—— 保卫国家 ,不设常备军 ;—— 国家的工商业繁荣 ,不收关税 ;—— 信仰自由 ,没有神权政治的统治 ;—— 如果瑞士容许国王、银行家、大臣、雇佣兵、垄断者和空论派等合伙干涉自己的事务 ,那么 ,哪里还能找到这种值得效法的、当前为整个欧洲所向往的制度的典范呢 ?

他们的干涉只能有一个目的 ,这就是彻底消灭这个处于欧洲中心的、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自己管理自己而不用他们帮助的人民典范。

我们由于最近各种意外的政治事件从欧洲各个角落来此集会 ,并且也处于象你们一样自由和几乎照你们那种方式获得自由的小民族之中 ;我们对于上述目的是了如指掌的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你们瑞士人 ,我们的兄弟 ,表示我们一致的希望 ,希望你们对蓄意反对你们的外交阴谋予以应有的反抗。

我们恳求你们不要理睬五国宫廷(我们不是说:五国人民)向你们提出的阴险的调停建议,它们互相勾结,以便把你们诱入致命的圈套。你们不应害怕来自他们方面的各种威胁。你们只是应该当心他们的阴谋。

即使这些宫廷的威胁来势汹汹,你们只要估计到他们有日益增长的内部困难,是可以同他们实际上拥有的力量较量一番的。

如果他们想以力服人,你们将不乏同盟者。我们的瑞士兄弟,你们已如此完好地把欧洲的民主自由这笔神圣的遗产保存至今,并敢于在最近用它来为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服务,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建议把它保存下去。

你们将向世界显示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先向你们表示我们的谢意和我们的真挚同情。

谨代表上述民主协会,并根据1847年11月29日协会全体会议(同一天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先举行了波兰起义周年纪念活动)通过的决定,

协会委员会:

名誉主席 梅利奈将军,1830年国民军团领导人

主 席 律·若特兰,律师,1830年比利时全

国代表大会前成员

迈因茨,比利时上诉法院律师

副 主 席 安贝尔,马赛《人民主宰报》前编辑

副 主 席 卡尔·马克思,《莱茵报》前编辑

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国民政府成员

格奥尔格·维尔特

协会秘书 阿·皮卡尔,比利时上诉法院律师

---

斯皮特霍恩,根特法院律师,1830年弗兰德临时  
政府首脑  
佩列林,制鞋工人  
阿·伯恩施太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辑

联合组成布鲁塞尔协会的德国工人同意这一告瑞士人民书。  
下列签名的该协会委员会成员可以作证。

主 席——瓦劳

副主席——赫斯

秘 书——沃尔弗

司 库——里德尔

写于 1847 年 11 月 29 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 1847 年 12 月 5 日《改革报》

## 1847年11月30日弗·恩格斯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演说记录<sup>277</sup>

公民们！三百五十年前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发现不仅会推翻那时的整个欧洲社会及其制度，而且也会为各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基础；可是，现在越来越明显，情况正是这样。由于美洲的发现，找到了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这就完全改变了欧洲过去的贸易关系；结果，意大利和德国的贸易关系完全衰落，而其他国家则上升到前列，西方国家掌握了贸易，因此英国开始起主导作用。在美洲发现之前，各个国家，甚至在欧洲，彼此还很少来往，整个说来，贸易所占的地位很不显著。只是在找到通往东印度的新航线之后和在美洲开辟了对欧洲商业民族有利的广阔活动场所之后，英国才开始越来越把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就使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日益紧密地靠拢。这一切导致大商业的产生和所谓世界市场的建立。欧洲人从美洲运出的大量财宝以及总的说来从贸易中取得的利润所带来的后果，是旧贵族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美洲的发现联系着的，是机器的出现，从而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斗争。

在发明机器之前，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

贸易基本上只限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根本不能生产的产品；一当机器出现，就开始大量生产，致使许多地方不得不停工，因为有些人现在开始购买机器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过去这样的产品是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的。以前的工人的地位完全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由四至六个不同阶级组成，现在则分成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

自从英国人霸占海上贸易并把机器生产发展到能够以自己的产品供应几乎整个文明世界，自从资产阶级获得政治统治，英国人就在亚洲获得顺利发展，而资产阶级也开始在那里蒸蒸日上。随着机器的推广，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不断被消灭。我们知道，葡萄牙人踏上东印度时发现那里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英国人去那里时是同一个阶段，印度人总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按着老方式生活下去，也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祖父怎样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孙子也就怎样做，而发生的许多强制性的变革，只不过是各个部落之间争权的斗争。当英国人到那里去并开始推销自己的工业品时，印度人失去了谋生之计，这才开始摆脱自己的一成不变的状况。工人们已经离开故乡，并和其他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一次接受文明的熏陶。旧的印度贵族彻底垮台了，在那里人们受到挑唆而互相敌对，就象我们这里一样。

稍后，我们看到，在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中，随着英国人及其机器的出现，一切都变了样，并被卷入文明之中。

奥地利，这个欧洲的中国，这个内部制度没有被法国革命所动



摇,甚至拿破仑对它也毫无办法的独一无二的国家,向蒸汽力让步了;在机器的影响下,那里一切都突然改变了;保护关税引起机器在这个国家的出现。结果小资产阶级兴起,推翻了上层贵族;梅特涅是有点上当了,当然,这是他从未料到的;在波希米亚议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资产阶级向他表示拒绝批准五万古尔登的税款。社会阶级发生了变化,小手工业者破产了,不得不转为普通的工人,因此,出现了对于梅特涅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因素。

在意大利,工业生产也增长了,资产阶级处处骑在梅特涅的脖子上,政府陷入了困境,以致梅特涅不得不同意波希米亚拒绝支付五万古尔登的税款。

总之,由于美洲的发现,整个社会分为两个阶级,这种情况没有世界市场的产生是不会发生的。全世界的工人到处都有同样的利益,中间阶级正在各地消失,而且它们的不同利益开始趋于一致。因此,革命不管在哪个国家开始,它必将影响其他国家,而且只有现在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1919年莱比锡版第8年卷

原文是德文

---

## 1847年11月30日卡·马克思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演说记录

关于比利时,我可以告诉大家,那里成立了工人协会<sup>278</sup>,目前有会员105人。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过去完全处于分散状态,现在已经代表一种力量了;过去哪里也不邀请他们,而今年协会的代表却被请求参加市政当局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波兰革命周年纪念活动,并被请求代表这个协会发言。万一政府由于协会无疑地对比利时工人也有影响而企图压制它,它已决定将自己的300册藏书及其他财产转交给伦敦协会。

---

我还想在著述方面发表一点意见。现在路易·勃朗在自己的<sup>279</sup>一部著作中证明:在法国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攻打巴士底狱这座城市监狱的关头,资产阶级却作出决定,反对那些用自己的鲜血保证了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人。革命的所有主要活动家现在都以其真正的身分出现,许多以无产阶级精神撰写并对社会有显著影响的传单也出现了。法国人从事活动更多地是为了一个党而不是为了获利。在七月革命之前,流传过以资产阶级精神撰写的传

单,同样,现在流传着以无产阶级精神撰写的传单。

德国哲学界写出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是用来批判宗教的;不过,这种批判没有以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到目前为止为反对基督教而写的所有著作,只限于证明,基督教是以虚假的原则为基础的,例如,作者互相抄袭;但是,至今还没有对基督教的实际的祭礼进行探讨。我们知道,基督教中的最高观念是献人祭。道梅尔在他不久前出版的一本书<sup>280</sup>中证明,基督徒确实把人弄死,并且在举行圣餐礼时吃人肉,喝人血。他以此来说明:为什么罗马人宽容一切教派而唯独迫害基督徒,为什么后来基督徒销毁一切旨在反对基督教的异教书籍。使徒保罗本人强烈反对让那些不得圣餐礼奥秘的人参加圣餐礼。现在这样的问题也很容易解释了,例如,一万一千个处女的圣骨是从哪里来的等等;有一个关于中世纪的文件曾谈到法国一个修道院的修女们同女修道院长之间订立的一个公约:未经全体同意不得再让任何发现圣骨之事发生。促使订立这个公约的原因是,某个修道士经常往来于科伦和巴黎,而且每次都留下某某的圣骨。凡是与这种事联系着的,通常都被看成是神父们的欺骗,但同时他们又被赋予远远超出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灵巧和智慧。献人祭被认为是神圣的事,而且也确实存在。新教只是把它转到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并且使事情稍有缓和罢了。因此,在新教徒中碰到的疯子比任何其他教派都多。正如道梅尔的著作中所描绘的,这种事情将给基督教以决定性的打击;现在问题是,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这给了我们信心:旧社会必将崩溃,这座欺骗和偏见的大厦必将全部倒塌。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1919年莱比锡版第8年卷

原文是德文

## 1847年12月7日弗·恩格斯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 演说记录

公民恩格斯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证明:商业危机仅仅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交易所是制造无产者的主要场所。

第一次发表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史文库》1919年莱比锡版第8年卷

原文是德文

---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  
1847年12月31日举行  
新年晚会的报道<sup>281</sup>

……然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218 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析中强调了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  
比利时自由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国家的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作  
用,宪法允许自由争论、结社权利和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撒播人道主  
义的种子。(热烈鼓掌)

载于1848年1月6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2号

原文是德文

---

该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以下注释:“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前几次举行的会议中,卡尔·马克思有一次在会上就‘什么是工资’这个重要问题作了报告,他讲得清楚、实事求是和容易了解,他引用实际的证据十分尖锐地批判了现存的情况,因此我们打算在最近把报告介绍给我们的读者。”<sup>282</sup>——编者注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 1848 年 1 月 9 日马克思在 民主协会会议上的演说的报道<sup>283</sup>

参加会议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许多听众站在大厅深处。接收了七名新会员。

由于卡尔·马克思作了关于自由贸易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协会过去召集的会议中最有意义的一次。马克思用法语作的报告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是听众的注意力并没有松懈。

根据一个会员的建议,一致决定——不,有一票反对——由协会出钱刊印这个演说。

我们只指出,布赖埃尔医生的演说的结束语,即认为生产资料(机器等等)应当属于全社会而不应当属于社会的单个成员,博得全体的赞同。

现在我们对马克思的演说作一简短分析: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伟大成果。一般地说,企业主所理解的自由贸易首先是原料的自由贸易,特别是谷物的自由贸易。反谷物法同盟的鼓动只追求博爱主义的目的:为人民提供较便宜的生活资料,就象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般只渴望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一样。”

马克思先生提到,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民,对这些自我牺牲的人毫不领情。他说,现在英国的“廉价粮食”如同法国的“廉价政

府”一样,都信誉扫地。然后他评论了英国自由贸易派的最典型的观点。嘲笑他们向各阶层人民——工厂工人、小企业主、租佃者、农业工人——所说的那些相互矛盾和口是心非的话。详细地评述了受到反谷物法同盟奖赏、目的在于证明废除谷物法对英国农业有良好影响的三篇文章。

为了指明自由贸易派的博爱主义词句纯粹是空话,马克思先生简单扼要地描述了英国工人对自己的厂主的态度。

他接着说,在英国废除谷物法的斗争不过是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斗争。就废除谷物法来说,工人阶级只能遭到直接的损失。马克思先生在说明这一情况之后,指出那种促使英国工人去支持资本家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工人希望肃清英国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

随后,马克思先生详细地驳斥了自由贸易派的以下论断:工人阶级会从一切商品的跌价中,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生产资本的增长中得到好处。他指出,相反,随着所谓的国民财富的增长,工资必定越来越降低。他说:“其实,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所有经济学家在表述经济规律时都是从自由贸易已经完全实现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自由贸易越是充分实现,那些在每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的有关确定工资的规律就越是能丝毫不差地被运用。但是,决定着工资水平的基本规律即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宣布的规律却在于,正常工资是使工人能作为工人生存下去并且延续自己的后嗣的工资;因此,这就是说,最低工资也就是工资的正常水平。

自由贸易就是资本摆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束缚它发展的民族桎梏。这是资本对劳动的自由。因此,自由贸易并没有消除资本和

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反而使它更加尖锐了。马克思先生大声说,难道我的敌人由于他扯断了束缚他同我斗争的绳索就不再是我的敌人了吗?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制度,才能对工人有帮助。

马克思先生继续说道,自由贸易在一个国家的不同阶级之间建立的友爱,也正在地球上各国之间建立起来。只有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头脑里才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把摆脱了民族桎梏的剥削即被提升到世界主义高度的剥削称为普遍友爱。

马克思先生接着回答了自由贸易派的一些诡辩,例如,自由贸易会实现国际分工,在这种分工下,每个国家将根据自己的天然使命进行生产,而且都能在每个生产部门中为自己选择一定的专业,等等。“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不懂得一国如何靠牺牲别国而致富,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先生本来就不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靠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马克思先生简单地谈了一下保护关税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处于落后状态下在国内实行自由贸易的手段,是消灭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是使在工业方面不发达的民族依赖于世界市场,即依赖于其他民族的自由贸易的手段。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时说:

“先生们,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它加速了社会革命,而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派可以赞成自由贸易。”



##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 1846 年 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的报道

2月22日晚,布鲁塞尔黑衣修女街“古宫”的大厅象过节一样,灯火辉煌,装饰着波兰和比利时的旗帜,许多人在这里隆重举行了克拉科夫革命两周年纪念会。讲演者有:列列韦尔、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瓦劳、律师卢布林纳等人,他们热情洋溢地论述了克拉科夫起义的纯民主主义性质。本报将在下一号详细报道这次纪念会<sup>284</sup>,现在只提一下,在公开的会议以后举行了宴会。有将近一百人参加,比利时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频频举杯祝贺。即席歌唱者也不乏其人。

载于 1848 年 2 月 24 日《德意志—  
布鲁塞尔报》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注 释  
索 引



## 注 释

- 1 《德法年鉴》杂志刊载的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6—625页)一文摘要,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九本经济学札记(《巴黎笔记》)的第五本。这本札记中的材料大约是在1844年上半年摘记的。

这篇摘要是恩格斯的早期经济学著作博得马克思高度评价的证明之一。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性质,它(连同其他原因)激励了马克思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毕生都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其间只有短暂的中断。当马克思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经济学家时,他仍称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并且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地引用它。——第3页。

- 2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恩格斯文章中谈到有关私有制消灭以后的劳动条件那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05页)。——第3页。
- 3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显然是卡·马克思于1844年上半年根据帕里佐的法译本(《政治经济学原理》,雅·德·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作的。这个摘要是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底在巴黎所作的九本经济学札记中的第四本和第五本。在这次发表的文献中,所有摘自穆勒著作的引文都放在引号内,而马克思对所摘原文的自由阐述,则不论在马克思本人的手稿中有没有引号,一律不用引号。

与马克思文稿中许多类似的材料(札记、摘要)不同,在这个文献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议论按其内容来说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衔接,而且先于这个手稿。方括号(编者加

- 的)内的罗马数字指的是马克思的札记本(包括这次发表的摘要)的页码。引文中的着重号照例是由马克思加的。——第5页。
- 4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的国民经济学是指大·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其中包括詹·穆勒的学说,显然,还指其他经济学家即李嘉图的同时代人的学说。——第18、105页。
  - 5 马克思在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这些定义中,再现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特别是在第二章《宗教的一般本质》和第三章《作为理智本质的上帝》中所表述的思想。——第19页。
  - 6 货币主义是重商主义的早期形式;它的拥护者认为,所有财富都包含在货币中,包含在贵金属的积累中,由此而禁止从国内出口金银,力图在别国少买多卖,并制定货币顺差的政策(并见注50)。——第20页。
  - 7 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是以下著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第四册和第五册。论意志和它的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68、78页;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尔涅的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46页。——第25、146页。
  - 8 这里使用行“Schacher”(直译是做买卖)一词而不用德语中通用的“Handel”一词来表达贸易的意思,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沙·傅立叶对贸易所抱的极端否定的态度(见本卷第321—355页),也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批判文献的传统,这种文献千方百计地强调——其中包括使用一些具有明显贬义的术语——自己对那种同“有组织的交换”相对立的、私有财产制度下的自发集市交换的谴责。——第29页。
  - 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来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草稿。我们看到的这部著作是写在30×40厘米纸上的三个手稿。每个手稿都有自己的页码(用罗马数字编号)。在第一手稿(共三十六页)中,每页都分成并列的三栏或两栏,各栏分别加上标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从第XVII页起只是《地租》这一栏有正文,而从第XIX页起到第一手稿的末尾,马克思不管原先加的标题,在所有三栏都写了正文。从第XIX页到第XXVII页这六页原文由本卷编者加上《异化劳动》这一标题。第二手稿只保存下来四页。第三手

稿是用白线钉上的十七张大纸(对折三十四张)。第三手稿的末尾(在第XXXIX—XL页)是《序言》,本卷和前几版一样,把它放在开头。按照马克思在《序言》中所表示的意思,把手稿中标明(6)的那一部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部分)放在全书的末尾。

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现在所用的名称,以及放在方括号里的各个部分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第43页。

- 10 这里以及下面的罗马数字都是作者编的手稿页码。——第45页。
- 11 这一批判的开头是马克思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467页)。——第45页。
- 12 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马克思没有写这些小册子,可能不是因为各种外部情况,而是因为他确信,在他还没有对各种社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第45页。
- 13 指布·鲍威尔,他在《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上针对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图书、论文和小册子发表了两篇长篇评论。马克思在这里所引用的词句大部分是从《文学总汇报》第1期(1843年12月)和第4期(1844年3月)刊载的这两篇评论中摘来的。“乌托邦的词句”和“密集的人群”这些用语见《文学总汇报》第8期(1844年7月)布·鲍威尔的论文《什么是现在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中对这个月刊展开了全面的批判。——第46页。
- 14 这时,马克思除德文以外还掌握了法文,对法国的文献十分熟悉。他读了孔西得朗、列鲁、蒲鲁东、卡贝、德萨米、邦纳罗蒂、傅立叶、劳蒂埃尔、维尔加尔德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而且还经常做摘要。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马克思还没有掌握英文,因此他只能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来利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例如,欧文的作品,他就是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文和其他文献资料都还没有表明,马克思这时已具有了他后来例如在《哲学的贫

困》(写于 1847 年)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渊博知识。——第 46 页。

- 15 除了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以外,马克思大概还指魏特林在他本人于 1841—1843 年出版的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为正义者同盟写的纲领性著作《人类的现状和未来》。

在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 und 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文集中,匿名发表了赫斯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第 46 页。

-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96—625 页。——第 46 页。
- 17 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以及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两篇文章,至少探讨了《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所包含的如下一些要点:要求无情地批判现存的世界,是建立新世界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号召对政治进行批判,号召在政治上采取一定的党性立场,从而把理论同现实斗争生动地结合起来;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货币拜物教的本质,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即同人相异化的、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本质;提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同自身和同自然界相异化的问题;对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那种空想的(“当时的”)共产主义形式作了批判的评价;强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全人类的解放”)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扼要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负有消灭私有制的使命的、定将成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心脏”即基本动力的阶级,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和提高。——第 46 页。

- 18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

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刊载在《现代德国哲学和政论轶文集》第 2 卷上。这个两卷本的文集,除了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外,还收入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在这个文集上发表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不久前一直认为是马克思写的,实际上却是路·费尔巴哈写的。——第 46 页。



- 19 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费尔巴哈的整个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自己把这种观点称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或“人类学”。它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新哲学即费尔巴哈的哲学，使人这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离的部分，成为自己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认为，这样的哲学即人类学包含着生理学，并将成为全面的科学；他断言，新时代的本质是把现实的、物质地存在着的东 西神化；新哲学的本质则在于否定神学，确立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第 46 页。
- 20 马克思的这个想法在他写了这篇《序言》以后不久，就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一书中实现了。——第 48 页。
- 21 马克思把第一手稿的各页都分成并列的三栏，分别加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这样的标题。每一栏都有按上述题目写的正文。但这样分三部分的论述没有贯彻到底，而到手稿的结尾实质上失去了任何意义。马克思所加的三个标题相当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个范畴，而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这三个范畴则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的三种收入形式。——第 49 页。
- 22 “普通人”（“simple humanité”）一词引自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卷（第 8 章）。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的所有引文都引自热尔门·加尔涅所译的、1802 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普通人”一词见该书第 1 卷第 138 页。——第 49 页。
- 23 引自斯密的著作第 2 卷（第 1 篇第 11 章）第 162 页。——第 51 页。
- 24 引自斯密的著作第 1 卷（第 1 篇第 9 章）第 193 页。——第 53 页。
- 25 复利是一种不仅按照本金，而且按照本金定期的增加量来连续计算的利息。因此，本金是象几何级数的项那样增长的，例如： $2 \times 2 = 4 \times 2 = 8 \times 2 = 16$  等等。——第 54、66 页。
- 26 在第一手稿第 VII 页上，同以前各页不同，马克思在所有的三栏里都论述《工资》这个题目。在第 VIII 页上，论述了两个题目：在左面的第一栏

- 里论述《工资》,而在右面第二栏里论述《资本的利润》。——第 54 页。
- 27 威·舒耳茨《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 57 页。
- 28 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 年巴黎版。——第 59、71 页。
- 29 查·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 年巴黎版。——第 59 页。
- 30 欧·毕莱《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59 页。
- 31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 年巴黎第 3 版第 1—2 卷。——第 62 页。
- 32 这一整段不是属于亚当·斯密的,而是属于《国富论》一书的法译者热尔门·加尔涅的。——第 63 页。
- 33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亚·斯密在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中讲过的关于竞争具有良好作用的思想。斯密认为,假如资本分散在二十个商人中间,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而这将给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带来直接的利益,因为这时各个商人都不得不比整个部门由一两个人垄断时卖得贱些和买得贵些。按照斯密的意见,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将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而且不降低利润。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必然要破坏关于不得提高工资的“天然协议”。——第 67 页。
- 34 这一整段,包括引自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和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引文,是从欧·毕莱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6—7 页)中摘录来的。——第 72 页。
- 35 指斯密关于决定工作者的成败和工资的大小的因素的议论。在这些因素中包括“成功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例如,斯密说道:“送子去学鞋匠,无疑他能学会制鞋技术,但是送他去学法律,那么精通法律并靠这个职业过活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对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说,中彩者应

- 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职业说,这成功的一人应得到不成功者二十人应得而未得的全部。”——第 74 页。
- 36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亚·斯密的这样一个论点:居民对某种大众消费品如马铃薯的需求的增长,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即使这种产品是从中等土地上收获的,也将使租地农场主在补偿基本开支和维持劳动力的开支以后仍有巨额赢余。而这种赢余的一大部分则将归于土地所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人口数目的增长,地租也将提高。——第 78 页。
- 37 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是从所谓现代国民经济学的代表(首先是李嘉图)的全部议论得出的关于土地所有者(他根据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不劳动而获得地租)和农产品生产者(即在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和工厂生产初期是占英国大部分人口的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至于亚·斯密,则追随重农学派,还证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的所谓一致性。——第 80、106 页。
- 38 这句话很可能说的是西斯蒙第的那种把宗法制私有地产关系理想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第 83 页。
- 39 “买卖”这个术语的原文是个难译的词:“Verschacherung”。当时的社会批判性著作,按照傅立叶的传统,把私人商业和一切市场交易一概蔑视为卑鄙丑恶的勾当。在这里以及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其他地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先驱者在论述商业方面对马克思的某种至少是术语上的影响(见注 8)。——第 83 页。
- 40 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社会批判性著作中相当流行。例如,魏特林在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就曾写道:“正象在筑堤时要产生土坑一样,在积累财富时也要产生贫穷。”——第 90 页。
- 41 马克思在本手稿中往往并列使用两个术语“Entfremdung”(异化)和“Entäußerung”(外化)来表示异化这一概念。但是有时把“Entäußerung”这个术语用于另一种意义,例如,用于表示交换活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获得,也就是说,用于表示那些并不意味着敌对性和异己性的关系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除了“Entfremdung”这个术语

外,马克思还使用“Selbstentfremdung”(直译是“自我异化”)这个术语。他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工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活动、劳动是回过来反对工人自己的、不以工人为转移的和不属于工人的活动。——第91页。

- 42 马克思在这里以改造过的形式转述了费尔巴哈哲学把宗教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一个论点。费尔巴哈在他的《基督教的本质》这一著作中曾经证明,因为在神的本质的观点中肯定的东西仅仅是人的东西,所以作为意识对象的人的观点就只能是否定的。费尔巴哈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成为乌有。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加以肯定的东西。——第91页。
- 43 这里所表述的思想是跟费尔巴哈的论点呼应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动的异化。费尔巴哈写道,上帝作为对人说来某种至高的、非人的东西,是理性的客观本质;上帝和宗教就是幻想的客观本质。他还写道,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主体的活动,是主体的被窃走的思维,而绝对哲学则使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活动在人那里异化。——第94页。
- 44 马克思在本段和下一段利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象动物那样是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第95页。
- 45 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的术语,表示人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概念。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谊和善良的关系,即以爱为前提,这些都是类的自我感觉或关于个人属于人群这种能动意识。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费尔巴哈也承认人们之间真实存在着利益的相互敌对和对立关系,但是他认为这种关系不是来自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条件,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是来自人的真正的即类的本质的异化,来自人的人为的、绝非不可避免的同大自然本身所预先决定了的和谐的类生活的脱离。——第96页。

- 46 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名著《什么是财产》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平等”观念时所持的基本论点。蒲鲁东的空想的、改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药方规定,私有财产要由“公有财产”代替,而这种“公有财产”将以平等的小占有的形式,在“平等”交换产品的条件下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这实际上指的是均分私有财产。蒲鲁东是这样设想交换的“平等”的,即“联合的工人”始终得到同等的工资,因为在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时,即使产品实际上不同等,但每个人得到的仍然是相同的,而一个人的产品多于另一个人的产品的余额将处于交换之外,不会成为社会的财产,这样就完全不会破坏工资的平等。马克思说,在蒲鲁东的理论中,社会是作为抽象的资本家出现的。他指出蒲鲁东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产的现实矛盾。不久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述了这样一个结论:蒲鲁东在经济异化范围内克服经济异化,也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克服它。——第 101 页。
- 47 马克思的第二手稿的第 XL 页是从这几个字开始的。这句话的开头,以及第二手稿的前三十九页都没有保存下来。——第 104 页。
- 48 指 1834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新济贫法。这个法律只允许一种救济贫民的方式——把他们安置在采用监狱制度的习艺所中。济贫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企业主雇用劳动力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中对济贫法和根据济贫法建立的习艺所作了详细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576—583 页)。——第 105 页。
- 49 这一节文字看来是对未保存下来的一页的补充,正象下面一节可能是对第二手稿的第 XXXIX 页的补充一样。——第 112 页。
- 50 “启蒙国民经济学”首先是同亚·斯密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继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也把亚·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改革者、“路德”。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启蒙国民经济学”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上是比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两种较早的经济学说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形式)更高的阶段。这两种体系(更确切地说,是实质上同一个体系的两个分支)的目标是追求货币顺差(货币主义)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两者都不外是为了货

币而积累货币;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货币,积存货币实际上被宣布为最高目的和目的本身。重商主义者象偶像崇拜者和拜物教徒那样对待货币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只能以外在的方法加以保存和确立”。同时,这两种体系的信奉者不注意生产本身,不认为生产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基础。只有“启蒙国民经济学”才承认生产、劳动是自己的主要原则或基本原理。——第 112 页。

- 51 见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96—625 页)。——第 112 页。
- 52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对立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为另一个方面所规定,因此都只是一个环节,但同时每一个方面也为自身所规定,这就使它具有独立性;相反,在矛盾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自己的独立性中包含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是被排斥了的。——第 117 页。
- 53 沙利·傅立叶在他关于未来世界、所谓协作制度的空想中,违反经济发展的现实趋向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对政治经济学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一门错误的科学),断言在“合理制度”的条件下,工业生产只能被当作对农业的补充,当作在漫长的冬闲季节和倾盆大雨时期“避免情欲消沉的一种手段”。他还断言,上帝和大自然本身确定,协作制度下的人只能为工业劳动拿出四分之一的的时间,工业劳动只是辅助性的、使农业多样化的作业。——第 117 页。
- 54 圣西门在《实业家问答》(1824 年巴黎版)这一著作中发挥了这些论点。——第 117 页。
- 55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巴贝夫、卡贝、德萨米,英国的欧文和德国的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马克思只是在《神圣家族》中才第一次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来表示自己的观点。——第 117 页。
- 56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大概首先是指 1789—1794

-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关于“完全平等”的社会以及在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社会的空想主义观点。虽然这种观点也表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整个说来这种观点还带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性质。——第 117 页。
- 57 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针对着卢梭的,因为卢梭及其信徒认为没有受过教育、文化和文明触动的状态对人来说才是自然的,而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等著作中阐发了他的上述论点。——第 118 页。
- 58 马克思在这里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提供了“历史之谜的解答”,换句话说,也就是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第 120 页。
- 59 指欧文对一切宗教的批判言论。用欧文的话来说,宗教给人以危险的和可悲的前提,在社会中培植人为的敌对;欧文指出,宗教的偏狭性是达到普遍的和谐和快乐的直接障碍,欧文认为任何宗教观念都是极端谬误的。——第 121 页。
- 60 拥有(“Haben”)这个范畴见莫·赫斯的一些著作,特别是发表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的《行动的哲学》一文(见注 15)。——第 124 页。
- 61 费尔巴哈把自己的认识论叫作心理学。看来这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第 127 页。
- 62 地球构造学是十八和十九世纪对记载地质学的通称。——第 130 页。
- 63 马克思把 *Generatio aequivoca* 这一用语当作法文 *génération spontanée* 的同义词来使用,照字面直译就是自然发生的意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谈到 *generatio aequivoca*——生命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0 卷第 640—641 页)。——第 130 页。

- 64 这里是马克思对穆勒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观点的批判(见本卷第7—13页)。——第138页。
- 65 引自斯密的著作,第1卷第29—46页;第2卷第191—195页(见注7)。——第146页。
- 66 引自萨伊的著作,第1卷第300、76—77页和第2卷第6、465页(见注31)。——第146页。
- 67 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5—27、75、121—131页。——第146页。
- 68 马克思引自詹·穆勒的著作第7、11—12页(见注3)。——第147页。
- 69 指布·鲍威尔的三卷本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在宗教史著作中,把收入《新约》的前三部内容相近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称为复类福音。这三部福音书——复类福音——内容相近,这表现在它们叙述的顺序是一致的,彼此互相抄袭,许多史料是共同的,用词和术语也一样。——第156页。
- 70 布·鲍威尔《基督教真相》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156页。
- 71 布·鲍威尔《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156页。
- 72 指青年黑格尔分子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言论。——第157页。
- 73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费尔巴哈在他的《未来哲学原理》一书第29—30节中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意见(见注18)。——第159页。
- 74 有关“意识的对象的克服”的这八点说明几乎是逐字逐句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摘录下来的。——第166页。
- 75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观点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却总是回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这显然表明他不同意先前的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特别是不同意抽象性,不同意把感性视为知识的基础和唯一源泉的感觉论。马克思在这里说是在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形式,他也象费尔巴哈那样对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形式感到不满,认为



- 不是旧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才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秘密。——第 167 页。
- 76 马克思所论述的关于人是直接的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论点,基本上是以费尔巴哈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所阐发的原则为依据的:把人看成自然界的特殊的、有意识的存在物;本质由外在对象的性质规定;任何存在物、任何本质必定具有对象的性质;在感性存在物之外的其他物是感性存在物的生存所必需的(如空气供呼吸,水供饮用,光供照明,动植物产品供食用,等等)。——第 167 页。
- 77 “受动的”(“Leidend Sein”)这个术语来自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样,把这个术语解释为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和方式。费尔巴哈说,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存在物才是必然的存在物;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只有受动的东西才值得存在。马克思跟费尔巴哈不同,他对“受动的”这一经验原则做了极其重要的加工和扩充,把社会实践即人为了掌握和改造外部世界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活动也包括进去了。——第 169 页。
- 78 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并利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批判黑格尔的论点。例如,费尔巴哈在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想就是存在、主词,而存在同时又是宾词;逻辑学是他所特有的那种形式的思维,是作为无宾词的主词的思想,或者是同时兼为主词和宾词的思想;黑格尔将客体仅仅看作能思维的思想的宾词。“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这个说法,看来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全神贯注于自身的圆圈”、“圆圈的圆圈”等说法的代用词。——第 176 页。
- 79 这里和下文均引自乔·威·弗·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1830 年海得尔堡第 3 版。——第 177 页。
- 80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在《前进报》(184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为该报撰稿是从 1844 年夏天即该报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68—489 页)时开始的。从 1844 年 9

月起马克思进入编辑部,开始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并在编辑部的组织事务方面发挥作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也被邀请为该报撰稿。为该报撰稿的还有海涅、海尔维格、艾韦贝克、巴枯宁及他人。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报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喉舌。它尖锐地批评了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以及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182页。

- 81 这里引用的是1844年8月9日刊登在《普鲁士国家总汇报》上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诏书。1844年7月26日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在柏林对国王行刺未遂是这篇诏书出笼的原因。——第182页。
- 82 指普鲁士外交官本生于1844年春天和夏天以备忘录形式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国家体制改革的建议。本生建议仿照英国议会建立有贵族的上议院和按等级原则选出的下议院这种两院制的普鲁士议会。——第185页。
- 83 恩格斯以这篇通讯开始为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撰稿,撰稿持续到1848年,在此期间略有中断。以前该报转载了(1843年11月11日和25日)以恩格斯署名发表于《新道德世界》周刊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75—593页),并在文章前加了编者前言:“这篇由弗·恩格斯执笔的有趣的文章采用上述标题发表于11月4日《新道德世界》。我们从中作了如下摘要,因为对我们的报纸来说文章的篇幅太大了。”编辑部在发表该文第二部分即有关德国和瑞士部分的摘要时,一再用一些插话指出恩格斯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从1844年5月起,恩格斯就开始经常向该报投寄关于欧洲大陆各国事件的报道,首先是关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报道(见本卷第193页所载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信)。这篇通讯载于该报“德国”栏。——第189页。
- 84 指德意志联邦,它是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于1815年成立的,最初包括34个德意志邦和4个自由市,它们各自保持封建专制制度。联邦加剧了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德国向前发展;德意志

联邦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成了整个德国反动势力的支柱。——第 189 页。

- 85 1834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德意志联邦各邦大臣的会议所通过的最后议定书规定对德国的民主运动和自由派运动采取镇压措施。这个议定书以及本文引用的 1832 年 6—7 月联邦议会的决议,都是德国统治集团对 1830 年的法国革命在德国引起的动荡的回答。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是这些警察措施的主谋。

维也纳会议的议定书和德意志联邦的其它秘密文件曾由德国自由派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卡·泰·韦尔凯尔在 1844 年在曼海姆出版的《关于德意志国民法律状况的重要文件》(《Wichtige Urkunden für den Rechtszustand der deutschen Nation》Mannheim, 1844)一书中予以发表。可能在这本书出版以前,民主派已经知道有这个议定书了。1844 年 1 月《前进报》发表了这个议定书。——第 189 页。

- 86 指 1844 年 1—2 月对领导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自由派活动家、为取消 1801 年的英爱合并而进行鼓动的组织者奥康奈尔的审判案。合并剥夺了爱尔兰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合并(Repeal of Union)的要求成了爱尔兰最得人心的口号。1840 年成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1843 年该协会在广大的爱尔兰人民群众中展开了为取消合并而进行鼓动的工作。奥康奈尔和这个协会的其他自由派领导人一面依赖群众运动的支持,一面却力图把运动控制在宪法范围内,把它引上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的道路。被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规模吓坏了的托利党政府,向奥康奈尔提出司法追究,决心给运动以坚决的打击。1844 年 2 月,奥康奈尔及其拥护者分别被判监禁达十二个月。但是在群众的抗议下,上院取消了判决。——第 189 页。

- 87 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这封信是不完整的,现在保存下来的片断,就是 1844 年 5 月 4 日该报发表的题为《国内和国外的运动》的编辑部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想把该报办成国际性的报纸,请“有关人士协助”撰稿。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见注 83)被认为是这种协助的范例,但是编辑部没有提及作者的名字,只称这篇文章是该报过去刊载的“关于大陆共产主义的一

篇很有趣的评论,执笔者是这个问题的行家”。

编辑部在援引了恩格斯这封信的片断后写道:“我们同他一样相信,大陆上很快就要发生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欣然接受我们这位朋友的建议。”从这时起,恩格斯为宪章派报纸正式撰稿。他提供的材料,由编辑部标明所报道的国家的名称(“德国”、“普鲁士”、“巴伐利亚”、“波兰”、“俄国”、“瑞士”、“法国”等)刊登在“大陆上的运动”专栏内,并注明为“本报通讯员来稿”。从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授权编辑部自行处理他提供的材料。有时候,恩格斯的某些简讯被冠以不同的标题刊载在同一号报纸上。——第 193 页。

- 88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共和国,是符合始终不渝地为消灭国家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中世纪分立主义残余而斗争的任务的。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即联邦主义原则的拥护者相反,坚持要求把德国转变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第 193 页。
- 89 这篇简讯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简讯描述 1844 年 2—3 月柏林大学生起来反对强化反动秩序。德国报刊特别是恩格斯关注的《科伦日报》对此作了报道。根据该报 1844 年 2 月 15 日第 46 号的报道,首先在柏林发动的大学生运动已经扩大到德国其他几个大学城(波恩、哈勒、海得尔堡、耶拿)。——第 194 页。
- 90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德国”栏。——第 196 页。
- 91 恩格斯指的是弗·阿·施泰因曼的著作:《十九世纪的漫画和剪影》1843 年科斯非尔德版。——第 196 页。
- 92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 年杜宾根版第 1—2 卷;这本书从黑格尔左派的立场批判了宗教。  
文章中提到的施特劳斯《使徒行传》一书并未出版。——第 196 页。
- 93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波兰”栏。——第 198 页。
- 94 指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第 198 页。

- 95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亚·古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的和波兰各省起义的实情》1834年巴黎版,书中充满了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观点。1841年还出版了他的两本书:《文明和俄国》(莱比锡)和《论未来的波兰》(柏林)。——第198页。
- 96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巴伐利亚”栏。——第200页。
- 97 指“瓦哈拉群贤堂”——1841年按照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构思,在雷根斯堡附近修建的宏伟建筑物,其中搜集了几乎所有的德国贤明人士的雕像。  
《瓦哈拉群贤录,瓦哈拉群贤堂的创建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编》1842年慕尼黑版(《Walhalla's Genossen, geschildert durch König Ludwig den Ersten von Bayern, den Gründer Walhalla's》, München, 1842)。这本旅游指南包括德国活动家的传略。瓦哈拉群贤堂搜集了活动家的雕像。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诗是空洞无物和矫柔造作的诗的典型,诗作于1842年出版。——第201页。
- 98 这则简讯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第202页。
- 99 《北极星报》的“俄国”栏刊载的这篇通讯,谈的是大臣委员会——沙皇俄国最高行政机构(1802年至1906年)的人事变动。——第203页。
- 100 指沙皇政府对争取独立的北高加索各民族所进行的战争。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沙米尔(于1834年被立为达格斯坦的伊玛目)领导北高加索山民为反对沙皇政府殖民政策和地方封建主专横肆虐而进行的解放运动。沙米尔领导的运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达到最高潮,只是在1859年才被镇压下去。——第203页。
- 101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法国”栏。它报道了1844年4—5月在里夫-德-埃埃发生的法国矿工的罢工。——第204页。
- 102 1844年5月30日在巴黎举行的雅·拉菲特的葬礼,这次葬礼变成法国共和党力量的大示威。——第204页。
- 103 在导致波旁王朝垮台的1830年七月革命期间,金融资产阶级的温和的

- 自由派代表之一、在巴黎掌权的内阁的成员之一雅克·拉菲特帮助路易-菲力浦即奥尔良公爵登上王位。——第 204 页。
- 104 阿尔及利亚人民在阿卜杜尔-卡迪尔领导下进行的反对法国征服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从 1832 年持续到 1847 年,中间略有停顿。在 1839—1844 年期间,法国人拥有相当大的军事优势,征服了阿卜杜尔-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国家,但是阿尔及利亚人的这位领袖利用摩洛哥苏丹的援助,组织了游击斗争。当苏丹的军队在 1844 年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中失败以后,阿卜杜尔-卡迪尔就在撒哈拉绿洲区隐蔽下来。1845—1847 年在阿尔及利亚西部举行的起义,是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斗争的最后阶段,这次起义被法国殖民者镇压下去(并见注 226)。——第 205 页。
- 105 载于《北极星报》的“瑞士”栏的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论述瑞士历史问题著作的第一篇。文章反映的是 1843 年联合起来成为分离的同盟——分离派同盟的落后的天主教州同主张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的自由激进派力量之间斗争的初期阶段。本文同恩格斯论 1847 年瑞士的内战这篇著作有密切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385—393 页)。——第 207 页。
- 106 “青年瑞士”——三十年代中建立的瑞士民主派和革命派的组织; 1835—1836 年出版了法文报纸(《La Jeune Suisse》)和德文报纸(《Die Junge Schweiz》)。它和政治流亡者的其他民族组织(“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等等)同时加入了在马志尼倡议下于 1834 年在瑞士建立的“青年欧洲”,其宗旨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第 208 页。
- 107 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离婚法草案是 1842 年由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萨维尼(1842—1848 年任普鲁士修订法律大臣)拟定的;本文考察了这个草案的拟定过程。——第 209 页。
- 108 尽管离婚法草案的准备工作是在政府范围内秘密进行的,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却在 1842 年 10 月 20 日公布了这个草案,从而引起了德国报刊对草案进行广泛的讨论。12 月 19 日,《莱茵报》刊载了马克思《离

- 婚法草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82—185 页),文章对草案进行了批判。《莱茵报》公布草案以及编辑部坚决拒绝提供草案投稿人的姓名,是该报于 1843 年 3 月被查封的原因之一。——第 209 页。
- 109 议会——1823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主要由贵族代表组成,其中城市和村镇的代表非常少;会议由国王召集,会议的职权通常仅限于讨论法案以及地方经济和省的管理问题。——第 209 页。
- 110 《北极星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篇文章补充了下面这段话:  
“现将摘自《太阳报》的一段话作为上述文章的补充:据本月 9 日布勒斯劳消息,织工们在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以后就开始上工了。在斗争期间,他们闯入某些林区管理员的家里,拿走了猎枪和子弹,对其他任何东西均未触动。”——第 210 页。
- 111 恩格斯叙述 1844 年夏天西里西亚骚乱的详情的文章,载于《北极星报》的《普鲁士》栏。——第 211 页。
- 112 恩格斯指的是在西里西亚织工中间广泛流传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第 211 页。
- 113 《大陆社会主义》一文是以给《新道德世界》报的一封信的形式书写的,信的前后都附有给编者的话,看来这也是恩格斯写的。——第 217 页。
- 114 恩格斯指的是他于 1844 年 8 月底至 9 月初曾在巴黎逗留,在那里,他同马克思会面,这次会面为他们的友谊和创造性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第 217 页。
- 115 指 1842 年在罕考门(伦敦近郊)建立“康考尔鸠姆”移民区的一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为英国神秘主义者詹·皮·格里夫斯的信徒,罕考门派社会主义者曾经宣扬道德修身和禁欲的生活方式;这一移民区存在的时间不长,很快就瓦解了。——第 217 页。
- 116 暗指法国在非洲北部进行的侵略战争。1844 年 8 月,法国谴责摩洛哥苏丹援助阿尔及利亚民族领袖阿卜杜尔-卡迪尔(见注 104),并对摩洛哥也开始采取军事行动。苏丹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停止援助阿卜杜尔-

- 卡迪尔 ,并于 1845 年签订了对法国有利的条约。——第 218 页。
- 117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为回答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反对意见而写的。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 ,他在 1844 年 10 月初就着手写一本小册子 ,以便通俗地叙述“共产主义在英国和美国的当前实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8 页)。主要材料是英国旅行家-欧文主义者约翰·芬奇的一组信 ,共二十九封 ,这组信以《美国旅游札记》为标题刊登在 1844 年 1 月 13 日至 10 月 19 日《新道德世界》上。引自芬奇信中的某些话 ,是恩格斯自己用德文意译的。这篇文章没有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 ,而是在 1844 年 12 月出版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恩格斯在他关于共产主义在德国的成就所写的一组文章中简评共产主义文献时提到过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599 页)。——第 221 页。
- 118 引自 1844 年 2 月 10 日《新道德世界》第 33 号所载芬奇的第五封信。——第 225 页。
- 119 这段话引自 1843 年 5 月 6 日《北极星报》第 286 号发表的劳·皮特基思利的通讯《何处着手和如何着手。震教徒移民区记述》(《Where to , and how to proceed Description of the Schaker Villages》)。——第 225 页。
- 120 引自 1844 年 2 月 17 日和 24 日《新道德世界》第 34 和 35 号所载芬奇的第六和第七封信。——第 228 页。
- 121 在这里和下面记述分离派的移民区时 ,利用了 1844 年 3 月 2 日和 9 日《新道德世界》第 36 和 37 号上所载芬奇的第八和第九封信。——第 229 页。
- 122 一神论派或反三神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的教条的宗教派别的代表。这一宗教派别产生于十六世纪 ,是人民群众和激进资产阶级对封建教会的一种抗议。一神论派于十七世纪传入英国和美国。它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仪式 ,而把宗教的道德伦理方面提到首位。——第 231 页。



- 123 恩格斯在记述欧文的门徒于 1841 年在汉普郡建立并一直存在到 1846 年初的“协和”共产主义移民区时,利用了索麦维尔的一篇短评,这篇文章载于 1842 年 12 月 13 日《纪事晨报》,署名“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第 233 页。
- 124 马克思冠以《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标题的这一笔记,收在他 1844—1847 年的笔记本中(我们所找到的马克思笔记本中的第一本笔记)。笔记中包括的四点基本思想,已经由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特别是在《“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一节中予以发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104—105、243—246 页)。——第 237 页。
- 125 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作者未加标题,收在马克思 1844—1847 年的笔记本中。草稿的基本点同马克思在 1843 年夏天为自己在世界史(包括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史)方面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的要点是一致的。同年秋天,马克思抵达巴黎以后,重新研究了这些问题,他打算写一本《国民公会史》。为此他作了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回忆录的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40 卷)。他所收集的材料(大部分我们没有找到),有一部分用于《神圣家族》。可能是由于想写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他拟了现在这个草稿。马克思在草稿中不是简单地重述他为《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而是在第 9 点中作了重要的补充:“为消灭 [Aufhebung] 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也就是说,为废除剥削者国家和整个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系而斗争。——第 238 页。
- 126 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是他为评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李斯特于 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 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一书而写的文章的草稿。李斯特在这本书中吹嘘自己要对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理论的错误的实质和原因进行研究。该书问世时在德国被大肆宣传,俨然成了追求财富、渴望统治的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宣言书,成了在政治经济上推动德国的“福利、文化和力量”的良方。恩格斯在 1844 年 11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他打算写一本小册子批判这本书,而在 1845 年 3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则赞同马克思准备批判李斯特的理论观点的计划。恩格斯

并没有写出一本专门评论李斯特的小册子。不过他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有一篇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19—621页)却批判了李斯特把德国资本家对保护关税的渴望变成了体系。

马克思评论李斯特的文章也没有付印。现在保存的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是不完整的:缺少第一张,显然上面有作者所拟的标题;第10—21张以及第23张也未找到。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和援引了李斯特这本书的第一卷。他把从法译本援用的引文都改译为德文。引文中的着重号照例都是马克思加的。在每一张的开头他用阿拉伯数字标明的手稿页码,本卷都放在方括号内。手稿中明显的笔误在这次准备发表时作了订正。编者给个别章节所加的标题放在方括号内。

这篇评论李斯特的文章的草稿,是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龙格的孙子长期保存的马克思遗稿中发现的。——第239页。

- 127 扬扬扬格 是古体诗中由三个长音节组成的韵脚。马克思用这个术语讽刺地说明李斯特的呆滞的文风。——第241页。
- 128 关于塞拉的著作,李斯特写道:“意大利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的著作:《论“王国”获得丰富的金银的方法》”(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第456页)。——第244页。
- 129 谏议院 是拿破仑第一任执政和称帝时期法国的立法机关;1799年建立,1807年撤销。——第244页。
- 130 指亚·斯密及其追随者。——第251页。
- 131 李斯特在他这本书第208页用两个家长的例子说明他关于生产力和交换价值的理论。这两个家长各有五个儿子,每年各有一笔除了维持家庭生活之外还带来一千塔勒收入的地产。一个家长把一千塔勒存入银行生息,强迫他的儿子从事繁重而又不熟练的劳动。另一个家长则用这一千塔勒让他的儿子受高等教育,使他们成为农学家和工程师。用李斯特的话来说,第一个家长关心的是增加交换价值,第二个家长关心的是增加生产力。李斯特在第209页谈到基督教和一夫一妻制是“生产力的丰富源泉”。——第253页。

- 132 “售卖”一词的德文原文是“Verschacherung”；“让渡”一词的德文原文是“Veräußerung”。——第 254 页。
- 133 “买卖”一词的德文原文是“Schacher”。——第 255 页。
- 134 马克思的这些提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对《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这一论点有所设想。——第 256 页。
- 135 李斯特把“工业力”理解为工厂工业的生产力，但是他使用这个术语常常只指工厂工业。——第 260 页。
- 136 暗指李斯特的这一说法：他的“生产力理论”应该与“斯密—萨伊学派”所阐发的“交换价值”理论并行地科学地加以研究（见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87 页）。——第 260 页。
- 137 马克思指的是约·弗·布雷的著作《劳动方面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理时代》1839 年里子版。——第 265 页。
- 138 英国的谷物法（最早于十五世纪通过）规定对农产品要征收高额进口税，目的是使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保持高价。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实行的几种谷物法（1815 年和 1822 年），略微改变了谷物进口的条件，而在 1828 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进口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进口税。
- 在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废除谷物法的运动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 1838 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同盟提出了贸易完全自由的口号，从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工资。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第 266、281、397 页。
- 139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美国曾掀起土地改革、无偿分配土地给每个劳动者以及其他民主改革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是全国改革协会。——第 267 页。
- 140 大陆体系，也称大陆封锁。1806 年拿破仑第一颁布特别命令：对英国实行经济封锁，以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这项命令是英法资产阶级角逐

- 的表现之一,它禁止和英伦诸岛有贸易、邮务以及其他的联系;禁止英国及其殖民地船只进入欧洲大陆各港口。在命令施行期间封锁并未收到很大成效,1814年命令被正式废止。——第268页。
- 141 麦特温条约是英国外交官麦特温于1703年12月27日签订的英葡商约,根据该商约,英国毛织品可以大量运入葡萄牙,而葡萄牙的酒以优惠的条件输入英国。李斯特在自己的著作第LXI, 28, 109—117页论述了麦特温条约给葡萄牙带来的害处。——第271页。
- 142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收在1844—1847年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即1845年3月所作的笔记。从恩格斯在1845年2—3月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计划是经过他们多次讨论的。但是,由于找不到出版者,预定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唯一完成的著作是由恩格斯翻译并附有他的前言和结束语《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见本卷第318—359页)。——第272页。
- 143 社会小组(Cercle social)——巴黎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组织,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的最初年代进行过活动。这个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限制大产业以及对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给予工作等要求。福适及其拥护者对法国革命文献中所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的批判,使激进平民派“疯人派”的代表雅克·卢、勒克莱尔克和其他人更加勇敢地起来捍卫贫穷的人。——第272页。
- 144 无法确定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或出处。但是这并不排斥手稿中有笔误。马克思可能指的是拉波尔德(拉兰德和拉波尔德这两个姓的外文写法相似)。在马克思笔记本中接下去有一页能看到拉兰德《论协作》一书的书名,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拉波尔德的一本书:《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作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272页。
- 145 马克思指的是德·德萨米、茹·盖伊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他在《神圣家族》第六章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7—168页)描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德萨米思想影响下在四十年代建立的巴贝夫派的秘密团体——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平均主义工人社”(该社出

版了《平等论者》杂志),聚集在《人类卫护者报》周围的人道派,都属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中革命的和唯物主义的派别。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80—581页)记述了这些团体的代表们对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批判。——第272页。

146 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的这些札记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前面。——第273页。

147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之后于1845年下半年(大约在夏末)写成的。从标题,标号“I”的小标题以及正文来看,恩格斯本想写一组文章,用具体、真实的材料来补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篇文章的主要材料来源是1844年10月—1845年1月载于《北极星报》的关于建筑工人罢工的报道。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罢工的过程。

这篇文章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6年一月号和二月号。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份杂志“载有论社会主义的通俗论文和报道劳动者的状况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99页)。恩格斯计划要写的这组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继续写下去。这篇文章在第一次发表之后,作者没有把它收进他生前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任何一种版本。——第277页。

1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4—515页。

凡迪门岛——欧洲人原来称它为塔斯马尼亚岛,是流放地。——第278页。

149 道勃雷(Dogberries)——在英国,人们借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一剧中的人物的名字来称呼治安法官。——第280页。

150 引自1842年5月9日埃士顿-安德莱恩的工人大会决议,这个大会通过了在1842年起义期间向曼彻斯特进发的决定(关于起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0页)。——第281页。

151 显然恩格斯指的是刊登在1845年1月18日《北极星报》第375号上的《曼彻斯特建筑业协会的联合大会》一文。该文指出,1845年1月11日

为讨论波林和亨弗莱公司建筑工人停止罢工的条件而召开的大会进行得很热烈。关于这次罢工,《北极星报》没有进一步报道。根据《曼彻斯特卫报》1844年12月24日的报道,罢工于1844年12月23日结束。雇主不得不遵守其他建筑工地上通行的劳动规章。——第291页。

- 152 这篇通讯是恩格斯于1845年9月重新为宪章派报纸撰稿以后给《北极星报》投寄的一组文章的第二篇。恩格斯由于在1844年8月底离开英国并从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曾暂时停止向该报投寄通讯稿。1845年夏天(7月12日至8月26日之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布鲁塞尔前往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在伦敦逗留期间,他们会见了《北极星报》编辑哈尼(8月中)。恩格斯返回伦敦以后,又不断为《北极星报》撰稿,第一篇文章是《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27—630页),这篇文章也同这第二篇通讯一样,在该报发表时按惯例注明为“本报通讯员来稿”。——第292页。

- 153 恩格斯所指的巴黎木工的罢工于1845年6月开始,持续了三个多月;历史上称作“6月9日罢工”。罢工者要求企业主建立固定的工资标准,并同工人签订合同。《改革报》广泛报道了罢工以及后来对罢工参加者的审判的情况,表达了法国民主力量对罢工工人的同情和支持。——第293页。

- 154 这篇通讯评论了1845年9月11日瑞士君主立宪主义报纸《纽沙特立宪主义者》第109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为警察迫害居住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提供了口实。

恩格斯节译了《纽沙特立宪主义者》的这篇文章;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第294页。

- 155 “青年德意志”——三十年代初在瑞士建立(1834年成立)的德国流亡者的秘密革命协会;它同“青年欧洲”(见注106)这个组织有联系。最初在“青年德意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大学生、政论家及其他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密谋的途径在德国建立共和制度。不久,它的活动日益受到主张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联合会和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会员的影响。在三十年代中,由于德国流亡者被大

批驱逐出瑞士，“青年德意志”的活动就停止了。它在瑞士的民主州（日内瓦、窝州）有几个继续进行活动的小组，它们在四十年代又把“青年德意志”恢复起来。“青年德意志”在不主张采取密谋策略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成员的影响下，开始日益注意社会问题。——第 294、298 页。

- 156 “德国天主教徒”运动是 1844 年在德国许多邦中发生的，有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教士约·隆格是它的领导人之一，“德国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和天主教会的许多教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于发展中的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

“光明之友”是 1841 年形成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这个宗教反对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 年，“光明之友”运动促成了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所谓“自由公理会”的成立。——第 296 页。

- 157 恩格斯援引他自己的文章《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27—630 页）。——第 297 页。

- 158 魏特林及其拥护者于 1843 年 6 月被苏黎世当局逮捕，同年 9 月出庭受审。检察机关无法证实被告犯有叛国和谋反的罪行，遂以教唆反对所有制和亵渎宗教的罪名将魏特林判处徒刑，驱逐出瑞士，并将他的追随者驱逐出苏黎世州。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75—593 页）一文中叙述了魏特林的案件。——第 298 页。

- 159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民主派的月刊《社会明镜》杂志撰写的。恩格斯曾参与该杂志的组织工作及其纲领的编写工作（参看本卷第 413—417 页和注 235）。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对 1838 年在巴黎出版的珀歌的四卷本《回忆录》所作的摘要（摘要由他自己译成德文）。马克思以文章的引言部分和个别插入的段落对这些摘要作了评注；他所引用的是第一卷中《论自杀及其原因》这一章。马克思在引用原文时作了压缩和意译，而不使用删节号，有些地方则自己措词，使它们的批判倾向更加尖锐。马克思在引言部分提到的有关作者的情况引自《回忆录》出版者勒瓦瑟尔的

序言。

在本卷中,马克思自己的话用老五号字刊印,珀歇一书的摘要则用小五号字刊印。马克思在文章中所写的比较重要的套用的句子和在援引时插入的其他字句以及他对句子的重新编排都作了脚注。引文中的着重号照例都是马克思加的。这篇文章载于这本杂志的一月号,并有马克思的署名。——第300页。

- 160 指《商业地理大辞典》,雅·珀歇编,1799—1800年巴黎版。——第303页。
- 161 百日是指拿破仑第一的第二次统治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恢复皇位起(他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以后)到同年6月22日即滑铁卢失败后四天重新退位为止。——第303页。
- 162 雅·珀歇《法国统计学原理》1805年巴黎版。显然,引文中误写或误印成1807年。——第303页。
- 163 这是恩格斯根据他和马克思早在1845年初拟定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的计划,对沙·傅立叶的《论商业》手稿所作的摘译。马克思草拟的计划提纲表明,他们本来打算出版一套范围广泛的法英作者的著作文丛(见本卷第272页)。看来恩格斯是1845年夏天在布鲁塞尔开始翻译手稿的。前言和结束语多半是写于1845年秋天,因为它们是对当时出版的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答复。

恩格斯选译了沙·傅立叶未完成的文稿《论三种外在统一》前七章的若干片断。傅立叶逝世后,在傅立叶派杂志《法郎吉》的前两期(1845年1—2月号 and 3—4月号)上第一次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大部分。这部著作中同傅立叶1808年匿名发表的《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一书相同的地方,编辑部用删节号代替,并标明了它们在该书中的页码。恩格斯在自己的译文中按照该书1841年版本恢复了那些相同的地方。

恩格斯节译了这七章,省略之处并没有全用删节号标明,在个别地方则用自己的话把译出的片断衔接起来。恩格斯的译文有些地方是节译或意译,而有的地方是用自己的话转述。

恩格斯对傅立叶原文的重要插话均用脚注说明。恩格斯的前言和结束语用老五号字刊印,傅立叶原文的译文用小五号字刊印。引文中的



着重号照例都是恩格斯加的。——第 318 页。

- 164 恩格斯指的是罗·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史随笔》1842 年菜比锡版。——第 318 页。

- 165 恩格斯说的“最劣等的德国理论”是指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存在于 1844—1845 年并在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中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是费尔巴哈学说的唯心主义方面和被阉割了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特殊混合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庸俗化，对它们采取高傲轻视的态度，这在格律恩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一书（1845 年 8 月在达姆施塔德出版）中格外明显。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反映出他和马克思准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开划清界线并批判它的代表人物的考虑，这时已经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 卷）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详尽的批判。——第 318 页。

- 166 这里指的是傅立叶著作中关于幻想自然界将来所要发生的变化而作的描写：海水的怪味将会改变，南北极上空将会出现放热的灵光，野兽将会变成有利于人类的牲畜，等等。

谢利叶方法是傅立叶在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所用的独特的分类法。特别是他想借助这种方法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他把关于社会心理因素——情欲的引力和斥力——的学说这一在他看来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则作为这门科学的基础。傅立叶在这种方法中以及在运用这种方法时把不科学的幻想的因素同合理的观察和辩证法的自发表现混在一起了。——第 320 页。

- 167 恩格斯把傅立叶手稿中的导言（《问题的提法》）和第一章《商业方法的顺序》的材料并入第一部分。开头引的几个片断，从“我们现在接触到文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起到“阻碍流通的一切原动力”止，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 331—332 页。——第 321 页。

- 168 傅立叶所说的“意识形态”、“思想家”是指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一批模仿者，为首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安都昂·德斯

杜特·德·特拉西,即 1804 年出版的五卷本著作《意识形态原理》的作者。——第 322 页。

- 169 在神圣同盟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举行的亚琛会议(1818 年)上曾邀请欧洲最大银行的首脑参与拟定法国在拿破仑战败后的赔款条件。会上决定,法国赔款的信贷手续由英国的伯林银行和荷兰-英国的霍普银行办理。傅立叶这里指的显然是伯林和霍普这两个银行家。——第 326 页。

- 170 1815 年的联邦主义者,指拿破仑第一 1815 年从厄尔巴岛回来直到滑铁卢失败这一短暂统治期间自愿支持他的人。——第 326 页。

- 171 指逃离英国的投机家约翰·罗所开设的专门银行经政府许可后于 1716 年在法国发行的银行券。1720 年银行破产,罗逃之夭夭。因为事前罗已经把银行转为国家财产,所以他的破产是国家破产的隐蔽形式。

阿西涅币是法国革命时期从 1789 年 12 月起发行的有价证券。这种有价证券以出售被没收的封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即国有财产)所得的收入作为保证金。阿西涅币是作为纸币流通的。由于 1794 年 7 月(热月 9 日)反革命政变后证券的发行和投机激增,阿西涅币迅速贬值。1796 年 12 月阿西涅币停止发行。——第 332 页。

- 172 傅立叶错误地认为这次行动是国民公会干的。这是督政府于 1797 年 9 月 30 日采取的行动,当时督政府已经取代国民公会的统治成为最高政府机构。督政府削减了全部国家债券的三分之二,认为只有三分之一是必须由财政部偿还的,因此称之为三分之一公债。——第 332 页。

- 173 从“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麻木不仁的目击者”起到“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也会承认这是诚实的破产”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 341—343 页。其余的段落,则按照《法郎吉》杂志发表的文字。——第 333 页。

- 174 傅立叶所谓的法兰西新法典是指 1804 年颁布的拿破仑第一民法典(Code civil)。——第 333 页。

- 175 傅立叶在手稿中列举不同种类的破产时曾指出破产者的真实姓名。但是《法郎吉》杂志在发表这一著作时,这些名字被删去了,而代之以虚构的、从文学作品中借用的名字。恩格斯自己在脚注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卷第 351 页)。——第 334 页。
- 176 暗指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耶稣会教徒、神学家托马斯·桑切斯的著作《论神圣的婚姻秘密》,这部著作以精细的诡辩和近似淫诲的大胆描写著称。——第 339 页。
- 177 从“银行家多朗特拥有两百万法郎”起到第 13 条最后一段(“用法庭对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 343—346 页。——第 340 页。
- 178 从“犹太人伊斯基里约带着十万法郎资本来到法国”起到“每一个人都贪婪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止,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 348—351 页。——第 344 页。
- 179 天主教举行祈祷仪式时在华盖下隆重地抬着所谓的圣餐。——第 350 页。
- 180 波克为法国南部的小城,以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闻名。——第 351 页。
- 181 从“小商人斯嘉本”到第 34 条末尾,恩格斯摘自《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第 346—347 页。——第 352 页。
- 182 在《法郎吉》杂志 3—4 月号除载有恩格斯提到的《论三种外在统一》手稿的三章(第八—十章)以外,还载有手稿第十一—十八章,其中和《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中相同的章节均删去。——第 355 页。
- 183 恩格斯把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情景同中世纪基督教封建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法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这种分期法把世界史划分为四个帝国:亚述巴比伦帝国、米太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又包括了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等不同形式,罗马帝国似乎是存在到世纪末)。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以绝对观念或世界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为基础的世界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小亚细亚和古埃及的历史、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日耳曼民族的历

- 史。至于那些历史不能纳入三分法模式的民族,黑格尔把它们称为非历史的民族。——第 356 页。
- 184 恩格斯指亨·威·凯泽尔的著作《财产的个性》1843 年不来梅版。——第 357 页。
- 185 指普鲁士许多城市在 1844—1845 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而成立的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团体,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尽管统治阶级竭力给这些团体涂上无害的人道主义色彩,这些团体的出现还是唤醒了城市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起了德国广大社会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团体的活动具有它所意料不到的倾向,遂于 1845 年春以不批准它们的章程、禁止它们继续活动为理由匆匆予以取缔。——第 357、413 页。
- 186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出版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见注 142)。他们准备吸收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参加《文丛》的出版工作,其中就有赫斯。但是由于赫斯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之一,使马克思、恩格斯无法同他以及一些德国刊物的其他许多出版者和编者合作,而且这也是《文丛》未能出版的原因之一。——第 359 页。
- 187 恩格斯的这些札记手稿显然是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作的准备,大约写于 1845 年 11 月。札记中引用了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原理》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 360 页。
- 188 沙·傅立叶的著作中的用语,见《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 12 章,结束语。——第 360 页。
- 189 路·费尔巴哈《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 的补充》1844 年莱比锡版。——第 362 页。
- 190 这篇匿名发表的短评是《神圣家族》的作者针对布·鲍威尔对该书的批评所作的回答,鲍威尔的批评包括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布·鲍威尔的文章发表在《维干德季刊》1845 年第 3 卷。短评的文字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二章中的一处文字部分相同(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09—111页)。——第364页。

191 对《神圣家族》的这篇评论匿名载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5年5月号。——第364页。

19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7—67、135—150、151—159、169—170页及以下各页。——第365页。

19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26—136页。——第366页。

19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138页。——第367页。

195 本卷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片断发现于1962年,并用原文载于《社会历史国际评论》杂志1962年第7卷第1部分。第三章的片断写在两页手稿上,本卷第一次予以发表。这个片断的上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217页(前两段)。——第368页。

196 这里谈到的奥顿主教(达来朗)于1789年7月4日提出的提案,目的在于扩大国民议会的权限。根据这个提案,议会中的辩论不应限于每个等级的选民在三级会议召开时交给自己代表的所谓委托书(*cahiers de doléances*)中所包含的问题;应当承认代表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决定任何问题。——第370页。

197 司法区(*Bailliages*)——革命前法国的司法区,这些区在三级会议的选举期间也是选区。

按等级划分的单位(*Divisions des ordres*)——按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来划分的单位,每个司法区都划成这三个单位。文中提到的431这个数字,看来不确切,应当是531个按等级划分的单位。——第370页。

198 网球厅(*Jeu-de-paume*)——凡尔赛的一个球场。1789年6月2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在6月17日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在这个厅集会,并且庄严宣誓,不通过法国宪法决不解散。

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有国王出席的最高法院(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的会议,它使得国王的命令必须注册才能具有法律效力。这里所说的是1789年6月23日的三级会议的一次会议,

国王在会上宣布,第三等级于6月17日通过的决议无效,并要求代表们立即解散。但是代表们拒绝离开会场,继续进行辩论。——第371页。

- 199 引自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奥托·维干德出版公司版第145页。——第372页。
- 200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纲领性文件。这一文件是同章程草案和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见本卷第419—437页)于1968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的文稿中发现的。找到的手稿,除了添写的几个字、最后一句话和代表大会主席及秘书的签名,都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恩格斯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马克思未能去伦敦),这一点从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各项决议中可以看出。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原来的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具有阶级性的新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47年6月9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会肯定了同盟章程草案和这一纲领草案。

共产主义者信条草案同章程草案一起被分发到同盟各支部去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纲领和章程时给以考虑。1847年10月底恩格斯在信条原文的基础上拟定了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7—374页)。恩格斯利用信条原文这一点可直接从下述情况得到证明:信条和《原理》有许多地方行文上是一致的,对《原理》中某些问题的回答,恩格斯决定保留信条中的原有答案。——第373页。

- 20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在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正如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的:“从后来一些著作的观点来看”,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自从马克思确定了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自己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力以后,这些概念的使用就精确了。马克

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劳动力价格”、“出卖劳动力”等概念。——第 374 页。

202 这个文件显然是马克思打算于 1847 年 9 月 18 日在布鲁塞尔的经济学家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的部分草稿。马克思在会上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会议闭幕以后,他就把演说整理一下准备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282—284 页)。草稿是马克思以摘记的形式写在第 10 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的,基本上完成于 1845 年下半年和 1846 年初。手稿中有几处由于墨渍而无法辨认。在文件的下边以及页边有恩格斯画的几幅像,显然画的是经济学家会议的参加者。——第 381 页。

203 这份手稿片断保存在马克思的一本包括有《工资》手稿并注明日期为 1847 年 12 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635—660 页)的笔记本中。在保存下来的手稿和书信中没有确切资料谈到这个片断同马克思其他著作的联系。可以这样推测:这个片断或者是马克思为 1848 年 1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做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准备的纲要(见本卷第 478—480 页),或者是他为 1847 年 12 月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中的几次政治经济学讲演准备的纲要(见注 265)。

文中马克思援用的几处引文引自他于 1847 年夏天摘抄的一本笔记。这本笔记的内容是对古·居利希的著作《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1845 年耶拿版第 1—5 卷所作的摘要。上述引文见该书第 1 卷。手稿中把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G 写成 J(马克思往往把 G ülich 写成 J ülich)。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时曾使用过这些材料;在第一章中曾对个别思想和概括有所探讨。——第 382 页。

204 《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计划草稿是马克思写在《工资》的手稿(见上注)这本笔记本的封页上的;笔记本上还注有“1847 年 12 月于布鲁塞尔”。——第 384 页。

205 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文本中没有反映第 5、6 点的内容。——第 384 页。

- 206 这份手稿是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页《共产党宣言》草稿。1848年1月底送到伦敦付印的誊清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这一页手稿部分是谈《宣言》第一章的内容,而主要是谈第二章的内容。——第385页。
- 207 恩格斯的这篇通讯是赖德律-洛兰在法国选举改革派1847年11月7日在利尔宴会上发表的演说的译文。译文译自1847年11月10日《改革报》的报道,略有删节。——第387页。
- 208 1835年的九月法令颁布于七月王朝时期,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加强了对进步报刊的镇压措施。——第389页。
- 209 《法国的改革运动。——第戎宴会》一文,是把1847年12月30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所载恩格斯的通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23—426页)加以扩充而成的文稿。文中记述的宴会举行于1847年11月21日,有关这次宴会的报道载于1847年11月24和25日的《改革报》。——第391页。
- 210 指路易十六的政府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同美国于1778年缔结的军事同盟,以及法国远征军和海上舰队参与反对英国——法国在贸易和开拓殖民地方面的竞争者——的军事行动。——第392页。
- 211 暗指法兰西共和国部队于1795年1月开入尼德兰领土,支持当地反对威廉五世总督的贵族制度的起义。总督被推翻以后,成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6),不久该共和国沦为拿破仑法国的附庸。——第392页。
- 212 恩格斯使用“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这两个词是指“摆脱民族狭隘性和民族偏见的”意思。——第393页。
- 213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集中批判路易·勃朗所说的似乎法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传播者这一民族主义的论点,并没有打算在同勃朗的论战中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传播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以后论述印度、爱尔兰、中国、伊朗等的书信和文章中指出,这些国家被拖入资本主义关系之中,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进行殖民奴役,由于它们变成了殖民地所属国的农业原料附属地,



殖民者无耻地掠夺它们的天然财富并残酷地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第 393 页。

- 214 英国同西班牙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殖民竞争,是和 1566—1609 年的尼德兰革命事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以及英国人打败西班牙人等其他胜利,使荷兰共和国(联合省共和国)便于对西班牙专制主义在尼德兰这一地区恢复其统治的企图进行抵制。在和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这一时期经常作为盟友共同作战。——第 393 页。
- 215 指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它导致在英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制度。——第 393 页。
- 216 在英国 1381 年农民起义(瓦特·泰勒起义)的参加者中流行的两行诗,这次起义的一位思想家约翰·博尔在向起义农民进行宣传鼓动时曾广泛加以引用。它显然是套用了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汉波尔的理查·罗尔的一首诗。——第 395 页。
- 217 圣约同盟派即十六和十七世纪苏格兰的喀尔文教派,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不受倾向天主教的贵族集团的侵害,缔结了特别的协议和盟约(圣约同盟)。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前夕,圣约同盟成了组织苏格兰人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制度、争取自己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政治形式和思想形式。——第 395 页。
- 218 指 1847 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民主协会。该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的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 年 11 月 15 日,马克思被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协会组成后不久就开始讨论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会议问题,以便在革命事件迫近的情势下加强欧洲革命力量的国际团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马克思在伦敦逗留期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宪章派领导人以及流亡在伦敦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代表就

有关代表会议问题顺利地进行了磋商。显然,恩格斯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民主派也进行了类似的磋商。1848年初达成了协议,预定于1848年8月25日比利时革命十八周年时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会议。但是由于1848年2月在欧洲开始的革命事件,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派得以武装比利时工人,并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是在马克思于1848年3月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未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带有更狭窄的纯地方性质,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第395、477页。

- 219 这一篇和后面一篇(见本卷第406—409页)关于宪章运动的通讯是恩格斯为法国民众派《改革报》写的。他于1847—1848年为该报撰稿,竭力利用它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团结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和民主派的力量。首先,恩格斯打算在法国广泛传播宪章运动以及宪章派刊物特别是《北极星报》的资料。恩格斯的通讯或他从该报选用并译成法文的报告,曾以《宪章运动》、《宪章派的鼓动》等标题刊登在《改革报》上,通常还附有“伦敦来信”这样的编辑部开场白。在为《改革报》撰稿期间(从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共发表了七篇恩格斯的通讯(其中五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并且还在他的协助下转载了其他报纸上刊登的马克思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的文章,他所宣传的宪章运动的经验,促使法国的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民族闭关主义,并对这一报纸的读者——法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具有激进倾向的中间阶层——发生了革命化的影响。——第397页。
- 220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告工人书是在1848年1月3日协会会议上通过的,并发表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第533号。恩格斯在下面引用时做了一些删节。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1845年夏天正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

- 斯,参加了将于 1845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离开伦敦而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竭力从思想上影响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这个核心在 1847 年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协会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影响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协会的活动持续到 1853 年。——第 397 页。
- 221 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各项要求,是 1838 年 5 月 8 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以下六点:普选权(赋予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 年和 1842 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1847—1848 年宪章派重新展开了争取通过宪章的群众运动。——第 397、463 页。
- 222 指的是英国 1830—1831 年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根据 1832 年通过的改革法案,城市中年收入不少于 10 英镑的房产所有者和承租人,都得到投票权。争取改革斗争中的主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没有得到选举权。——第 397 页。
- 223 第一次在本卷发表的《法国的局势》这篇短文曾经未加署名载于 1848 年 1 月 16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从文章的内容能证明作者是马克思,因为文章中对法国资产阶级的写照以及对无产阶级这个在法国实行革命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唯一阶级的作用的评价,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一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采用问答形式来写自己的政论文章,特别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从 1848 年 1 月 19 日《改革报》发表的这篇短文的法译文来看,也能断定作者是马克思,因为当时正在巴黎的恩格斯同该报编辑部保持密切的接触(见注 220)。——第 400 页。
- 224 恩格斯援引并叙述的是一本小册子:《前科尔贝收税官伯蒂先生驳有关他的离婚案的流言蜚语》1847 年巴黎版。——第 401 页。
- 225 吕诺在众议院对财政部卖官鬻爵提出质询以及当时的财政大臣拉卡弗

- 拉普拉涅给予否定答复一事发生于 1846 年 6 月 13 日。由于伯蒂的小册子(见前注)的发表和社会舆论对它的强烈反响,1848 年 1 月 7 日的《改革报》登载了上述吕诺和财政大臣之间的辩论的摘要,以及恩格斯在后面引用的反对派议员安·玛·杜班对这个问题的讲话。——第 402 页。
- 226 恩格斯在本文中分析阿尔及利亚人的领袖阿卜杜尔-卡迪尔被俘(见注 104)的报道时,对这一运动的评价不同于他在比较早的文章(见本卷第 205—206 页)中所持的看法。恩格斯一面谴责资产阶级的法国采用野蛮的方法占领阿尔及利亚,同时又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关系取代比较落后的封建宗法关系是不可避免的,而反抗这一进程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恩格斯更深入地研究了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历史和被压迫群众对殖民统治的反抗的历史,指出被压迫民族反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的斗争具有解放的和进步的性质,这一斗争客观上促进了工人阶级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比如说,恩格斯在 1857 年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阿尔及利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99—110 页)这一条目就是用这一观点阐述了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运动。——第 403 页。
- 227 《北极星报》编辑部在这里作了如下说明:“这封信本来应该在上星期送给本报,但直到本星期二才由一位友人从巴黎带给我们。那时本报通讯员曾一度幻想,路易·菲力浦或他手下的人可能会采取公正的或宽大的行动。阿卜杜尔-卡迪尔将不是送往埃及,他将被禁锢在法国。国王守信用的又一个样板!无耻的菲力浦守信用的样板!”
- 阿卜杜尔-卡迪尔在法国被囚禁近五年,到 1852 年才获准移居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第 403 页。
- 228 恩格斯在这篇通讯中记述了宪章派为通过全民请愿书而召开的群众大会。文章所引的哈尼和琼斯的讲话摘录,引自 1848 年 1 月 15 日《北极星报》第 534 号发表的报告,恩格斯在引用时作了一些删节,在不少地方自己作了转述。看来,《改革报》编辑部把恩格斯所提供的文章删去了一部分,并在下面三段中使用了该文所包含的事实和观点:
- “我们已经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宪章派的鼓动。《改革报》是目前

唯一对这个广泛的组织表示关切的法国报纸。这个组织的力量和毅力与日俱增,它必不可免地将在一定的时机推翻英国寡头政治的怪异大厦。

今天我们刊登了宪章派两位主要发言人厄·琼斯先生和乔·哈尼先生的讲话。读了这两篇讲话,便可确信群众的愤怒已达到何等程度,便可理解群众那种迫使罗伯特·皮尔呈请辞职的失望情绪,虽然他为减轻人民负担做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届内阁连想都没有想做的事。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所引用的两篇讲话的意义和作用,应当想起特权阶级妄图用最近可能有人入侵的谣言来诱使人民走上歧途。他们不是提出在伦敦周围构筑碉堡,而是想大量扩充常备军。这还是老一套。他们想用对付巴黎人的方法来对付英国人。现在我们看到,人民是怎样回答这些暗示的。我们让通讯员来说吧!”——第 406 页。

- 229 指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五万人。协会是许多政治运动和召开宪章主义公会的倡议者。但是,在它的活动中缺乏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组织上相当涣散。1848 年宪章派失败和协会队伍分裂后,它丧失了群众组织的性质,但是它在革命的宪章派的领导之下进行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宪章运动的斗争。协会于 1858 年完全停止活动。——第 406 页。
- 230 土地共用社是 1845 年根据奥康瑙尔的倡议创办的,一直存在到 1848 年。共用社的宗旨是用征集的资金购买土地,并把土地分成小块以优惠的条件出租给工人股东。土地共用社的活动的积极方面是表示——在请愿书和印刷的宣传品上——反对贵族对土地占有的垄断。但是,关于通过让工人回到土地上去的办法可以使工人不受剥削,减少失业等等的思想,具有空想的性质。共用社的活动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第 407 页。
- 231 指宪章派的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和许多激进的活动家于 1847 年 8 月 5 日在诺定昂进行的选举中被选进议会。——第 407 页。
- 232 指圣斯蒂凡教堂(St Stephen's Chapel),从 1547 年起,下院的会议就

- 在此举行。——第 408 页。
- 233 在哈尼的讲话中使用了西班牙国王和德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一些同时代人关于国王的领地的用语：“太阳不落”的领地。——第 408 页。
- 234 交易所街(Change Alley)是伦敦的一条街道,南海商业金融公司管理机关的所在地。它是经营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主要场所之一。——第 409 页。
- 235 致爱北斐特《社会明镜》杂志的读者和撰稿人的公开信是弗·恩格斯和莫·赫斯写的。从 1845 年 1 月 20 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17 页)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参加了该杂志的出版筹备工作,以及它的纲领的起草工作,纲领以这封公开信的形式刊登在创刊号上。最初恩格斯曾打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部,他在自己的一篇通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588—601 页)中谈到这一点。恩格斯所制定的调查工人状况的计划,在很多方面是同他当时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在这个纲领中也有一些带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抽象伤感主义和博爱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来自赫斯。对赫斯观点的不满,显然是恩格斯拒绝参加编辑部的原因之一。赫斯主编的《社会明镜》很快就离开了恩格斯在纲领中制定的路线,并且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和伤感主义思想的传播者。——第 413 页。
- 236 指 1844 年 6 月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见本卷第 209—213 页)。——第 416 页。
- 237 这一文件证明,马克思被驱逐出法国后,比利时当局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1845 年 3 月 22 日他被召到布鲁塞尔警察局,并被迫向它递交了这份书面保证。马克思在 1845 年 3 月 24 日给海涅的信中曾提到这件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458 页)。——第 418 页。
- 238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于 1847 年 6 月初在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分送各区部和支部讨论。草案反映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所进行的改组工作。1847 年初,马克思和恩格

斯同意在同盟按民主的原则进行改组并清除同盟的结构和活动中所存在的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的因素的条件下加入同盟。恩格斯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对章程的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见注 200)。由地方区部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代替了以前的领导机构——狭隘的人民议事会,成为同盟的最高机关,而中央委员会则成为执行机关。同盟所有的组织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同时,草案的某些条款也表明了改组的不彻底,还有以前的宗派观念的影响。这些条款后来按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下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建议而表达得确切了(见注 266)。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2月)通过了这个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结构的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

这个章程草案是1968年在汉堡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尔滕斯的文稿中发现的,同时还发现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其他在本卷中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419页。

- 239 领导正义者同盟的人民议事会(它的所在地于1846年11月由巴黎迁往伦敦)在1847年2月写信给同盟的地方组织,要求选举代表,出席定于6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代表大会。在人民议事会的信中还确定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代表大会决定同盟的执行领导机关仍设在伦敦,这个机关按照通过的章程草案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称为中央委员会。——第424页。
- 240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秘密组织不能公开举行自己代表大会的会议和公布会议的材料。——第424页。
- 241 指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第21条(见本卷第421页)。——第424页。
- 242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协会在自己的不同活动时期都有分会设在伦敦工人区。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与了协会的活动。可是,由于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引起分裂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在协会中势力的暂时增强,马克思、恩格

- 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于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在颇大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在第一国际纲领中的确立。协会作为国际俱乐部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 425 页。
- 243 指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秘密的工人团体,在其成员中广泛传播着空想派别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卡贝、德萨米和其他人)。——第 425 页。
- 244 在这个总结报告中描述的 1845—1846 年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情况,同自从 1846 年 8 月 15 日起旅居巴黎的恩格斯寄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报道是相符合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所载恩格斯 1846 年 8 月—12 月的信)。总结报告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根据恩格斯的报道写成的。恩格斯在克服同盟巴黎各支部内部的思想混乱,在划清它们的革命一翼同倾向于庸俗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魏特林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排斥,这一部分可能是恩格斯自己写的。——第 425 页。
- 245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 年斐维版。——第 425 页。
- 246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由卡·格律恩译成德文,于 1847 年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 426 页。
- 247 大概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巴黎盟员为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见注 270)的参加者募集的捐款。——第 426 页。
- 248 指的是卡·格律恩的小册子《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 年比尔文肯版。——第 426 页。
- 249 指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会,它在其所在地从巴黎迁到伦敦(1846 年 11 月)以前主要是由魏特林分子组成。——第 430 页。
- 250 显然是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面晤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和参加同盟在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改组工作。1847 年 1 月底



- 2月初,约·莫尔代表人民议事会同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在巴黎的恩格斯进行了谈判。——第430页。
- 251 伦敦中央委员会计划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定期机关刊物(报纸或者杂志),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成功。只是于1847年9月初在伦敦出版了一期《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它是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印刷所中印刷的。从这期的内容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在刊登的(威·沃尔弗、卡·沙佩尔和其他人的)文章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其他派别,回击了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讦,叙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原理。在杂志的试刊中,第一次在刊物里作为题词出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1847年9月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事实上固定的机关报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并把报纸的编辑事务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第434页。
- 252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年2月》(见注239)。——第437页。
- 253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给同盟的各国支部寄去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时,也给它们寄去了类似的附信。——第438页。
- 254 1847年9月14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是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以后同盟工作的季度总结。它象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其他文件一样是在汉堡的同盟盟员马尔滕斯的文稿中发现的。在最后一页上卡·沙佩尔给他的附言证明,这份文件是指定供汉堡各支部使用的。——第441页。
- 255 指的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于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即在它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发出的两份告同盟书(见注252)。——第444页。
- 256 指的是福尔塞尔的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基督教》1847年斯德哥尔摩版。——第444页。
- 257 斯堪的那维亚协会是存在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激进民主派的协会。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联系。参加这个协会的主要是工人和手工

业者。该协会的主席是同盟盟员、翻译家、出版商和书商佩尔·约特雷克,秘书是埃克斯特廖姆。——第 444 页。

- 258 1847 年 8 月被派往阿姆斯特丹的约翰·多尔在 10 月把由八人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阿姆斯特丹支部成立的消息告诉了中央委员会。

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于 1847 年 2 月 14 日。在它的组织和活动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起了积极的作用。1848 年 3 月,伦敦的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给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教育协会送去一百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姆斯特丹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由于组织 1848 年 3 月 24 日的阿姆斯特丹人民群众大会以支持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遭到警察的残酷迫害。——第 448 页。

- 259 马克思准备出版《哲学的贫困》德译本的计划没有实现,在马克思生前只用德文发表了这部著作的第二章的一些片断。这部经恩格斯校订过的著作的第一个德文本于 1885 年出版。——第 450 页。
- 260 1847 年初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中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被第一次代表大会开除的魏特林分子同格律恩的拥护者联合起来了。10 月发生分裂,有一个支部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它开除出盟。当时在巴黎的恩格斯于 1847 年 10 月 25—26 日写信给马克思说:“在我到达的前几天,最后的一些格律恩分子(整整一个支部)被赶了出去,不过其中半数是会回来的。现在我们总共只有三十个人。我立即建立了一个宣传支部,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我立即被选进了区部,任务是搞通讯。有二十到三十个人正待接收入盟。我们很快又会更加壮大起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113—114 页)——第 450 页。
- 261 暗指 1845 年在伯尔尼出版的威·魏特林的著作《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作者在这本书中为盗窃辩护,认为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手段。——第 451 页。
- 262 指的是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秘密革命组织“青年德意志”的前成员,这个组织在 1845 年被警察破坏(见注 155)。——第 451 页。
- 263 提到的是下述印刷品:匿名小册子《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主们》、卡·

- 海因岑的小册子《为专制国家官兵制定的近代战争条例三十条》(纽施塔特版)。——第 451 页。
- 264 指科伦、威斯特伐里亚、爱北斐特的共产主义者小组。这些小组早期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有联系,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建立同盟支部。——第 453 页。
- 265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工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在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实行公开联合的中心。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协会对比利时工人运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见注 218)。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在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而终止。——第 453 页。
- 266 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反映了马克思为使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完善化,为在党的结构中克服正义者同盟所固有的宗派主义关门倾向的残余而进行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关于代表大会的决议要经过支部批准的条款取消了,而关于禁止盟员参加其他政治组织,则只限于那些目标与同盟背道而驰的组织。——第 453 页。
- 267 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章程——是初步方案,必须在地方上讨论,经过修订并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 年 12 月)最后批准。——第 455 页。
- 268 指 1847 年春在柏林被捕的正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判案。由于盟员的出卖者、主要证人门特耳否认了自己以前的口供,法庭不得不对许多被捕者判处很轻的惩罚,并宣告一些被捕者无罪。——第 457 页。
- 269 关于“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220 和 242)所在地召开的国际会议的报道,以《波兰革命。——重要的群众集会》为题载于《北极星报》。在这篇报道中摘要转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

- 说(这两篇经过作者审阅的演说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09—412页)。报道提供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详情细节,这是对《改革报》所发表的恩格斯关于这次会议的简短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13—415页)的补充。——第458页。
- 270 指1846年2月22日在克拉科夫共和国举行的民族解放起义过程中建立的波兰共和国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宣言号召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宣布了民主权利,废除了封建义务,并将农民的份地转归农民所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民主派(邓波夫斯基等人)。克拉科夫的起义在1846年3月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武力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一项将“克拉科夫自由市”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458页。
- 271 在1846年2月克拉科夫民族解放起义期间(见注270),奥地利当局在加里西亚挑起了乌克兰农民同小贵族起义部队之间的冲突。——第460页。
- 272 指在瑞士1847年内战中进步力量的胜利和分离派同盟为了它的利益勾结欧洲列强武装干涉的企图的失败(见本卷第207—208页和注276)。——第460页。
- 273 马克思把召开国际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建议同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76—281页)作了对比。——第462页。
- 274 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作为“中央”(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被派往波兹南,组织波兰境内的起义;他在起义前不久(1846年2月)被普鲁士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由于1848年3月德国开始了革命,他才被释放。——第465页。
- 275 指瑞士内战(见注272和276)。——第467页。
- 276 指欧洲五强(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有利于分离派同盟而企图组织对瑞士内战的外交干涉和武装干涉,它的倡议者是得到法国基佐政府支持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梅特涅和基佐的计划中有

- 召开关于瑞士问题的五大强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把媾和条件强加于瑞士的交战双方。由于分离派同盟的军队被迅速击溃,这些反动计划破产了。——第 467 页。
- 277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11 月底—12 月初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伦敦逗留期间,也参加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 242)的会议。他们对协会会员做了许多报告。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演说的记录非常简略和不全。在本卷中,演说按照协会记录簿所记的次序发表的。记录本没有找到。——第 471 页。
- 278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创建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 265)。——第 474 页。
- 279 指 1847 年在巴黎出版的路·勃朗的著作《法国革命史》。——第 474 页。
- 280 指 1847 年在汉堡出版的道梅尔《基督教古代的圣礼》一书。——第 475 页。
- 281 1848 年 1 月 6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2 号刊登的报道中说,1847 年 12 月 31 日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举办的新年晚会有将近 130 人出席。他们当中有各国(比利时、德国、波兰、法国等)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除了马克思以外,发言的还有德国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威·沃尔弗,他为“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愿望的表达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繁荣举杯祝贺。波兰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约·列列韦尔以波兰民主派的名义向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致敬,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燕妮·马克思在晚会结束时朗诵了诗。报道指出,新年晚会是国际民主力量增长和团结的重要显示。——第 477 页。
- 282 在以后的几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没有找到有关马克思的《什么是工资》这一报告报道。1847 年 12 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作了一系列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讲演。除了为讲演准备的其他材料以外,马克思还拟定了《工资》的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6 卷第 635—660 页)。——第 477 页。

- 283 这一叙述马克思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的报道载于 1848 年 1 月 16 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 5 号,标题是《上星期日(1 月 9 日)民主协会的会议》。民主协会曾经两次(6 日和 9 日)通过这家报纸发出即将举行公开会议的通告,邀请自己的拥护者来听取“卡尔·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协会出钱刊印马克思的演说。伯恩施太德执笔的关于 1 月 9 日马克思讲演的简讯载于 1848 年 1 月 19 日《改革报》。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444—459 页)1848 年 2 月初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478 页。
- 284 关于在布鲁塞尔举行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会的报道,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没有见到,因为该报的最后一号即第 17 号是 1848 年 2 月 27 日出版的。——第 481 页。

## 人 名 索 引

### A

- 阿贝尔,雅克·勒奈(Hébert, Jacques-René 1757—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领袖。——第 272 页。
- 阿卜杜尔·卡迪尔(Abd el Kader 1808—1883)——1832—1847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1847 年被法国人俘获。1852 年被允许迁往叙利亚。——第 205、206、402、403 页。
- 阿卜杜尔·拉曼(Abd el Rahman 1778—1859)——摩洛哥的苏丹。——第 205、404 页。
- 阿尔伯特(Albert, prinz von Sachsen-Coburg-Gotha 1819—1861)——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第 293 页。
- 阿尔塞兰(Arcelin)——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的军医。——第 206 页。
- 阿拉戈,埃蒂耶纳(Arago, Etienne 1803—1892)——法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8 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在那里属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多米尼克·弗朗斯瓦的弟弟。——第 391 页。
-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斯瓦(Arago, Dominique Fran çois 1786—1853)——法国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是共和主义者;1848 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积极支持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第 389、396 页。
- 阿诺特,约翰(Arnott, John)——宪章运动的活动家。——第 458、466 页。
- 阿梯拉(Attila 死于公元 453 年)——匈奴帝国国王(433—453)。——第 348 页。
-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 公元前 525—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剧作家。——第 133 页。
-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0—1848)。——第 194 页。
-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élvé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272 页。
- 安贝尔,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社会主义者,1834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1833—1834 年是马赛《人民主权》报的编辑。四十年代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第 461、469 页。

安德斯,奥古斯特(Anders August)(拉普人)——德国政论家,侨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8年底起为伦敦东头区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分会的领导人之一。——第443页。

昂格勒斯,茹尔(Anglès, Jules 1778—1828)——伯爵,巴黎警察厅长。——第315页。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玛丽-泰莉莎-夏绿蒂(Angoulême, Marie-Thérèse Charlotte, duchesse d' 1778—1851)——路易十六的女儿,昂古莱姆公爵的妻子。——第315页。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arski, Ludwik 1787—1873)——伦敦的波兰政治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399、464页。

奥顿主教——见达来朗-贝里戈尔。

奥尔良王朝(Orléans 1830—1848)——法国王朝(1830—1848)。——第205页。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利浦·路易(Aumale, Henri Eugène Philippe-Louis d' orléans, duc d' 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之子。——第206、403页。

##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1760—1797)(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272、384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政论家,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后来

是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第217页。

巴莱尔-德维约扎克,倍尔特兰(Barère de Vieuzac, Bertrand 1755—1841)——法国法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议会议员,雅各宾党人;后来是热月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第370、371页。

白金汉,詹姆斯·西尔克(Buckingham, James Silk 1786—1855)——英国作家和旅行家,议会议员。——第230页。

邦纳罗蒂,菲利浦(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战友。——第272页。

包令,约翰(Bowring, John 1792—1872)——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自由贸易派。——第466页。

鲍威尔,埃德加尔(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218页。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了许多关于基督教史的著作。——第45—47、156、364—367、370、371页。

鲍威尔,亨利希(Bauer, Heinrich)——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第456、457页。

贝尔纳(Bernard, G.)——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 第 399 页。
- 贝尔加斯,尼古拉(Bergasse Nicolai 1750—1832)——法国保皇派的政论家,重农学派,职业是律师。——第 108 页。
-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 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四十年代是瑞士的魏特林派的领导者之一。——第 299 页。
- 贝魁尔,康斯坦丁(Pequeur, Constantin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59, 71 页。
- 贝朗热,比埃尔·让(Bé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法国诗人,民主主义者,讽刺歌曲作家。——第 389 页。
- 本生,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家,政论家和神学家,接近普鲁士宫廷;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 185 页。
- 彼得逊,尼古拉(Petersen Nikolai 1814—1894)——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四十年代是魏特林派,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452 页。
- 毕莱,欧仁(Buret, Eugène 1810—184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 59, 60, 72 页。
-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贝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将军,奥尔良派;曾参加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指挥部镇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战争组织者之一;写有许多军事著作。——第 403 页。
-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第 272 页。
- 本肯多夫,亚历山大·克里斯扎弗罗维奇(Бенкендорф,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1783—1844)——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尼古拉一世的亲信;二十年代是宪兵首领和第三支队的队长。——第 203 页。
-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 1824—1898)(真名为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在《新莱茵报》当编辑并领导《工人兄弟报》,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450, 451 页。
- 波林(Pauling)——曼彻斯特建筑业承包商。——第 278—280, 282—291 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旁王朝(Bourbon)——法国王朝(1589—1792, 1814—1815 和 1815—1830)。——第 303, 309 页。
- 波泽(Pohse, K.)——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俄国的代表。——第 399 页。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1849 年革命的活动家,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第 391—395, 474 页。
- 勃鲁姆(Bluhm, P.)——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 399 页。
- 伯蒂(Petit)——科尔贝的收税官。——第 401, 402 页。
-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

- 1848), 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 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3月被开除出同盟。——第470页。
- 博林布罗克, 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 Henry Saint John,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第393页。
- 博伊姆勒, 约瑟夫·米哈伊尔(Baümler, 约 1778—1853)——德国传教士, 1817年侨居美国, 在那里的佐阿城(俄亥俄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第228、229页。
- 布赖埃尔,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Breyer, Friedrich Albert 1812—1876)——德国自由派, 四十年代布鲁塞尔的医生,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478页。
- 布雷, 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7)——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 职业是印刷工人。——第265页。
- 布鲁姆, 亨利·彼得(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名活动家, 大法官(1830—1834)。——第58页。
- 布洛利, 维克多·弗朗斯瓦(Broglie, Victor François 1718—1804)——法国将军,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指挥反革命联军。——第371页。
- C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408页。
- 茨万齐格尔(Zwanziger)——西里西亚的德国厂主。——第211页。
- D
-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Talleyrand P 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1791—1799、1799—1807、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 以政治上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第370页。
- 达兰贝尔, 让(D 'Alembert, Jean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第393页。
- 大卫·丹热, 比埃尔·让(David d'Angers, Pierre Jean 1788—1856)——法国雕塑家, 四十年代是选举改革运动的参加者。——第389页。
- 道梅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德国作家, 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第475页。
- 德莱克, 海尔曼(D öleke, Hermann)——德国三十至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成员。——第294页。
- 德穆兰, 卡米尔(Desmoullins, Camille 1760—1794)——法国政论家,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右翼雅各宾党人。——第108页。
- 德萨米, 德奥多(D ézamy, 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 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卓越代表。——第272页。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安都昂·路易·

- 克劳德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Claude 1754—1836)——伯爵,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感觉论哲学家; 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 25、110、146 页。
-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 대표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领袖。——第 393 页。
- 狄克逊, 威廉 (Dixon William)——宪章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 406 页。
- 迪里希 (Dirig)——兰根比劳(西里西亚)棉纺织厂厂主。——第 212 页。
- 迪韦里埃, 沙尔 (Duveyrier, Charles 1803—1866)——法国文学家和律师, 圣西门主义者。——第 259 页。
- 杜班, 安得列·玛丽·让·雅克 (Dupin, André Marie Jean-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 制宪议会议员 (1848—1849)。——第 402 页。
- 杜邦·德·累尔, 雅克·沙尔 (Dupont de l' 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 自由派;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 1830 年革命的参加者; 四十年代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 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 396 页。
- 杜诺瓦耶, 沙尔 (Dunoyer, Charles Pierre-Joseph 1786—1862)——法国庸俗的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259 页。
- 多尔·约翰·巴尔塔扎尔 (Dohl, John)——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7 年是同盟在荷兰的特使。——第 443、448 页。
- E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
- F
- 法伊恩, 格奥尔格 (Fein, Georg 1803—1869)——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成员。——第 294 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46—48、128、157—159、171、217、237、296、318、360—362、366、368、369 页。
- 费里埃, 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Fé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模仿者。——第 243、268—271 页。
- 芬克,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威廉·冯 (Vincke, Friedrich Ludwig Wilhelm von 1774—1844)——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论土地所有制》一书的作者。——第 108 页。
- 芬奇, 约翰 (Finch, John)——英国旅行家和记者, 欧文的信徒。——第 223、227、229 页。
- 丰克,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威廉 (Funke, Georg Ludwig Wilhelm)——德国神学家, 右翼黑格尔分子。——第 108 页。
- 弗朗斯瓦·德·讷夫沙托, 尼古拉-路易·弗朗斯瓦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 Nicolas-Louis-François 1750—1828)——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督政府时期曾领导内务部。——第 303

- 页。
-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1821—1847)——奥地利大公。——第 293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第 182—185、194、195、209、292、293 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 391、395 页。
-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242、325、393 页。
- 福尔塞尔,卡尔·丹尼尔(Forsell, Karl Daniell)——瑞典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作者。——第 444 页。
- 富塞尔,约翰(Fussell, John)——伯明翰宪章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406 页。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17、272、300、319—321、323、329、336—339、342—344、348、351—358、384 页。

## G

- 盖伊,茹尔(Gay, Jules 1807—1876 以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第 272 页。
- 歌德,约翰·沃尔夫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 151、152 页。

-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 Cristoforo 1451—1506)——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亚人。——第 471 页。
- 格鲁培,奥托·弗里德里希(Gruppe, Otto Friedrich 1804—1876)——德国政论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1842 年写了一本反对布·鲍威尔的小册子。——第 156 页。
-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426—428、445、450 页。
-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272 页。
- 古利耶,保尔·路易(Courier de Méry, Paul-Louis 1772—1825)——法国语文学家 and 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第 110 页。
- 古罗夫斯基,亚当(Gurowski, Adam 1805—1866)——波兰政论家,1830—1831 年起义的参加者,转向君主专制方面;1849 年起侨居美国,五十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 198 页。

## H

-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Haller, Karl Ludwig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士。——第 108 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

- 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以及宪章派其他刊物的编辑,“民主派兄弟协会”委员,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友好关系。——第 397、399、406、408、462、465 页。
- 海德——见沃尔弗,威廉。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 451 页。
- 汉特,托马斯(Hunt, Thomas)——英国社会主义者,在威斯康星州创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第 231 页。
- 赫斯,莫泽斯(He, Moses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46、124、470 页。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46、47、156、157—165、170—178、237、356、365 页。
- 亨弗莱(Henfrey)——曼彻斯特建筑业承包商。——第 278、279、282—291 页。
- 华莱士,威廉(Wallace, William 约 1270—1305)——苏格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的领袖。——第 205 页。
- 霍恩舒(Hornschuh)——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派;瑞士特使。——第 452 页。
-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Holbach, Paul-Henri 1723—1789)——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自然体系》一书的作者。——第 272 页。
- 霍尔姆,彼得(Holm, Peter)——丹麦的社会主义者;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 399 页。
- 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奥古斯特·亨利希(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1798—1874)——德国资产阶级诗人和语文学家。——第 195 页。
- 霍夫曼,麦克斯(Hoffman, Max)——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成员。——第 294 页。

## J

- 基卜生(Gibson)——曼彻斯特的建筑工人。——第 285 页。
- 基恩,查理(Keen, Charles)——宪章运动的参加者,“民主派兄弟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399、406 页。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izot, François 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 至 1848 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 400、401、404 页。
- 吉纳耳(Ginal)——在费拉得尔菲亚的德国传教士;曾在宾夕法尼亚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第 231 页。
- 加尔涅,热尔门(Garnier, Germain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 第 269 页。
- 加尼耳,沙尔(Ganilh, Charles 1758—1836)——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第 110 页。
- 居利希,古斯塔夫(G ülich, Gustav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保护关税的拥护者。——第 381 页。
- ###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1841—1849 年是《人民报》编辑。——第 120、272、384 页。
-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约 100—44)——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183 页。
- 凯泽尔,亨利希·威廉(Kaiser, Heinrich Wilhelm)——德国作家,《财产的个性》一书的作者。——第 357 页。
- 康克林,叶哥尔·弗兰策维奇(Канкрин, Егор Францевич 1774—1845)——俄国国家活动家,伯爵,在德国出生;1823—1844 年任财政大臣。——第 203 页。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第 459 页。
- 柯林斯,约翰·安德森(Collins, John Anderson 1810—1879)——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流亡美国,1843 年在斯坎尼特尔斯(纽约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第 231 页。
-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第 282 页。
- 科瑟加顿,威廉(Kosegarten, Wilhelm 1792—1868)——德国反动的政论家,农奴制度的辩护人,曾鼓吹恢复中世纪秩序。——第 108 页。
- 克拉克,托马斯(Clark, Thomas)——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1848 年后是改良主义者。——第 399、406 页。
- 克拉维埃尔,埃蒂耶纳(Clavière, Étienne 1735—1793)——法国国家活动家;1789 年—1794 年革命时期是立法会议代表;在吉伦特党政府内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第 245 页。
- 克雷尔(Krell, G.)——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瑞士代表。——第 399 页。
-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 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集团,《人民论坛报》的编辑。——第 428 页。
- 克罗沙尔(Crochard)——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的下级军官。——第 206 页。
- 克希林(K öchlin)——埃斯林根(维尔腾堡)的纺纱厂厂主,保护关税派。——第 265 页。
- 孔德,沙尔(Comte, Charles 1782—1837)——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第 245 页。
- 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追随者。——第 272 页。
- 库尔曼,格奥尔格(Kuhlmann, Georg)——奥地利政府的秘密情报员;

- 以“先知者”自命;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魏特林派中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使这种思想披上宗教语言的华丽外衣。——第 299、429 页。
- 魁奈,弗朗斯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最大的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 114、479 页。
- ### L
- 拉菲特,雅克(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分子,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第 204、205 页。
- 拉卡弗-拉普拉涅,让·比埃尔·约瑟夫(Lacave-Laplagne, Jean Pierre Joseph 1795—1849)——法国国家活动家,保皇党人;1842—1847 年任财政大臣。——第 401、402 页。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 年任外交部长,是临时政府的实际首脑。——第 389 页。
-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父,政论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396 页。
- 拉普,约翰·格奥尔格(Rapp, Johann Georg 1757—1847)——德国鼓动家,曾在美国创办共产主义移民区。——第 225、227 页。
- 莱昂(或弥勒),伯恩哈特(Leon Müller), Bernhardt)——伯爵,在美国的德国移民,三十年代初在菲力浦堡创立了《新耶路撒冷》移民区。——第 227 页。
- 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 年是临时政府成员。——第 387、389—391 页。
- 兰齐措勒,卡尔·威廉(Lancizolle, Karl Wilhelm 1796—1871)——德国法学家,著有关于德国各邦历史的著作。——第 108 页。
- 劳顿,查理(Laudon, Charles 1801—1844)——英国医生,工厂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委员。——第 59 页。
- 劳申普拉特,约翰·恩斯特·海尔曼·冯(Rauschenplatt, Johann Ernst Hermann von 1807—1868)——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成员。——第 294 页。
- 勒克莱尔克,泰奥菲尔(Leclerc, Théophile 生于 1771 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穷的劳动阶层的利益的“疯人派”的领袖之一。——第 272 页。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杜·普勒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第 393 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第 3、18、41、72、105、110、113、136、137、148、246、247、263、264、267、479 页。
- 李奇,詹姆斯(Leach,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织布工人;1842 年郎卡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的朋友。——第 282 页。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 239—254、259、261、262、264—265、268、271 页。
- 里德 (Read)——曼彻斯特的建筑工人。——第 290 页。
- 里德尔, 理查 (Riedel, Richard)——德国裱糊工, 侨居布鲁塞尔, 德国工人协会会员; 1847 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 470 页。
- 里普利, 乔治 (Ripley, George 1802—1880)——美国一神论派传教士, 1842 年在布鲁克农场 (马萨诸塞州) 建立移民区和学校。——第 231 页。
- 利奥, 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 108 页。
-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参加者, 波兰流亡民主派领袖之一, 1847—1848 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员会委员。——第 461、469、481 页。
- 列斯凯, 卡尔·威廉 (Leske, Karl Wilhelm)——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 298 页。
- 隆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传教士, 利用天主教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第 296 页。
- 隆特贝格 (Luntberg)——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代表。——第 399 页。
- 卢, 雅克 (Roux, Jacques 1752—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动者阶层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一。——第 272 页。
- 卢布林纳, 路德维克 (Lublīner, Ludwik)——波兰革命者, 律师, 1848 年侨居布鲁塞尔。——第 481 页。
-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305、371、393 页。
- 鲁卡斯 (Lucas, T.)——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 1847 年 11 月 29 日为纪念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第 462 页。
-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德国新教 (路德教) 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等级思想家。——第 112、113 页。
- 路德维希一世 (Ludwig I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 (1825—1848)。——第 197、200 页。
- 路易·菲利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71、204、205、218、391、394、403、404、460、462 页。
-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 (1461—1483)。——第 393、394 页。
- 罗, 约翰 (Law, John 1671—172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 法国财政大臣 (1719—1720); 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 332 页。
- 罗伯茨, 威廉·普劳廷 (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 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第 284—288、290 页。



罗德戴尔,詹姆斯(Lauderdale, James 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批判亚·斯密的理论。——第136页。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第196、406页。

吕诺,塞巴斯提安(Luneau, Sébastien 1800—1880)——法国国家活动家,1831—1848年是下议院议员。——第402页。

## M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 Gabriel 1709—1785)——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第272页。

马尔,威廉(Marr, Wilhelm 1819—1904)——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领导人之一,《现代社会生活报》的编辑。——第294、296、298、439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136页。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

马莱-迪庞,雅克(Mallet Dupan, Jacques 1749—1800)——法国政论家,历史回忆录的作者。——第303页。

马提诺,哈里埃特(Martineau, Harriet 1802—1876)——英国资产阶级女作

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第230页。

马歇尔,约翰(Marschall, John 1783—1841)——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70页。

马赞尼洛(Masaniello 1620—1647)(托马佐·安尼洛Tomaso Aniello的绰号)——1647年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第390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的狂热辩护士。——第311、244、246、264页。

迈因茨,卡尔·古斯塔夫(Maynz, Karl Gustav 1812—1882)——德国法学家,布鲁塞尔大学教授,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469页。

梅利奈,弗朗斯瓦(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法国人,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第461、469页。

梅利什,约翰(Melish, John 1771—1822)——英国作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访问和描写了美国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第230页。

梅洛(Mellor)——曼彻斯特的建筑工人。——第285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c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时从牢中释放。——第465、466页。

-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185、460、473 页。
- 门特耳, 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Mentel, Christian Friedrich)——德国裁缝, 正义者同盟盟员, 1846—1847 年因同盟案件被关在普鲁士狱中。——第 428、430 页。
- 蒙克 (Monk)——英国法学家。——第 285—286 页。
- 弥勒, 威廉 (Müller, Wilhelm 1816—1873) (笔名科尼斯文特尔的沃尔弗干格·弥勒 Wolfgang Müller von Königswinter)——德国诗人, 四十年代是杜塞尔多夫的医生。——第 218 页。
- 米拉波, 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利益的代表者。——第 245 页。
- 米歇尔 (Michélot, J. A.)——法国民主主义者, 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第 399、459 页。
- 密尔顿, 约翰 (Milton, John 1608—1674)——杰出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 393 页。
- 摩莱, 路易·马蒂约 (Malé, Louis Mathieu 1781—1855)——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 曾任首相 (1836—1837、1837—1839), 1848—1851 期间是保守的保皇派“秩序党”领袖之一。——第 400 页。
- 摩莱里 (Morelly)——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第 272 页。
- 莫德, 丹尼尔 (Maude Daniel)——曼彻斯特调解法官。——第 280—286、290 页。
- 莫尔, 约瑟夫 (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427、439、456、457、466 页。
- 莫尔莱, 安德烈 (Morellet, André 1727—1819)——法国神甫, 作家和哲学家, 写了许多经济著作。——第 303 页。
- 默泽尔, 尤斯图斯 (Möser, Justus 1720—1794)——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德国保守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第 108 页。
- 穆勒, 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 同时也从李嘉图理论中得出某些激进的结论。——第 3、5、17、18、33、40、105、110、113、137、139、146—148、246、264 页。

## N

-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第 243—244、266、268、303、389、465、472 页。
- 瑙威尔克, 卡尔 (Nauwerck, Karl 1810—1891)——德国政论家, 柏林大学的教授, 曾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小组。——第 194 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1825—1855)。——第 185、194、197、199、203 页。

## O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121、226、232、272、300、319、384 页。

## P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第 404、460 页。佩基奥, 朱泽培 (Pecchio, Giuseppe 1785—1835)——意大利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写了许多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第 244 页。

佩利斯 (Pelisse)——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的上士。——第 206 页。

佩列林, 让 (Pellering, Jean 1817—1877)——比利时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 鞋匠。——第 470 页。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的领袖; 首相 (1834—1835、1841—1846), 在自由派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第 281 页。

皮卡尔, 阿尔伯 (Picard, Albert)——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 461、469 页。

皮林, 理查 (Pilling, Richard 生于 1800 年)——曼彻斯特工人, 宪章派; 1842 年

是埃士顿和斯泰里布雷芝 (在郎卡郡南部) 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第 281 页。

皮特基思利, 劳伦斯 (Pitkethley, Lawrence)——英国旅行家; 四十年代初访问和描写了震教徒的共产主义移民区 (纽约州)。——第 225 页。

皮特曼, 海尔曼 (Pütman, Hermann 1811—1894)——德国激进派诗人和新闻工作者,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298、299 页。

品得 (Pindar 约公元前 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 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第 262 页。

珀蒂冈 (Petitgand)——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军官。——第 206 页。

珀歇, 雅克 (Peuchet, Jacques 1758—1830)——法国作家和经济学家, 正统主义者, 复辟时期是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第 300、303、304、312、313、315、316 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48 年为制宪会议议员。——第 56、100、117、139、143、144、272、357、426、450 页。

## Q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友好关系。——第 399、406、458、

459页。

## R

若特兰,律西安·列奥波特(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四十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第461、469页。

## S

萨尔蒙(Salmon)——曼彻斯特建筑工人。——第283—285页。

萨伊,路易·奥古斯特(Say, Louis-Auguste 1774—1840)——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萨伊的弟弟。——第245、268页。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代表。——第3、6、7、62、66、74、75、77、78、105、113、136、146—149、243—245、248页。

塞拉,安东尼奥(Serra, Antonio 十七世纪最初二十五年)——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早期代表之一。——第244页。

桑切斯,托马斯(Sanchez, Thomas 1550—1610)——十六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耶稣会教徒、神学家,婚约的制定者。——第339页。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51—153页。

沙贝利茨,雅科布(Schabelitz, Jakob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资产阶级激进派,“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1845—1848年住在伦敦,在那里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99

页。

沙多勃利昂子爵,弗朗斯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第389页。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左的”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380、399、423、437、443、456、457、461、466页。

沙普斯(Sharps)——波林和亨弗莱建筑公司的股东。——第288、289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E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246、264页。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为自由贸易派。——第110、137、259页。

舍夫茨利伯爵,安东尼(Shaftesbury, Anthony, Earl of 1671—1713)——英国哲学家,道德论者,自然神论的著名代表,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393页。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110、117、272、319、

- 384 页。
-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 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369—372 页。
- 施米特,西蒙(Schmidt,Simon)——德国制革工人,正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之一,魏特林的拥护者。——第 299 页。
- 施泰因,罗仑兹(Stein,Lorenz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第 318、319 页。
- 施泰因曼,弗里德里希·阿尔诺德(Steinmann, Friedrich Arnold 1801—1875)——德国政论家,文学家,《十九世纪的漫画和剪影》一书的作者。——第 196 页。
- 施坦道,尤利乌斯(Standau,Julius)——德国教师,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在瑞士的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领导者之一。——第 294 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有名的青年黑格尔派。——第 156、196 页。
- 舒耳茨,威廉(Schulz,Wilhelm 1797—1860)——德国政论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第 57、70、74 页。
- 斯卡尔贝克,弗雷德里克(Skarbek, Fryderyk 1792—1866)——波兰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亚·斯密的信徒。——第 40、146、148、149 页。
- 斯克尔顿,约翰(Skelton,John)——四十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 406 页。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3、25、49、53、62—69、72—82、105、106、112—114、145、146—148、241—243、246、248、253、264、268—271 页。
- 斯皮特霍恩,沙尔·路易(Spilthoorn, Charles Louis 1804—1872)——比利时律师,民主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30 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员。——第 470 页。
- 斯塔尔男爵夫人,安娜·路易莎·热尔门(Stalé, Anne Louise Germaine, baronne de 1766—1817)——著名的法国女作家。——第 304 页。
- 斯图亚特,杜格尔德(Steward,Dugald 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派: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的代表人物。——第 243 页。
- 斯托尔伍德(Stallwood)——四十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伦敦宪章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458 页。
- 司各脱(Scott)——曼彻斯特建筑工人。——第 285 页。
- 索麦维尔,亚历山大(Somerville Alexander 1811—1885)——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第 232、234 页。

## T

特德斯可,维克多(Tedesco,Victor 1821—1897)——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1847—1848 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

近。——第 464 页。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首相(1836、1840),1848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1849—1851 年是立法会议议员,奥尔良派,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400 页。

## W

瓦劳,卡尔(Wallau, Karl 1823—1877)——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后来是美因兹市长。——第 470、481 页。

万桑(Vincent)——四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1845 年巴黎木工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第 293 页。

威尔逊,伊萨克(Wilson, Isaac)——四十年代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第 466 页。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维尔腾堡国王(1816—1864)。——第 265 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 年 12 月—1835 年)。——第 409 页。

威斯特,约翰(West, John)——麦克尔士菲尔德宪章派的领导人之一。——第 406 页。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自由派政论家;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属于中间派右

翼。——第 196 页。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第 292、293 页。

维尔加尔德尔,弗朗斯瓦(Villegardell, François 1810—1856)——法国政论家,傅立叶主义者,后来是空想共产主义者。——第 120 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 Georg 1822—1856)——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461、469 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 70—19)——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324、338 页。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第 46、298、319、320、384、425、445、448、451 页。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鲁普斯 Lupus)——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三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46—1847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80、423、433、437、470 页。

## X

西尼亚尔,尼古拉·弗雷德里克(Signard, Nicolas-Frédéric 1803—1889)——法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医生;1848—1849 年是制宪议会的议

员。——第 391 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第 72、108、246—249 页。  
 希尔迪奇,理查(Hilditch, Richard)——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64 页。  
 希兹比(Hizby)——匹兹堡(俄亥俄州)铁厂厂主。——第 231 页。  
 悉尼,艾尔杰楠(Sydney Algernon 1622—1683)——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复辟时期辉格党反对派领袖之一,君主立宪制度的拥护者。——第 393 页。  
 席尔——见沙佩尔,卡尔。  
 辛利克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Hinrichs, 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4—1861)——德国哲学教授,右翼黑格尔分子。——第 365

页。

##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代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 130 页。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第 465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 465 页。  
 伊丽莎白(Elisabeth 1801—1873)——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普鲁士王后。——第 182、183、293 页。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派。——第 262 页。  
 约翰逊(Johnson)——曼彻斯特建筑工人。——第 287 页。

##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 A

阿巴公——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公。——第 336 页。

### B

保罗——据圣经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之前叫扫罗。——第 475 页。

### D

黛安娜——古代罗马人的月神,相当于希

腊女神阿尔蒂米斯。——第 152 页。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第 280 页。  
 多朗特——让·巴·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人物之一。——第 341 页。

### G

盖罗尔斯坦公爵鲁道夫——欧·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第 365

页。

## J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19、157 页。

吉约姆——古代法国喜剧《律师巴特兰》中的人物。——第 353 页。

## K

克伦纳士——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坦神,宙斯的父亲;后来是时间神。——第 58 页。

## M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第 366 页。

弥赛亚——在一些宗教教义中(首先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其使命是消除罪恶并在人间建立天国(希腊文译为基督)。——第 390 页。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151 页。

米诺托——古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的怪物,人们以男女少年祭他。——第 331 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和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第 240 页。

## P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狄坦神之一,他从神那里盗走了火,带给人们;宙斯令赫斐斯塔司把他锁缚在悬崖上,让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第 133

页。

## R

若克里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法国喜剧中流传的人物,愚蠢和幼稚的人的化身。——第 338 页。

## S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第 353 页。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特别在东方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第 281、283 页。

##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 109 页。

## X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第 22 页。

夏娃——圣经传说中的第一个女人。——第 395 页。

## Y

亚当——圣经传说中的第一个人。——第 395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 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 293 页。



##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

—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c du 9 Janvier 1848 [Bruxelles, 1848]. — 第478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52—467页)。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载于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期和第2期(双刊号)。——第45页。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 Frankfurt am Main, 1845. —

第364—367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 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 第450页。

####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本卷第373—380页)。

—Entwurf des kommunistischen Glaubensbekenntnisses.

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汉堡版。——第430、434、435、438、439、442、444、447、449、454、455页。

《普鲁士新闻。——西里西亚骚乱》(本卷第209—210页)。

—Prussia.

载于1844年6月29日《北极星报》第346号。——第211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

-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 第 277、278 页。
- 《在瑞士的“青年德意志”。密谋反对教会和国家》(本卷第 294—297 页)。
- “Young Germany” in Switzerland. Conspiracy against church and state. 载于 1845 年 9 月 27 日《北极星报》第 411 号。——第 298 页。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596—625 页)。
- 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载于 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 1 期和第 2 期(双刊号)。——第 3、4、46、112 页。
- 《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627—630 页)。
- The late butchery at Leipsic. — The German working men's movement. 载于 1845 年 9 月 13 日《北极星报》第 409 号。——第 297 页。

## 其他作者的著作\*

### B

- 鲍威尔,埃·《批评派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1843 年沙洛顿堡版(Bauer, E. 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 Charlottenburg, 1843)。——第 218 页。
- 鲍威尔,布·《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1842 年布朗施威克版第 3 卷(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ände 1—2. Leipzig, 1841; Band 3. Braunschweig, 1842)。——第 156 页。
- \* 鲍威尔,布·《基督教真相》1843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Bauer, B. 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 156 页。
- 鲍威尔,布·《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Bauer, B.]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载于《维干德季刊》1845 年莱比锡版第 3 卷。——第 364—367 页。
- 鲍威尔,布·《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1842 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Bauer, B.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2)。——第 156 页。

\* 凡是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 [ ]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Pecqueur, C. Théorie nouvelle d'économie sociale et politique, ou E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Paris, 1842)。——第59、71—72页。

毕莱,欧·《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Buret, E.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Tome I. Paris, 1840)。——第59—60、72页。

\*勃朗,路·《法国革命史》1847年巴黎版第1—2卷。(Blanc, 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omes I—II. Paris, 1847)。——第474页。

伯蒂《前科尔贝收税官伯蒂先生驳有关他的离婚案的流言蜚语》1847年巴黎版(Petit. Réponse de M. Petit, ex-receveur des finances à Corbeil, aux calomnies répandues à l'occasion de son procès en séparation. Paris, 1847)。——第401—402页。

\*布雷,约·弗·《劳动方面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理时代》1839年里子版(Bray, J. F.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 Leeds, 1839)。——第265页。

## D

\*道梅尔,格·弗·《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第1—2卷(Daumer, G. F. 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 Bände 1—2. Hamburg, 1847)。——第475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第4册和第5册。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de Tracy, A. L. C. Elémens d'idéologie. IV-e et V-e parties.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第25、146页。

## F

\*费尔巴哈,路·《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Feuerbach, L.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载于《现代德国哲学和政论论文集》。由阿尔诺德·卢格编辑,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In 《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Hg. v. Arnold Ruge.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46、157页。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第159、360页。

费尔巴哈,路·《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 的补充》1844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Glaubens im Sinne Luthers. Ein Beitrag zum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4)。——第362页。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Feuerbach, L.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und Winterthur,

- 1843)。——第 46、128、157、360—363 页。
-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 F. L. A.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第 243、268—271 页。
- 芬奇,约翰《美国旅游札记》(Finch, J. Notes of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载于《新道德世界》1844年1月13日—6月22日第29—52期(第5卷);6月29日—10月19日第1—17期(第6卷)。——第223、224、226—230 页。
- 福尔塞尔,卡·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1847年斯德哥尔摩版(Forsell, C. D. Kommunismen och kristendomen. Stockholm, 1847)。——第444页。
-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3卷(Fourier, Ch.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Vol. III.)载于《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4卷。——第323页。
-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载于《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320、321、331、333、340、341、344、345、355页。
- 傅立叶,沙·《论三种外在统一》(Fourier, Ch. Section bauchée 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载于184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郎吉》杂志第1卷。——第319、320、321—332、333—341、342—345、346—356页。

## G

- [格律恩,卡·]《国王对普鲁士议会的决定。论时局问题》1846年比尔文肯版([Grün, K.] Die preussischen Landtags-Abschiede. Ein Wort zur Zeit. Birwinken, 1846)。——第426页。
- 古罗夫斯基,亚·《俄国的和波兰各省起义的实情》1834年巴黎版(Gurowski, A. L'avéité sur la Russie et sur la révolte des provinces Polonaises. Paris, 1834)。——第198页。

## H

- [海因岑,卡尔]《德国的饥饿和德国的君主们》1847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Der deutsche Hunger und die deutschen Fürsten [Bern, 1847])。——第451页。
- 海因岑,卡尔《为专制国家官兵制定的近代战争条例三十条》1846年纽施塔特版(Heinzen, K. Drei ig Kriegsartikel der neuen Zeit für Officiere und Gemeine in despotischen Staaten. Neustadt, [1846])。——第451页。
- [赫斯,莫·]([He M.])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唯一和完全的自由》(Die Eine und ganze Freiheit)  
—《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That),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In: 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 Zürich und Winterthur,

1843)。——第 46、124 页。

\* 黑格尔, 乔·威·弗·《精神现象学》(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载于《黑格尔全集》1832 年柏林版第 2 卷。——第 46、156、159、161、162—166、169—172 页。

\*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载于《黑格尔全集》第 3—5 卷, 1833—1834 年柏林版。——第 46、156、178、179 页。

\*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1830 年海德堡第 3 版 (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n Grundrisse. Dritte Ausgabe. Heidelberg, 1830)。——第 160、177、179、180—181 页。

## J

居利希, 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1845 年耶拿版第 1—5 卷 (G ülich, 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ände I-V Jena, 1830)。——第 382、383 页。

## K

凯泽尔, 亨·威·《财产的个性, 兼论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 年不来梅版 (Kaiser, H. W. Die Persönlichkeit des Eigentums in Bezug auf den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in heutigen Frank-reich. Bremen, 1843)。——第 357 页。

## L

劳顿, 查理《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 以书信形式向医生提出》1842 年巴黎版 (Loudon, Ch. Solution du problème de la population et de la subsistance, soumise à un médecin dans une série de lettres. Paris, 1842)。——第 59 页。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弗·索·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 附有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1835 年巴黎第 2 版第 1—2 卷 (Ricardo, D.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 - S. Constancio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 B. Say. Tomes I-II. 2<sup>e</sup> édition, Paris, 1835)。——第 72、246、264 页。

\* 李斯特, 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 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 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 (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die Handelspolitik und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Stuttgart und Tübingen, 1841)。——第 239、243—247、252—254、260、262、264 页。

## M

莫尔莱《新商业词典的说明》1769 年巴黎版 (Morellet. Prospectus d'un nouveau dictionnaire du commerce. Paris, 1769)。——第 303 页。

默泽尔, 尤·《爱国主义的幻想》第四次修

订本。1820年柏林版第1—4卷(Möser, J. Patriotische Phantasien. Vierte verbesserte Auflage. Bände I-IV. Berlin, 1820)。——第108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德·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Mill, J. 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Traduits de l'anglais par J. T. Parisot. Paris, 1823)。——第5—17、30—33、38—42、137—138、139、146—147页。

## P

佩基奥,朱·《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或意大利经济学家的简评。附导言》L加卢瓦译自意大利文,1830年巴黎版(Pechio, G.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Italie, ou Abrégé critique des économistes italiens;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Traduite de l'italien par L. Gallois. Paris, 1830)。——第244页。

皮特基思利,劳·《流亡。何处着手和如何着手。震教徒移民区记述》(Pitkethly, L. Emigration. Where to, and how to proceed. Description of the Shaker Villages),载于1843年5月6日《北极星报》第286号。——第225页。

珀歌,雅·《法国统计学原理》1805年巴黎版(Peuchet, J. Statistique élémentaire de la France. Paris, 1805)。——第303页。

珀歌,雅·《摘自巴黎警察局档案的回忆录》1838年巴黎版第1—4卷(Peuchet, J. Mémoires tirés des Archives de la police de Paris.

Tomes I-IV. Paris, 1838)。——第300、303、304—315页。

蒲鲁东,比·约·《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由卡尔·格律恩译成德文,1847年达姆斯塔德版第1—2卷(Proudhon, P. J. Philosophie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 Deutsch bearbeitet von Karl Grün. Bände I-II. Darmstadt, 1847)。——第426页。

## R

《让·巴·萨伊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文章和书信》,由他的女婿沙尔·孔德在他死后出版,1833年巴黎版(Cours complet d'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 Volume complémentaire Mandages et correspondance d'économie politique; ouvrage posthume de J. B. Say, publié par Ch. Comte, son gendre, Paris, 1833)。——第245页。

## S

萨伊,路·奥·《论国民财富并驳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谬误》1836年巴黎版(Say, L. A. Etudes sur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et réfutation des principales erreurs en 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36)。——第246页。

\*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7年巴黎第3版第1—2卷(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Troisième édition.

- Tomes I-II .Paris , 1817)。——第 62、66、75、77、146 页。
- 塞拉,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Serra, A .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d 'oro e d 'argento dove non sonominiere (1613)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antica》. Tomo I . Milano , 1803)。——第244页。
- 《商业地理大辞典》雅·珀歇编,1799—1800年巴黎版第1—5卷(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géographie commerciale par J .Peuchet . Tomes 1—5 .Paris , 1799—1800)。——第303页。
- \* 圣西门·《实业家问答》(Saint-Simon . Cat échisme des industriels)1824年巴黎版。——第117页。
-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由奥托·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 Leipzig , Verlag von Otto Wigand , 1845)。——第372页。
- 施泰因,罗·冯·《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代史随笔》1842年莱比锡版(Stein ,L .vo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 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 . Leipzig , 1842)。——第318、357页。
- [施泰因曼,弗·阿·]《十九世纪的漫画和剪影》由靡菲斯特菲勒司的作者画,1843年科斯费耳特版([Steinmann , F A .]Caricaturen und Silhouett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 Vom Verfasser des Mefistofeles . Coesfeld , 1843)。——第196页。
- \*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Strau ,D . F Das Leben Jesu .B ànde 1—2 T übingen , 1835—1836)。——第196页。
- 舒耳茨,威·《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Schulz ,W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 Zürich und Winterthur , 1843)。——第56—59、70—71、73—74页。
- 斯卡尔贝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并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Skarbek ,F .Th éories des richesses sociales .Suivie d 'une bibliographie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 .Seconde édition .Tome I . Paris , 1839)。——第146页。
- \*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2卷(Smith ,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 Traduction nouvelle ,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 ;par Germain Garnier . Tomes I—II . Paris , 1802)。——第25、49、51、53、62—69、72—82、145—146页。
- [索麦维尔,亚·]《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农业区札记(十七)》([Someville ,A .](One who has whis-

ted at the Plough) Notes from the Farming Districts<sup>Nº XVII</sup>), 载于 1842 年 12 月 13 日《纪事晨报》。——第 233—234 页。

## W

\* 魏特林, 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 年斐维版(Weitling, W.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第 425 页。

魏特林, 威·《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5 年伯尔尼版(Weitling, W. Das Evangelium eines armen Sünders. Bern, 1845)。——第 451 页。

## X

西斯蒙第, 让·沙·列·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 年布鲁塞尔版第 2 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II. Bruxelles, 1838)。——第 248 页。

\* 西斯蒙第, 让·沙·列·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 年巴黎版第 2 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ome II. Paris, 1819)。——第 72 页。

\* 西斯蒙第, 让·沙·列·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 年巴黎版第 2 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Seconde édition. Tome II. Paris, 1827)。——第 247—248 页。

## Y

尤尔, 安·《工厂哲学, 或工业经济学》, 在作者的参与下译出, 1836 年巴黎版第 1 卷(Ure, A.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Traduit sous les yeux de l'auteur. Tome I. Paris, 1836)。——第 262 页。

## 文 件

## D

《代表大会告汉堡同盟书, 1847 年 6 月 9 日》, 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 年 6 月至 9 月)》1969 年汉堡版(Der Kongress an den Bund im Hamburg, den 9ten Juni 1847. In: Gründungsdokumen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Juni bis September 1847) Hamburg, 1969)。——第 438—

446 页。

## G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1847 年 6 月 9 日》, 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 年 6 月至 9 月)》1969 年汉堡版(Statut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den 9ten Juni 1847. In: Gründungsdokumen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Juni bis September



1847).Hamburg,1969)。——第424、429—432、438、442—445、449、452—454页。

## K

《克拉科夫宣言》(Cracow manifesto)1846年2月22日。——第458、459页。

## L

《离婚法草案,由法律修订部于1842年7月提出》(Entwurf einer Verordnung über Ehescheidung,vorgelegt von dem Ministerium für Revision der Gesetze,im Jule 1842),载于1842年10月20日《莱茵报》第293号附页。——第209页。

## M

《“民主派兄弟协会”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The Fraternal Democrats (Assembling in London),to the Work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January 3,1848),载于1848年1月8日《北极星报》第533号。——第397—399页。

## W

《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1834年6月12日),载于《德意志民族法律状况重要文献》1844年曼海姆版(Das Schluprotokoll der Wiener Conferenz vom 12 Juni 1834 In Wichtige Urkunden für den Rechtszustand der deutschen Nation Mannheim,1844)。同时,载于1844年1月24日《前进报》第7号附刊。——第189页。

## Z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6

年11月》,载于《1848年民主袖珍手册》1847年莱比锡版(Ansprache der Volkshalle des Bundes der Gerechten an den Bund,November 1846.In《Demokratisches Taschenbuch für 1848》Leipzig,1847)。——第444页。  
《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告同盟书,1847年2月》,载于《1848年民主袖珍手册》1847年莱比锡版(Ansprache der Volkshalle des Bundes,der Gerechten an den Bund,Februar 1847.In《Demokratisches Taschenbuch für 1848》Leipzig,1847)。——第437、444页。

《中央委员会告汉堡同盟书,1847年6月24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汉堡版(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in Hamburg,den 24ten Juni 1847.In Gründungsdocumen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Juni bis September 1847).Hamburg,1969)。——第441、442页。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47年9月14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汉堡版(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den 14ten Sept.1847.In Gründungsdocument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Juni bis September 1847).Hamburg,1969)。——第444页。

##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 B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 伦敦出版

—1844年10月19日第362号。《曼彻斯特和索尔福的木工大会》(Great Meeting of the Carpenters of Manchester and Salford)。——第279、280页。

—1844年10月26日第363号。《曼彻斯特。——波林公司的木工和细木工的罢工》(Manchester —The Strike of Messrs: Pauling and Co's Carpenters and Joiners)。——第279、280页。

—1844年11月9日第365号。《亨弗莱反萨尔蒙。——攻击》(Henfrey v. Salmon —Assault)。——第283、285页。

《木工和细木工的罢工》(The Carpenters and Joiners' Strike)。——第287—288页。

—1844年11月16日第366号。《工人的又一个胜利。——曼彻斯特的木工和细木工》(Another of Labour's Victories —The Carpenters and Joiners of Manchester)。——第284—288页。

—1844年11月23日第367号。《曼彻斯特。——建筑业同盟的联合大会》(Manchester —Great Aggregate Meeting of the Building Tra-

des)。——第288—289页。

—1844年11月30日第368号。《罢工的扩大。——工人的又一个胜利》(Extension of the Strike .Another Victory for Labour)。——第289—291页。

—1845年1月18日第375号。《曼彻斯特建筑业同盟的联合大会》(Aggregate Meeting of the Manchester Building Trades)。——第290页。

—1848年1月15日第534号。《人民宪章。——重要的公众大会》(The People's Charter —Important public meeting)。——第406—409页。

### D

《德意志季刊》(《Deutsche Vierteljahrschrift》), 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 1838年第3期。《伯明翰和乌尔未汉普顿之间的矿区; 特别论及铁的开采》(Der bergmännische Distrikt zwischen Birmingham und Wolverhampton; mit besonderer Bezugnahme auf die Gewinnung des Eisens)。——第73页。

### G

《改革报》(《La Réforme》), 巴黎出版

—1847年11月10日《利尔宴会》(Banquet de Lille)。——第387—

- 390页。  
—1847年11月24、25日《第戎宴会》(Banquet de Dijon)。——第391—396页。  
—1848年1月2、3日《阿卜杜尔·卡迪尔投降》(Soumission d'Abd-el-Kader)。——第401页。  
—1848年1月5日[《关于阿卜杜尔·卡迪尔投降条件》]。——第403页。  
—1848年1月6日《巴黎,1月5日[关于伯蒂先生的小册子]》。——第401页。  
—1848年1月7日[《摘自1846年6月13日下议院会议的速记报告》]。——第402页。

## M

- 《每季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 伦敦出版,1842年12月第141期。  
《反谷物法运动》(Anti-Corn-Law Agitation)。——第280—282页。  
《每日辩护者和通告者》(《Daily Advocate

and Advertiser》),匹兹堡出版,1843年7月17日。[《对俄亥俄州佐阿的分离派移民区的描述》]。——第229页。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1844年6月1日或8日。[《巴黎共和党的示威游行》]。——第204—205页。

## N

《纽沙特立宪主义者》(《Constitutionnel Neuchatelois》),1845年9月11日第109号。[《纽沙特立宪通讯》]。——第294—296页。

## W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5年5月。《对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一书的评论》。——第364—367页。

## 文学著作

## A

- 阿拉戈,埃·《贵族》。——第391页。  
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第133页。

## F

- 伏尔泰,法·《扎伊拉》。——第325页。

## G

- 歌德·约·沃·《浮士德》。——第151页。

## L

《律师巴特兰》。——第353页。

## S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151—152页。

##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3卷。——第324、338页。

## 期 刊 索 引

### A

《奥地利观察家报》(《Österreichischer Beobachter》)——奥地利的一家日报;1810—1848年以此名称在维也纳出版;奥地利政府的非官方的机关报。——第466页。

### B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参加编辑部的还有乔·哈尼。1843年至1850年该报登载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190、193—195、197、199、201—203、206、208、210、213、288、293、297、299、390、396、397、405、458、466页。

###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第45、46页。

《德国公民手册》(《Deutsches Bürger-

buch》)——海·皮特曼于1844年12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的1845年年鉴和1846年夏天在曼海姆出版的1846年年鉴。年鉴中刊载有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第219、236、359页。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400、466、470、477、480、481页。

《德意志季刊》(《Deutsche Vierteljahrschrift》)——1838年至1870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73页。

《地球报》(《Le Globe》)——日报,1824—1832年在巴黎出版;从1831年1月18日起成为圣西门派的机关报。——第272页。

### F

《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179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卡·德穆兰。——第108页。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法国保皇派的日报,1631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第303页。

《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

——法国保皇派的杂志,1672年至1820年在巴黎出版。——第303页。

《法朗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傅立叶派的刊物,1832年至1849年在巴黎出版;曾屡次改变刊物的名称、出版期数、篇幅和开本。——第320、355页。

《芬尼杂志》(《Das Pfennig-

Magazin)——德国的一家科学普及周刊;1833年至185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29页。

##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

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91、396、399、400、403、404、409、466、470页。

《共产主义杂志》(《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只在1847年9月初出了试刊。——第433、434、438、443、446、447、449、454—456页。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396、403、404页。

## H

《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

fique)——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维·孔西得朗。——第218页。

##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

——英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70年至1862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232—233页。

## L

《莱茵社会改革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德国的一家杂志,由海·皮特曼出版,共出版过两卷,第一卷于1845年8月在达姆斯塔德出版,第二卷于1846年底在德国和瑞士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别列坞出版。——第298、299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

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第469页。

《黎明报》(《Le Point du jour》)——法国

的一家日报,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倍尔特朗·巴莱尔在1789年6月19日至1791年出版;它阐明国民议会的辩论。——第371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

nel)——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403页。

## M

《漫游者》(《Der Wanderer》)——共产主义者同盟伯尔尼支部打算出版的刊物。——第 451 页。

《每日辩护者和通告者》(《Daily Advocate and Advertiser》)——美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32—1843 年以此名称在匹兹堡(美国)出版。——第 229 页。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 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 204 页。

## N

《纽沙特尔立宪主义者》(《Constitutionnel neuchâtelais》)——瑞士君主立宪派的报纸,1831 年至 1848 年 2 月在纽沙特尔出版。——第 294 页。

## P

《普罗凡斯信使报》(《Le Courier de Provence》)——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 年至 1791 年在巴黎出版。——第 245 页。

## Q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民主派的报纸,184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182、185、218 页。

## R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 年 1 月 5 日至 12 月 31 日

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第 429 页。

《人民主宰报》(《Peuple souverain》)——法国民主派的月刊;四十年代在马赛出版。——第 469 页。

## S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报》(《Le Débat Social, organe de la démocratie》)——比利时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 年至 1849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 218 页。

《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前社会关系的刊物》(《Gesellschafts-spiegel. Organ zur Vertretung der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und zur Beleucht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Zustände der Gegenwar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1845—1846 年在爱北斐特出版;主编是莫·赫斯,共出版了十二期。——第 301、317、367、413—417 页。

《生产者》(《Le Producteur》)——法国的一家刊物,1825—1826 年在巴黎出版;是圣西门学派的第一个刊物。——第 272 页。

##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5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205、466 页。

《太阳报》(《The Su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 年至 1876 年在伦敦出版。——第 403 页。

## W

《晚报》(《Aftonbladet》)——瑞典的一家

- 日报,1830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十九世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144页。
-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月刊;由奥·吕宁负责编辑出版,1845年1月至1846年12月在比雷菲尔德出版,1847年1月至1848年3月在帕德波恩出版。——第291、364—367页。
- 《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chrift》)——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奥·维干德于1844—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布·鲍威尔、麦·施蒂纳、路·费尔巴哈。——第364—367页。
- X
- 《现代社会生活报》(《Blätter der Gegenwart für soziales Leben》)——德国的一家月刊,威·马尔于1844—1845年在瑞士(洛桑)出版;是秘密社团“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第294、296页。
- 《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罗·欧文创刊于1834年,出版到1846年止;开始在里子出版,从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5月弗·恩格斯为该报撰稿。——第217、218页。
- 《新闻报》(《La Presse》)——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成了反波拿巴的报纸。——第403页。
- Z
- 《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Décade philosophique,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法国共和派的报纸,1794年至1807年在巴黎出版,每月出版三次,主编是让·巴·萨伊。——第245页。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政变以后成了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205、466页。